

天安门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史景迁 著

JONATHAN D. SPENCE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美)史景迁著;尹庆军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9

ISBN 7-80109-263-5

I.天…

II.①史… ②尹…

III.:知识分子—作用—研究—中国

IV.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901 号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尹庆军等译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7,61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市印刷一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76 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定 价:19.60 元

编者的话

本书初版于1981年,英文原名为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 - 1980(《天安门: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年》)。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乔纳森·D. 斯潘思(Jonathan D. Spence)。

斯潘思1936年生于英国苏尔里,早年就读于英国温切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1965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现除担任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外,还同时兼任该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和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斯潘思很早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他十分景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此他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

史先生熟悉中国历史,尤其精通中国近现代史。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十余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他的这些著作多次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获奖,不仅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在英语国家的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史先生知识广博,学问精深,但没有一点儿学究气。他写这

3/2/30

些著作不是摆出一副学者的面孔，引经据典，繁琐考证，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他掌握的丰富的史料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地娓娓道出。他讲述的历史条理清晰，事实准确，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读史先生的书就好像是在寒冷的冬夜在暖暖的壁炉旁听一位老人在讲故事，读者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在那些陈年往事之中。难怪英语国家的读书界亲切地将史先生称为“故事大王”。

本书出版后即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注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将其誉为“西方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星期六评论》对此书评论道：史先生的这本书“绝对是第一流的，从形式上说，是大胆的，从内容上说，是严谨的，从展现复杂的人类舞台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富有激情的”。作者“用巧妙的，极为新颖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历史，通过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参加者——影响本世纪的那些动荡事件和受其影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反叛者——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他“将文学资料和较为常见的政治和社会原始资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研究中国和中国人民，深刻洞察了难以改变的国家政权与中国的文学家、作家和思想家的进取精神之间的不断冲突。这项工作是无二一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图书馆杂志》也评论说，本书包含着“小说家对生活的嗅觉和历史学家把握事实的功底……在资料收集之丰富，写作手法之生动和富有人情味方面，还没有其他书可以与其相比”。

本书主要是讲述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改良和革命中的作用，根据这些知识分子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主要是小说、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描述和分析

他们的心路历程,涉及的人物多为人们所熟悉,比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沈从文、秋瑾、陈独秀、梁漱溟、徐志摩、王实味、瞿秋白、闻一多、丁玲、胡也频、老舍等。其中的三个主线人物是康有为、鲁迅和丁玲。作者从1898年戊戌变法一直讲到本世纪80年代,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一直讲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应该说,作者讲述中国革命的角度是独特的。他有意将中国革命舞台上的主角(如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及蒋介石)的政治活动只当作本书的历史背景,而突出并不处在舞台中心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富强的中国的不懈追求,描述他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和内心冲突。作者的写法基本上是白描式的,但在娓娓的叙述中也不乏一些个人的独到见解。从全书来看,作者的立场是比较客观的,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从作者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立场:“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我希望,他们所做的,也是我没有提到的,但却有着相同才智和经历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这也许有助于清除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

当然,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一位美国的历史学家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与我们不可能没有差异。相信读者在阅读时是会注意到这一点的。

本书的翻译参考了台湾出版的中译本,但基本上是重译的。

对于书中的引文,译者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了核对,对极个别未查到出处的引文则模仿当时的语言习惯一一译出。史先生是史学大家,其文笔又是一流的。译者和编者能力有限,虽尽心尽力,却难以在译文中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文采和神韵,且译文出自多名译者之手,难免有些疏漏,望读者见谅。另外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个别不适宜的段落做了一些必要的删除和技术处理;原书附有 62 幅插图,考虑到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故删去,在此特向读者说明。

编 者

1998 年 8 月

谨以本书和我的爱

献给我的母亲

一个人对于一个这样服从真理而又喜好寻求真理的民族还能要求什么呢？对于这样一个顺从而丰饶的国家，除了由明智而忠诚的人来促成一个贤明的人民和拥有先知、圣者和高贵人物的民族，又能要求什么呢？我们认为离收获的时间还有五个月，其实连五个星期也用不着了；因为只要我们睁开眼睛就会发现战场上的战斗已经接近白热化。

——约翰·密尔顿《论出版自由》

致 谢

我特别感谢一直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两个人：莫尼卡·俞，她帮我克服语言障碍并寻找文献资料；安东尼·玛尔，一位最热心、最胜任的图书馆馆长。我还向莫勒·戈德曼、迈克尔·里兹和詹姆斯·科尔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在读到本书初稿时提出了一些敏锐的并且是有用的批评意见，还要由衷地感谢帕克尔·黄波飞（音译），他帮助我核对了许多本书引用的诗词。

除了我在耶鲁大学的朋友和同事以外，还有许多学者慷慨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时间、文字材料或专业书目。我要感谢简·詹姆斯、罗伯特·黑格尔和勃涅·麦克唐戈尔；乔伊·勃纳尔、安妮塔·常、乔纳森·安格尔和约翰·伯恩斯；戴维·古德曼；南希·里温伯格和约翰·布里安·斯达尔；程培凯（音译）、斯蒂芬·海伊和舍尔曼·科契兰。我还要感谢从本书一开始写作就提供资助的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沃德人文科学基金会，感谢雷奥·李和英格伯格·沃尔德，前者将其保存的徐志摩书信手稿借给了我，后者则在康奈尔大学斯特雷特家族档案中找到关于徐志摩的资料并向我提供了复印件。我首先是在康奈尔大学和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的公开讲演中讲到了跟本书主题有关的各种想法的；我要

感谢那些提出一些容易引起争论而且常常是令人感到鼓舞的问题的听众。沈从文在访美期间很宽厚地让我占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翻译汉斯·弗兰克兰的帮助下，确认了他在1949年以前生活的许多细节。

我也感谢帮我打印出那些难以辨认的手稿的那些人。他们是玛丽·加里森、费洛伦斯·托马斯、劳拉·波切尔、玛丽·惠特尼；并特别感谢卡特琳·冯-德·瓦特，除了打字以外，她还帮我整理出了索引初稿。

任何一本试图全面审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主题的著作都不可避免要大量参考其他学者的著作。同样感谢允许我复制其出版物的所有出版商。我感到我从写这些书和论文的学者以及本书所叙述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物那里获益匪浅，特别是萧公权、罗军庞（音译）和爱娃·阿蒙罗特-马关于康有为的著作；维廉·里尔和杨宪益、戴乃迭关于鲁迅的著作和译作；夏西安（音译）、鲍尔·皮克维兹、李玉宁（音译）和马里安·加利克关于瞿秋白的研究；雷奥·李、西里尔·博奇和盖洛德·龙关于徐志摩的著作；徐凯宇（音译）关于闻一多的研究；聂华苓和杰弗雷·金克利关于沈从文的著作；普鲁登斯·周、兰博尔·沃瓦和保尔·贝蒂关于老舍的著作；张君勱、加利·勃约格和艺-子·福尔维克关于丁玲的研究。我从其他作者——常常是青年学者——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他们目前正在美国构筑现代中国研究这一特别具有活力、特别令人激动的学科。

最后，感谢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斯夫顿，她对我的支持从未间断过，并时常提出一些问题。

史景迁

1981年3月于耶鲁大学

英文版前言

天安门守卫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垮台以前,皇帝的神圣权威一向是通过这道大门播扬的。深居皇宫的帝王朝南端坐,威仪越过重重庭院和护殿小河,再穿过天安门而颁行四海,达于万民。可是,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里,天安门的防卫功能和象征功能都不复存在。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成为矛盾重重的近代中国的见证人。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庭,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醉金迷,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面前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共产党1949年取得胜利以后,紫禁城被辟为博物院。天安门前拥挤的小胡同被夷平了,建起一个巨大而壮观的广场。在广场的正中央,耸立着质朴无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两旁是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建筑,肃穆而呆板,没有任何修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安门成为一个检阅台,成百万计的红卫兵云集于前。门楼上迄今仍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彩色画像。

这本书所涉及的人，只是众多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少数。我希望通过对他们生活的描述，让读者了解一些重大事件的不平常的后果。这些事件通常是被松散地集合在一起，统称为“中国革命”。书中叙及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各自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表现时下颇为流行的“集体传记”的风格。或者说，我欲揭示的是，他们每一个人在不得不作出日常决定时所面临的困难，他们身处其间的混乱环境，他们本想置身世外却免不了的外来干扰，以及他们偶尔做了出格决定后外界如何反应等等。

书中的主要人物，都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中国政治领袖。尽管有时候也提到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但我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并不处于革命过程的最中心，但他们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痛苦，而他们的个人经历也有助于了解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本书的叙述主线是三个人物：第一位是学者康有为，受传统儒学教育，19世纪末激进改革派的代言人，政治活动失败后流亡海外，潜心于自己的乌托邦大同思想的研究；第二位是鲁迅，早年赴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成为20年代痛苦失意的大学生和农民的杰出代言人；第三位是丁玲，清王朝灭亡后受过教育的新女性，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对自己的创造天赋同国共两党相继制定的艺术标准之间的巨大不和谐有着深切的感受。

康有为、鲁迅与丁玲的生活年代，跨越了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期。康有为生于1858年，死于1927年，其时共产党正与国民党为争夺农民暴动和城市罢工的领导权而展开第一轮大较量。鲁迅生于1881年，死于1936年，其时共产党遭到国民党重创，经过长征之后在荒凉的中国西北部幸存下来，而日本则已做

好了侵华准备。丁玲生于1905年,30年代遭软禁,40年代和60年代被送去劳动改造,70年代被投入监狱,1979年被邓小平副总理平反后重返领导岗位。我把这三位的生平作为编年体历史的主线,间或穿插其他有关人物。这些人物相对于本书的叙述主线只是配角,但丝毫不表明他们的重要性不如前者,如早期女革命家秋瑾,有过军旅生涯的沈从文,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受西方教育的诗人徐志摩、闻一多,讽刺小说家老舍等。

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我希望,他们所做的,也是我没有提到的,但却有着相同才智和经历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这也许有助于清除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

这些中国人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构成了本书的核心。他们全都是某种形式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直接代表工人和农民,但绝对不是单纯的旁观者。当然,在他们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他们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恐惧而又着迷地注视着舞台中央结局已定的人与神的搏斗。然而,尽管这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声音有时似乎太尖锐太刺耳,他们的姿态有时似乎太过于形式化,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了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于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

目 录

编者的话	I
致 谢	1
英文版前言	3
第 一 章 鼓天下之气	1
第 二 章 幻象与暴力	24
第 三 章 彷徨	55
第 四 章 远处的天空	81
第 五 章 饿乡	111
第 六 章 赞美天堂	144
第 七 章 谁家的小孩儿	174
第 八 章 叫醒了春	203
第 九 章 告别美丽的一切	236
第 十 章 难胞	268
第十一章 整风	295
第十二章 新秩序	322
第十三章 叛教者之声	354

第一章

鼓天下之气

1895年初春，一艘航行在北中国海海面上的中国汽轮，遭到日本兵的拦截和搜查。自日本在1894年8月至1895年2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海陆军以来，这类蛮横无理的事件便屡有发生。那场战争是中日两国为争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而爆发的，日本以其现代化的精锐之师，在经过重整后的经济与工业基础的支持下，控制了战争的绝对主动权。

这艘汽轮上有一位乘客，他是学者康有为。看到中国的领海权受到如此侵犯，他在心中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屈辱。近十年来，康有为已多次向清廷上书陈奏，敦请改革中国的经济与军事。而今，他所担心的因统治者的冷漠而导致的最坏结果就在眼前：“日人来搜船，当颇愤”，他事后记述这件事时写道，“以早用吾言，必无此辱也”。康有为的确十分气愤，但他仍天真地相信北京的统治者会听从他这个既非朝廷命官又没有上层关系的南方教书先生的劝告。康有为已经准确地感觉到，日本的胜利证明满清王朝已濒于覆亡的危险，尽管还没有人敢公开这样说。

与康有为同船的还有他在广州万木草堂的学生，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境况恰似土耳其：两者都是拥有光荣传统的大国和弱国，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下，无能为力，任凭宰割。

对康有为来说，这次事件的印象尤其深刻，因为他是乘船赴京参加会试。会试是全国最高级别的考试，统治者经由地方到中央的一连串的逐级考试，选拔最优秀的儒生，终身为朝廷服务。可是，康有为这一趟赶考所经历的一切，却令他大失所望：考棚破烂而肮脏；满城都是关于考试舞弊和考官收受贿赂的传言，对广州地区来的考生要价还特别高；甚至连送你去考场的轿夫也为索要更多的赏钱闹事，并偷窃粮米和财物。整个京城的道德秩序荡然无存。那年5月，康有为写道：“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车声隆隆，接轸不问，直省亦然。”^①

1895年，康有为37岁。他生长在富裕家庭，十岁时就能背诵《论语》。除私塾先生外，严厉而慈爱的祖父也对他的学业时加指导。他15岁中秀才，随即加紧准备乡试。康有为18岁结婚，妻子比他大三岁，七岁时便由父母做主订下了这门亲事。他时常在广州附近的城镇走动，把所见所闻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他对过分形式化的“八股文”很反感，尽管八股文是考试成功的基础。因此，他不是钻进经典古籍之中，就是沉浸在佛经的恬静世界。

但与此同时，他的个性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发展。命运给了他特别的悲伤，也给了他特别的机会。他的父亲得了肺病，在康有为十几岁时一直呆在家里——而按中国当时的传统，父亲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9页。

通常是要远离家乡做官的——这样，康有为就可以同他的父亲终日生活在一起。对后来的康有为来说，1867年恰似一场梦：他和父亲坐在一个小蚊帐里，为父亲驱赶蚊蝇，帮他翻身，给他递手杖，端痰盂……康有为唯一的弟弟康广仁就是在这年7月出生的，而就在七个月后，父亲便离开了他们。康有为作为康家的长子，按儒家的礼法安葬了父亲，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早熟地意识到家道已缓慢地走向衰落。

早在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康有为读了大量历史和哲学书籍，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了自信，相信自己有改造未来的能力。他觉得自己“卓然出乎其类”，有“上友古人之意”，将来必定会成为中国的大圣贤。尤其是他敬爱的祖父1877年意外淹死之后，康有为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研读佛经，使他的省察功夫更深了。他说他整整有一个月，彻夜不眠，自由冥想，想天国，也想人世；想可能经历的最大欢乐，也想最大的忧伤，以检验心性。起先，鄙俗的念头魔鬼般地挤满脑海；后来，梦魇消逝，心境清明，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如此无拘无束的思想，逐渐在心中产生了一种社会责任感：想到人们的艰辛与不幸，他深信上天已经赋予了自己拯救他们的心智和能力。他开始怜悯和同情人民大众，并把参与天下事视为自己的使命。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到香港，香港的情景令他惊叹不已。尤其是外国人盖的高楼大厦，清洁的街道和警察的办事效率，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对西方的好印象，在他到了上海之后就更确定无疑了。上海是1839年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通商港口，当时已成为日益繁华的大都市。康有为当即开始阅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学著作，并着手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制订中国的自救方案。

当时的中国学者中，通过部分地接受西方的军事、工业、科学技术来制订这类“自强”计划的不乏其人。但康有为在吸收这些新知识后，却把它们融入自己的乌托邦计划之中。到他 1895 年进京赴考的时候，他已经形成一套融思想和实践于一体的独特混合物：他给地方官和皇帝写信或呈请愿书，敦请修建铁路，改革军事；他抗议慈禧太后将国防用款挪作修建自己的宫殿；他组织乡勇以对抗流寇盗匪；他组织社会力量废止女子缠足陋俗；他创办了许多私塾，为找到一个恰当的地方，他多次搬家，直到后来租下孔庙，并一租就是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仰慕他的学生。这些年轻人接受的是全套儒家学说，以求通过科举考试，获取仕途功名。可与此同时，他们又帮助康有为研究如何创新，如何破除儒家的经典。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康有为在 1886 年至 1889 年间写了《孔子改制考》一书，试图说明孔子的原意是信奉变化与发展的。这种注解意味着，由西方列强输入的新制度和科学在古老中国的传统中早有先例，因而无需在保留中国“国粹”时轻易地予以抛弃。

尽管广州及其他地区的权贵学者斥责康有为的学说，且达到恶毒和难以容忍的地步，但他的学生们却认为他是一位睿智而富有感召力的导师，能引导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因此，康有为十分看重这些有天分的追随者给予他的这份尊敬。他广泛寻求帮助他完成“使理想开花结果”这一伟大使命的人，而当其中有人不幸早逝，他的悲痛简直如丧亲人。康有为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把西方科学引入儒家学说，并对一些符合佛教教义和西方天文学知识的新观点深感兴趣。他透过显微镜的观察而领悟了物体大小的相对性，通过对电与光的研究而理解了

速度快慢的相对性。由此，他在思维观念中确认了事物可以无限分割和无限膨胀的可能性，相信一切都是变化不定的：“根元气之混沌，推太平之世”。在1895年所写的一段文字中，康有为概要地论述了这种学说及他个人的感悟：

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及五百年后如何，千年后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体迁变如何，月与诸星交通如何，诸星、诸天、气质、物类、人民、政教、礼乐、文章、宫室、饮食如何，诸天顺轨变度，出入生死如何？奥远宵冥，不可思议，想入非无，不得而穷也。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随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形魄现示之变，安身立命，六通四闾，浩然自得。然后莫往莫来，因于所遇，无毁无誉，无丧无得，无始无终，汗漫无为，谓而悠然以游于世。又以万百亿千世。生死示现，来去无数，富贵贫贱，安乐患难，帝王将相，乞丐饿殍，牛马鸡豕，皆年所以作，故无所希望，无所逃避。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

士人，不肯自洁，不肯独乐，不愿自尊，而以与众生亲。为易于援救，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诸天不能尽也，无小无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亲之众，而悲哀振救之，日号于众，望众从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①

1895年春天，数千名考生涌进北京。他们或许不像康有为那样对世界的未来怀着广阔而遥远的梦想，但肯定同康有为一样对中国的现实困境深以为虑，倍感屈辱和挫折。由于逐级通过科举考试需要几十年时间，这批考生的年龄从20出头到50多岁不等，37岁的康有为在其中不算大。这个年龄层的人正逢中国败仗连年的多事之秋：1894年败于日本，1842年败于英国，1856—1860年败于英法联军，1884年再败于法国。30多年来，关于如何对付外来威胁，各种建议奏章盈筐累篋，诸如设立兵器制造局、培训外语、选派留学生、发展海军舰队等等。这些建议虽然被勉强采纳了一些，但进展非常缓慢。守旧的大臣一般认为改革会破坏原有的好秩序，而在光绪接掌朝政之前垂帘听政达15年之久的慈禧太后，虽然急欲通过加强经济基础巩固满清王朝的统治，抵御西方列强，但却没有能力支使朝廷重臣，不论是汉人，还是满人。

无论这批孔门弟子多么善于忍耐，或者说受到多么严格的容忍之训，当中日《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15日电传至北京时，他们还是惊呆了，愤怒了：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17—118页。

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准许日本工业进入富庶的长江流域。听到这个消息才几个小时,康有为就和他的一些好友组织了一次请愿,紧急抗议《马关条约》。数日后,他们拟定了一份长达18000字的奏章,征集到1000多名来自全国18个省的考生的签名。拥挤的集会、频繁的穿梭联络、长长的请愿队伍,以及考生们在参加政府组织的竞争性考试中却自愿参与反政府活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了空前的令人感动的爱国热情。康有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以这种方式组织起上千人的集会,在清朝是前所未有的。同他一起亲身经历过日本兵强行搜查汽轮事件的学生兼好友梁启超,连续36小时夜以继日地抄写这份奏章。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弟弟后来写道,可以说,他的学生时代从那时起便结束了。

康有为的这份奏章是呼吁变革的呐喊,即是对年轻的光绪皇帝又是对掌握大部分实权的慈禧太后的呐喊。在语气尽可能谦恭委婉的奏章中,康有为和他的签名者要求彻底改革中国的经济与教育制度。奏章在痛陈19世纪以来中国屡遭败绩之后,回顾了中国的辉煌历史,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康有为指出,历史上所有英明君王都不把国家的法律和风格视为僵化不变的东西。相反,汉、明、清诸王朝的开国皇帝无一不是顺应新的环境制定新的制度,并从各种渠道吸纳新人。日本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明治维新,也是如此。

康有为认为,这种用人方式及组织制度上的灵活性可以“鼓天下之气”;把首都迁出北京则可以“定天下之本”。北京靠海太近,不易防守,列强动不动就兵临城下,威胁京畿。为了保留这十里之城,我们丢掉了千里之地。事实上,前朝皇帝不但适时变革他们的制度,在必要的时候也迁都。对19世纪90年代的清

王朝来说,康有为认为都城的首选地是陕西省的西安。西安深居内陆,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就奠基于此,公元6世纪到9世纪隋、唐两代的伟大都城长安也在这里。如果迁都西安,中国军队可以向纵深调度,重新把通商和交通要道置于本国保护之下,日本军队绝不敢侵入。

在关于“强天下之势”的论述中,康有为反复强调了“以民为兵”的思想。他认为,中国早期各朝各代均是赖此为强,如今大西洋沿岸诸国也是因此而盛。清朝需要组建年轻的正规军队(康有为指出,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康熙皇帝就有此议),使之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共同形成一个真正有效的国防体系。革新的军队还应该装备最精良的武器,如“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大炮方面,中国也得拥有和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同等水准的重型武器。对中国自己不能制造的武器,应该到诸如香港国际武器市场之类的地方以合理的竞争价格采买,而不要在国内经二手变价收购。中国人应该了解军事技术的迅速进步: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枪每分钟可射10发;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进攻中国时,已经有了每分钟射30发的枪;而今,中国人从血的代价中得知,日本的步枪可以每分钟射60发。中国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可以动员侨居东南亚的四百万华人。他们身在海外,所感受到的屈辱更胜于我们,不变的中国心促使他们渴望为祖国重振昔日雄风助上一臂之力。

这些开宗明义的见解一定使保守的大臣们目瞪口呆,尽管他们在以往的30年中也听到过种种关于改革的建议。但是康有为却指出,这些不过是对敌人压力的直接反应,是“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中国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能根本改

变政府结构的全面“自强”计划。“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皇帝务须从以下六个基本方面着手改革：第一，清政府必须增加赋税，提高国库总收入。目前，政府每年收入七千万两，即使自己分文不用，也要三年才能付清日本的索赔款。通过向富户及商人征税、建立国家银行和拓展交通运输，每年收入一亿两银子是不成问题的。第二，中国必须建设国家铁路网，这是为了国防，也是为了商业活动。第三，清政府必须鼓励发展机械工业，发展造船业。第四，中国必须开发自己丰富的矿产资源，如云南的铜，山西和贵州的煤、铁，山东和湖北的铅，江西和湖南的锡，以及四川的许多资源，“我若不开，他人入室”。第五，中国的币制必须统一而稳定。第六，必须建立有效的邮政系统。

论述到这里，康有为特意提醒道，这六项改革可以使国家强盛，但却不可能减少国人的贫困：

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囊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①

由此，康有为开始了奏章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他称之为“养民之法”的四方面计划。在农业方面，他认为应生产更为独特优质的产品，以保持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丝绸已受到意大利、法国和日本制造商的挑战，茶叶制作技术也已在印度和锡兰（现名斯里兰卡——译注）广为传播。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26页。

中国需要组建农业社团和农技学校,发展高水平的农业技艺,进而发展多样化的林业和渔业,培育新品种。在工业方面,中国人必须学习西方发展汽船、铁路和电报,这是前几十年里西方列强迅速进步的导因。现代人必须超越曾国藩等儒学政治家所表现出来的极为有限的创新兴趣,而代之以建立各种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训练中心。自然,这些中心培养的学生应受到良好的数学和机械学教育。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每年的发明专利多达13000件,而俄国不过百余件而已。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为了同西方和日本竞争,必须发展自己的产品,支持本国贸易公司,学习西方商贸方法,翻译西方商业教科书,训练商人经商技巧。中国不能永远把罪恶的鸦片贸易作为现实市场缺乏效率的托词,因为每年进口纺织品的花费已远远超过鸦片本身。康有为破天荒地用赞赏的语气向皇帝开出一份清单,列举了189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购买的部分物品:

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绸、洋緞、洋呢、漳絨、羽纱、毡毯、手巾、花边、纽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篋、瓷器、牙刷、牙粉、胰皂、香油,食物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干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销流,耗我以万万计。^①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27—128页。

中国必须加速发展自己的工业基础,才能减少这些耗费。

在帮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计划中,康有为引用了许多外国移民垦殖的例子,如西伯利亚、密西西比、婆罗州(现名加里曼丹——译注)、巴西和加拿大等。他认为他的移民方案无论是流放和强迫,还是自愿和经商,都有可能引导中国人去开垦自己的边疆地区。这一政策将改变那种中国的赤贫者因生计所迫移民海外的传统方式,即作为苦力去美国垦荒,或被赶往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对罪犯,以劳动加以处罚;对鳏寡孤独,疲瘫残疾,则由社会抚恤。

康有为的长篇奏章,最后归结到中国的教育问题,这一点倒是与他的考生身份颇为相符。从拘泥形式的考试谈到了经费欠缺的图书馆。他又举了许多外国的例子,如印度、英国、俾斯麦的德国和日本等。随后,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论述引用了太多的外国例子,康有为回过头来重新肯定儒学的精神价值,以及它对于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康有为本人作为一位儒学智者,尽管是那种反传统的、叛逆型的智者,他还是建议皇上选派优秀的儒学学者出访西方。这无疑是相对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传教的一种反向流动。康有为也许并不知道,200年前莱布尼兹出于对中国儒学的向往,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不过康有为的想法超越了莱布尼兹,他认为中国不仅要派人出去广泛传播儒学,而且要建立海外儒学书院,凡能招收到一千名学生的学者,应受到嘉奖,并授予世袭爵位。

这份长篇宏论,新颖独到的奏章,经历了重重波折。重臣孙毓汶——1895年任总理事务大臣兼兵部尚书,也是腐败官吏的领袖——是支持批准《马关条约》的。他极力反对康有为的奏章签名活动,派出密探散布谣言,阻止考生签名,并在北京城里到

处张贴告示，抨击反对条约的人。因此，当康有为5月2日把奏章送往军机处转呈皇帝时，办事人员竟然不予收转。然而，签名者显然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处罚，许多签名者都通过了会试，康有为本人亦然，而当局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的。5月底，康有为对奏章作了修改，并送达皇帝御案前。皇帝6月初阅毕奏章，命人抄录，在重臣中传阅，并一份呈与慈禧太后，一份存档。见受到如此礼遇，康有为于7月再上一书。但这份呼吁广泛改革的奏章却被守旧的大臣多方延宕，最终未能送至御前。

康有为又在北京待了三个月，尽其所能地鼓吹改革与现代化：刻印介绍外国教育、军事和政治事件的报纸，在京城达官显贵中传阅；组建强学会；与皇帝的老师、一位改革的支持者长谈；同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改革者李提摩太会晤；从英美驻华官员处收集外国书籍，并委托朋友到上海买来更多的外国资料。令他感到无比惊讶的是，整个北京竟没有一份完好的世界地图出售。这些活动并不出格，也不为很多政治圈内的人所熟知，可康有为还是被迫于10月离开北京，否则就有被当成捣乱分子逮捕的可能。在北京忙了几个月，只有一项建议被采纳了：北京街上的脏乱得到一些治理，死尸被随时抬走，乞丐也被通通赶走。这是皇帝交待要办的，拖延再三才付诸实施，但又不是全面彻底地执行，只是在宣武门附近略有改观而已。

康有为奏章里的另一项建议也出人意料地有了结果。一位康有为极为讨厌的清政府官员，即审查奏章的军机章京丘保成，对康有为1895年7月所呈奏章中关于利用华侨为国服务的建议很感兴趣，请求皇帝允许中国商人接管政府在过去30年中建造的兵工厂及造船厂，使之能以符合商业规律的革新方式经营。1895年8月，该建议得到皇帝的热烈回应，宣布凡东南亚、澳大

利亚和美国西部的华人,都可以组建辛迪加接管政府的企业,既可以承租,也可以直接购买。他们还可以向清政府借贷所需资金,另设新厂。“一切照外国的成例”,皇帝说,“只要他们愿意,可让其开班上课,讲授商业贸易。”尽管利用华侨帮助国内建设的想法并不是全新的,但像这样引人注目的热心支持却非同寻常。在随后的几年里清政府开始系统地动员华侨回国,大规模地引进外国资本,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工业。

康有为这种同华侨的联系方式与后来孙中山的方式是全然不同的。孙中山比康有为小八岁,也出生在广州附近,但两人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相差极大。孙中山在农家长大,家乡人多地少,生活艰难。半个世纪以来,大批的中国人从那里远涉重洋,到东南亚和美国谋生。孙中山的两个叔叔死于加州淘金热时期,他的哥哥移居夏威夷,父亲则留在老家,种地做裁缝并兼更夫才能勉强度日。移居夏威夷的哥哥后来经商发了财,孙中山前去投靠。显然,如果孙中山仍留在广州,他是不可能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来到夏威夷后,他先上了英国人办的意奥兰尼学校,接着进奥阿厚书院。1886年,孙中山离开夏威夷回国学习西医,起初跟一位美国医生在广州学习,随后又到香港拜英国人为师。

中日甲午战争时,孙中山已成为一个受过东西方文化教育的人,懂多种语言,并接受过部分中国传统教育。他是一位熟练的外科医生,又是一名基督教浸信会教徒,会说英语,会打板球,交游甚广,与夏威夷、香港及澳门的许多半西化的华人保持着亲密关系,与西方的医生、传教士也过往甚密,同时还同广东老家的亲戚、乡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孙中山的经历促使他激烈反对家乡的宗教迷信,他甚至在一次回家时出于反传统的热情对

家乡的祠堂做出不敬之事。尽管如此，孙中山仍然热切地期望把平生所学贡献给国家。他确信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是善于把人类的天赋创造性地运用于自由贸易和开发自然资源之故，而不仅仅得益于坚船利炮。1894年，孙中山曾就此给一位有影响力的大臣写过一封长信。可这位大臣正忙于中日战争，没有予以理睬。随后，到1894年底，清政府对日本的软弱态度令孙中山深感厌恶，而英国人的办事效率和目标意识，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时候他对自己毕生所要从事的事业心中还完全没底。

康有为一心一意想说服满清政府革新改进以图强，但不主张推翻满清王朝。孙中山的想法全然不同，他认为推翻满清王朝是中国图强的前提。1898年11月，他迈出了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步，在夏威夷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革命组织，命名为兴中会。除了推翻满人统治、引进西方科技和兴办实业这一明确目的外，兴中会还旨在建立共和政体，尽管这后一个目标在其最初的宣言中并没有刻意强调。据推测，孙中山建立共和政体的思想大约是受到了夏威夷政体变革的影响，夏威夷是在当年夏季组建共和国的。到1895年夏，兴中会已有会员120人，每位会员交会费五美元。另外，孙中山还通过发行“革命公债”集资700余美元，承诺待反满起义成功后即以十倍偿还。还有一些会员变卖了商店和土地，孙中山也可望从他哥哥那里获得更多的援助。不过，这些经费对于发动一次起义来说，还是显得太少了。

孙中山似乎很指望得到秘密帮会的支持。这些半公开或完全秘密的帮会或因宗教信仰的相同，或因经济利益的一致，或因同一地区性的认同性而组成，它们有时也参与一些不法活动，但出于传统的立场，它们也立志推翻外族统治（包括满人和外国

人),恢复汉人统治。到1895年年中,这些秘密帮会尤其有希望成为同盟者,因为很多秘密帮会的成员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日战争,而今却被遣散,且往往数月的饷银分文未得,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经过一些训练、对政府不满、力量变化不定的势力。孙中山同几个来自香港的秘密帮会头领建立了联系,在六名跟随他从夏威夷来的兴中会会员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戏剧性的起义计划:10月在广州起事,随即辐射全国,一举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广州的满清官员获悉这一计划并摧毁了这次密谋,不少人被捕,起义一枪未放便遭失败。孙中山先逃往澳门,后到了香港,可英国迫于清政府的压力又将其驱逐出境。他被迫继续逃亡,经日本到了夏威夷,于1896年夏抵旧金山,在那里募集资金,发展会员。

康有为是1895年11月回到广州的,但在他的文章和谈话记录中,一点都没提及孙中山这次流产的起义。他除了修订自己的《孔子改制考》之外,还着手制订一系列新的计划,包括写一本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书,精心拟订在巴西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方案。他认为巴西的纬度与中国相同,且地广人稀,是中国移民的理想去处。他与弟弟康广仁一起去了香港,并在澳门创办了一份改革杂志。他一度前往广西,想说服桂林的官员兴建现代化街道,但无功而返。回到北京后,康有为组织了广东同乡会,并要求政府捐赠各种现代读物。德国攻占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的事件发生后,康有为和他的几个朋友有感于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成立了“知耻会”。由于钦慕日本的效率和英国的强大,他建议朝廷结成中日英大同盟以对抗俄国和德国。他还同北京的朋友一起上书,建议在国家的考试科目中加上经

济学和自然科学。

阅读和著述的生活有时候也被一些偶发事件打断。1898年1月的某一天，一些清廷权贵召见康有为，要他陈述需要革新改制的理由。开始时气氛对康有为很不利，一位满人重臣劈头就说：“祖先之法不可改。”康有为胸有成竹地回答道：“祖先之法乃用于治理祖先之国土，若祖先之国土倘无能保护，何论祖先之法？”接着，康有为陈述了自己关于财政与教育的改革设想，并受命写成奏章。这份奏章于3月份送抵光绪皇帝御前。可是，由于朝廷正为新的外患所扰，英国要山东北部的威海卫作海军基地，俄国要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两港，康有为的建议被搁置一旁。他就利用这段时间联络该年进京赶考的考生。在他弟弟康广仁和得意的学生兼好友梁启超的帮助下，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这件事遭到守旧官员的反对，却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光绪相信保国会毕竟是爱国的。但是，康有为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留在京城不可能取得什么新的进展。1898年6月中旬，他准备回到广东，回到他的学生中去。

康有为总是随时准备接受生活中突如其来的逆转，并以宿命论以待之。他曾写道：“吾常与己言，诸事太顺，祸必附焉。”这次他正要动身时，接到女儿写来的一封信，说家乡正在流行瘟疫，劝他最好在北京多呆一些日子。他只好取消行程，暂留北京。可恰在此时，皇帝的圣旨到了，令他前往颐和园觐见。他立刻差人送一封家书和一百块银元回去，在信中他特别提到了一年前发生的一件巧事：去年准备回家时受到军机大臣的召见，今年要回家时又受到皇帝的召见，命运多么奇妙啊！

光绪皇帝的6月召见给康有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自此便没有丝毫动摇过对光绪的尊敬与效忠。按说，光绪作为

满清王朝的代表,同朝廷的腐败和缺乏效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中国要在世界上赢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必先推翻清王朝,这已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康有为认为光绪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已有反抗慈禧太后之意,而慈禧才是真正反对现代化和改革的。因此,在康有为看来,这次召见在京西的颐和园而不在紫禁城,无疑是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的。颐和园是在圆明园的废墟旁建立起来的,圆明园于1860年被占领北京的英法联军所破坏,以报复中国人危害、拘禁他们的外交官。为了重建庞大的颐和园,慈禧太后不惜举债,大肆透支国库税人。在这样一个地方,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他的改革大计是再恰当不过了:

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云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乃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狭,度之高下,砖石楹楠之多寡,窗门槛椳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庀材鸠工,殿乃可成,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①

两个半小时觐见谈话中,康有为又重提他1895年的奏折,强调朝中人事改革的重要性。现有的大臣既缺乏现代知识又不锐意求进取,一味地反对革命,不更换这些迂腐之臣,而想革新图强,则“犹缘木而求鱼也”。

觐见光绪之后,康有为写了一封简要而兴奋的家书,向母亲禀报一切,强调像他这般地位卑微的人而获皇帝召见,实为罕有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5页。

之幸。他说，被皇帝敕令觐见，这是自 1850 年以来所不曾有的事。他已离家六个月，时刻惦念着母亲，并对不能承欢膝下深以为憾。不过现在他相信，当母亲闻知此讯，必感深慰于心。今后如何尚难预卜，如果自己不能回家奉养母亲，就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他还告诉母亲，小弟广仁也和他在一起，均平安无事。

几乎与此同时，他与弟弟广仁同游北京近郊的西山，一路散步谈天，猜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兄弟俩的关系一向十分亲密。他十岁父亲去世，弟弟广仁才出生七个月，父亲临终之言，就是要他善待幼弟。他眼见幼弟小时候经历许多病痛，他教弟弟读书，看着他长成一个敢作敢当的有为青年。广仁曾在广州英美医学院学西医（孙中山曾在此短期工作过），本打算毕业后在上海开一家自己的诊所。广仁代表了康有为所要塑造的新一代中国人，勤奋努力而富有理想，尽管他不像兄长那么对政治有兴趣。兄弟俩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保守势力显然正在准备反对皇帝，慈禧可能反对的迹象也已很明了。她已调了一位得力心腹到中国北方拥有重兵，而有革新思想的皇帝前任老师则被逼退休。康有为已处在秘密监视之下，时时受到被暗杀的威胁。广仁与家中经常联系，他们已安排好于事情急迫时逃往澳门的路线，同时与侨居加拿大维多利亚的中国友人保持着联系。

觐见皇帝之后，康有为被任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出乎意料的是，朝廷竟然真的推出了一连串的改革，而且改革的事项正是康有为所建议的。朝廷下令废除“八股文”考试，设立京师大学堂，改各地寺庙为学堂，组建一系列地方机构发展商业、农业和工业。康有为把明治天皇在促进日本现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辑录成书，送呈御前，以激励光绪皇帝。他也举出波兰的例子作反证：王室完全被愚昧的保守分子所误导，最后终于沦

为被俄、普、奥诸强瓜分的悲惨下场。维新运动一开始,就有许多建议书被送到光绪御案前。康有为无不幽默而欣赏地描述了这些清朝时期的“大字报”。他说,好些建议书是乡下农民、渔民写的,摞起来达两尺多厚,其中虽不乏责备皇帝的微词,光绪也能一笑置之。康有为对此极为赞赏,毕竟,大众的意见可以直达朝廷,言路因之畅而不塞了。

由于快速推行革新,皇帝需要大量的新人帮他推行新政。对高级官员的破例任命可能会在官僚体制中受到阻碍,光绪便任命一些年轻的改革家为军机章京和各部行走。他们官位虽然不变,但像康有为一样,随时可以得到皇帝的垂询。新任命的人员中有23岁的广东维新会会长,还有33岁的谭嗣同。谭嗣同既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哲学家,也是一名武林好手,还对西方科学和数学深感兴趣。他是康有为的崇拜者,也是梁启超的好友,在湖南组建维新社团,创办维新报刊,使长沙成为维新思想的重镇,并因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和打破常规的行为而深受青年激进主义者的拥戴,却又为年长的官僚们所嫉恨。

谭嗣同接到皇帝的诏书离湘赴京时,是1898年9月。是时,他所寄予希望的帮助维新皇帝的改革者们已是四面楚歌,北京及各省都是一片反对声。谭嗣同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奉诏赴京,但是他与他的同事都不知道该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帝国政治体系中周旋。康有为自己也担心整个维新派的力量太单薄,无力承担如此重负。由于反对势力越逼越紧,加上对慈禧太后可能会干预压制维新人士与皇帝的担忧越来越深,他们试图通过发动一场政变先发制人。由于考虑到一些高级武将在皇帝与慈禧太后最后摊牌时可能有的忠君心理,维新派冒了被告密乃至被妄加叛逆之罪的最大风险。为防万一,康有为劝皇帝以

巡视为名远离北京。康有为写道，北京城又脏又乱，墙断垣残，水污气浊，昔日庄严荡然无存，保守气息充盈于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军队日有增加，许多被裁汰的庸劣官员逸荡街头，这些都是维新政治的障碍。当然，这次康有为不像1895年那样建议皇帝西移西安，而是东移上海。虽说上海是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但那是一个繁华的货物集散港口，是新科技与新观念的交流中心，是一个开放而无拘束的自由之地。

这些计划还来不及实施，保守势力就反击过来了。忠于慈禧的军队开进了城。康有为经友人密告，于1898年9月20日逃到天津，上了一艘英国轮船经上海直赴香港。21日，光绪被囚禁瀛台。同一天下午，京城御林军包围了康有为和他的广州友人经常聚会的南海会馆，发现康有为已经逃走，便逮捕了他的弟弟康广仁。22日，康有为的好友梁启超试图找日本公馆出面救助维新派人士，未获成功，遂逃出北京登上一艘日轮而幸免于难。那天稍后，逃亡路线便被全面封堵。24日，谭嗣同被捕。在前，他不听友人劝告，拒不逃离北京，并试图通过本地武林好汉援救光绪皇帝逃离软禁。谭嗣同留下了一首为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绝命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谭嗣同及另外四位年轻的维新人士——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于9月27日以叛逆罪在军机处受审。下午四点审讯中断，极可能是出于慈禧的意思，立刻行刑，不必多审。当天晚上，“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

康有为后来写道：“余有折翼之痛”。他弟弟的死确实令他悲愤不已。我们可以想像，康有为的悲愤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显然是他让弟弟暂留北京，以便妥善处理因他本人仓促出逃而未来得及带走的书籍和财物，这大大违背了他在亡父生前许下的照看好广仁的诺言；其二，他粗心地忽略了弟弟与自己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他的弟弟死得毫无价值，无非是在一次尚未明确方向的革命进程中的偶然伤亡；其四，广仁至多只介入了某些反政府活动的外围事件。广仁死时才30岁，留下一个八岁的女儿，没有儿子。康有为也没有儿子，他便成为康家唯一幸存的男人。在一首悼亡诗中，康有为为自己竟未能亲自安葬弟弟而深感愧疚。这首诗虽只是锥心悲痛之作，却被嵌入纪念维新运动的《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八首》之中：

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
百年夜雨神伤处，最是青山骨未收。

康有为一心惦记着自己和其他家人的安全，未能找人把广仁的尸体弄出北京。一位广东同乡的忠仆，把广仁的头缝接在尸体上，草草地安葬了。康有为的大太太、二太太及女儿接到北京来的紧急电报，于9月25日逃抵澳门，其他的朋友于27日帮忙把他母亲送到香港，三天后广仁的遗孀及女儿也到了香港。康家的一切财物及康有为的书籍均被没收。一家人经大难而重逢。一个月后，康有为记述道：“（母亲）与一女仆相对隐泣吞声，悽惶万状。既见，告之为不孝未能救天下，儿危老母，虽天幸得全，而贻以大

忧，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① 为不使母亲再度悲伤，康有为及家人未把广仁的死讯告诉她，而说广仁出家为僧了。

虽然经历了如此的大灾大难，康有为似乎仍旧充满了希望。他到达香港后，受到了热烈欢迎。许多富有且同情中国的人，还送来了现金礼物。1898年10月，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电邀康有为访日，并答应给予帮助。这又使他重新充满了希望，也使他对这个曾经打败自己祖国的国家更加看重了。由此可以证明，改革者只要愿意，是很容易把民族主义因素同现代化因素区分开的。这时孙中山也在日本，很想与康有为面谈，但被康有为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仍是光绪皇帝的忠臣，而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的行为，已经被认定是叛贼乱党了。

康有为原希望日本出面支持，使光绪皇帝重掌政权。不料他才到日本五天，10月31日大隈首相就倒台了，他的希望成了泡影。1899年春，康有为乘船远赴华盛顿，想说服麦金利总统支持光绪重掌政权。然而，由于他没有获得旅游签证，美国海关要求他提供官方保证才能放行。清政府当然不会替他出具保证。他只得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港登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副总督与他进行了会晤，温哥华的华人社会给予了他很热烈的欢迎，总理在渥太华以茶相待，加拿大总督邀他参加舞会。招待虽然热忱，实质上的忙是帮不上的。后来，康有为发现英国也不愿意插手。他5月底到达伦敦，自由党领袖把康有为的要求提到下议院辩论。辩论持续了八个小时，一些议员认为慈禧及其追随者都是“腐败昏庸之辈”，另一些议员则指责康有为的“不智之举”。在仔细考虑了英国的远东战略——通过一个强大而现代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7页。

化的中国的制衡而把俄国的野心局限在远东地区——之后，此案以 14 票之差未获通过。

在国际上寻求最高层支持的努力自此告一段落。康有为已经阮囊羞涩，缺少活动经费。他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海外华人社会，沿途筹募革命基金，而孙中山已如此奔走了三年。康有为了 1899 年夏季闷闷不乐地由英国回到加拿大，在维多利亚他觉得舒服多了，他在此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经过支持者的激烈争辩之后定名为“保皇会”，高举拥护光绪的旗帜，支持他建立现代化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是，他不能忽略多数支持者的商业利益，所以答应未来宪法中要列有保护与发展海外侨民商业的条款。同样，他也不能忽视极为团结的华人海外帮会（孙中山 1896 年 5 月环游世界时已与它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加拿大的华人帮会与美国的华人帮会关系极为密切，因为他们都是向美国的排外法案挑战、搞非法移民的行家里手。为此，康有为接受了哥老会“龙头老大”的称号，并获得了七千多美元的捐赠以及一个作藏身之地的小岛的使用权。

这真是一种非比寻常的“见识”，让康有为了解了多年来他一直羡慕并屡加论述的外国生活，了解了他确信清政府必须对其实业加以利用的海外华人。1899 年 8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为遭囚禁的光绪皇帝祝寿，祝寿诗中多处流露出他对自己以及中国的尴尬处境的无奈：

海外初瞻寿域开，龙旗披拂白楼台。
白人碰盞椅裳至，黄种然灯夹巷来。
上帝与龄怜下士，小臣泣拜倒蒿莱。
遥从文岛瞻琼岛，波绕瀛台梦几回？

第二章

幻象与暴力

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那种由精英们于 1895 年所表现的不满与愤怒之情,已遍及全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虽然渴望中国革新的愿望依旧,但对西方及已经西方化的日本的敌意却明显增加了。许多人认为,外国人的到来不仅仅是做生意和强占中国领土,而且腐蚀了中国固有的道德精神,那些随着鸦片商人与外国军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正是腐蚀中国文化的蛀虫。这种反基督教的情绪,加上对 1898 年西方不断侵扰中国北方的侵略行为的愤怒,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地方武装交织在一起,引发了著名的“义和团”事件。义和团首先在山东和直隶两省活动,并得到了政府官员的暗中支持。后来,满清朝廷也予以公开支持。1900 年,义和团发展为全面的暴力活动,袭击教堂,杀害传教士及其中国教民。从 6 月起,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被持久围困,直到 8 月中旬,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方才解围。

康有为与孙中山都认为这是他们实现自己理想的好时机。

康有为在离开加拿大在日本和香港作短暂停留并得到一些富商的支持后,定居新加坡。1900年初,他惊悉慈禧太后要废光绪重立幼主,立即发动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发电报给朝廷表示支持光绪。同年春天,在梁启超及其他东南亚、加拿大、美国及上海友人的支持下,康有为决定采取武力行动。他又担心孙中山在他的老家广东首先发难一举成功。康有为决定在武汉三镇的汉口及安徽发动一系列相互呼应的起义。梁启超本来担心力量不足,写信给康有为说“欲飞恨无翅”,不曾想好几个秘密帮会的首领纷纷离开孙中山而倒向康有为,海外华人的捐赠也多达30万美元,这使梁启超大受鼓舞。

康有为确定湖南籍维新人士唐才常作为起义的总指挥。唐才常是谭嗣同的好友,曾与梁启超及部分1898年遇难的维新人士一起推行过教育改革。作为一个地方性的革命者,他的想法同康有为的全国性的保皇目标一度难以协调。特别是自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一起为避义和团之乱而远逃西安以后,唐才常对皇帝更为失望,但他终究还是答应了康有为。在这次起义中,康有为的缺乏经验直接导致了唐才常的失败;亟需的军备和资金因种种原因没有按时到位而被迫延期数次。8月初,由于安徽方面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提前发难,整个密谋计划败露。8月21日,包括唐才常在内的30名汉口起义领导人未发一枪便遭逮捕,后全部遇难。

就在康有为的支持者们被捕遇难的同时,孙中山也在广东以东150里处的惠州地区着手实施自己的武装起义计划。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一直没有停止在海外华人和国内秘密社会中发展自己的力量。1896年,孙中山前往伦敦筹款时,险遭清政府驻英领事馆的绑架。他侥幸逃脱,没曾想这却帮了

他的大忙。在英国传媒大肆渲染下，孙中山声名雀起，一时成为世界知名人物，一年前因举义失败而蒙受的耻辱在此获得了有效的补偿。在伦敦期间，他还得到另一大好处，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看了许多书。广泛的阅读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更加系统化，他把兴中会关于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国的目标扩大到了平均地权、防止大地主垄断的层面。孙中山的思想明显受到了亨利·乔治平均课税和重分土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1899年，在同梁启超和其他流亡日本的激进主义者的持久辩论中，他对亨利·乔治的理论曾大加赞赏。

孙中山以台湾和日本为基地开展活动。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康有为举义的失败，他已很少有表达这些新思想的机会，而是集中力量支持惠州地区的秘密组织。他们于1900年10月在惠州组建武装力量，并与满清军队勇敢交战。孙中山供给他们钱和弹药，帮助献计献策。不过，他们主要还是为自己的目标而战，他们的口号是“护洋灭清”（正好与北京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相反）。这些反叛势力也答应支持有益的改革与全面开放通商。他们的武力虽不足以包围惠州城，却能打有效的游击战，并得到当地农民的普遍支持。如果孙中山能够有效地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钱和弹药，这股反清力量有可能将自己的势力遍及广东省，并延伸到东北方向的福建。可是，孙中山被一位军火贩子骗了，又受到他在台湾摇摆不定的日本支持者的误导，未能从整体上给反叛力量制订出成功持久的军事策略，也未能及时补充武器弹药，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这股势力萎缩瓦解。一些未被杀害的参与者，因为已经被朝廷通缉，不能重返家园，只好亡命香港。

一连串的失败，使得孙中山不易再找到举义的机会，筹募经

费也更加困难了。尤其是在康有为的学术声望的影响下,孙中山的政治改革支持者越来越少,大量的人倾向于康有为,连他在夏威夷的哥哥也一度加入了康有为的保皇会。然而,康有为因汉口与安徽起义的人员伤亡闷闷不乐,对自己的政治意向也总是明确不了,以致无法以坚定的决心推进自己的事业。1900年末,他写了一首悼念唐才常的诗,33岁而亡的唐才常显然让康有为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弟弟,以及自己对他们的死应承担的部分责任。康有为的保皇会不排满,但要求提高中国人国际地位的意愿却相当强烈。他们希望获得较多的合法贸易权利和与各文明民族一律平等的地位,在国内的政治目标则是支持人民对改革政府事务的迫切要求。

汉口举义的失败,使康有为与其支持者之间有了很大隔阂,广州起义的失败也使孙中山先生与其伙伴产生了分歧,但远不及康有为那么严重。对康有为来说,这使他与国内秘密帮会进行合作的一整套政策出现了疑问。1900年以后,康有为似乎已经屈服于加拿大侨民的要求,把保皇会的主要目的变成保护华侨的商业行为。这从长远看或许对光绪复位有益,但从近期看却使康有为与其支持者像是为钱而工作。同时,他与他的学生兼得力助手梁启超之间在改革问题上也有了很大的差异。梁启超虽然在唐才常被捕遇难后没有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去出家当和尚,但他1900年底在澳州对华侨发表了一系列讲演,主张共和革命之后,光绪可以当新共和国的总统,而不是一位立宪的君主。这种表述显然是有所指的,暗含着对保皇会的优柔寡断的不满。

对康有为来说,更严重的是新加坡基地已经变得很危险了。英国政府官员对他及其支持者虽然都礼貌地给予保护,但是他

的一位最大的支持者、汉口举义捐款 25 万新币的谷绍温在起义失败后与他断交，谷绍温的几位最有影响力的朋友都转而支持孙中山的组织。他们谴责康有为不足以成大事，且有侵吞捐款之嫌。谷绍温认为，康有为的失败是因为他向满清政府效忠，以讨好朝廷，博取高官厚禄。

从 1900 年夏天起，康有为认为孙中山可能雇了杀手暗杀他。由于清政府已经悬赏 14 万两白银要康有为的脑袋，康有为的害怕自然不是空穴来风。新加坡总督为了支持他，把孙中山的几位同党抓了起来。孙中山亲临新加坡营救他的朋友时，康有为竟能说服总督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并规定五年内不准再进入新加坡。不过，孙中山对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仍有强大影响力，他虽不在新加坡，但是忠诚的兴中会会员仍能不断地传递反满信息。其中有一位是惠州起义失败后亡命新加坡的广东人，口才极好，还是一位良医，他很能鼓动华侨拥护孙中山。人们之所以听从他的鼓动，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口才和他的亲身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医术。他免费为人治病，从而在贫穷的工人与秘密帮会成员中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有时以教育活动为掩护，有时直接向群众宣传，广泛传播反满信息和共和主张。从吉隆坡到槟榔屿，新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革命旗帜在各种集会上飘扬。

康有为心力交瘁，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心情也很郁闷。自新加坡去槟榔屿也未能使他稍加愉快。1901 年 12 月，他带幼女同璧前往印度。几个星期的跋涉之后，终于到了大吉岭，租了间房住下。这是英国驻印官员及其家人的避暑别墅，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康有为带着幼女散步、骑马，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观赏雪景。可是他并不轻松，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跟着他一起

到了大吉岭：梁启超及许多以往支持他的人现在都喊出反满口号，甚至主张在中国南方建立革命政府，或在广东建立独立的政权。他写了两封措词谨慎的长信，一封给梁启超，一封给华侨社会，呼吁渐进改革，以避免中国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恢复皇权，即使这个皇帝是满族人也无所谓，然后在汉满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一个强大的合法政府。越过君主制直接过渡到共和制肯定会引起大混乱。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考虑再三的结果，民主是必然的，是最后的归宿，但不可忽略历史的每一步骤，每一阶段。

康有为一方面用法国革命、英国改良和美国政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引述孔子对人类发展进化的某些论述作为科学根据。他指出，自公元前五世纪孔子时代以来，中国的典籍就倾向于循环论而不用辩证发展观来分析中国的政治运作模式，强调社会运行由阴而阳，自阳返阴，更替不已。但是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段中，也偶有学者在其早期著作中作了与此截然不同的描绘。其中有对孔子《春秋》的评注，还有《礼记》的一部分。《春秋公羊传》指出，孔子认为存在着一种广阔的跨越时间和历史的运动，人类在这种运动中由“治乱世”而入“升平世”再进入“太平世”。在《礼记·礼运篇》中，人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对未来大同社会的构想，在大同社会中家与国的约束都是不必要的。康有为既引用这些论述来解释人类的历史活动，又用它们去反对自己以前的支持者，批评他们缺乏耐心的政治改革立场。他通过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解释，提出了自己的未来构想：中国已经经历了“治乱世”，但是不能越过“升平世”直入“太平世”，而应该按部就班地先学习西方与日本，慢慢地进入“升平世”。尽管人们在深思大同社会时可以为未来设计出一幅更好、更幸福的图景，但

通向大同世界的路是没有捷径的。

康有为带着幼女同璧在大吉岭山散步沉思，他在这儿把孔子的理想与佛教的理想合而为一，又阅读了一部分西方乌托邦文献，于1920年底写成了著名的《大同书》。

在大吉岭的一段隐退生活（一般认为他们父女俩的生活费有一部分是1900年汉口举义的捐款，他的对手声称这笔款一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交待），康有为过得比较清闲。他说，到这里后才终于有了可能写一首较长的诗来哀悼他弟弟的忠魂，这件事他憋在心里已经四年多了。也是在此地，他不只找到了描述未来的词语，更可以检讨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模糊意向的根源。他一直觉得（写于《大同书》的开头）：“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搏搏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① 他现在把自己产生这种意向的根源归结于他十余岁时看到的一张幻灯片，它反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军队被普鲁士军队打败后色当城的一片狼藉景象。那种家毁人亡、横尸遍野的惨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随着年龄的增加，读的书多了，见识的广了，想像力增长了，有关意向也就更明晰圆通了：

生于大地，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也。既与有知，则与有亲。凡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及近世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英，吾已嚼之饮之，藉之枕之，魂梦通之；于万国之元老硕儒名士美人，亦多执手接茵，联袂分羹，而致其亲爱矣。凡大地万国之宫室服食舟车什器政教艺乐之神奇伟丽

^① 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四年版第2页。

者，日受而用之，以刺触其心目，感荡其魂气。其进化耶，则相与共进，退化则相与共退；其乐耶，相与共其乐；其苦耶，相与共其苦。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如气之无不相周矣。^①

康有为认为世界上的悲苦可分为六类：即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及人所尊羨之苦。我们若进一步仔细分析这些悲苦的性质，就会发现每一种悲苦的枷锁，无一不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家庭、性别、阶级、国家、职业及法律等种种枷锁，哪一种不是人自己制造的呢？如果人类能除去这些枷锁，我们就能进入大同社会；基于人类的技能和预见，也许能够把这些枷锁一一解除。

国家的终结可以通过渐进的联邦制来实现（康有为把美国和德国视为由小国组成大国的范例），而不必经由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民主作为独裁的对立面，是一种健康的象征，因为各种政治团体、劳工联合会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存在可以使民族国家摆脱自我中心主义。民族国家将逐渐联合成一个较大的联合体，比如俄国吸纳东欧国家，巴西吸纳拉丁美洲国家，德国统一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及低地国家，再由土耳其、波斯与印度相并而成立一个穆斯林帝国。这几个大联邦也不是永久分离的，它们将会在一个世界议会的压力下逐渐走向统一。这个世界议会则通过经济制约、海军巡逻以及由音乐家和哲学家设计的一种通用语言而获得某种一体化的力量。这样，再加上以前各国完全解除武装，大同世界于是诞生。康有为说其他行星上的事我们管不了，他相信 19 世纪某些理论家的说法，认为火星上正在进

^① 康有为《大同书》第 4—5 页。

行战争——因为影响不了地球上的人类，就让他们继续厮杀吧！

在大同社会里，将没有阶级的差别，贵族的残余与封建的制度全都一扫而空。而在工业社会里，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工厂会越变越大，彼此间的沟通会越来越复杂，“贫富之不均，远若天渊”。康有为认为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胜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又工党之结联，后彼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仓地注目者，必在于此。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① 解除这些紧张局势的唯一法门，他认为就是消灭家庭，这么一来，人们的思想就不会被私有观念所控制。

慢慢地，统治者会有条不紊地终止种族歧视，不分黑、白、黄，一视同仁。康有为并不认为经由简单的立法就可以达此目的：“放黑奴之高义，林肯能糜兵流血以为之。而至今美国之人，不肯与黑人齿，不许黑人同席而食，同席而坐，不许黑人人头等之舟车，不许黑人人客店。黑人之被选举为小吏者，美国人犹共挤之。”^② 康有为认为，黑人之所以被厌恶乃是因为他们的长相、体臭及文化行为的关系。这种厌恶只有通过民族交互大迁移、全球性的异族通婚才能消除。对染有无可救药之恶习或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应让其服用绝嗣药物。经过这样的大混血与大清理，最终到来的大同社会将只有一个种族。他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自然定律选择下，这个新种族必然具有白种人的体型特征和黄种人的心智。

^① 康有为《大同书》第 356 页。

^② 同上，第 180 页。

国家没有了,行政局限的枷锁就解脱了。世界将按精密的经纬度进行划分,民族边界的消除使社会交往变得异常便利,所有的人都将通过一套复杂的电子通讯网络保持联系,而这一切都由一个位于空气清新山顶上的统一的大同政府进行管理。如何组织这个政府倒是—个问题,康有为对他所听说的政治选举没有什么好的印象,称其“大昏博夜,喧走道途,号召徒党,密谋相攻,或至动兵行刺。若议举之先,兆人万众,旁皇奔走,大罗酒食,以媚庶人。所取即未必公,即公亦出大争,坏人心术,侵入根种。”^①因此,这种选举的可疑性,是颇值得铭记在心的,毕竟选举政治作为西方通行的制度,在中国从来没有过,将来也很难再有。康有为对选举的不良印象,可能与另一位湖南维新人士黄遵宪的见解有关。黄遵宪 19 世纪 80 年代曾任中国驻旧金山领事,他在—首诗中曾这样描述美国的选举:

某日戏马台,广场千人设。
纵横乌皮儿,上下若梯级。
华灯千万枝,光照绣帷撤。
登场一酒胡,运转广长舌。
盘盘黄须虬,闪闪碧眼鶻。
开口如悬河,滚滚浪不竭。
笑激屋瓦飞,怒轰庭柱裂。
有时应者者,有时呼咄咄。
掌声发雷声,拍拍齐击节。
最后手高举,明示党议决。

① 康有为《大同书》第 392 页。

康有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由高级官员以电话征询民意，“立问立复，从其多者而用之”。被推举的官员则应礼让为先，力辞不就，须“再三为大众所推，乃得受之”。大同社会所设的各行政部门大多数都是实务工作（健康、工业等），最后的三个部门则表现了康有为的人类进步观：奖智部、讲道部与极乐部。由于有特定的部负责物资分配、义务教育（到20岁），以及农村中自治农场的经济和技术，这最后三个部将关注人类智力的发展，它的任务是消除城市与乡村的差别，防止任何个人的偶像化，在新世界的自由新人中既杜绝懒惰又抑制竞争本能。

在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中，他最关切的就是要废除家庭与性别的枷锁。他本来是很支持家庭意识的，也看到了宗族制度在中国人口繁殖和培养后代忠孝观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宗法家庭的破坏性却越来越明显，它使社会分裂，妨碍教育的标准化及儿童教养的规范化。在大同社会里，家庭将由社会机构所取代，人的一生从生到死都由各机构照顾。照顾将从“人本院”开始，在那里，怀孕的妇女将得到妥善照料，由经验丰富的女医生、护士教导她们如何保健。随后，从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到恤贫院、医疾院，再到养老院，直至负责火葬的考终院，形成一整套社会服务机构。

就大同社会的整个结构来看，男人女人是一律平等的。男女之间隔阂极大，这也是康有为一心要破除的。我们可以猜想得到，他在这方面的感受是他有切肤之痛的由衷之言，倒并非纯粹是为未来而写的。他本人的家庭遭遇就多灾多难，因此对妇女的不幸尤其印象深刻。比如说他父亲去世时，他已经十岁了，很能了解寡母丧夫之痛，而他自己又受父亲临终之托要照顾好

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弟弟遇难之后，他的遗孀及年幼的女儿，也成为自己的家庭责任。他的三个姐妹，一个两岁时夭折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就被迫嫁给生病的未婚夫，丈夫婚后 19 天就上了黄泉路，未留下一儿半女，让她活活守了 43 年寡，家产也被她亡夫的族人败掉了。另一位妹妹带着三个儿子守寡，年纪尚轻便在极度的不幸中去世。她的辛劳与焦虑加速了她的死亡。康有为写道，他比她大两岁，兄妹俩彼此很亲热，也很喜欢一起读书谈天。她的记性好，又好静，好学不倦。她是因穷困而死的，而康有为当时又远离家乡，爱莫能助。康有为与他弟弟年轻时就为废除妇女缠足而奋斗，建立社会组织支持不缠足的妇女。康有为不准他的两个女儿缠足。显然，就是因为有此决定，同璧才能现在陪他来大吉岭山区散步，而没有留在香港她母亲身边。康有为对自己的包办婚姻起初显然是感到很幸福的，但五个孩子中竟有三个（两女一儿）早夭，只留下两个女儿。1897 年，他快满 40 岁时又娶了梁氏为妾，在槟榔屿期间生了一子。康有为出外旅行时太太张妙华留在香港照顾婆婆；妾梁氏很可能陪他到了大吉岭，不过他一直没有提到她。康有为显然十分钟爱同璧，并以有她为伴深感快慰。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十分痛苦地决定送同璧去欧洲及美国学习，那时她才 17 岁。康有为在一首送别诗中写道：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但却是中国女权走向前进的一步。

康有为的这些家庭背景深深地影响了他在《大同书》中关于妇女的论述，而这是他最好的一段论述：

若夫经历万数千年，鸠合全地万国，无量数不可思议之人。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且人人皆有至亲至爱之

人，而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偏屈无辜，偏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而举大地古今数千年，号称仁人义仕，熟视坐睹，以为当然，无为之讼直者，无为之援救者，此天下最奇骇不公不平之事，不可解之理矣。吾今有一事，为过去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吾今有一大愿，为同时八万万女子拯沉溺之苦；吾今有一大欲，为未来无数不可思议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乐焉。^①

平等是康有为的终极目标，大同社会应该坚持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包括选举、教育及担任公职等。当然，妇女在担任公职之前须在人本院、育婴院或某个养老机构中服务一段时间。男人女人在公共场所应穿一样的衣服，以避免人为的差异性。受完教育年满 20 岁时，男女可以签一份婚姻契约，不能少于一个月或长于一年，期满后，彼此合意可以续延。同性恋也是法律认可的，他们也可以彼此签定契约。由于教育程度高且乐于工作的妇女可能选择不生孩子，这会威胁到种族的繁衍绵延，康有为极力主张要使妇女的怀孕变得非常愉快而有成就感，如给情侣们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妇女在充满爱意中受孕，并愉快地度过孕育期，生产后则给她们安排她们自己选定的娱乐方式。在大同社会里，一切愿望都是被尊重的。

^① 康有为《大同书》第 193 页。

尽管康有为用他的生花妙笔,把大同社会描述得令人神往,但是很显然,他无法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1903年春完成《大同书》后,他离开了印度的大吉岭,环游世界,自东南亚而欧洲转赴加拿大。1905年他以教师身份拿到旅游签证到了美国。他继续促请华侨支持光绪皇帝,并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时鼓吹孔子思想的重要价值。他宣称他的大同社会“太超越时代了”,因而只与少数几位学生谈论他的《大同书》,拒绝将全书出版。其实,如果他能更多地宣传他的大同理想,并使自己作为这种理想的鼓吹者为更多的人所知,他完全有可能在新一代学生中找到一批追随者。自1900年义和团失败和八国联军进驻北京以来,学生们就被不安和愤怒的情绪左右着,现在已开始公开讨论共和组织、社会主义与女权运动等问题。康有为自身的学术地位和1898年领导维新运动的声望以及他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醉心向往,常使人认为他是富人与保守华侨的代言人;而孙中山所提出的社会革命则更为有效而动人。他举出欧洲的社会实例向中国学生们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适合机器耕种的国家,生产力主要还是人力,产业并未完全控制在私有者手中,他们可以在贫富差距尚未形成之前,经由社会革命的方法予以阻止,以避免重蹈欧美的覆辙。

1903年,康有为的学生兼好友梁启超已经30岁,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康有为在大吉岭时,梁启超流亡日本,在那里他形成了一种彻底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重组民族国家的想法。被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需要有全新的组织形态,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中华帝国所没有和不能想像的。梁启超认为现代历史的动力已经变成“民族求生存的奋斗”,在这种奋斗中无可选择的只有一种规则,就是“适者生存”。要成功地参与这

种奋斗，必须鼓励全民族一起投入政治运动，争取多数人的统治权。卢梭的强有力的呼声，敲响了传统独裁专制政权的丧钟，他惊醒了中国人的“奴隶心态”。梁启超在1900年这关键性的一年，写信给他的老师康有为说，奴隶心态使中国的政治在过去几千年中达到了腐败与退化的极致，使中国人民陷入无边的痛苦深渊之中。这种病症不用自由之药是无法治愈的。

不过，梁启超的想法并未超越孙中山等人的主张。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日本的明治维新表明，社会革命不一定要推翻君主王朝。为了反驳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坚持推行反满革命的主张，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一本《罗兰夫人传》。罗兰夫人是法国革命中的女英雄，是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但由于革命的暴民失去了控制，她的自由理念随着她上断头台而告结束。梁启超引此为诫力劝国人不可轻言革命。他说革命犹如洪水，一旦决堤，泛滥成灾，便会连好带坏一起冲掉。

1903年，梁启超也到了美国。看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之后，他心中那一点点儿对民主的赞赏念头也消失了。他所看到的民主制度是腐败的，是分肥式的：选举过于频繁，舞弊太甚，太注重大众的短期利益，使有作为的领袖很难为国家及民众的长远利益做未雨绸缪的计划；有才能有抱负的人都逃避政治生活，许多总统不过是泛泛之辈。再则，民主在美国根深蒂固，有其独特的环境因素，别的国家是难以照搬的。后来，梁启超又到旧金山唐人街作了较长时间的访问。这里的华人大多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移居美国的。在这个典型的华人聚居区，梁启超看到了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劣根性、自私和暴力统治。他得出结论说，这样的民族，不够资格实行充分的民主，他们要有强有力的政府进行统治和管理。在结束美国之行时，他这样写道，中国人可以忘掉

卢梭与华盛顿,他们应该记住的倒是自己古老的严厉而有效的法家传统,要不就该生活在斯巴达的利库尔加斯或者英国的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因此,正如当初康有为在自己的欧洲之行中前往二百多年前彼得大帝曾去学习造船技术的荷兰造船厂参观一样,梁启超在内心深处又回归到康有为那里。他在当时写道,俄国的改革显示了专制统治的效力,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支持国家集权的,毁掉中国的将不是蒙昧主义,而是进步主义。他更进一步指出,法国为1793年革命所付出的严重代价,直到差不多80年后才得到些许的回报,而这回报与为此所付出的牺牲是不成比例的,远远达不到人们当初的期盼。如果我们今天以不受限制的代价购买自由,也许70年之后还享受不到它的幸福,即便那时候获得了相应的报偿,我们古老的国家又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梁启超在经过一段激进主义摇摆之后,又回头认同了康有为的看法,认为中国还不宜进行急速的变革,君主立宪如果真的要实行,仍以满人在位为宜,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生存发展的唯一大道。可是,他们以前的许多朋友却不赞同他们的观点,或者对他们明显赞成俄国专制主义的看法不敢苟同。

1903年,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些详细资料,尤其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著作,开始在日本流行。中国人或读日文版译文,或由日文再转译成中文,使之在中国也逐渐风行起来。这些著作反映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等人的基本思想,并宣扬他们关于暴力与理想主义不可分割的狂热信条。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此深信不疑,奉为至理名言。他们也知道俄国帝国主义正觊觎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东北地区。欧渠甲就是一个例子。他曾是康有为的学生,参加过1898年的维新运动与

1900年的汉口举义。他写了本小册子《新广东》，主张南部中国独立。他也像梁启超一样，指责中国人的奴性及其“沉默的消极态度”。1902年以后，他表面上是在旧金山为康有为的保皇会工作，实际上是在通过鼓吹中国南方人的种族优越性而设法将保皇会的旧金山会员引向更加明确的革命方向。另一位是秦力山。1898年以前，梁启超与谭嗣同在长沙讲学鼓吹维新的时候，他是长沙的一位维新派学生。1900年他也曾参与康有为策划的起义。他对1901年俄国知识分子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领导群众暴动、罢工反沙皇一事深为所动。他深情地写道，中国的学者们应采取与俄国同样的方法来把握自己的命运。秦力山不同意康有为拒绝与那些未受教育的群众同谋共事的做法，便设法动摇康有为在东南亚华人中的地位及影响力。第三位韩文举，原是康有为的拥护者，1891年曾求学于康有为，在1900年举义事件中担任澳门地区的负责人，现在也变得极端反满了。他于1903年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谈到了无政府主义和革命问题。他指出，许多民粹主义思想都源于黑格尔、马克思与圣西门，且与《礼记·礼运篇》中有关大同社会的思想（康有为以此作为他乌托邦的蓝本）相似。韩文举明确倡导革命，推翻满清独裁统治。他说，世界上一切的腐败与混乱，无一不是源于专制独裁政府。腐败与混乱看起来像是被捆绑在一起的绳子，可独裁专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根，如果你先把它剪断，其余的就迎刃而解了。否则，“百日难解也”。1898年康有为帮助光绪皇帝所推行的维新运动通常被称作“百日维新”，韩文举说“百日难解”，可能是有意借此揶揄康有为。不过，他所论述的重点还是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一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1881年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被处死。韩文举显然很欣赏她的英勇行为。

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对中国早期革命者来说,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榜样。她生在富有家庭,祖父与父亲都是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可她自己建立了一个“第二家庭”,成员是圣彼得堡读书会的激进学生。她曾化装,机智地骗过沙皇警察,与克鲁泡特金联系。她为农民接种天花疫苗,热心教导贫穷的工人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她于1873年被捕又戏剧性地逃脱,并最终加入了恐怖组织民意党。她的一生充满了自我牺牲与冒险。她暗杀沙皇的行为,几乎无法不让人深受感动:沙皇改变了例行行程之后,她预伏杀手伺机而动;当沙皇的雪橇在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沿着冰冻的运河急冲而下时,索菲娅镇静地挥着白色手帕;第一枚炸弹没有投中,第二枚由格伦维斯基抓着引爆,他自己当场死了,沙皇受了重伤;索菲娅被捕后从容受审;最后,她被绞死在她的情人、农人之子泽尔耶波夫身边,死时年仅27岁。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很流行暗杀,甚至持改革立场的人也认为暗杀行动可以迫使领导阶层进行有利的变革。有线索表明,康有为在他弟弟被清政府杀害的那段郁郁寡欢的日子里,曾计划暗杀慈禧。梁启超也认为,暗杀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是有效的。1904年长沙改革派刺杀前广西巡抚(他主张满清实施俄国的沙皇制度)的行动,若不是杀手太紧张忘了打开左轮枪的保险,准会叫他一枪毙命。1906年,康有为的一位好友试图暗杀慈禧,结果事败被捕,死于狱中。

保皇会的另一位成员走得更远,他按照自己所理解的俄国模式,在日本留学生中组织暗杀队,并与一位当时住在横滨的、从广州来的化学家研究制造炸弹。他回国后收了一位名叫吴樾的学生。1905年,吴樾模仿格伦维斯基,怀揣炸弹冲到五位奉慈禧之命出国考察宪政体制的大臣面前,拦路引爆炸弹,吴樾当

场死亡，两位大臣受伤。吴樾事先写了一封遗书，宣称他并不是要杀害这些大臣，只是想激怒清政府使出更高压的手段，以刺激中国人沉睡的爱国心，积极加入革命的行列。

另一个不同的转向极端主义的例子（从某种观点看，也是并行不悖的例子），便是上海的激进报纸《苏报》。《苏报》是当时许多宣传革新与现代化、报道国际新闻的新派报刊之一，这些报刊正慢慢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1899年至1902年，《苏报》常常发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也曾讨论诸如支持光绪反对慈禧的重要性、敦促制定中国宪法等问题。然而，当1902年慈禧为了争取主动而下令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知识介绍到新式学校中之后，《苏报》的编辑开始把读者对象转向新一代激进学生。1903年，《苏报》成了上海爱国学社的非正式机关报。该学社同后来成立的上海爱国女校一起，成为中国中部讨论革命理论的大本营。《苏报》越来越有名，在中国各地均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到1903年夏季，《苏报》开始公开鼓励暗杀行动，赞赏俄国的恐怖主义，提出满人及其走狗人人得而诛之，并声言以四万万入之力推翻满清腐败王朝，易如“摧枯拉朽”。它还发表文章攻击康有为继续支持满人的行为，文章毫无顾忌地对皇帝直呼其名，把他描述成“卑鄙小人”。

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做的最具讽刺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租界的设立。写作激烈的反满宣传品的文人，只要躲在外国租界地就很安全，清政府的警察未经租借国领事的同意就不得进入，更别说逮捕人犯了。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就是在租界发行的。邹容，四川人，曾赴日本接受过一年高等教育，是谭嗣同的崇拜者。他虽然无缘见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但很快成为《苏报》的一批最激进作者的好友。写作《革命军》时年仅18岁，

他在书中呼吁华盛顿和卢梭的精神,而这恰恰是梁启超号召中国青年应拒绝的榜样。邹容鼓励国人勇敢地追求自由,夺回自己的锦绣河山,彻底摆脱 260 年的满族统治: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羈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①

邹容嘲弄他的同胞奴性深重,甘愿受满人统治达 260 余年之久。他们的境遇比娼妓都不如,娼妓遇到好客人还可以赎身从良,有个出头之日,他写道,中国人比马好不到哪里去,只能温驯地在主人胯下过活;他们简直像畜生,欢天喜地吃着主人给他

^① 邹容《革命军》民智书局民国十七年初版第 1—2 页。

的草料，殊不知这些草料仅是他劳苦工作的几百分之一。那些在满人朝廷里任高官的汉人，尤其是19世纪中叶曾帮助满人镇压汉人起义的那些汉人，简直就是自己族人的刽子手。那些留着猪尾巴辫子，戴着花翎顶子，穿满服的汉人，成了沐猴而冠的世界笑柄。这是几世纪以来华夏民族的最大耻辱，哪怕“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之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补偿这几百年的耻辱。^①

邹容在书中列举英、法及美国革命的成就，并以一种悲壮的语气指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不免一战。他也像康有为一样，认为白种人与黄种人是已达进化极限的两种人，不过他比康有为更进一步把中国人从其他各黄种人（西藏人、交趾支那人、蒙古人、通古斯人、土耳其人）中挑了出来，特别作为对抗白种人的势均力敌的代表。他说，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是进化过程中的生死存亡之战，是力量与智慧的较量，是优胜劣汰的大舞台。在结论中，邹容呼吁国人团结一致，驱满人，杀清帝，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实行普遍兵役制，维护男女平等，保障言论、思想与出版自由，赋予人民以武力反抗政府违法侵权行为的权利，照美国的榜样制定宪法、设立地方自治政府。中国人应以被称作“黄祸”为荣。邹容这样激励国人：

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神族之势力。尔有政治，尔自司之；
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
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尔须自挥

^① 邹容《革命军》第23页。

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①

1903年春,《革命军》在上海租界出版发行。不久,《苏报》即有热烈的反应。清政府大为恼怒,深感受辱,认为这是叛逆行为,向英国领事交涉要求把邹容与《苏报》的编辑交给清朝刑部审讯定罪。英国官员1900年也曾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当时,唐才常汉口举义失败后曾要求庇护于英领事馆。但是,1903年的西方人对清政府的态度已比三年前强硬得多,他们一致决定不交出邹容与《苏报》编辑,因为恰在此时他们获知一位中国记者,也是唐才常的好友竟被拷打死于北京监狱。因此,他们坚持要由国际混合法庭审理,清政府可以派观察员出席,但一切须按西方的法律行事。结果,邹容以散发煽动性文字被判监禁两年,若交由满清政府则必死无疑。然而,两年徒刑对健康不良的邹容来说也显得太长了,他于1905年春死于狱中。

邹容死时年仅19岁,他的早逝更提高了他的声名,孙中山独具慧眼地运用了邹容的影响力。他的追随者把《革命军》(改名为《为生存而战》)配以邹容坐牢的消息在新加坡地区大量印行,他自己也在1904年访问旧金山时,叫人印了11000份,广为散发。

邹容反复申言(以达到一种夸张的效果),四万万中国人必需夺回自己的自由,驱逐满人及外国列强;康有为曾经呼吁,全世界八万万妇女要团结起来,解除她们所受的压迫;1904年,一位名叫秋瑾的年轻妇女在这两方面迈出了符合逻辑的一步,她通过关注两万万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把民族发展与妇女解放

^① 邹容《革命军》第55页。

融为一体。

1904年秋，秋瑾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份刊行于日本的新激进主义中文报纸上。她以自己所理解的关于男权压迫的个人经验，描述了妇女的这种悲惨命运：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①

秋瑾在文章中所抗议的是几百年来不公平，她的抗议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又增添了新的力量，扩大了革命的范畴。在西方传教士及中国改革者的影响下，中国的女子学校日益增多，女子会馆和女子联谊会纷纷设立，鼓励娶天足妇女，留学国外的

① 《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5页。

女大学毕业生络绎返国，报章杂志上常有妇女的文章以及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发表，西方妇女领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一切，都推进了当时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秋瑾很推崇罗兰夫人、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凯瑟琳·比彻。在秋瑾的诗篇中，流露出她渴望建立一种新的妇女精神。她也像康有为一样，反对过分迷信西方的模式，而希望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找出她心中的新妇女形象。她历举中国历史上的女英豪，指出她们往往具有同时代男子所不曾具备的胆识与气度。

秋瑾 1904 年发表的文章是世事与她个人经历的产物。据有关资料，她的父亲是一位和蔼并娇惯她的慈父，但她在文章中所攻击的那些无情的父亲，似乎也不完全是夸张。在 1905 年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她对亡父的不满。她在信中说如果在葬礼上少铺张花费些，他们也不致于为一日三餐发愁。缠足是她最为痛恨的事，她小时候缠过脚，后来她自己停止了。在一首词中她写道：“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关于包办婚姻，她有一次对她的弟弟说，她此生在个人问题上的诸多苦恼都源于她未能自己选择丈夫，她父母迫使她嫁给一位湖南商人，两人很合不来。1904 年夏，她离开了丈夫和子女，东渡日本。她离开北京时写了一首诗，简略地定名为《有怀——游日本时作》，叙述她 26 岁时的生命际遇：

日月无光天地昏，沉沉女界有谁援？
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
放足湔除千载毒，热心唤起百花魂。
可怜一幅鲛绡帕，半是血痕半泪痕！

虽然留日中国学生的情况十分复杂,但是秋瑾从中找到了自我。这些学生一离开国家,就背叛了儒家的教育体系,尽管许多学生是清政府由各省选送出来的公费留学生,他们只要注册在学,按部就班完成学业,回国后一定有官可做。一方面,留学生们被政府的代表们严密监视着,并要求他们行为得体;另一方面,学生们在新思潮、新经验的冲击之下,很快就发现了清政府的腐败本质,与日本的明治政府一比较更是相形见绌。1904—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沙皇陆军,阻止了俄国势力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展。这些留学生对之钦佩不已。日本的胜利说明了明治维新的具体成效,加强了整个国家的实力。他们兴奋地谈论着,一个亚洲国家终于打败了一个欧洲强权国家。中国学生们觉得这次战争在相当程度上雪洗了自己国家1894年的失败之耻。秋瑾在一首诗中以豪迈的语气赞美日本的胜利。她指出,“阴鸷大无信”的沙俄置举世抗议于不顾,巧取豪夺地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日本真是举国奋起,妇女们参加红十字会,跟他们的战士一同上前线。秋瑾还与流亡日本的反满起义领导人交上了朋友。义和团事件期间,她正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攻占都城的耻辱。而今,她看到中国留学生出版的杂志,便投寄感情激越的文章攻击满人为劣等人种,赞成把暗杀作为唤醒人民革命的手段,推崇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的行为。在她的诗篇中,她呼唤卢梭的精神,歌颂为自由而奋斗的波兰爱国志士,对吴樾刺杀满清五大臣以唤醒“二百余年汉声死”的国人灵魂的举动推崇备至。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常有同乡会的组织。秋瑾是浙江人,她丈夫是湖南人,后又同子女一起在北京居住,因此她参加上述各地同乡会的联谊活动。她又很巧妙地进入东京的实践女子职业

学校,投身政治性活动,组织秘密团体“十人团”,参加妇女进步社团,并给《方言》杂志写文章。《方言》杂志是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同康有为的追随者辩论而创办的。秋瑾还加入了三合会在横滨的海外分会。1905年夏,她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是众多反满革命组织的大联合。

秋瑾对自己作为一个女革命家的身份还没有形成准确的定位。有时候,她很赞赏她的男同志们的尚武精神及枪法和制造炸弹的技术;而在委婉的诗篇中,她也描述她的女性朋友并倾诉她们自己的需要和期盼。在东京,她有段时间把自己扮成西方绅士模样,照了一张像:三个扣子的深色西装、大翻领、软帽、灰色便鞋、手杖,一应俱全。她自题小照道:

俨然在望此何人? 侠骨前生悔寄身。
过世形骸原是幻,未来境界却疑真。
相逢恨晚情应集,仰层嗟时气益振。
他日见余旧时友,为言今已扫浮尘。

秋瑾虽然在日本找到了自己新的生活方式,但却一直为钱所苦恼,更有别离之痛。但是当他的哥哥秋誉章以家庭的名义写信叫她回国与丈夫重修旧好时,她于1905年6月19日回信断然拒绝,并对其前夫的人格痛加指责:

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 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为彼篡取,此等人岂可以人格待之哉? 彼以待妹为无物,是欲绝我命也;况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如仆不如! 怨毒中人者深,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以常人待

我，以常人报之，非妹不情也。一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嘱二妹讨取此银时，不妨决裂。盖妹思之熟矣，为人奴隶，何不自立？后日妹当可自食其力，何必为人之妇者？况仇怨已深，断无好结果。况一年之久，未通一函，即视我母兄，彼何曾一置念耶？闻早娶妇矣。等妹之情义，若有虚言，皇天不佑。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如无寸进，不能自食，则必以一讼取此儿女家财，不成，则死之而已。^①

1906年初，秋瑾回到了中国，但她没有到她丈夫那里去，也没有回娘家。她直接到了上海，在那里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上海有同情革命的群众，有生气蓬勃的知识分子及政治环境，审判邹容与《苏报》编辑，并没有减弱人们的激进变革的愿望，这种愿望随处可见。上海有一群激进的教师与知识分子，其中有几位也是留学日本的，他们把上海的几个反清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光复会”。光复会的主旨是革命，与康有为还在孜孜以求的光绪复位毫不相干。它的基本目的是反满，誓词简洁明了：“光复汉族，还我河山”。这与12世纪北宋爱国志士抗击金国侵略者的口号一致。1905年，光复会会员以抵制美货的活动抗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苛刻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1905年及1906年光复会的势力扩展到浙江北部。光复会的许多会员像秋瑾一样在1905年底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秋瑾一回到中国，就为两件事情奔走忙碌。这两件事有时是一致的，更多的时候却相互冲突。一件是渐进改革以提高妇

^① 《秋瑾集》第33页。

女的权益,另一件则是激烈的反满革命。她对她的好友、著名的书法家吴芝瑛说,她觉得自己与当时的年轻革命者不同:“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① 基于这种看法,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妇女杂志》,并亲自撰文写稿,在近郊的一所女子学校教书,翻译一些日文的关于保健护理方面的知识读本。她预计,通过教育逐渐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可能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可与此同时,她又觉得暴力的革命行动主义有其可取之处,她也为同时代青年人高喊的“革命”口号所动,并觉得人生苦短。我们在她的一首诗中看到,她竟然以 27 岁为老,发出“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的感叹。

就在这个时候,秋瑾的事业与她表兄徐锡麟的事业有了联系。徐锡麟生于浙江省富庶的绍兴县,1906 年时 33 岁,是一位到处闯荡,经历丰富的人。他到过日本,参加了光复会,但拒绝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光复会的领袖们急欲发动浙江省的武装起义活动,并认为秋瑾与徐锡麟是两位很适当的起义领导人选。这一主张甚合他们的意,许多人在革命的状态下都满怀冲动。这种冲动并不是指在战斗中必需的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也不是说在严密的警察防线前出于斗争需要而不顾一切,它涉及到各种可能的后果,诸如招致政府的搜查与惩罚,哪怕是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不得幸免。因此,尽管当时浙江境内的所谓“革命势力”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包括一些半西化的知识分子,一些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一些与私盐贩子勾结的地方秘密帮会成员,也许还有一些不满的本省士兵。可是,秋瑾与

^① 《秋瑾集》第 185—186 页。

徐锡麟的所作所为，却好像是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而清政府则一无所知似的。

事实上，清政府仍然是十分强大的力量。它虽然在“苏报案”中被挫败了，但还拥有相当的军力和警力，仍能有效地控制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和农村。自1901年以来，清政府通过组织新军，按西方军队操练，配备最新武器，提供最好补给，的确使其国防力量增强不少。出国考察立宪制度的想法也并未因吴樾暗杀考察大臣而终止，两位大臣被刺受伤后，朝廷又另派两人接替他们，组成新的五人小组前往美国与欧洲考察。考察大臣于1906年回国，态度保守地建议向君主立宪制过渡，计划有系统地成立省及全国性的议会。1905年，传统的考试方法已经明令废止，从而为全国的学校制度与课程改革开辟了一条大路。在北京设立了一所大学，政府还资助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很多地区，政府控制的经济也加强了，官督商办公司纷纷设立，铁路网正在逐渐伸展扩大。这些改革，唯一对秋瑾与徐锡麟有利的，也许是他们可以趁机造一种舆论，鼓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反对渐进主义，因为渐进主义可能使满人政权在新技术和新资源的支持下重新得到巩固。

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秋瑾演出了她人生最后的一幕戏，舞台便是大通学堂。大通学堂是徐锡麟在1905年夏天设立的，作为革命的掩护机构，贮藏着他当年春季自上海购买来的武器弹药。学堂的设立是经政府批准立案的，用于训练乡勇头目，训期六个月，同时还开有英文、日文、体育与美术等课程。学员尽可能招收绍兴地区的秘密帮会成员。

1905年底，徐锡麟离开大通学堂，教员们对继任者的意见不一，引起了许多争执，学堂的声望大为减弱。1907年秋瑾应

聘来到大通学堂后,她把当地一所女子学校及绍兴体育教育社合并,以此作为另一个阵线,与浙江省的新军建立联系。她的举止打扮很不像一位老师,因而引起了地方保守乡绅的侧目;她跨腿骑马,穿西式男装,鼓励女学生参加军事训练。秋瑾奉命负责协调秘密帮会的活动,以配合光复会的起义,并与徐锡麟保持联络。但是,由于此时徐锡麟在安徽西部的安庆巡警学堂工作,这段不近的距离使秋瑾与徐锡麟的联系有些困难。秋瑾仔细制定军事组织计划,连制服与旗帜的设计都设想好了。她设计的旗帜是白底黑色“汉”字。她还召开了几次会议,筹募经费,并力图通过信差与各地负责人保持联络。但是,她对可能支持革命的广大群众一无所知。她与中国贫苦百姓最接近的一次,可能是1904年夏天,她乘坐三等舱挤在苦力中间东渡日本。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她后来告诉她的好友吴芝瑛,她身上总是带着防身的匕首。她与普通人卓然不群的意识,可以从她的一首诗中看出来。她在诗中曾开玩笑似地说,她自己前世可能是一朵百合花,因为她能“浊流纵处身原洁”。在浙江,她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为与当地的秘密帮会首领一样的人物的,尽管该省到处充斥着社会暴力。连年饥荒使邻近各省的饥民成千上万地涌入浙江,绍兴的贫苦市民在1907年还闹过两次抢米风潮。

满清当局听到传言,说秋瑾的学校将有所行动(1907年春夏两季他们曾搜查过几次)。同时,他们又得知安庆可能有麻烦。1907年6月底,徐锡麟处境危险,他竟然奉命逮捕他自己:他当时任安庆巡警学堂监督,当局交给他一份嫌疑犯的名单,要他调查并加以逮捕,他本人的化名赫然也在名单上,他当即决定带领安庆巡警学堂的学生暴动。7月6日,他在学生毕业典礼上把安徽巡抚刺杀身亡,可惜的是只有30余人支持他的行动,

这就等于宣告了他的革命夭折。他们战斗了四小时，因弹绝而被捕，经过简短的审讯就被处决了。被谋杀的官员家属要求挖徐锡麟的心祭奠亡魂，也被应允照做。

秋瑾在看到上海报纸报道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之后，虽然明知自己一定会被捕，但还是拒绝了逃离大通学堂的建议。7月13日，政府士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与几位学生本想抵抗，但很快就被围捕了。严刑拷问毫无结果，于7月15日被斩头处决。同年还有些秘密帮会组织及私盐贩子团伙的零星义举，也都被镇压下去了。不过，清政府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后，浙江的各次起义也像孙中山与康有为前些年的屡次起义一样，都没有获得成功。

秋瑾在其早期诗篇中经常用她的姓——“秋”做为诗材。秋作为四季之一，在汉语里有其象征意义。她常喜欢一语双关地把秋与风和雨相连，以唤起人们对这个季节暗淡、肃杀的印象，而这一景象又仿佛同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已婚妇女的抑郁相依相伴。后来的一段时期，她对身为妇女的角色有了充分的自信，进而产生了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可是，在临行刑的时刻，秋瑾写了她平生最后一行诗，又反映出她早期的情绪。由于这句诗所产生的共鸣，秋瑾悲愁的一面将比她理性和勇武的一面更生动地存留在她的同胞的记忆之中：“秋风秋雨愁煞人”！

第三章

彷徨

秋瑾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了徐锡麟的死讯，鲁迅则在东京的报纸上看到了秋瑾和徐锡麟的死讯。对此，作为绍兴同乡的鲁迅不会无动于衷。他参加了在东京的浙江学生举行的一次大会，悼念两位殉难者，谴责满清政府的残暴。经过大会的激烈辩论，学生们决定向北京发一封电报，抗议清政府的反人道行径。这是一种相当勇敢的行动，因为如果清政府迁怒于学生们的行动，就会停止向学生发放津贴，并命令他们返回中国。不过，鲁迅对两位革命者的遇难并未怀有很深的同情。他曾目睹了1905年同徐锡麟一道赴日本的中国学生因行为不轨被逐出日本，他还发现徐锡麟是个言行不一的人，口中的调门非常革命，却随身带着太太的三寸绣花小鞋。秋瑾在东京学习时，鲁迅曾同她做过一些讨论，但印象并不很深刻。他感到，秋瑾在绍兴的行为如此激烈，其原因就在于她在日本的公开讲演受到中国学生的广泛赞誉以至于使她过分偶像化了。他曾对一位朋友说，秋瑾是被“捧杀的”。

鲁迅这一评论所表现出的讥讽、不屈和敏锐，正是他晚期大量关于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三大特点。鲁迅小秋瑾几岁，生于1881年，21岁时赴日本留学。他曾受过传统的科举教育，也曾广泛地涉猎中国的小说和民间故事，还曾在西方化的江南水师学堂研修英文，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地质学和矿产学。在南京，他接触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思想，还读过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鲁迅后来回忆他十八九岁时的这段生活时说：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军凯撒未到，此间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昧……”^①

鲁迅被书中内容所吸引，一口气读完全书，发现了“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随着晚清作家林纾的文言译著的出版，他又读到了福尔摩斯，读到了哈葛德和大仲马的一些作品，并因此而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广泛的认识。

在日本，鲁迅对于事关自我、中国文化和中国未来前途的各种对立的思想感到无所适从。这种迷惘的心理也正是当时大部分留日学生的共同苦恼。他要探求的是他自己的道路。起初，他倾心于梁启超提出的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思想。自1896年起，

^① 《鲁迅全集》第2卷第405页。

梁启超一直倡导阅读平民百姓所写的乡土文学作品,他认为这些书描写的是官僚的腐化可耻、滑稽可笑和愚蠢的考堂、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与缠足的残酷不仁,等等,而这样的主题可以“唤醒民族的羞耻感”(因为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即因科举行贿案毁了仕途,并被判处死刑,他的父亲周伯宜嗜鸦片烟成瘾,他的母亲因不缠足而被传为笑柄,所以他很可能会深受这些文字的影响)。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并愈加坚信“政治小说”的重要性。李顿和狄斯累利等人的作品引入日本后,先是受到民间的普遍赞誉,随后又于1880—1890年间受到某些有影响的日本政界人士的青睞。可能受写政治小说也能引起政界人士注意这一现象的影响,梁启超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了一份杂志《新小说报》,杂志的警世之作显示了小说“革新”道德、宗教、行为、艺术和民族特性的力量。

鲁迅有感而发,为浙江学生杂志《浙江潮》翻译改写了《斯巴达之魂》,文中叙述了莱奥尼达斯率军在温泉门抵御波斯入侵者的故事。他注意到了梁启超提出的科幻小说具有潜在重要性的说法,把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从日文翻译改写为中文。他还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一篇介绍地质学,另一篇叙述居里夫妇发现镭的经过。尽管我们知道,鲁迅没有参加任何中国在日本的革命组织,但他经常参加激进的中国学生举行的抨击慈禧太后与中国驻日公使的集会。受此影响,他毅然剪掉发辫。

1640年,满族征服中国之后,曾强迫中国人蓄发结辫,以接受这种满族发式来表示臣服满人的统治。尽管人们时有不满,辫子还是留了两百多年,不过中国人始终认为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到19世纪末,出国旅行的中国人更觉得这条发辫是民族

耻辱的象征。鲁迅曾嘲讽那些蓄发结辫的留日学生，说他们盘在头上的发辫把帽子高高顶起，宛如“富士山”，尽管鲁迅知道，蓄发学生担心的是回国后没有辫子会被认为是革命党（在军校读书的蒋介石剪掉辫子后不得不格外小心；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章炳麟在上海一次集会上当众剪去发辫，因“苏报案”与邹容一起被投入监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伙伴黄兴，则为了能够安全地返回中国而不得不留着发辫）。后来，鲁迅声明，他剪掉辫子的原因既不是为了美观也不是为了革命，而仅仅是因为“不方便”，这显然是一种个人行为。像秋瑾穿上西装后即拍照留念一样，鲁迅剪辫后也立即拍了一帧照片，并在照片背后题诗一首送给他的好友：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阖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一首充满民族主义情感的古体诗，但诗中对矢的想像，则取自鲁迅当时正在阅读的拜伦的《拉罗》一诗。

当鲁迅的日文达到能够阅读和记笔记的程度时，他决定留在日本学习现代医学。医学专业以前曾吸引过康有为的弟弟和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学医的动机，是他认为专门的技能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鲁迅学医在某种程序上也怀有同样的动机。他后来写道：“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①但鲁迅学医还有更深切的原因。他的父亲不

^① 《鲁迅选集》第1卷第2页。

仅仅是被误治了,还因为误治而迁延时日,致使鲁迅不得不经常花大价钱到药房去抓药,为此还要典当物品以支付药费。据说鲁迅年轻时曾患牙疾,中医认为这是肾亏上火所致,且肾主男子性器官,这显然是暗示病因在于手淫。这样的误诊是既有害又令人难堪。这一事件或许使鲁迅确信,必须同这种无知进行斗争。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演进,鲁迅也敢于正视母亲不顾家庭和社会的非难而不肯缠足的事了。在同朋友的谈话中,鲁迅已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救治“中国人的疾病”的方法了。

秋瑾在日本时,对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甚感鼓舞,而鲁迅认为这对中国而言并不是好兆头。1904年,他进入日本北部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因为他想避开其他中国学生,再则该校是免费的,不过伴随这个决定而来的显然是孤寂。此外,仙台是驻屯日军和军备的所在,他感到日本学生并不善待他。他的语言有障碍,生活成问题,甚至有人说是因为老师向他泄露考题他才得以通过基本考试的。尽管他的主科都及格了(解剖学优,生理学良,尸体解剖和德语差),他还是决定在1906年退学。鲁迅自己说,造成他退学的原因是: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看着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

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安慰他的谎话。^①

就像康有为看到 30 余年前普法色当之战的幻灯感到震撼一样，这些幻灯片显然对鲁迅产生了同样的震撼。但是，鲁迅所感到痛苦的，并不仅仅是惨剧的本身，他所感到痛苦的还有中国人脸上的冷漠和呆滞。他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说，这些关于同胞的幻灯片使他确信，医疗技术并非像他以前想像的那么重要：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②

^① 《鲁迅选集》第 1 卷第 340—341 页。

^② 同上，第 2—3 页。

不过,鲁迅在开展其文学运动之前,于1906年回到了绍兴老家,办了一件很可能会引来诸多讥讽的事:奉母命与他知之甚少的朱安女士结婚,婚礼按全套传统仪式进行。新娘的个子很矮,以至于让人看起来并不般配。鲁迅婚后很可能始终没有圆房。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桩婚事,这对夫妇也没有生过一儿半女,他甚至把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自己妻子的名字视为禁忌。

婚后不久,鲁迅把新婚的妻子留在老家,同他的弟弟一道去了日本。到日本后,他开始着手进行一项有选择的宏大读书计划。阅读的重点有两大类作品:一类为其国家被外国占领或遭遇分裂威胁的作家的作品,一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和意志力量的作家的作品。

康有为、邹容和秋瑾常常提醒人们注意,在强国支配下的世界上,弱国始终面临着遭受瓜分和分裂的威胁。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告诫人们,如果中国不对国家加以改造,就会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陷于四分五裂。面向广大民族主义读者的白话文杂志和报纸,讨论的主题包括:1772—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如何瓜分波兰,犹太人的命运和犹太复国运动,以及美国的黑人问题。在这种潮流之下,鲁迅和他的弟弟专注于俄国、东欧和巴尔干诸国的文学。他们精心翻译(通常是从德译本转译)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作品。鲁迅和他的弟弟每个星期日都去听章炳麟的非正式讲演,这期间,他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也日渐具体化了。章炳麟是睿智的论辩家和《苏报》的主笔,他痛恨满清政府,憎恶康有为的渐进主义和亲满态度。他于1906年服满三年刑期后在上海出狱。尽管鲁迅认为章炳麟的文言文很不好理解,但他极为推崇章在狱中写的那些赞誉邹容

的诗,他甚至能把这些诗全部背诵下来。鲁迅的弟弟在回忆在东京听讲演的情形时曾说:章炳麟的讲演通常都是鼓励反满情绪,这也是惯常的话题。后来我开始注意民族革命文学,则把文学与这些弱小民族联系起来,我读了波兰、犹太和印度作家的作品,有的描写他们国家衰败的情形,有的记述国家丧失独立的悲痛。当我阅读时,这些作品对我产生了深切的影响。

1907—1908年,鲁迅在日本撰文详细论述欧洲那些“立意
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作家。鲁迅认为
这些作家“力足以振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把他们称之为
“摩罗”诗人。^① 鲁迅认为,密茨凯维支、裴多菲、雪莱、普希金、
莱蒙托夫、果戈里等人都属于“摩罗”诗派,而其“宗主”则是拜
伦。鲁迅关于“摩罗”诗派的思想,受到尼采和易卜生作品的影
响,也与他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中智慧与情感已不可能和谐共
处的想法有关。因此他认为,人应该遵从“超人的意志力”,追求
道德与美的价值,而不是物质的价值。他写道,“诚若为今立计,
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掙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
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
宪之云乎?”^② 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的结尾发问道:“今索诸
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
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
末《哀歌》,以诉天下貽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③

鲁迅这个时期的作品,显示了他既不相信康有为的工业化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58—59页。

② 同上,第41页。

③ 同上,第101页。

和宪政主义主张,也不赞同孙中山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的主张。鲁迅认为,那些曾经得益于物质进步的西方国家,已经体验到了物质主义的弊害:“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①。同时他主张“排众数”,因为“理若极于众庶矣,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② 民众所能做的不过是遵从,尽管其为数不多的好传统中存在着理解自然和追求绝对的精神,尽管这种精神比那些传统的中国乡绅们更纯洁和深刻得多。

就像他超脱医学一样,鲁迅也超脱了政治。他认识许多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但他没有参加这两个组织。他的目标只是激发出中国人潜在的意志力,只是赋同胞们以英雄般非凡的力量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他朝着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但每一件事都不顺利:他的俄语老师企图自杀,俄语课因此停止了;他创办了一份期刊,名叫《新生》(刊名取自但丁的作品),第一期尚未出版便夭折了;找了一份校对工作,以便挣点钱,因印刷厂陷于困境而告吹了;两部精心编辑和翻译的外国小说集,寄托着他改造中国人意识的企盼,总共印制了1500册,但在东京和上海每集只售出数十册。

1909年,鲁迅放弃了在日本的工作,把希望和企盼深深埋在心里,回到中国杭州教书。不久,他又从杭州返回绍兴老家。在绍兴,他是一位知名教师。他曾大胆地在生理课上讲授生殖方面的知识,不过他没有把这方面的内容撰写成书。

梁启超也深信,写作是改造中国人的方法。19世纪末20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49页。

^② 同上,第44页。

世纪初,大约在鲁迅第一次到达东京的时候,他开始写他的那部叫做《新中国未来记》的小说。这是一种未来派的政治讽刺小说,吸收了贝拉米《回顾》一书和当时日本未来派小说的许多写法,也可能受了康有为《大同书》乌托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把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年代设定在1962年,那时中国人正在庆祝“新秩序”建立50周年。一位老者的思绪又把故事带回1902年,当时有两位刚从欧洲返回中国的青年,一位是立宪派,一位是革命派,他们正在辩论中国的未来。显然,梁启超对此感到困惑,这正是他和康有为与孙中山辩论的非常紧迫的问题。小说写了四章就搁笔了,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政治工作,转向了编辑和出版政治性刊物。

1903年,康有为从大吉岭下来,从那时直到1911年清王朝最终灭亡,他与梁启超一直在寻求解决改良派与革命派分歧的答案。孙中山激烈抨击康有为的支持者是“帮凶”,是亲满的“民族叛徒”,而且满清政府也对改革摇摆不定,这都使原本很困难的调和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工作更加困难。此外,改良派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一直缺乏支撑他们的希望所必需的资金。

显然,“保皇会”的名字不得不换掉,尽管康有为深深钟情于它。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人界内,“中华维新会”的名称取代了“保皇会”。1906年,因为清政府准备派五位大臣赴国外考察外国宪政,以观察中国维新的可能性,康有为不得不接受了“国民宪政会”的名称。但梁启超更中意另一个名称“帝国宪政会”。结果,“保皇”的名称被放弃了,而另外三个名称则在海外华人界保存下来。但梁启超在东京又建立了另一个组织,使人们愈感惶惑。该组织叫“政闻社”,其目的是建立国会、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保持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平等权利。这样的政纲康有为

是赞同的,但因为梁启超等人希望该组织能在国内发展,而康、梁二人此时均流亡国外,无法充任领导,于是以另一位维新人士任“总干事”。在当地商人和学者支持下,政闻社于1908年初在上海开办。康、梁二人并非没有遇到竞争,因为当时还出现了几个由中国的企业家和乡绅领导,而且名称和目的相类似的组织。

有一段时间,康有为的海外组织颇为雄壮威武,并不断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持。其证据之一,是重建毁于1906年大地震的旧金山保皇会总部所需的经费,仅数月即募足。捐款者达150余人,捐款额自5美元至400美元不等。捐助者包括广州银行的创建人和一位夫勒斯诺赌博界的华裔巨子,等等。能够得到如此迅速和热切的支持,是因为有中华维新会经办的军事学校为后盾。这些军校至少在21个美国城市成功地发挥了影响。这些身着制服的中国子弟,在美国教官指挥下训练,他们手持国民警卫队淘汰的武器,每周集会高唱康有为写的校歌。在洛杉矶,西部军校的中国学生昂首行进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的行列中。1905年,康有为在纽约马特大街检阅了中国第二团,然后才乘马车去沃尔多夫-阿斯多里亚饭店参加欢迎会。康有为曾梦想在西方开办儒学学校。这方面的工作则由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毕业生完成了,他在纽约创建了“孔教会”。该会成立后,颇为兴旺,后来迁往上海,再后又迁到北京。

康有为进一步政治活动的重要领域,是致力于修改美国的排华法案。罗斯福总统曾同康有为当面讨论这个问题。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的情况下,康有为和许多中国人发动了一场国内外同胞抵制美国货的运动。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在上海,抵制运动得到秋瑾的朋友们的支持,并一直持续到1907年。只是当美国开始抵制中国货之

后，中国人的抵制热情才逐渐消退。

康有为还一直就维新撰写论著，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官僚机构、人才录用、对中国公民进行科学教育和地方自治的结构等。1908年夏，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全世界两百余个城市华人界的名义，向清政府发表宣言。这篇宣言可以看作是康有为流亡期间政治思想的精要。宣言要求：召开国会以实现真正的宪政统治，慈禧太后退位，裁撤太监以杜绝他们影响政治，停止在官吏任命上私偏满人歧视汉人，恢复光绪的权力使其成为立宪君主，把首都从北京迁至长江流域，废除行省都抚制度并以较小的行政区划取而代之以提高行政效率和便于中央控制，成立专门机构以处理满洲、蒙古、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的事务，实施广泛的征兵制、发展海军、建造兵工厂以增强中国的军力。这些措施得到了康、梁在上海的组织政闻社的热烈拥护，而清政府的反应则是逮捕了该社的几位成员，并下令镇压了政闻社。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篇宣言中的各项目标，除去使光绪成为立宪君主之外，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不管他们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但事实上，康有为的支持者和孙中山的拥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年来愈趋激烈，而且没有什么调和的可能。他们不仅撰文相互抨击，还激烈地争夺对报纸的控制权。例如，康有为的支持者夺走了孙中山在新加坡的一家报纸，孙中山的支持者则把康有为的人逐出了旧金山的一家报纸。他们还激烈地争夺对美国军校华人学生组织的领导权，激烈地争夺世界各地华人的捐款，争取外国人和外国政府的支持，争夺对秘密会党和慈善团体的控制。1906年，孙中山的支持者甚至指控康有为的女儿蓄意欺骗海外华人。康有为则令人在香港状告对方诽谤，并获胜诉。康有为的组织财力比较雄厚，因为这些组织在

美国和加拿大格外强大，保皇会和中华维新会主办的贸易企业曾在这两地赚了大笔钱，而且它们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业、银行业、贸易和餐饮业的投资也曾赚了大笔钱。但是康有为和他的助手到处建学校、办报纸，还做了大量过分乐观的投资，终于搞到入不敷出的地步。例如，他们曾在墨西哥的托雷翁投资兴建电车，当墨西哥总统迪亚斯政权于1910年垮台时，由于康有为的疏忽或挥霍，他留在墨西哥的资财几乎全部损失殆尽。

康有为在1904—1910年周游列国花费的金钱是无法计算的，但肯定为数不菲。他曾游历过罗马、米兰、巴黎、柏林、哥本哈根、西点、黄石公园、盐湖城、蒙特卡洛、阿尔汉布拉、菲斯、乌普萨拉、特隆赫姆、康提、卢克索、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而这只不过是他访问过的一小部分地方。他所到之处，必住最豪华的旅店。他为何要四处周游呢？部分原因如他向梁启超所说，他感到无家可归和生性好动。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于1907年有了一位新伴侣，一位随父母移居美国的17岁广东小姐何旃理。她与康有为一见钟情，心甘情愿地嫁给康有为，成为他的第三位夫人，并担任了他的秘书。（他们结伴在世界各地旅行，并在康有为买的一座瑞典海边的小岛上小住，1908年还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康有为如此周游列国的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是在有意无意地效法他从青年时代就景仰的哲人——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寻访有道之君未果，开始以其余生就乱世的人生与政治问题著书、讲学。康有为几乎每到一处，均撰写长篇的中国古体诗，他赞美自然风光的壮丽，叙述当地的历史事迹，也探讨现时或将来可能遭际的教训。乘气球飞临巴黎上空，引发了他对命运和拿破仑权势的感怀；造访荷兰，使他回想起彼得大帝学习造船的历历往事；游览君士坦丁堡，使他对奥斯曼帝国恢复宪政政府油然

而生向往之意，而对中国仍未实行宪政而甚感懊恼；看到了耶路撒冷“哭墙”边悲泣的人群，使他想到了人类的悲苦，想到了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分裂的国家，想到了中国可能会很快沦落到那样的境地，想到了他们自己那屡遭挫折的抱负：

筑者所罗门，于今三千年。
城下聚男妇，号哭声咽闻。
日午百数人，曲巷肩骈连。
凭壁立而啼，涕泪涌如泉。

珍宝移罗马，痛心亦难言。
正当吾汉时，渺茫何足云。
吾国两千载，亡国破京频。
刘石乱中华，洛阳惨风云。

吾未免为人，多请犹为牵。
吾为有国故，身家频弃捐。
哭弟哀友生，柴市理冤云。
哭墓已不获，先骸掘三坟。

天外不能出，大地不能捐。
国籍不能去，大釜不能穿。
犹是中国人，临晚盖乡园。

娟娟涕被席，耿耿伤我神。

愿告爱国者，犹太是何人。^①

孙中山也在不停地奔走于日本、东南亚、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他坚定不移地抨击满清政权，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康有为。1905—1910年，安徽和浙江两省起义失败，秋瑾和徐锡麟遇难，同盟会对这两次举事并未过多介入，但在这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参与组织了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地举行的数次起义。因每次起义的财力多寡不一，当地武装结构的性质不尽相同，清政府做出反应的速度快慢不等，所以每次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也不尽相同。1906年12月在湖南与江西省交界处举行的萍浏醴起义中，参加者是心怀不满的矿工、秘密会党的成员和反叛的士兵，同盟会会员和当地的激进学生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起义。如果这次起义获得成功，他们将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各阶级联盟，但因清政府的地方武装过于强大，起义组织被瓦解了。1907年春，孙中山的一位年轻支持者在中朝边界联合当地山区绿林举行起义，但被清军镇压。1907年12月，孙中山和其他军事领袖试图从河内附近的基地进发，与广西山区的大批游击队会合，其事未果，孙中山先生则遭到法国人驱逐。1908年3月，同盟会的其他会员在广西省西部以二百余人的革命部队举事，其事亦未果；4月，又准备与云南的反清势力联合举事，又未果，同盟会会员则遭到法国人的驱除。1908年11月，同盟会会员已成功地渗入广东新军，他们想趁光绪和慈禧去世所造成的混乱举行兵变，一举攻下广州以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但因大批新军仍然忠于清政府，兵变被镇压。

^① 《康南海先生诗集》卷十一第50、51、55、56页。

屡次失败引发了同盟会内部的争议,有人怀疑孙中山的能力,有人要求孙中山辞职或要求另择他人以取代孙中山先生。屡次失败还使许多有影响的光复会会员背离了孙中山,并使某些革命者再次深信,为了引起大规模的动荡,并进而引发革命,必须对满族官吏采取暗杀手段。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同盟会会员刘思复曾试图暗杀清水师提督李准,其事未遂而炸伤左手。孙中山的朋友汪精卫也曾图谋在北京行刺清政府的摄政王载沣(行刺前被捕,但未被处死)。

但是,孙中山先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使他不断拥有大批新的追随者。他始终能够从新加坡、夏威夷和温哥华等地的华侨界募集充足的资金,从而使他的革命报纸可以源源不断地面市,也可以使他的支持者不断得到武器装备。尤其是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后,继位的是小皇帝溥仪,继续支持满族君主的理由不复存在,康有为在美国的支持者开始土崩瓦解。这一点对孙中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往康有为在美国的组织一直占优势,现在孙中山先生可以去填补这个真空了。1909年,亲孙中山的青年党在旧金山成立,此举使孙中山获得了来自学生、工人和教师的支持。同年10月,孙中山访问纽约,并赢得了当地人士的忠诚,这些忠诚完全可以使他建立革命的基层组织,并使他与波士顿秘密会党的首领和芝加哥亲革命的中国基督徒建立了联系。一位在加拿大移民局工作的华裔译员也倒向革命,这使孙中山先生的支持者得以方便地进入北美。

当时仍有一些秘密会党忠诚于康有为,并对康有为温和的改良措施深信不疑。尽管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对这些会党格外小心,他的年轻支持者们却利用他们的激进杂志发起了攻击。他们抨击老一代改革者,称那些改革者“如鼠似牛”。他们支持女

权运动,以秋瑾为榜样,主办由中国妇女撰写和为中国妇女撰写的戏剧的演出。在政治方面,他们坦率地宣称,赞同孙中山先生民主政府和民族主义的主张,在某种程序上支持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坚定不移地反对康有为。1911年初的几个月中,孙中山先生从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界募集了七千余美元,考虑到十余年间的屡次失败,这确实是数目巨大的一笔款项。他把这笔款汇到香港,因为他的得力助手们正在香港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起义。1911年4月,同盟会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原约定由同盟会会员和广州新军内部的同情者共同举事,但因出现重大疏漏,原定参加起义的城外新军同情者并未加入战斗,尽管起义军殊死奋战,并攻入两广督署,起义军终被清军击败。遇难革命者近百人,广东的同盟会组织尽遭破坏。

起义年复一年连绵不断,恰恰说明了中国人民对满清政权已感到失望。中国人民对国家因积弱而无以在国际上自立感到失望,并把国家的积弱归咎于满清政权。他们对清政府军事、政治力量的迅速膨胀也已有所警觉;新军(尽管同盟会已渗人其中)正在成为满清政权新的权力基础,新组建的内阁式政府完全由满人控制,省级行政大权亦将很快落入满人的严密控制之中。清政府力图整顿中国散乱无章的铁路系统,尽管此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明智的必须的改革措施,但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出,清政府决心进一步削弱省级自治权和消除日渐壮大的中国企业家阶级的影响。孙中山先生面对的情况是,人们普遍感到焦虑和愤懑,而同盟会的组织又太小不足以代表学生、乡绅、商人、妇女和华侨之间彼此抵触的利益。

在这种新的反清形势下,孙中山先生做出的反应是,放弃了自己的“南方策略”。以前,他把香港、河内、新加坡等地作为推

动内地革命的基地。1911年中,他下令在更靠近北方的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该总会的会员是来自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的革命者,其直接目标就是促进会员在其家乡所在省份,尤其是在同盟会与新军联系密切的武汉地区发动起义。但孙中山的影响毕竟有限。1911年10月10日,因炸弹意外爆炸,武昌地区的革命部队发动兵变,当时武昌竟没有同盟会的高级领导人。当高级领导人化装成红十字会人员赶到武昌时,指挥兵变的竟是满清军队的高级军官。经过两个星期激战,作为外国租借地和商业中心的汉口失守,三个星期后,重要工业城市汉阳亦告失守。但武昌起义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一系列兵变、起义,并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亡。

孙中山先生在丹佛至堪萨斯城的火车上听到了武汉三镇起义的消息,当时他正在为筹集资金奔忙。他没有立即返回中国,而是去了欧洲,因为此时欧洲对中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要向欧洲各国表明新共和国的态度,阻止欧洲国家支持满清王朝,干预中国革命。孙先生一到欧洲即受到保护,但更使他感到鼓舞的,是欧洲各国纷纷表示支持。10月25日,孙先生返抵上海,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一星期后,他抵达南京。1912年1月1日,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先生返回中国与列宁1917年从芬兰的凯旋归国有点相似。他们作为革命党领袖都有过长期流亡生活的经历,他们都是在自己领导的革命党推翻强大的统治者政权后返回故土的。同盟会确曾与中国各界人士有过普遍的联系,如新军的官兵、秘密会党领袖、商会的重要成员、学生以及各省咨议局的代表,等等。但是,作为领袖的孙中山,对武昌起义所引发的遍布全国的夺权行动却没有多少控制力。例如在中国南方,尽管广东省在

一定程度上由同盟会会员或同情同盟会的军人所控制；但邻省广西却由土匪改编的军队所主宰，实际上他们曾是镇压同盟会起义的力量；而云南省的都督则是梁启超忠实的弟子，他信奉的是日本人的那种尚武精神。

华中各省的情况也不甚明朗。在湖南省，同盟会领导成员被立宪党人杀害后，权力落入湖南省参议院院长谭延闿之手。在湖北省，新任都督是一位长期反对同盟会活动的满清职业军人，他是在威胁之下被迫出任都督一职的。上海总算在陈其美的控制之下，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是一位能干的军官，但他不愿与其他激进组织联盟，尤其不愿与前光复会的会员联盟，他曾于1912年初派人暗杀了光复会最重要的发言人。（中国后来的领袖们，在这段动荡的多事之秋，最初都扮演了并不显眼的角色。蒋介石，生于宁波，曾在日本东京人军校学习，在东京时非常推崇邹容的《革命军》并加入同盟会，一直追随其长官陈其美，1911年24岁，时任团长。毛泽东，一位湖南农民的儿子，1911年18岁，时为湖南长沙的学生。）

再往北方的各省，或直接或间接地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袁世凯曾任满清政权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北洋新军的统帅，1898年曾支持慈禧逮捕维新人士、剥夺光绪皇帝的权力。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后，满清摄政王以足疾严重，不克任职为由，迫令袁世凯自动引退。但是，中国北部的的新军指挥官都忠于袁世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这些部队拒不执行清政府的出兵命令，袁世凯也以足疾未愈为由谦辞满清政府授予他的湖广总督一职。在北洋军拖延不前之际，清政府终于同意了袁世凯领兵抗击革命军的条件：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宣布大赦、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清政府还允诺，北洋军

从同盟会武装手中夺回汉口和汉阳后，即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但与此同时，华中各地的代表已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此后，经过袁世凯、孙中山、满清摄政王之间的长期谈判，满清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孙中山于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则于2月15日被南京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任期至宪法颁布和全国大选举行之日止。

1911年夏，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再度聚首。他在一首诗的副题中写道：“与任甫离居者十三年，槟榔屿、香港一再见，亦于今八年矣。儿女生于日本，皆不能识。相见如梦寐。”^①这次重逢开始时很愉快，康有为带着他的第三位夫人，也欣然看到了他亡弟的女儿考上了日本女子大学。但武汉十月起义以及随之而起的暴乱，却令他甚感痛心，并把他那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希望彻底打破了。他在给一位向他电告武汉起义的朋友的回信中写道：

大变若此，忧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武汉军初变，不能长驱北陷，以为政府陆海立凑，不日可扑，岂政府疑新军无一敢调，又无军械，并乏兵饷，故十余日不能出师，汽车又不能载炮，遂令各地响应，全国沸变。^②

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康有为又一次去翻外国革命的老账：

① 《康南海先生诗集》卷十二。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7页。

法国革命表明,高度的革命期望于事无益;印度革命则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对于美国革命,康有为不得不承认它是成功的,但他认为其原因仅仅在于美国革命时期人口少且英国的民主传统已深深地扎根于社会,而中国却从不曾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康有为再次弹起了他那让人们克制的老调。16年前,他曾告诫满清皇帝,变法不当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此时,他则认为,中国以革命的方式骤然实行民主,无异于让蛮蒙之人去开飞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梁启超和康有为在中国实行渐进式的改良做了一番最后的努力。因为完全的君主立宪与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不相容,康有为于是精心设计了一套他称之为“虚君共和”的理论。在这种制度下,君主通过职位世袭的方式使国家得以延续,但实际上像寺庙中泥塑木雕的宗教偶像一样,并不拥有任何实权。康有为认为,充任这个象征性角色的可以是那个满族的小皇帝,也可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康有为曾给革命派的领袖和他在中国各地的朋友写信,力促此制的实行。

梁启超甚至设计了一个更为煞费苦心的计划:策动北京禁卫军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小皇帝的叔叔(光绪帝的兄弟)为总理大臣;处决离间士绅与朝廷的官员;皇帝颁示“罪己诏”;满人采用汉人姓氏,等等。向同盟会展示这种新的统一政府的前景,就会使其会员认识到不断举行武装起义将会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就会使他们看到一个至少确实保留了某些康、梁价值的中国。1911年11月,清政府在北方激进军官的压力下,解除了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通缉。此后,梁启超迫不及待地返回东北,同那里的军事领导人讨论他的这些想法。这些军事领导人有的曾是留日的激进学生,有的曾同梁启超一道工作过。但不久这次活动便遇挫折,并变得危险起来,他联系的一位关键人物遭暗杀,其

他几位试图在中国北方发动兵变的军官也被处决，而且南满奉天附近地区又遭到土匪的威胁。梁启超的朋友们提醒他赶快逃走。结果，回国仅十天，他就又逃回了日本。他也曾计划在广东组建忠于康梁的武装，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

1912年2月满清皇帝退位，康有为似乎接受了这个必然的现实。他在写给海外华人支持者的信中表示，尽管他对不幸的流血惨剧深感遗憾，但中国毕竟有了共和制度，他要求这些支持者团结起来支持国民党，并积极投身国家重建工作。他还鼓励他的那些海外华侨界的朋友们克服困难，去争取议会的席位。但康有为本人并没有返回中国，而是留在日本继续他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此时，他与梁启超的关系已相当紧张。袁世凯曾邀请梁启超到清政府的内阁中任职，遭到梁启超断然拒绝。但大批来信则是敦促梁启超脱离康有为，回国为新的国民政府工作。1912年春，当梁启超行将作出决定之际，他与康有为之间已出现了公开的裂隙。梁启超终于在1912年10月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梁启超的回乡之旅，充满了不愉快。搭乘的轮船又小又挤，甲板上没有散步的地方，无法呼吸海上的新鲜空气。船到大沽，却因大风退潮无法进港，只能停在港外。在令人气恼的三天里，梁启超只能眼巴巴地隔水遥望中国海岸。他在第三天给女儿的信里写道：

今日初八了，吾侪犹在大沽口也。十五年前，仓皇去国，在此地锢闭十一日……望归国，望了十几年，商量归国，又商量了几个月，万不料到此后，盈盈一水，咫尺千里，又经三日矣。何时能进，尚如捕风，此种港湾，大约除我堂堂大

国外,全球更无他地可拟,终日辄在此丈室中,世界上事百无闻见,亦不知京师曾否闹到天翻地覆,亦不知世界上已亡了几个国,惟觉日长如年,惟以叶子戏度日。^①

这就像一种不祥的征兆,预示着在未来的时日里,梁启超的希望,还有那些在岸边等候欢迎他回国的人的希望,终将归于破灭。

革命刚刚爆发时,在绍兴教书的鲁迅开始写有关革命的文章,尽管当时的文章还没有戏剧性的内容,大部分人只是按照浙江省会杭州的样子行事。11月6日,驻防杭州的清军只同革命军零零星星地打了两天仗就投降了。乡绅和商人占主导地位的省议会成为唯一有组织的机构,并主持宣布了浙江省的独立。其成员与新军(其中有许多同盟会会员)和某些当地会党领袖联手,解除了清军的武装,控制了浙江省的铁路。省议会选出新任浙江省长官后,又就军事、财政、教育和工业等方面发布了一系列任命。有些新任官员被派往小城市,去接替已解职的清朝官吏。但在大部分地区,那些在清朝灭亡前即颇具影响的当地地主和乡绅则巩固了他们对政府的控制。前清朝知府实际上成为新政府的长官。绍兴周边的乡间秩序日益恶化,人们认为必须找一位独立的军事长官,他们找到的这个人就是秋瑾1907年与之联系的秘密会党领袖王金发。

鲁迅记述过,他留学日本时的一位友人来看他,那位友人兴高采烈地说应该出去看看“光复”的绍兴: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50页。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①

在1912年初写成的一篇小说中，鲁迅描述了一个未曾发生的革命故事。在这篇他始终未定名的小说中，他描写的是一个孩子眼中的造反故事：故事的叙述人是一个九岁的男孩。他所讲述的故事一半出自他自己的观察，一半出自另外两个关键人物的谈话。这两位人物中，一位是这个男孩的私塾先生，他迂腐而世故，被谑称为“秃先生”；另一位是男孩家的看门人，叫“王翁”，他为人和善而有耐心，多年前“长毛”攻占绍兴时，他曾见过那些“长毛”。

某个夏日，人们惊闻“长毛将至”。这个男孩当然知道，这些要来的“长毛”不可能是太平天国的兵将，因为太平天国早已被打败，其兵将也死去多时，但由于“长毛”与“造反”被视为同类，所以“长毛将至”的消息还是能够引发人们绝望的情绪，使人们做出相互矛盾的举动：

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

^① 《鲁迅选集》第1卷第346页。

有挟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因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王翁自云前经患难，止吾家勿仓皇。^①

王翁的说法，完全出自他自己过去的经历，他对这个男孩说：“唉！长毛来，长毛来，长毛初来时良可恐耳，顾后则何有。”^② 不过鲁迅并未对这位“明智的老农”或类似的人物表现出些许感伤，他通过讲故事人的嘴告诉我们，多年前，王翁的父亲曾因供养其家乡的“长毛”而赚了一笔钱，但当太平军败退时，王翁又与村民们携锹荷锄追赶落败的“长毛”，争抢他们遗弃的金银珠宝。王翁的生存意识其实与秃先生并无二致。鲁迅在小说的一个段落中已明确地表明了他早期即对迂腐的绅儒怀有蔑视之心，此后直至终其一生，他的作品中也一再表现出这种蔑视：

人谓遍搜芜市，当以我秃先生为第一智者。语良不诬。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已身无几微之痛。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犹巍然拥皋比为予顽弟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若由今日天演家言之，或曰由宗祖之遗传，顾自我言之，则非从读书得来。^③

① 《鲁迅全集》第7卷第567页。

② 同上，第569页。

③ 同上，第566页。

结果，诚如鲁迅所述，造反者并没有来。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造反者，也可能那仅仅是其他灾难下的难民所引起的流言。天晚了，话语渐渐消沉，热心肠的老仆李媪带着孩子去睡觉了。鲁迅用一段梦中的对话结束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那梦呓中的造反者显然影射着中国，影射着1911年：

雨益大，打窗前芭蕉巨叶，如蟹爬沙，余就枕上听之，渐不闻。

“啊！先生！我下次用功矣……”

“啊！甚事？梦耶？……我之噩梦，亦为汝吓破矣……梦耶？何梦？”李媪趋就余榻，拍余背者屢。

“梦耳……无之……媪何梦？”

“梦长毛耳……明日当为汝言，今夜将半，睡矣，睡矣。”^①

① 《鲁迅全集》第7卷第571—572页。

第四章

远处的天空

同鲁迅那篇小说中的小男孩一样，沈从文 1911 年也是 9 岁。他也是听着“长毛”造反的传奇故事长大的（他的祖父打过“长毛”，他的父亲喜欢讲“长毛”）。但是，当革命来到湖南西部凤凰县他的家乡时，现实的情景远远超过了他以往听到的故事。起初，这孩子只是看到家里有人来去匆匆，后来又看见父亲擦枪，一位叔叔在磨刀，听到人们因急切和激动而结结巴巴的说话，还看到弟弟、妹妹和他们的奶妈被送到乡下去了。尽管他不知道谁在和谁打仗，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但有一天晚上他父亲离家出门，第二天早晨回家后，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他知道情形很不好。

这个孩子听一位叔叔说，街上堆了四百个人头，衙门前还挂着一长串人耳，这说明被杀害的不止四百人。这些人头和血污成为他少年时期的主要记忆。他的父亲听说，所有的店铺又开门了，好奇的人们都上街去看热闹，还听说被杀的人里面没有自己的亲属之后，就问自己的儿子愿不愿意去看看，沈从文说他愿

意去。他后来回忆说：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竹子作成（就是把这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的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希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叔父问我：“小东西，你怕不怕？”我回答得极好，我说“不怕”。我听了多少杀仗的故事，总说是“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看戏时也总据说是“千军万马分个胜败”，却除了从戏台上间或演秦琼哭头时可看到一个木人头放在朱红盘子里，此外就不曾看到过一次真的杀仗砍下什么人头，现在却有那么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的东西。我并不怕，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

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心中许多疑问，回到家里时问爸爸，爸爸只说这是“造反”，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①

把以前的背景情况与随后的大屠杀联系起来，一段故事便跃然而出：沈从文的父亲和族人，以及当地的乡绅联合当地苗人，试图蹬着竹梯攻上凤凰县城墙，占领官衙，赶走清朝官吏；起

^① 《从文自传》第28—29页。

事失败后,被打败的乡绅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旁观者,并若无其事地看着苗人一群群地被处决。沈从文说:

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皆得杀头。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得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来的人一多,被杀的头简单异常,无法自脱。但杀人那一方面,却似乎有点寒了心。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沟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宪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即有一百二百,差不多全是无辜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忍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茭,一仰一覆的顺茭,开释,双仰的阳茭,开释,双覆的阴茭,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①

沈从文并不是第一次目睹这种杀戮的场面。他生长的凤凰县位于湖南西部,与四川和贵州接壤。那里的人们,像许多中国偏远的农村地区一样,长期以来已对暴力事件习以为常。他的家乡在高山密林之中,河流湍急,移居到那里的外地人常与当地土生土长的苗人争夺土地。当地家世绵延的大户人家常常送人从军,沈氏宗族自然也常常这样做。沈从文在当地私塾里读过

^① 《从文自传》第30—31页。

几年书,但有很多空闲时间,他可以到山谷和河岸去游玩,去看手艺人干活,去田野小溪观察大自然。他也在屠宰场着迷地看宰杀牲畜。他还去看过监狱里带着镣铐干苦工的囚犯。他和邻居的孩子们就在城里的刑场上玩耍。

凤凰县没有向现代化发展的任何迹象,这里没有轮船,没有火车,也没有电,而这些东西在中国东部已极为常见。它甚至与长沙也极为不同,1890年长沙新派学校已很流行,1905年的长沙同盟会已很活跃。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大多经由有权势的熊希龄家族,熊希龄也是凤凰县人,沈从文母亲的妹妹即嫁到熊家。熊希龄曾积极参与整顿长沙的书院,也曾担任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参赞,回国后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一直保持联系。熊希龄的一个弟弟曾请人为他画了幅身着拿破仑式戎装的骑马肖像(又为他的妻子画了一幅身着约瑟芬服饰的肖像),这大概就是欧洲文化深入湘西的典型的代表。熊家还有一套林纾翻译的狄更斯的作品。这些书很快就被沈从文发现,并使他乐不可支。

沈从文的父亲也走过不少地方,对外国火器的威力也有很深入的了解。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时,他曾在防止敌方自海路进攻北京的要塞大沽炮台任裨将。义和团在北京围攻各外国使团后,列强组织一支联合救援部队。这支部队在大沽击败了清军,清军提督羞愤而自杀。沈从文的父亲虽未曾受伤,却被迫退伍,郁郁不乐地返回家乡。他不曾采取过反清的立场。但1912年3月,当革命派的影响由长沙波及湘西山区时,沈从文的父亲也同当地的知名人士一道赞誉新的共和国,诋骂前清的官吏。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人群中飘着一面写有粗大“汉”字的白旗(正如秋瑾五年前所设想的一样)。但沈从文的回忆却充满了痛苦,因为他的父亲在省议会议员的竞选中失败

了。他的父亲因失败而感到羞愧和愤怒，他离家而去，重返北京，试图恢复他的军旅生涯。此一去，他12年没有再见到他的儿子。

父亲离家后，沈从文慢慢认识到革命给凤凰县带来的变化。军队的样子，汉人对少数民族苗人的统治，还有新的民国官员办公仪式，都一如旧惯。他注意到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当地的大家族现在占据了行政和军事长官的职位。按照清朝的法律，这些官职均应由朝廷任命外省人担任，而现在虽已人民国，大户人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小户人家立刻开始感到他们以强凌弱的权力。时局的变换使沈从文的家道中落了，虽然他不甘于此，可又无可奈何，就像他无法从脑海中把那成堆的人头抹去一样。为谋出路，在零七八碎地读了几年书之后，他便投入一支控制着湘西的小股军队。在这支军队里，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一样，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央的控制不断被侵蚀，看着中国慢慢地滑向军阀割据。

在绍兴，鲁迅虽地处革命的中心，却也感到了同样的空虚。他曾记录过一个小小的事件，那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在随后十年里拢攘纷争的一个缩影。1912年，绍兴新建的革命政府任命鲁迅为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监^①。他也顺应时代的潮流，与他人一道创办了一份学校的报纸。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学生们向报纸投稿，批评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某些政策，批评当地其他文官，还顺带抨击了他的好友和侍妾。报纸刊出批评文章

^① 原文如此。绍兴军政府委任鲁迅为绍兴“山(陕)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应在1911年11月中旬的某日。——译者

的几天后，王金发给学生领袖送去了五百元大洋。学生领袖收下这笔钱，他们告诉鲁迅这大概是都督购买报纸“股份”的钱，收下这笔钱后，学生们仍然批评他们滥用职权。这时，王金发派了一队上兵，捣毁了报社，还殴打了报社的员工。在这次事件中，一位报纸的支持者被刺伤。鲁迅后来以讽刺的笔调写道：

……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着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①

这件事，尽管有些“风流”和“疯气”的色彩，却深深地触及了表达自由、腐败和暴力等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因素。

1912年2月，满清最后一位皇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被提名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曾答应孙中山先生到南京正式就任大总统职位，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参议院中的支持者也投票使南京成为国家的新首都。但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举动，因为南京是孙中山的势力中心，且远离袁世凯的北洋军基地。再者，南京富有历史性的启示，14世纪时明王

^① 《鲁迅选集》第1卷第348页。

朝最初即定都南京。但是,迁都一事遭到许多中国人的反对,大部分外交使团也反对迁都,而且北京地区连续发生几次兵变,袁世凯便借口军心不稳而宣称他将留在北方,并坚持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之职。3月10日就职仪式在北京举行,迁都南京之事终告流产。

迁都等动议不成,孙中山的支持者则试图以颁布临时约法的方式来箝制袁世凯。他们想在这部《临时约法》中规定,国务员享有实权,国务员由内阁选出,内阁成员则由在议会两院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选出。这样,总统成为挂名的国家元首。在把这些想法变为政治现实的努力中,同盟会改组为一个群众基础更为广泛的政党。这就是国民党,康有为一度也曾想用这个名称为他自己的组织命名。

这个新成立的国民党的重要实力人物是宋教仁。他很年轻,但已参加同盟会多年,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他于1907年曾试图策动东北“马贼”起义,于1911年参加了广州起义,并于1911年夏季参与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热情奔放,意志坚定,而且不拘泥于小节,他一方面指导国民党的全面竞选,一方面在他的家乡湖南省亲自参加竞选。他抨击袁世凯抓权太多,要求限制总统的权力,号召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仅有限度地参加了这次竞选。在1913年2月的全国大选中,新组建的国民党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击败了其他主要政党,赢得了众议院596个议席中的269席,在参议院中赢得了绝对多数。1913年3月20日,获胜的宋教仁启程赴北京任职——尽管他仅30岁,但很多人都指望他成为中国的新的总理——但在上海车站遇刺身亡。

尽管人们愤怒地谴责这种暗杀的行径,尽管有证据表明这

起谋杀是受袁世凯的指使，但不少政客却乐于从国民党遭受的挫折中获取利益。1913年大选中失败的三个小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的领袖们就是这样的政客，其中最具影响的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对自己的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甚感失望，他在宋教仁被刺前两天给女儿的信中写道：

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吾复有他种刺心之事，不能为汝告者，吾心绪恶极，仍不能不作报中文字，为若乃不可状。执笔两小时乃不成一字，顷天将曙，兀兀枯坐而已。^①

梁启超的痛苦反应，正如沈从文的父亲在竞选失败后的痛苦反应一样，反映出在第一次选举中，许多中国人还不能将政党政治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同个人的屈辱和丢面子等问题区别开来，因此康有为所谓中国当时尚不具备实施民主政治的条件的警示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梁启超还深信，对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使用了暴力和腐败的手段。由于梁启超从未对孙中山抱有好感，所以他对袁世凯后来针对国民党的那些行动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梁启超昔日的长沙维新派同僚熊希龄，曾于1912年出任第一届临时政府的财政总长，他此时的心境也与梁启超一样。1913年春，袁世凯强行从外国银行团筹借所谓的“善后大借款”。此举得到进步党的支持，但遭到国民党顽强有力的反对，因为国民党认为此举将使外国财团牢牢控制中国的新政权。袁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8页。

世凯的反应是,禁止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活动,罢免支持国民党的各省都督,以熊希龄出任总理之职,并派出他的两支最强人的部队进攻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南京。

1913年9月1日,经过激战之后,南京被攻陷。大约两星期之后,熊希龄内阁组成,梁启超人阁出任司法总长。10月初,内阁提出《大总统选举法》,并经宪法会议通过;袁世凯则强行召开国会,当选为正式大总统。11月初,袁世凯下令解除国民党党籍国会议员的职务,逮捕在北京的国民党员,内阁副署了袁世凯的这个命令。一直努力在各省总督中寻求支持的孙中山,看到军事胜利无望,于1913年12月在日本寻求政治避难。

一直在为道德原则和宪政改良而奋斗的梁启超,此时已卷入政治利害关系的漩涡之中。人们可以说反对袁世凯并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是背弃了其职责,可以说选举产生的国会已经“合法地”确认袁世凯为大总统;当然也可以说熊希龄内阁在财政、司法、行政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公务须要处理,而且即使在解除了国民党党籍国会议员职务之后,国会仍然是内阁得以运作的唯一场所。但是,袁世凯于1914年1月解散了残存的国会之后,梁启超肯定为是否在袁的政府任职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不过,在经过思想斗争之后,他仍然留下来为袁世凯工作(虽然疑虑越来越深),直至袁世凯露骨地表现出要登基称帝为止。

袁世凯的举动有其复杂的背景,其中包括他个人的野心,也与他认为君主制可以解决中国新政府所面临的那些政治、经济难题相关。由于他不能理解公众的那些合理的抱怨,并不一定是对他个人的不敬,所以他解散了民选的国会,当时那些半独立的省或省以下行政区划之间的讨价还价,标志着新的共和国尚

没有统一的财政计划和税收体系。袁世凯渴望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急于通过军事和教育改革使中国走向强大。但是，这样的改革花钱极多，而富人和穷人都不同意为了这样的改革支付税款，因为富人要交纳大部分税款，穷人则看不到哪一项改革会给他们个人带来好处。面对这样的局面，各省普遍感到不满，而袁世凯则愈发相信要想生存就要向外国借款。但是，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之后，英、法、德、俄等国没有多余的钱借给中国，日本成为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外国力量。日本政府起初对中国成立民国政府并无兴趣，但他们很快认识到，他们可以利用当时的形势，以大笔贷款换取中国的领土和经济特权。由于袁世凯要钱的心情愈益迫切，日本政府的要求也愈益苛刻。最后，日本政府于1915年5月7日在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中提出苛刻要求，其中包括：日本在东北、山东、长江流域享有特权，有权租借东北的农业土地，且在东北的日本居民享有治外法权地位，以及允许日本警察驻防中国境内等。尽管中国人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并努力抵制这些要求，但袁世凯还是屈从于日本的压力。这件事使袁世凯下定决心，复辟帝制，登临君位，并以此来增加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

在某种程度上讲，康有为的论调与袁世凯的决定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康有为曾不断告诫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共和政体是不可行的。他曾著文鼓吹“虚君共和”制。他也曾在杂志上撰文不遗余力地鼓吹以孔教作为国教，以使国人有一个持续稳定的信仰。袁世凯确实重建了孔子思想中关于礼的那些内容，甚至到前清的天坛主持祭天仪式。然而，当时在日本的康有为已深切地意识到中国的贫弱。他警告说，过分依赖外国贷款和实行联邦制都是危险的，中国正面临着放弃自己的文化而倾

心于西方文化的严重危险。他还警告说,现时的土匪与乞丐政府,很有可能失去对西藏、蒙古、新疆和东北等重要的边疆地区的控制。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然绝不是有人专门安排的),康有为于1913年12月终于自日本返回中国,而恰恰是在此时孙中山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康有为此次回国的目的是奉母灵归葬康家墓地,康的母亲亡于83岁,灵柩暂厝澳门十余年,这次康有为把她与她那早已死难的儿子康广仁安葬到了一处。1914年初,北京政府对康广仁、谭嗣同和其他四位戊戌变法的死难者予以隆重表彰,并将他们的功绩垂昭后人。如果袁世凯将此举看作是对康有为的抚慰,那么他得到的就是失望,因为当他邀请康有为到北京政府任职时,康有为拒绝了他的邀请。康有为在上海安顿下来,赁屋而居,继续过起了写作读书的日子。不过,就在那一年,他的姐姐和他那年轻的太太相继亡故,这使他那本已郁郁沉沉的心情愈发沉重了。

1912—1914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彼此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都对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倍感愤怒,并公开予以谴责。他们两人都把击败袁世凯的希望寄托在蔡锷身上。蔡锷曾是一位维新派人士,此时则是控制着云南、贵州两省的军界要人。康有为在一封长信中敦促蔡锷将军夺取四川,并把四川作为护国军的活动基地。康有为认为,以四川丰饶的资源为依托,加上经过改革的财政制度,并以孔子的学说为指导,蔡锷将军必能成功地击败袁军,梁启超则试图在广东组织武装力量以支持蔡锷,因为梁启超认为东南地区有数支愿为摧毁袁军而慷慨赴命的小股武装,那里是反击袁世凯的重要基地。尽管蔡将军没有把袁世凯赶下台,但他在中国西部和中部领导的几场战斗,却

极大地削弱了袁世凯的地位。

这样一来，梁启超和康有为都卷入了他们劝诫中国应予以避免的那种杀戮无度的军阀政治之中。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愤怒和忧惧中死去，这场复辟的闹剧也随之而结束。按照1913年《临时约法》的规定，他的大总统职位由副总统继任，1914年被解散的国会重新开会。但是中国中央政府和财政支付能力软弱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扭转。1916年初，康有为给另一位军人写信，这个军人叫张勋，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军阀，袁世凯曾委任他为长江巡阅使。康有为在信中指出袁世凯企图称帝，标志着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恢复帝制，“清室”应当仁不让。康有为在信中还问张勋对此有何想法。这种暗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因为张勋对满清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他曾因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镇压有功而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褒奖。张勋也曾在1911年为清王朝镇守南京，并把国民党逐出南京。在此期间，他一直留着辫子，而且他还命令他的部下都像他一样蓄发留辫。康有为或者是认为张勋之忠诚于满清，恰如他自己之不能忘情于光绪，或者是认为这大概是他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在1916年全年一直与张勋保持着密切联系。

张勋的野心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事，甚至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也要写文章作诗去批评他。例如，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当时是天津南开中学18岁的学生，他当时就写过一首这样的诗。诗是用隐喻的笔调写的，因为直接批评军阀过于危险，诗中所题日期是1916年9月：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1916年夏,孙中山怀着在混乱的局面下有所作为的希望由日本返回上海。此时,他已把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党名定为“中华革命党”。他的目的是联合有意反对军人干政的人,以恢复中国的宪政,使支离破碎的中国共和体制重返正途。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那些反对军人政权的学生,都对当时的军人政治没有什么影响力。1917年6月中旬,张勋率兵进入北京。6月27日,康有为应张勋之邀,乘火车重返北京。自1898年逃离中国后,他还不曾回过北京,望着那些熟悉的屋宇、城墙和宫殿,他不由得顿生深深的怀旧之情。退位的皇帝溥仪,现在已经11岁了,他和他的老师与家人还住在紫禁城里,民国政府为他们提供颇为丰厚的岁银。在随后的四天里,张勋与溥仪的随从商议细节,康有为则去光绪皇帝召见过自己的颐和园游览,他还参拜了孔庙、游览了万牲园。7月1日,张勋宣布溥仪复位,并邀康有为入朝任事。康有为在一首诗中(残缺)兴奋地记述了他此刻的心情,诗的大意是:丧乱已历六年,随着大龙旗再度飘扬,国家终于再返太平。^①

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就像在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的那样,康有为起草了大量旨在强化行政和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条例和敕令。康有为此时所陈述的外国模式是1660年时的英国,当时的英国正值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复位,这一例子说明经过一段共和制阶段之后,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秩序良好的君主立宪制。尽管康有为一直在设想一种建立在独立而强

① 原诗为:六年四乱亦堪悲,□□□□万物熙。鸡犬不惊金鼓静,驱车九陌看□旗。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卷十四。——译者

大的议会之下的“虚君”概念，但张勋和溥仪的大部分顾问的设想却是完全放弃共和制和恢复帝制。康有为一直没有进入皇帝的核心圈子，于是他越来越感到失望。这场复辟闹剧遭到了全国各地的愤怒声讨，原来答应支持张勋的那些军阀则迅速转向，不再支持张勋。康有为在当月写的一首古诗的题记中，形象地描述了这场复辟的结局：

十八日，南苑飞机队潘世恩，尉迟良从飞机投炸弹于宫中，毙三人。宫廷大震，醇王于十九晚召入吾，曾赏禁城二人肩舆，不及候，徒行入东华门，已闭，久叩之，守兵观吾冠服乃应门。则殿廷阒然。醇王命商外使，相对凄惨，外使许保宫禁。托泽公复命，遂留使馆。^①

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反对张勋的声浪越来越高，北京城里到处响着反对者的枪声，康有为则静静地坐在美国使馆里看着儒家的经典《春秋》。

1914—1917 这三年间，康有为和梁启超曾同 50 余位军界高级人士发生过联系。这些人大多是军界要人，常常握有重兵，占据大片地盘。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出身满清的军校，有的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的部下，有的曾受训于日本的高级军校，有的曾在德国军校学习，有些是受招安的土匪，有的是 1912 年趁乱占地为王的军人，有的是同盟会和光复会的会员，还有一些则是大通学堂等激进组织的成员。他们有的曾忠心地为满清王朝

^① 《康南海先生诗集》卷十四第 4—5 页。

而战,有的最初忠于袁世凯而后又转向民国政府,有些人则坚决效忠于孙中山或孙中山的助手。尽管他们的出身、际遇与效忠的对象各不相同,但许多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有一些人是基督教徒。有的人追求总统、总理、内阁部长、省督军等最高级的职位,并且得到了这些职位(尽管通常为时不长)。有些人满足于固守一隅之地,他们或者以走私鸦片,抽取交通税和农业税等方式筹取经费,或者通过半合法的方式从其他军队长官或地方政府那里获取资助与补给。

下层军人的生活,沈从文描述得最为生动入微。沈从文十余岁即入伍从军,一直在他湘西老家的一支小股军队中当兵,始为司令官的护卫,继之则升为文书。像许多人一样,沈从文不久就发现,当兵的生活乏味而充满暴力。他们这些湖南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自己和长官的生计,还有镇守自己的驻地,防止土匪的劫掠。他们通常驻扎在小城镇,营地是寺院或其他的公共建筑。食物很简单,但尚足果腹。虽然也进行日常的操练,但由于枪支弹药奇缺,实弹射击等训练几乎不曾进行。薪俸不高,每月仅三四元钱,但供应足够的伙食。长官们也不时进行一些爱国主义和士兵职守方面的训示。士兵中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粗通文墨即可迅速升迁,不过年长的饱学之士却也不时入伍为官。年轻的沈从文酷爱书法,书法成为他的终生嗜好。与当地妇女私会是不允许的,但无所事事的士兵可以逛妓院、下赌场、进酒馆,还可以看行刑杀人砍头。

处决士兵非常流行,因为处决之后常常会得到兵员的增补。如果被处决的是一个逃兵,这个部队还会得到一大笔赏金。被处决的最多的,是乡勇从山里或村里抓来的男人(偶尔也有女人),其理由大都是指称被捕者为土匪,士兵们通常并不做深究

即认可这种指控，并在乡人毕至的集日把人犯砍头示众。人犯被砍头前，常常要遭受拷打，而人犯的各种表现则是士兵们的基本话题。士兵们视人犯的不同表现，或是表示赞誉，或是表示蔑视。据沈从文的记载，即使在最太平的月份，通常也要杀二三十人，但在重大的清剿土匪活动中，杀人的数字会高达二三千人。反而言之，土匪的武装也会伏击居无定所的那些巡逻部队（因为这些部队很少出去巡逻），也会劫持商人或外国传教士以勒索大笔的赎金。有时，整支的部队也会在伏击中被全部消灭。

在《从文自传》的《一个大王》一章中，沈从文生动地刻画出了那一时期远离国家大舞台的小规模冲突。文中讲的是他在湘西的经历。主角是沈从文长官一位刘姓的弁目刘云亭。刘原是土匪头目，受招安后进入正规军。他一直是长官忠实的侍卫。一天，友邻部队抓获了一位女土匪，他勾引这位女土匪，想帮她逃跑，并想再次啸聚山森，复操绿林生涯。不承想事泄，女土匪被处死。正当刘拿到通行证就要出逃之际，他也被抓住了。刘向他的长官恳求饶恕，而那个张司令官却拒绝了。沈从文是这样记述的：

那大王听司令官说过一番话后，便不再喊公道了，就向两楼的人送了一个微笑，忽然显得从从容容了，“好好，司令官，谢谢你几年来照顾，兄弟们再见，兄弟们再见。”一会儿又说：“司令官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我还不干！”司令官仿佛听不到，把头掉向一边，嘱咐副官买付好点的棺木。

于是这大王就被拥簇出了大门，从此不再见了。

我当天下午依然上了船。我那护照上原有两个人的姓

名,大王那一个临时用朱笔涂去,这护照一直随同我经过了无数恶滩,五天后到了保靖,方送到副官处去缴销。至于那温文尔雅才智不凡的张司令官,同另外几个差弁,则三年后在湘西辰州地方,被一个姓田的部属客客气气请去吃酒,进到辰州考棚二门里,连同四个轿夫,当欢迎喇叭还未吹毕时,一起被机关枪打死。所有尸身随即被浸渍在阴沟里,直到两月事平后方清出尸骸葬埋。刺他的部属田旅长,也很凑巧,一年后又依然在那地方,被湖南主席叶开鑫派另一个部队长官,用请客方法,在文庙前面夹道中刺死。^①

这段简洁的文字恰当地表现了当时的暴力轮回。沈从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这样的暴力现象在19世纪时相当普遍,而1911年之后似乎更加恶化了。

据康有为估计,中国革命的前两年里,死亡人数约达二千万。他的这个数字来自日本资料,其中可能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因为日本人尽可能夸大死亡人数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中国人的自相残杀越是严重,日本人就越是能够摆出一付秩序维护者的架式,也越是能证明他们不断在中国和中国东北增加经济和政治投资是合理的。其实相当可信的数字大概只及那个被夸张数字的十分之一。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广州起义有多少人遇难,汉族军队打败满清王朝时有多少满人遇害,湖南等地的苗民有多少人被杀害,袁世凯的北洋军攻陷汉口和汉阳时有多少工人和军人死亡,1912—1913年袁世凯的军队两次攻打南京又有多少平民和军人死亡,还有秘密会党之间争夺地盘的战斗所造成

① 《从文自传》第133—134页。

的数不清的难民(如鲁迅所说,那些倍受惊吓,从“何墟”逃往“芜市”的难民)中又有多少人死亡呢?当然,我们罗列出了一系列暴力,绝不是想证明杀戮是合理的,即使是在最终建立国家秩序这种漂亮的借口下,也不能说暴力是合理的。

对某些老派的儒家学者来说,要他们去适应这样的世界,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梁济,一位饱学的儒士,退休的小官,在他60岁生日的前几天在北京投湖自尽,以他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死令许多人深感不安,因为他在最后一篇作品中明白地表示,他所以做出自杀的决定,就是因对旧秩序和新秩序都心生厌恶。梁济认为,有为数不多的人会以死来表示对被推翻的清王朝的忠心,但不会有人牺牲个人利益去为新的民国服务。梁济酷爱京剧,他曾用京剧标准的衰落来影射人世间的谬误:因为社会衰落了,所以京剧表演的道德和美学标准下降了,但观众却不能看出这标准已经退化了。在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忠、孝、仁、义”,已被四个新的价值观“吃、喝、玩、乐”所取代了。

梁济的死并没有对鲁迅造成很深的触动,他甚至在后来的作品中间接地讥讽过这一举动。但到了1918年下半年,鲁迅对中国当时的状况也已深感愤怒和厌恶,他甚至在作品中形象地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比作患了梅毒。他曾在日本学过医,在绍兴也讲人类生殖的课,这都表明他的这种比喻绝不是随意之笔。鲁迅思想深处的想法是,中国人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先天性的缺陷,以至于人们的血液中流动的就是愚昧无知和淫乱无度,中国的希望所在,只能是彻底清洗血管,并使之充满中国意识的活力。

鲁迅后来在作品中也曾写过,他离开绍兴不再教书了,到北

京干起了坐办公室的工作,但这工作却使他感到极度无望。晚上坐在家耐心仔细地注释和抄写古籍中的碑铭文字。一天晚上,一位在日本结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来看他时曾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实际上,鲁迅潜心于碑铭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他所说的,他想以此来排解笼罩着他思想的寂寞。他曾形象地把这种寂寞写作是:“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这种寂寞的感觉,与他早年在日本尝试以文学救国却不幸失败的结果有很大的关系,自那以后,这种寂寞感就愈益强烈了:“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①

鲁迅后来说,他所以决定再次尝试写作,是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影响,但他可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②。这些“猛士”指的是像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其他编辑那样的人。《新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政治和文学杂志。这是一份全力抨击儒家价值观的杂志。在康有为继续坚持把孔教作为国教可以使中国得到加强,而且可以填补可怕的道德空虚等观点后,《新青年》对孔家店的抨击更加激烈了。1916年,陈独秀撰文指出,孔子思想与西方思想不可能结合成有益的思想体系:

① 《鲁迅选集》第1卷第3—4页。

② 同上,第5页。

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

陈独秀不曾幻想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为在中国运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做的努力使他深信，中国的积弱不振以及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很可能会产生亡国灭种的后果。他还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认识又更加深了他那悲观的思想。他深信，这样的民族主义必须包含有爱国主义的情操，而爱国主义的情操必须是理智的。1916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不独洋钉铁针，充斥吾市，即写字之墨，日食之米（年来粤商购米，不之长江而之越南，以厘税重也），外货亦日渐输入。其他大宗之布帛、纸、油、香烟、肥皂等等，更何论焉。——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数。虽有极少数开明之士，其何救于灭亡之命运。^②

^① 《独秀文存》第79页。

^② 《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0页。

陈独秀和鲁迅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城市中新出现的大批有文化的人,大都是创建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学校所培养出来的,而且他们已经慢慢地习惯了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但是旧有的价值观仍然在发挥着影响。确实,大量印行的休闲类杂志(如《礼拜六》)和通俗小说,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采取的都是极为保守的态度。这些作品有的嘲讽肤浅的西方文化,有的则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这些作品的作者向厌恶军阀统治和政治腐败的公众提供的,是社会小说和“暴露小说”,而这类小说所起的作用则是重新肯定传统的价值观,甚至最为流行的新式言情小说,也只是讲些行为方式上的转换,并没有宣传改变妇女地位的思想。

鲁迅相信,《新青年》的编者和作者必定感受到了那种他在日本体验过的孤寂感。但与此同时,鲁迅心里也充满了矛盾,不知道是否应该唤醒那些逃避现实而沉醉于文学中的人,因为这些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鲁迅在同《新青年》的一位编辑的谈话中说:如果有一个没有窗户而又根本无法破毁的“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如果让他们闷死,他们就不会感到任何痛苦,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那位编辑的回答是,必须去唤醒他们,必须做这种努力,因为对于那些困在“铁房子”里的人来说,并不一定就没有逃出的机会。^①

鲁迅的这番设想无疑与他儿时深刻而恐惧的记忆有关,当然也与他父亲临终前的一幕记忆有关。他父亲临终时,在病榻

^① 《鲁迅选集》第1卷第4页。

前服侍的邻居衍太太坚持要烧一些伴送死者到阴间的纸钱和佛经，同时又催促年轻的鲁迅尽力把他父亲招回阳间：

“叫呀，你的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①

这样的回忆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但鲁迅却勇于把这种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的事用作创作素材，结果，这些素材使他在数年间创作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语白话文写作，屏弃了他年轻时写作用的艰涩难懂的古文。他的作品中不时插有片段的对话、俚语和描写性的段落，他的作品还常常能把痛苦和懊恼描绘得活灵活现，这都使他成为第一位以严肃作品打入以通俗小说为主题的周刊市场

^① 《鲁迅选集》第1卷第330页。

的作家。1918年4月至1919年4月间,他创作了三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出了一幅中国图景:中国的文化使中国人腐败了,中国人被有害的迷信情绪所包围,并不时地滋长出一些残酷的习性。在《狂人日记》中,他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吃人者,他指出,如果人们仔细地看,就会在满篇“仁义道德”的故纸的字缝里读出“吃人”二字。在《孔乙己》中,他写了一群尔虞我诈的假道学先生。在《药》里,他描写了一位愚昧和短视的人,这些人把力图解放他们的人出卖给了满清刽子手。从这几部小说中可以看到鲁迅所赞赏的作家果戈里和安德列耶夫的影响,但更深刻的还是他年轻时的回忆:绍兴酒馆和茶楼里的闲人,出当铺进药店为久病的父亲抓药,上学时的那些毫无想像力的儒学先生,徐锡麟被处死后那颗被剖出的尚带余温的心脏,久久难以忘怀的秋瑾的诗句,还有在仙台的幻灯片中看到的那些眼看着同胞被杀却麻木不仁的中国人。

在1919年4月完成的《药》里,这种往日的情景表现得相当突出。故事开始于一个秋天的早晨,这里的秋暗示着秋瑾,故事讲述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始终没有出场的叫作夏瑜的革命烈士,这里夏瑜也是暗示着秋瑾。小说中讲了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得了肺病就要死去,他们为了救孩子的命,按照当地迷信的说法,给孩子吃了蘸着刚刚被杀害的革命者夏瑜的血的馒头。这一家姓“华”,在这里暗示着“中国”。镇里的人对死难的革命者夏瑜毫无同情之感,反而在夏瑜死后嘲笑他试图说服狱卒去造反;他们所赞赏的却是那个为自己活命而出卖夏瑜的人。鲁迅以一个小茶馆为背景,精心地说明了年轻人同老年人相比还显得过于稚嫩了,换句话说就是青年人还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故事的结尾是两位老年妇女在墓地相会，一位是吃了人血馒头也没能活下来的华小栓的母亲华大妈，另一位是死难革命者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这两位老人彼此并不相识。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迭迭，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踉踉跄跄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

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圈着那尖圆的坟顶。

他们的眼睛都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象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功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

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①

鲁迅在 1919 年春说过，由于人们的视角不同，所以革命或者是被看成无用之举，或者是遭到曲解；夏瑜的鲜血没能救活那个濒死的孩子华小栓，中国人也没能理解夏瑜牺牲的意义。但是，鲁迅还说过，希望是存在的，尽管它微弱得只能透过难以捉摸的征兆才能看到。毕竟，有人把花环放到了死难革命者的墓上，那花是红色的，就像那蘸在馒头上的鲜血，就像那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红色旗帜。华小栓的妈妈也跨过了那条窄窄的小路，从右边的贫民行列中走出来加入了左边夏四奶奶的行列。那乌鸦飞起来了，尽管没有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人们所企盼的具体征兆，但它飞起来了，带着明确的目的，飞向那遥远的目标了。

鲁迅没有明确地说出那遥远的目标是否就是指中国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当时的许多事件很快就明确了这个目标究竟指向何方。《药》发表之际，适逢《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也正值中国的青年刚刚知道在巴黎和会上中

^① 《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07—310 页。

国的要求被西方列强无情地搁到了一边。这样,鲁迅发出的信息,被迅速地融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潮之中,并成为宣告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文献。

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讲,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并不多。1909年,中国曾非正式地派代表出席了第二国际布鲁塞尔大会,在上海出现过社会主义研究会,1913年选举时还曾建立了一个正式的社会党(它宣称自己是属教育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因此没有参加选举)。在法国,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的中国留学生也学习了大量社会主义理论,并与一项成功的勤工俭学计划相结合,成立了自己的社团。1917年后,其成员迅速增加。当时,中国决定支持同盟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决定是在中国的一种愿望的支配下做出的,这个愿望就是取消德国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和特权。中国派出20多万劳工到法国,他们或是在军工厂中工作,或是帮助同盟国挖战壕、运输、从事后方的建设。这些中国人中,有一些人是在到法国时就是受过教育的,更多的人则是通过特殊的军事训练后才识字的。这样,在法国就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和估量布尔什维克革命对同盟国力量的影响。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尚未传播开来之时,对于中国的激进活动家来说,把社会主义同反帝国主义政治联系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倒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关于弱小民族自决权的十四点计划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使他们深信美国一定会促使其他同盟国列强尊重中国的主权。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张勋复辟失败后掌权的中国北京政府重新抬起了袁世凯那种不得人心的政策,并于1918年为了换取新一轮大笔贷款而将德国在山东半岛和青岛的所有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即使是知道这笔交易

的那些人，也不知道英、法两国曾作出秘密承诺，保证尊重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

关于凡尔赛谈判后期的大量信息，梁启超都用电报发回国内。尽管(或是说由于)梁启超参与其事，他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弱日甚而倍感沮丧。1918年末，他出访欧洲，考察欧洲的局势，如有可能，还想对中国谈判代表施加某些压力。乘坐轮船行驶在“波平如镜”的大海上，他感到分外愉快，每天读书思考，没有世事烦恼，每日所见尽是蓝天碧海，他的唯一担心却是“登陆后恐无复此乐矣”。1919年2月抵达伦敦，雾中隐隐透出的殷红色的太阳，寒冷的旅馆和无法下咽的食品，使他骤然间又回到了现实之中，并不由然地想到，战后的情景尚且如此，更遑论战时了。但是，英国人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俭朴精神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节俭同中国随处可见的浪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3月到达巴黎，他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心里又多了几许感伤。他在一封给女儿的明信片表露了他所感到的震惊与茫然：

三月七日晨七时乘汽车发巴黎，十一时到兰士，兰市昔为大都市，有十一万人，今余数千耳。市中舍宇无一完者，兰士为法国宗教上第一名城，城建于三世纪，有罗马帝奥古斯丁之凯旋门，城中教堂最著名，为哥特式建筑之最胜者，作始于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乃成，四壁所雕石像二千五百余，皆精绝。一九一四——一六——一八年德人三次炮击之，专以教堂为射的，残破过半矣。^①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8页。

在后来的书信和文章中,梁启超不断提及他对战争涂炭生灵,摧残文化的警醒,他认识到造成战争暴行得以发生的气氛的不仅仅是德国,而是所有的西方国家。他厌恶战争,也厌恶过去的那些秘密交易和现时的怯懦表现,正是这种怯懦使同盟国列强最终拒绝了中国的请求,而且允准了日本的种种要求。在给国内政治同僚的大量电报中,梁启超告诫说:这是中国申明其国际权利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如果中国现在不表明自己的立场,那又如何要求在世界各国中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呢?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的最后决议在北京的报纸上公布了,这个决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反应之强烈不亚于24年前康有为和应试的举人们对中日《马关条约》的抗议。这种反应首先表现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示威,而后于5月4日抗议运动达到高潮,这一天也因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而被载入史册。在这个新纪元中,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向往已经同新型的国际政治上的觉醒和广泛的新的社会意识结合在一起了。这或许就是对鲁迅所提出的象征的最为真切的说明,也就是说,只要飞起来了,那遥远的目标就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了。因为尽管还有苦恼和愤怒,但伴随着这种政治意识的觉醒,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扬眉于国际社会的那种愉悦了。当时在日本学医的郭沫若(像15年前的鲁迅一样),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息,并在一首诗中表露无余。课余之时,他带着幼子漫步在海边:

阿和,哪儿是青天?
他指着头上的苍昊;
阿和,哪儿是大地?

他指着海中的洲岛。
阿和，哪儿是爹爹？
他指着空中的一只飞鸟。
哦哈，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要同白云比飞，
我要同明帆赛跑。
你看我们哪个飞得高？
你看我们哪个跑得好？^①

^① 郭沫若《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95—96 页。

第五章

饿 乡

狭义地说,1919年5月4日的危机,是一次政治“事件”它包括从那个特定的下午1点30分到5点45分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代表北京13所专科学校和大学的约三千名学生聚集在紫禁城南边的天安门开始了一次爱国示威游行,目的地是外国使馆区。许多学生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民族主义和反日口号:“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一些人散发了当天上午由当地一家印刷厂印出来的25000份传单,详细内容是抗议日本对山东的经济与领土要求和呼吁中国人民决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

学生们遭到警察的阻拦,不能进入使馆区,于是他们改变了游行路线,前往交通部长曹汝霖的宅邸。曹还兼任中国国家银行的行长,他之所以被选为目标是因为他以亲日而闻名:1915年他参加过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1918年他帮助筹措了几笔大宗日本新贷款,而现在他又要求中国批准凡尔赛条约。学生们没有找到曹——他从后门溜跑了,于是冲进他的宅邸,烧了一些

东西，殴打了曹的家人和他们发现躲在这里的曹的朋友。当这次集会开始疏散时，警察终于采取了较强硬的行动，逮捕了 32 名学生，并把他们拘捕入狱。

这一事件在表面上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它的反响却是直接而深远的，北京学生不仅得到他们的老师和他们所拥戴的太学校长蔡元培（他是一位卓越的学者，是秋瑾 1906 年在上海的那些日子的光复会的领导人。他曾出国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学术界上升得很快）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还以惊人的技巧紧密地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学生联合会，以便向政府施加最大压力。因为学生们向全中国非正式地宣布 5 月 7 日为国耻日，以纪念四年前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的那一天，所以北京以外的中国学生立即发起了示威活动。政府愚蠢地试图用封锁新闻的办法来掩盖事件的真相，但完全失败了。天津、上海，然后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的学生开始准备他们自己的罢课和抗议活动。在日本，东京也有几千名中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在警察和马队冲击下才被驱散，有二十几名学生受了重伤。

愤怒的电报——不管是有关中国政府愿意向日本妥协的，还是有关它逮捕学生行为的——源源不断地传到北京。孙中山要求，所有学生不能因为爱国^①而受到惩罚。康有为把学生们的示威活动说成是自 1912 年民国成立以来“民权”的第一次合法的表达；称之为一次大快人心的事件，并把学生比作 12 世纪宋代的那些抗议政府在外来侵略面前软弱无能的爱国者。^②此

① 许德珩《纪念与回忆》，见《九三社讯》1956 年 11 月 12 日。

② 见《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066—1067 页。

时的他正处于一种先见之明的兴奋之中,因为他认为国际联盟的成立是通向他的大同世界的第一步。

尽管慌乱的政府下令释放 32 名学生——这些学生在 13 辆载有学生的汽车的护送下凯旋般地回到校园——但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这场急速发展的运动,特别是一名在示威游行中受伤的学生死去之后,更是如此。在其他城市中,更多的学生会成立了,这些组织开始与其他经济和社会团体合作。在上海,61 所院校派代表参加同一个联合会,并同商人和工人联合,准备联合抵制日货和罢工、罢课;在学生们为联系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劳工部”后,他们吸引了十万多人参加了 5 月底的一次集会。中国码头工人不卸日货,商店不卖日货,杭州的黄包车夫不拉日本人。教师们也很快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北京高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教师在 5 月中旬成立了一个教师联合会。

兴奋的情绪因国立北京大学这所在这个国家最有声誉的大学的校长蔡元培的突然辞职而高涨。蔡一直支持学生的自我表达的权利,并且在 32 名学生被逮捕时向政府提出抗议,但他也一直坚持认为大学是文化和研究中心,学生必须学习。他的辞职信的开头是一句令人不解的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①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知道,蔡是引用一个古老而又动人的寓言,说是一位官员夸耀一匹难得一见的骏马;路边的孩子一见到他就兴奋地鼓起掌来,于是他骑着这匹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直到马累死。这句简短的话是否意味着蔡元培认为他是那匹马,他的学生是那些孩子?或者像一些人认为的,那匹马是那些中国总统不愿在公众抗议面前解除其职务的不得人心的亲日

^① 《蔡元培全集》第 3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94 页。

派部长呢？也许按鲁迅当时辛辣的说法，蔡元培不愿像1907年的秋瑾那样去“击节而死”，也许他不愿站在他认为必须完全服从的政府一方镇压学生。在武汉三镇，亲日的督军已经对示威学生表现出严厉态度，他命令军队驱散一切大型集会，几百名学生遭到士兵的殴打，至少一名学生被枪杀，他下令学生如再发表反日讲演将格杀勿论。此后，所有公开的抗议活动都停息了。

民国总统徐世昌一直认为学生会回去上课，中国将像往常一样批准凡尔赛条约。徐总统是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的多事之秋就任总统的，他曾是袁世凯的密友。和蔡元培校长一样，他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他们是清朝在知识界很有名望的翰林院的翰林，也是少数在民国任高官的两位翰林）。他迷恋于传统的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也反对研究当时在北大正在盛行的社会理论、现代法律和社会科学。所以他继续支持亲日阁员，拒绝命令中国参加凡尔赛和会代表不在条约上签字；当学生以全面罢课对此作出反应时，他下令拘捕所有再次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

学生的反应是相当成功的。他们不畏恫吓，十几人一组十几人一组地走上街头，在公园、街头向人们讲演，呼吁人们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反对批准条约，继续抵制日货。他们根本不怕政府的拘捕。“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新青年》原编辑，当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长的陈独秀写道，“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①

当政府逮捕了第一批学生时，几千名学生开始上街纠察，这

^①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页。

次他们是背着卧具和食物来的,表明他们准备直接去坐牢。政府又逮捕了450名学生。次日更多的学生涌上街头,被逮捕的学生人数已超过1100人,北京所有的监狱已人满为患,政府不得不征用整幢整幢的大学校舍作临时监狱。尽管这些临时住所条件艰苦,但学生们仍拒绝接受同情者主动捐赠的钱款。比如梁启超的弟弟把广州一个商团捐赠的一千大洋送给一个学生组织时,就遭到了婉拒。这样做可以避免贪财的嫌疑,而鲁迅在绍兴辛亥革命期间就曾对他的学生报纸编辑尖刻地提到过这一点。

由北京学生为代表的抗议浪潮又一次席卷全中国,声势甚至超过了5月4日的抗议活动。在天津,170多个教育、经济和宗教组织组成了救国大同盟;高涨的政治热情使周恩来中断了他在日本的学业,返回天津,主持一个被扩大了的学生联合会刊物。不久,各类以城市为基础的学生组织合并成了中华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同情罢课的据说有40多家商号和工厂,大约有55000名纺织、铸造、铁路、烟草和码头工人响应学生们的号召,举行罢工。

最初,抗议示威活动大多是由男生领导的,但越来越多的男生被政府监禁,女生开始按自己的意志进行抗议示威活动。这是一种崭新的,惊人的发展。在天津,女学生和少数教师已经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和一个专门写演说稿的小组(后来与周恩来结婚的师范女校学生邓颖超就是领导人之一);到了这时,在北京,一百名女生在6月4日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前一次逮捕她们的男同学;6月5日,一千多名女生在徐总统官邸前举行抗议活动。最后,总统起了作用,6月10日,他接受了曹汝霖和另外两名因亲日立场而臭名昭著的内阁成员的辞呈。但在命令凡尔

赛的中国代表拒签条约这一问题上他还是犹豫不决。这些代表迫于中国国内抗议消息的压力——七千多份电报如潮水般涌来——和巴黎中国学生对他们人身安全的威胁，最终在6月28日凡尔赛和会结束时没有签字。

这么多人长期企盼的这种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胜利，因为中国人拒绝批准条约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日本在华的实际立场。但从5月开始一直延续到6月的这场运动仍对教育、对劳工组织、对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态度和对他们自己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作用。多种现象表明了这种转变：在这段时间，创办了四百多种白话文刊物，讨论文化和政治问题；开办了几百所设有激进主义课程的新式学校；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组织问题开始受到密切关注。《新青年》杂志原本不是一份专门关注政治问题的刊物（至少没有正式明确），但在1919年末，它刊出一篇新颖的、理想主义的宣言。其中指出：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

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①

最后这一段呼吁特别贴切，因为中国妇女的变化一直是相当混乱的。尽管在妇女教育上有一些进步，尽管在法律结构上保护寡妇不受非人的不公正的对待方面有些变化，尽管不断强调要铲除缠足和溺杀女婴的做法，但这些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而后一点恰恰是近20年前秋瑾和康有为深恶痛绝的。此外，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已实行的很多很有希望的创造性的做法在随后的军阀年代也消失了。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成立的妇女军事组织和红十字会组织不久也解散了。在广东省曾有段时间允许一些妇女投票和参加临时议会，但在国民党放弃支持原先由同盟会倡导的妇女权利之后，这类做法也就停止了；1912年南京临时议会选举时曾积极广泛地倡导中国人的选举权，并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但后来却没有什麼结果。另一些有希望的尝试，如建立

① 《独秀文存》第245页。

妇女保险组织以向她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通过变卖妇女的首饰以成立妇女银行等,都彻底失败了。到了1914年,教育总长甚至公然反对妇女教育事业,妇女教育事业又受到挫折。(当时的教育总长是汤化龙,后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被一名中国理发师暗杀。)

不过与此同时,还是不断出现一些积极的征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子学校的开办,社会开始逐渐容忍甚至鼓励开办这种新的学校,许多思想解放、观念较新的男教师很快到这些学校去任教。人们广泛阅读其他国家著名女杰的传记和关于中国女性的浪漫故事及秋瑾的诗。秋瑾的诗集在1907年她牺牲后很快就出版了,而且不久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扩充版。从1915年《新时代》创刊时起,陈独秀就一直致力于女权事业,1918年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白话文全译本(1907年鲁迅曾在他的一本日文集子中首先讨论过此剧),此剧很快受到普遍欢迎,它的女主角娜拉在中国渐渐成了一个为人熟知的人物,就像十年前的索菲娅一样。

和沈从文在湘西目睹军阀世界的混乱纷争一样,丁玲也在一个小县城内——这个小城距沈当时住的地方沿沅江而下大约一百里——看到了长沙妇女斗争的情况。丁玲1905年生于湖南中北部安福的一个中等富裕的地主大家庭。和沈从文一样,她注定要成为中国的第一流作家,并一直生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80年代。丁玲也像沈从文那样生动地描述过的辛亥革命,她的描述一部分来自她自己孩提时的印象,另一部分的根据则是她母亲讲的故事。她记得,小时候她和其他孩子一起,总是对要来长毛的传言深怀恐惧;而当大人们夜观天象,议论种种不祥

之兆时,他们又总是又好奇又害怕地站在花园里,忐忑不安。她母亲对革命的主要记忆就是突然之间一切都静了下来,或者说一种已成习惯的吵闹声突然停止了。市场上整日整夜做买卖的喧闹声不复存在,轿夫们静悄悄地忙碌不停,渡船也忙着载运有钱人出城到乡下去投靠他们的亲戚,以便另谋生计;许多乡下脚夫也赶进城来乘机揽活挣钱,大多也都能如愿以偿。丁玲和家人看见大车小车的财物,被匆匆运往安全的地方;镇上的人边逃难边说,这里不会有问题的,这么个小地方不值得一攻;又听人抱怨所有渡船都在涨价;还听到远处阵阵的枪声,看到没留辫子的读书人在街上走,并被告知“他们肯定是革命党”。

丁玲的父亲曾短期留学日本,但他在1911年以前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丁玲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模糊地记得他是一位懒散而慷慨的人,他会随兴所致地把家财送给亲戚或普普通通的朋友。到后来,丁玲甚至努力回忆也想不清楚父亲长的是什么样了。她家的亲戚与她的寡母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当她母亲毅然决定离开赖以庇生的老家祖业去接受现代教育之后,亲戚们对她更加看重。母亲先到新成立的常德女子学校读书,后来又到了省城长沙。

现代教育虽然刚发展到常德,但长沙却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激进思想的大摇篮了,那时谭嗣同、梁启超及其他革新派巨擘都在此教书。甚至在谭嗣同被杀头、梁启超出逃之后,长沙仍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教育中心,有中国中部最好的学校,更是开妇女教育之先河的城市之一。丁玲在追述她母亲1911年在常德、1912—1913年在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情形时,重新展现了那段困难重重却又让人激动不已的生活。同学们的年龄自10来岁至40岁不等,但个个都努力准备在一

个新的中国中生活。

丁玲的母亲上学时已经 30 岁了，上学后她逐渐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中国被外国列强欺压的种种屈辱，知道了改革与自强的紧迫性。她的许多女性朋友也都滔滔不绝地发表她们的“救国”愿望。那些在抽鸦片家庭中（有时候 10 岁左右的孩子就开始吸）长大的学生则痛陈抽鸦片的危害。她们还一起激动地阅读从上海寄来的激进报刊。有的呼吁以秋瑾的英雄形象作为当代妇女的楷模，有的则主张以教育取代暴力。有一位年轻的妇女说，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自光复会成立以来，举行了多少次起义，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唯一的结果就是一颗颗人头落地。一年后，丁玲的母亲与另外六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誓，要继续读书，要与男人一样有成就，通过教育的途径达到救国的目的。七人中，30 岁的母亲是最年长的，她的好友向警予 17 岁，年纪最小。

大人谈话时，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旁听，因而对大人们所谈的教育问题、妇女未来的作用等均耳熟能详，并能就大人们半开玩笑的问话作出颇有爱国热忱的反应。有一次，她们对一个小女孩说，我们一定要让你受到适当的教育，不要让男人把你藏在高阁中，降低了妇女的价值……小宝贝，你是要读书还是要婶婶给你买糖吃？那个小女孩回答道，我要读书，我不要什么糖果，我要一艘外国汽船。因为她在她妈妈朋友的家中，看见过一具外国汽船模型。这时候，丁玲已经知道了男女之间在教育 and 期望上有着天壤之别。她母亲的弟弟可以乘船出外做生意和求学，而她的母亲则只能留在家中学绣花。而今，看到母亲苦读的情形，丁玲仿佛看见了母亲靠卖田产、养鸡、养猪、种菜艰难度日的情景。每当看到毛茸茸的小鸡破壳而出时，那种柔弱不堪……

击的小生命常使她联想到一个小女孩在此时此地降生。

当然,最让人揪心的是看到一位母亲放小脚时的那份痛苦、那份坚毅。丁玲后来整理了母亲刚上学那段日子的一些笔记:入学考试、各种准备工作及陌生的环境,已经使这些乡下妇女惶惶不安;开学当天,还得一双小脚站在操场上,听那说不完的入学训辞,忍受着种种屈辱的身体上的痛苦,忍住眼泪不让它流下来。现代教育的课程对这些妇女而言,是一种戏剧性的挑战。比如体育课,对所有学生都有要求,缠小脚的学生却没法上。丁玲的母亲在一些天足的激进朋友的鼓励下,决心不顾同学的嘲笑,坚持上体育课。她还解开裹脚布,试着跑步,每天晚上把脚泡在冰冷的水中以减轻疼痛。经过不间断的锻炼,她发现自己的脚又慢慢地伸展开,最后终于可以跟其他同学及老师一样,穿普通的鞋子了。对丁玲的母亲来说,到1914年这种坚强的意志终于有了结果。她当时已没有钱交学费,便在长沙附近的桃源小学找到一份教职。在那儿教了几年书以后,又被提升到她自己的启蒙母校常德女子学校任舍监。

这种缓慢而稳步的奋斗,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胜利,并使丁玲得以顺顺利利地上学,不必缠足,还可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她在长沙第一女师附属小学读了几年,又搬回常德与母亲同住,并于1919年再次回长沙上学。这几年,已进入青春期的丁玲受她母亲的好友向警予的影响很大。向警予是“常德七女”的老幺,对她们的结义救国的宗旨极为热切,这时已经成了一位意志坚定而有才华的妇女。她毕业于周南女子中学,这是当时最好的女子学校,她与朋友们把这所学校变成一个政治活动中心。在激进的校长的鼓励下,她与好友蔡畅一起成立了一个妇女勤工俭学会,与毛泽东和蔡和森(蔡畅的哥哥)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

会建立了联系。参加妇女勤工俭学会的年轻妇女都是打算去法国的,因而她们可以说是中国新一代妇女自立自强的先锋。向警予常常与丁玲谈自己的计划,而她乘汽船换帆船溯江而上回老家时,一般都要在桃源与丁玲母女盘桓几天。桃源及周南学校的女学生,也是湖南各地五四运动的领袖。她们在毛泽东所组织的学生联盟的支持下,组成“救国十人团”,到全省各地,鼓励湖南青年的爱国热情,提高他们的目标意识。

与爱国主义同时发展起来的妇女自由意识,很大部分是由《新青年》及同类刊物上的文章所引发的。这些文章指出中国妇女的依赖性,批评传统婚姻的荒谬,为各种形式的同居或自由恋爱大声疾呼。丁玲通过她的激进行为,逃脱了她的族人为她安排的婚姻;她不顾族人的反对,坚持要同杨开慧(她的好友,长沙名教师之女)到男女合校的学校去读书,虽然她母亲后来同意了,但她未来婆家的人认为最好让自己的儿子离她远一点儿。年仅14岁的丁玲还到外游说,希望湖南有关当局承认妇女的平等权益,使妇女享有合法继承权,当然都没有成功。当向警予、蔡畅等人前往北京学习法语,并于1919年前往巴黎时,丁玲和她母亲因为没有钱不能同行,但是她们仍然保持书信联络。

然而,这些年轻妇女的非凡表现,她们的勃勃生机和卓越勇气,并不能掩盖中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异常强大的反面压力这一事实。虽然妇女解放的趋势是有的,但无以计数的妇女仍没有解开裹脚布,并要求她们的女儿缠足,婚姻仍由父母安排,寡妇仍过着守节不嫁的生活。更有甚者,时不时有人用西方化的伪科学和数学公式般语言重新“论证”妇女的从属地位,以补充孔夫子关于三从四德的圣训。

1918年,鲁迅写了一篇题为《我之节烈观》的论文,发表在

《新青年》上。他无情地解剖了人们对妇女的混乱态度,指出当前在妇女贞节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因为男人并没有贞节问题),完全是康有为坚持恢复帝制的那一套逻辑,或者有如那些灵学家,企图唤醒古代哲人孟子的灵魂,用以解决中国问题。他尖锐的问道:

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①

鲁迅接着又说,关于“阴类”“阳类”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即便是有此阴阳法则,但谁也不能证明某一性别就是优于另一性别。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才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② 现存制度对妇女的苛求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即使不能改正过去的错误,但至少可以阻止不对的事情一再发生:

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① 《鲁迅选集》第2卷第7页。

^② 同上,第10页。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①

对这种伪善的剖析，并不限于上海或北京的少数优秀作家。1919年，当湖南长沙南阳街的赵小姐因为宁死不愿嫁给同城的吴先生，她的父母坚持相逼而自杀时，就有人着手分析这次事件的深刻原因，并试图从中吸取建设性的教训。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二十五六岁，也是不满于父母让他跟邻居的女儿结婚，离开湖南中部的老家，跑到长沙来读书的。结果，毛遇上了丁玲的朋友杨开慧，并与她终成眷属。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跟他学了几年伦理学，从他那儿吸收了一些重要观念，如个人的自我实现、个人的社会责任等。毛泽东可能也看过杨昌济1915年发表的论中国家庭的文章。文章赞扬了西方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及自由选择婚姻伴侣的可能性，并指出为那些心智不全或体格欠健康的人安排婚姻是危险的，实际上不应该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弱点通过遗传延续下去。也许是出于对这种残酷的优生学观点的下意识的抵触，毛泽东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体育锻炼，他主张通过锻炼和军事训练增强中国人的体格，扫除中国人以“双手白嫩”为美、以“少年老成”为尚的传统观念，

^① 《鲁迅选集》第2卷第12-13页。

而代之以“野性”，要能跃上马背边驰边射，愈战愈勇，吼声撼山摇地，怒啸日月失色，要有“力拔山气盖世”之猛烈，“不斩楼兰誓不还”之胆量。

这种浪漫而戏剧性的体格改造的想法，究竟救不了赵小姐。尽管她的勇气无疑与十几岁的丁玲、杨开慧并没有不同，但她还是成了不幸的一员。正如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所说，赵小姐是死下一个三面铁丝网中，这三面网一是她的家庭，二是吴家（未来婆家），三是中国社会。不管赵家和吴家如何固执，如果社会上有一个强有力的公意支持她，如果有一个全新的环境，认为离家出走并不可耻，甚至认为是勇敢可敬的，那么这个少女就不致于死。她是死于社会制度的黑暗愚昧，因为它不重视个人意愿。因此，简明的结论是：社会必须改革，自杀无论如何不是解决之道。毛泽东指出，正是因为自杀是由于社会剥夺了人们的一切希望的结果，我们理应向社会挑战，找回失去的希望，直至奋战而死。

不知瞿秋白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因为他的母亲也是自杀的。那是1915年，他才16岁，他母亲把红磷火柴头仔细地刮下来，然后用酒吞下去。就她的情况而言，绝望行为的理由像中国社会本身一样复杂：当初她嫁给了江苏的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子弟，这些地主在清朝是乡绅阶层的中坚，辛亥革命后，他们常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获得政治权力（正像沈从文在家乡所见到的那样）。但是，她丈夫懒惰奢侈，既不能从地里收到较多的钱，又不能在新的国家或省政府中找个差事。他让瞿秋白受到了良好的初等教育，但是，等坐吃山空后，他就到外省找了一份教书的差事，收入极其微薄，不足以糊口，更无余钱寄给妻子。瞿秋白

的母亲挣扎着抚养六个孩子，还要服侍半瘫痪的婆婆，债台高筑，可亲戚们还经常指责她不会理家，不尽孝道。有一天，她终于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正在学校上课的瞿秋白，惊闻母亲死讯，震惊无措。待他赶到家时，看到的是母亲的遗体 and 散落周围的火柴棒。瞿秋白感到前途渺茫。在几乎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到武汉投奔亲戚。1916年，他又北上到北京。由于太穷，交不起正规大学的学费，他便进了五年制的俄文专修馆；这是外交部新近设立的一个教育机构，不但不收学费，还发些零用钱，并答应毕业后在外交部或中东路安排工作。瞿秋白受过良好的古文教育，尤其精于古典诗词，而且对佛学也有很大兴趣，他后来回忆说，1917年入学前，他对俄国文学毫无了解，对俄国革命也没有注意，如果说他有什么理论的话，那也是“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①

在北京的三年里，他过着“枯寂”的生活，埋头苦读，按专修馆的要求，每天读俄文和法文11个小时，另外，还看佛经和中国哲学典籍。他以为，这些东西对他后来通过利他思想转而进入服务人类的超越境界颇有助益。^② 他的唯一社交活动是在他的俄文班的同学中间，再就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办公室里见到的一伙人，他们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也到了北京，当时也正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馆员，他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会。从李大钊讲述的马克思主义中，瞿秋白得到了一些安慰，因为他所看到的

^① 瞿秋白《多余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编印1973年版第3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2页。

世界都是消极的,北京的官僚腐败现象令他感到压抑和气愤,他的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嫉妒与仇恨让他困惑,使他感到“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①。李大钊也是刚开始研究俄国和马克思主义,可他向这些年轻的中国听众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观点,那就是,俄国是一个榜样,它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从其后进入现代世界一事中得到启发。1918年7月,李大钊写道:“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②他暗示,中国可以照此而行。四个月后,李大钊宣布,“Bolshevism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胜利将把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一扫而光。他像15年前的邹容那样大声宣布:“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帜。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瞿秋白依然态度谨慎,继续在佛经中寻找类似的解放。他认为佛教的普救主义,才是挽救世界危亡的正途。世事没有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也是一样。

对瞿秋白来说,促使他行动起来,改变思想方向的,是1919年5月4日的游行抗议活动,而不是这些抽象的讨论。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5月的头几天,他还是一个不情愿的参加者,他之所以成为俄文专修馆的代表,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干;但是,自他参加了5月4日和6日的游行集会之后,特别是被抓进北京监狱,与其他数百名学生关了三天后,他觉得自己像是“卷入旋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3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4页。

③ 同上,第603页。

“漩涡”似的，便和一批在京的朋友“‘热烈’参与学生运动。”^①当时，他才20岁，他在后来的著述中描绘过游行抗议活动对他当时的思想的影响：

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刺激，——克鲁朴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千百万册书报。……

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痛苦，解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恶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是包括在这里。^②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瞿秋白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报道和社会活动中，这些行动不只是受了“五四的激进主义”大气候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影响，也受了像“中国青年会”这类改良组织的影响，后者在当时反动派与军阀控制的中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早先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典籍和佛学，后来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现在，他又对罗素的著作产生了兴趣。当时中国出现一股“罗素热”并不令人惊奇，他的许多著作已译成中文。在陈独秀提出的我们现在需要研究“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不是儒家思想的号召下，许多人为了深入了解西方的科学观念，全身心地研究罗素的数理逻辑著作；此外，罗素对现象世界和现实

^① ^②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3页。

本质的看法,与佛教哲学的吻合常常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同时,他的和平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给那些已经被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所吸引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素是1920年底到中国的。当时,他刚访问完苏联,就作为新知演讲社邀请的几个知名人物之一,来中国做巡回演讲(新知演讲会是梁启超创立的,他从法国回来后,便决定将余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书事业,而不是政治活动)。当时,罗素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从两个事实看出来,一是“罗素研究会”的成立,一是《罗素月刊》的创办。他关于社会改造的可能性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罗素这次来中国还带着他的情人,年轻的社会学家多拉·布莱克同行。她在女子学校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演讲也很有影响。她在演说中毫不掩饰自己与罗素的关系,赞扬苏联对男女关系的改革,告诉中国青年人大胆站起来,反抗旧的婚姻模式,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在中国的环境下,布莱克和罗素带来的信息当然是激进的,它们不仅深受保守人士的痛恨,也让一些左派人士感到不安。以毛泽东为例,他从北京回长沙后听了罗素的演讲(丁玲也可能听过演讲)。罗素提出的共产主义不用暴力革命起义,而用教育和启蒙式说服的办法,也能实现的观念,极有说服力,对此毛泽东很警惕,他在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及其他湖南朋友的信中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中国没有时间做温和的改革;况且,学校与报纸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如果人们只是温和地等待,改革将是遥遥无期的。^①

瞿秋白虽然沉浸于罗素的作品之中,但他却错过了罗素的

^①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演讲,因为1920年10月罗素在中国旅行演讲时,他正好接到北京《晨报》的聘约,要他到苏联去做该报的通讯记者。虽然这使他中断学业,并有可能破坏他到政府部门任职的前程,他还是接受了聘约。瞿秋白之所以孤注一掷,待遇优厚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还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中国人对苏联缺乏确切的了解;虽然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讨论小组,1920年夏又成立了几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但是,自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没有一个有识的中国观察家去过苏联;而无论罗素和布莱克的描述多么生动,他们所凭借的,也只是在苏联短暂访问的有限经验。此外,不只是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搜集苏维埃社会的情况,《晨报》——也就是聘用瞿秋白的报馆——也在进行这一活动。《晨报》是七年前作为梁启超的进步党的喉舌创办的,与北京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及“研究系”政治人物有联系,梁启超仍然是研究系的主要成员。瞿秋白接受聘约,既有实际的经济原因,更有一种拓荒的先驱精神支持着他。他怀着激动与紧张的心情,把这次的俄国之旅,视为可为中国人民带来光明的神圣任务;临行前,他与亲朋好友一一告别,还看望了他多年不见的父亲。

10月18日,一大群人到北京车站为瞿秋白送行。他的叔叔瞿菊农是一名激进人士,瞿秋白正是和他一起第一次尝到了参加社会主义活动的喜悦。这次,他写了一首惜别诗,以泰戈尔和伯格森的精神为证,说明万物皆存在着一种和谐,它可以超越躯体而分离。旅行几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车抵哈尔滨就停止不前了,要等苏联军队清除铁路沿线的谢苗诺夫的白俄军队后才能安全行驶。火车左等右等,到11月仍不能前进。瞿秋白便利用这段时间研究哈尔滨。当时,日本在那里的工业和经济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瞿秋白亲眼目睹了日本人为之骄傲的工作

精神。他开始把自己的论文、诗词和观察加以整理，汇编成册，后来以《饿乡纪程》为题发表。饿与俄同音，一语双关。对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饿乡”不仅指苏联，更兼指他们三千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有两位学问人格俱优的贤人伯夷、叔齐宁愿在首阳山（清朝人管异之称之为饿乡）饿死，也不肯在无道昏君的统治下苟活，由此证明，自我牺牲往往能带来极高的精神补偿。

瞿秋白在1920年12月写的一首诗，表现出他开始怎样将佛教的物质生活的虚幻感、他的世界的动荡感与他正要去探索的世界的紧迫“现实”调和起来了。诗中说：

蒙昧也人生！
霎时间浮光掠影。
晓凉凉露凝，
初日熹微已如病。

露消露凝，人生奇秘。
却不见溪流无尽藏意，
却不见大气滢洏有无微。
罅隙里，领会否，个中意味？

“我”无限，“人”无限。
笑怒哀乐未厌，
漫天痛苦谁念，
倒悬解待何年？

知否？知否？倒悬解待
自解解人也；
彻悟，彻悟，饿乡去也
饿乡将无涯。^①

在哈尔滨停留期间，瞿秋白还写了一篇将赞美与幻想揉为一体的杂文，把他叔叔10月18日送别时的诗中的一些观点加以引申发挥。瞿菊农在诗中写道：“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乡人，究竟怎样。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②

瞿秋白把这一比喻引申为对祖国对自己的追求的隐喻：中国正是这块睡乡，“黑甜乡”，因为她的人民都在追求享乐与舒适，还因为那里的一切光亮全都熄灭了：“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身几乎消失。”但是现在，终于在俄国出现了一线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地耀着。”在震颤人心的结尾部分，瞿秋白写道：“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是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③

12月，铁路沿线的匪患肃清，但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仍是一件缓慢而辛苦的事，火车要在几个接轨处停留。在这些地处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6—7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同上，第3—5页。

穷乡僻壤的寒冷的市镇上,耳闻目睹及与不满的农民的交谈,使瞿秋白对苏联实验的尚不坚定的信仰经受了考验。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为他要追求的“光明”的第一印象设定了背景;1921年初,随着火车驰近莫斯科,他从车窗向外望去,但见一排排覆盖着积雪的树枝中透出光明:“车行拂掠着万条枝影前进,偶尔掠过林木的缺处,就突然放出晶光雪亮的寒月,寒芒直射,扑入车窗,如此闪闪飞舞突进,渐进莫斯科。”^①

这些雪月寒光的确使瞿秋白对苏联形成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形象。因为当时的苏联正处于饥饿和劳苦之中,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阶段就要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即将开始推行。在1921年所写的第二部书《赤都心史》中,瞿秋白继续看到了不同层面的失望与希望,经历了凉与热。他没有掩藏他警告过的消极现象,比如社会主义国家是“梦想,幻想;枪,监狱。”^②他注意到饥饿的俄国农民吃死人尸体或绝望地在家中自焚的报道;注意到对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残酷镇压情况;尝过了俄国的黑面包——“其味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③;他充满同情地看到苏维埃干部掩饰不住他们对中国旅客所带的白面包的渴望神情。他自己也得了重病,发高烧,说胡话,最后被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疗养院治疗。

瞿秋白常常满怀乡愁,思念江苏和北京的花草树木,亲朋好友,还有美景。这种乡愁在感人的《家书》一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84页。

② 同上,第77页。事实上,这是瞿文记载的一个工程师的话。——译注

③ 同上,第76页。

致。不过，这种乡思和他日渐提高的分析中国社会的能力结合起来。《家书》一文描写了他看到弟弟的来信后的感受，这封信是1921年3月寄出的，他11月才收到。他对弟弟在信中说“家里还好”一语感到震惊，根本不信——他记得家中的生活情形，他对中国“士”的作用的看法，使他无法接受这种安慰之辞。他对母亲的爱，对她的死及支离破碎的家庭的记忆，以及他们对都属于“士”的阶段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弟弟言不由衷。瞿秋白开始认识到，“士”的阶级既不是明显的资产阶级，也不是明显的封建阶级，他们因把持知识而获得权力，并以此权力“治”无知的农民，正像外国列强以其科学治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样。这些反省使瞿秋白意识到自己也是“士”的阶级中的一员，要想不照此下去，“士”只有“无产阶级化”，他发誓，“总有那一天。”^①

然而，苏联让他崇拜，她向他展示的积极方面使他产生了希望，所以他才会写道：“如今幸面见着心海中的灯塔，总算勉强辩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② 瞿秋白愉快地记下了他的各种经历：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漫步在莫斯科近郊的公园时，看见情侣们手拉着手在散步；在小学校受到小朋友载歌载舞的欢迎，并教他们认识他们所知道的第一个中文字；在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亚的陪同下，瞻仰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故居，在树林中散步，参观图书馆（他欣喜地发现馆藏中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老子的《道德经》），访问原托尔斯泰庄园里的农民；亲眼目睹列宁对众多人的演讲；聆听夏里亚宾演唱普希金的诗；以及在参加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葬礼时，他内心的复杂情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62—164页。

^② 同上，第91页。

绪和众人的不同表情。

在各种活动中。给瞿秋白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和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谈话时间虽然很短,但卢那察尔斯基还是谈到了1917年以后苏联出现的问题,这一定使瞿秋白在想到中国时产生了共鸣;卢那察尔斯基告诉他,革命后,他们即促进学校的革新,培育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然而开始非常困难,因为教职员不仅不是共产党人而且很多都是立宪民主党人,都以怠工反对政府。由于集中力量发展科学和医学的某些方面,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连西欧的一些著名科学机构最近也派学生前来留学。战争与内战的破坏给建筑物和工厂造成了灾难,但有些问题已巧妙地解决了(比如俄国当时缺乏书籍和纸张,一些俄文书就在德国印刷)。教育人民委员又说,他们对远东文化与文明极为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的地理位置处于欧亚之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联人民特别仰慕东方文学和哲学。要尽一切努力增进双方的交流,基于这种需要,苏联已建立了一所东方大学。

瞿秋白本人就是两国发展与交流过程的一部分。1921年,他开始受到苏联的重视。由于来俄留学的中国学生激增,他在东方大学担任了翻译,不久又担任了该校教员——当时,该校只有一位略通中文的教员。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初期,苏联专家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列宁为了促进世界革命而创立了第三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会见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主要因为那一年中国得知苏维埃政府有意放弃沙俄时代获得的通商特权以及对中东路的控制权。刚开始时,共产党招收党员的工作进展缓慢,主要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俱乐部、研究小组,形成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核心，再逐渐扩大。1921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避开当地军阀的突然袭击，他们把会议地点选在法租界的一所空荡荡的女子学校里。参加会议的仅有13人，代表着全国57名党员。两名共产国际的成员也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些不声不响的活动中慢慢成长起来的。不过它在整个1922年发展稳定。那年年初，几位激进的留法学生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因为他们企图破坏勤工俭学组织设在里昂大学的中法总部。^①被赶回国的有毛泽东的好友湖南人蔡和森，还有丁玲的朋友向警予。蔡、向在法国已经结婚。他们回到上海后与陈独秀联系。这位以前的《新青年》主编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现在已是共产党的总书记。7月，他俩被选为中央委员。向警予被任命为党新设立的妇女部部长。她开始成功地把上海地区缫丝厂与卷烟厂的女工组织起来。缫丝女工夏天站在滚烫的热水前缫丝，每天工作13个小时，才挣40文钱。1922年8月，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业女工大罢工，参加者几千人。蔡和森任宣传部长，不久，他果断地把几个主张改良的人清除出党。湖南省的年轻领袖，像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也在矿工和铁路工人中活动，帮助组织广州至汉口铁路附近的安源煤矿的矿工罢工，并在长沙的印刷工人以及人力车夫中开展工作。

^① 作者有误。事实是，里昂中法大学是由北洋政府以照顾勤工俭学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办的。但校长吴稚晖竟将已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拒之门外，另从北京、上海等地招来一批官僚子弟入学，引起在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愤慨，于是占领了这所学校。——译注

直到当时为止,这些罢工中最能显示工人运动的潜在力量,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922年6月初开始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工人罢工的原因之一是要求增加工资,更重要的是要求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负责签约雇用海员,而不让从中谋利的把头负责。到1月底,香港各码头工人协会、苦力组织纷纷加入,支持罢工,参加罢工者达到三万人之多,使150多艘船动弹不得。尤其严重的是,广州苦力组织响应香港海员工人的号召,不为英国船只装补给品。罢工蔓延到广东其他港口,并得到在上海的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导,后者有效地防止了从上海雇用海员破坏罢工的活动。到2月底,香港的蔬菜商、有轨电车工人、竹篮制造业工人、佣工等加入到同情罢工的行列中。到3月3日,这个小小的殖民地的生活几乎停顿,香港当局被迫让步,同意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取消把头制,并宣布废止一切有关压制工会的法令。

在这些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在华中各工厂和铁路部门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后来合并为工会组织,比如汉冶萍总工会,它于1922年12月在武汉成立,把当地煤矿工人、铸造工人、钢铁工人、水运工人联合起来。工会的要求也越来越复杂了,从工时工资,扩大到要求疾病及伤残津贴,从分享红利,扩大到设置休息和娱乐设施,以及实行抚恤金制等等。

罢工需要相当多的组织技巧,因为劳动者成分复杂,有工匠、商业行会会员、社会群体、无政府主义者,而共产党员则是极少数。另外,罢工也要有勇气,因为20年代初,镇压罢工的事常有发生:长沙纱厂大罢工时,发生了打破窗户、破坏机器的情况,两名无政府主义工会领导人就被湖南省政府枪毙了;就在香港大罢工结束前夕,英国军警向离开香港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开枪。

1922年南方铁路罢工时，不仅中国军队屠杀罢工工人，连外国军警也与工厂警卫和军阀勾结起来对付工人。1922年在英国办的开滦煤矿举行大罢工时就出现过几家联合屠杀工人的事情。当时，英国军警就得到了吴佩孚将军的一支部队的支持。

吴佩孚将军是华中、华东最有实力的军阀，他坐镇洛阳，控制了北京和汉口之间的广大地区，虽说他的下属对镇压开滦罢工负有责任，但他本人被共产党组织者认为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军阀，他们认为他会与他们共同努力改善劳工的生活水平。因此，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一直特别积极地将京汉铁路沿线的各种工人俱乐部组成一个联合工会。但是，1923年1月底，当各俱乐部的代表在北方的铁路中心郑州开会时，吴佩孚将军发出一纸禁令，不许他们开会，而且还把违反禁令的几个人抓了起来。2月4日，共产党和工会领袖宣布举行铁路系统大罢工。这种举动是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他的整个控制区，威胁到他的军事政治组织的生命线。在该地区其他军事领导人的密切配合下，2月7日，吴佩孚命令他的部队对工人采取行动，枪杀了大约30人，伤者不计其数；江岸分工会主席因拒绝下令让工人复工，在站台被砍头示众。

吴佩孚的暴力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满洲、四川、天津和上海等地的军阀和资本家纷纷向工会组织大肆反攻。1923初的这种镇压活动普遍取得了成功，它也使共产党人对与孙中山和国民党联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期间（瞿秋白抱病参加了这次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局主席季诺维也夫建议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作为一项基本政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现阶段，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驱逐外国帝国主义，摧毁本国的封建

主义。这种构想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此时的国民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十分弱小,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纳了上述计划。同年年底,在同次大会上再次当选总书记的陈独秀前往莫斯科,会见共产国际的高级代表。他被苏联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政策的正确性所说服。这次他还见到了瞿秋白,后者是他的翻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瞿秋白虽然旧病复发,但他仍然对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各种成功的可能性感到振奋不已,他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间可能是1922年初。他从来就没有说过他要做一个客观的记者,而现在,他似乎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找到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消除了他从佛学出发对现实本质产生的怀疑,并使他产生了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希望。1922年元旦前夕,他写了一首诗,表现了他的“俄乡”之旅已经找到光明的激动心情:“莫斯科忽然移近东亚”,他欢呼道,“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烘烘烈烈,光轮轰轰——呀!晓霞,晓霞!”^①在莫斯科工作、写作和研究几个月后,他的风格有些活跃,但意志更坚定了,找一个最佳的位置去大干一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当陈独秀访俄结束后建议他回国工作时,他接受了建议。

这时瞿秋白才24岁,可是他在革命社会中的经验却比中国共产党内的任何一个人丰富,由此而来的声望使他在1923年夏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原来就学苏联文学,在莫斯科期间又专攻过苏俄文学理论,加上他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178页。

对苏联社会的研究，这一切使他在学术界，特别是像上海大学这种激进的新学校，特别有吸引力。到1923年，上海大学已像几年前的北京大学那样，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劳工组织专家蔡和森教历史社会学，左翼批评家兼小说家茅盾任文学系主任，戏剧家田汉教英国文学，瞿秋白的同乡兼同学张太雷教政治学。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不到几个月，就被上海大学聘为社会学系主任。他接受了这一职务。

以上海为新的基地，瞿秋白全力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原理，以及各派社会主义的著作，既有罗伯特·欧文的早期著作，也有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信札。他主要依据布哈林的理论著作，反复讲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在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地位的基本理论，并简要地阐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主动帮助无产阶级发展自己独立的艺术形式的方式，因此，中国不再有“为艺术的艺术”，而是逐渐发展到“为人生的艺术”的阶段。^① 瞿秋白嘲笑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讨论文化时提出的观点，指出他们的观点陈腐之极，“很可能装人‘东方文化陈列馆’玻璃柜里，与他们二十五年前反对的小脚及辫子媲美”。^②

在其他文章中，瞿秋白还努力扩大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词汇，他讨论了像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俄国作家把象征手法作为反对传统文化形式的革命性用法，讨论了像谢尔盖·谢苗诺夫这样一些作家的意义，后者的小说《饥饿》说明了无产阶级有可能用创作文学作品来丰富他们自身，这一可能性已经被苏维埃官方文化组织中的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305—309页。

② 同上，第240页。

青年作家开发出来了。瞿秋白的理论文章在上层建筑中的作家能否改变经济基础这一棘手问题上,表现得有些模棱两可,而且他还暗示,文化的大变革只有在经济得到根本改造后才能到来。可见瞿秋白在连他自己都信奉的知识分子具有先锋作用的问题上,并不是十分自信的,1923年10月,瞿秋白发表了题为《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批评五四运动后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中国的拉丁文”(即以前的文言文)虽被大多数现代作家所拒绝,但是他们在将其转译成真正的准确的白话文方面还有很大的困难;此外,加上掺杂了太多西欧文化的成分,于是成了一个新的混血儿,瞿秋白称之为“外古典主义”。这就使已经糟糕的情况更加糟糕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文学作品继续与社会毫不相干,只是能够影响人的情绪——就像“转旋舞(Le valse)和“诗”(poesie)——还可以没完没了的谈论爱情,瞿秋白写道:“爱真正不是神的,爱是人的。爱若是神的,便是说谎。”^①为了替代那种轻浮诗句,瞿秋白着眼于未来,到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作家将不再把“下煤窑”看成是不光彩的事了。^②瞿秋白本人尚未走到这一步,但他尽力使自己熟悉上海产业工人,并在《铁火》一诗中展现了理论上合理的新体裁的样版,这首于1923年10月15日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诗写道:

我不在柔和细腻的自然里,
我不在繁美华盛之中;
在这烟气迷天的工厂中,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29页。

② 同上,第232页。

锻炼我的铁花，火涌。

铁花受不着阳光的煦和，
铁花领不着月光的抚慰；
小炉里融融的火腿，
嗤嗤地烧着了花蕊。

那地方锤子的声音来得蠢，
那地方金铁的声音来得紧。
好一似铜松拂着刚风，
我真爱上了，舍却不忍。

不是那轻挥羽扇，妙舞回旋的——
而是那胼胝满目，——是有力的掌。
工厂里燃着不熄的火苗，
照耀着我这壮勇无畏的胸膛。
我吹着铁炉里的劳工之怒，
我幻想，幻想着大同，
引吭高歌的……醉着了呀，群众，
锻炼着我的铁花，火涌。^①

1923年秋，像来自中国各地的其他许多摆脱了束缚的学生一样，丁玲参加了上海大学的入学考试并注册入学。与她一起来自长沙的，是她的好友王剑虹，她俩曾一同为在湖南实行男女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21—222页。

同校,为争取女子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当时,丁玲18岁,王剑虹20岁。论经历,她们当然不能与瞿秋白相提并论,但是她们像他一样,也是十多岁就离家闯荡,也像他在武汉与北京一样,靠自己的智慧在南京和上海呆了几个月。她们受到了挫折,尝到过找不到工作(无论是教师还是女佣)的滋味;她们从上海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些工人组织的情况,从为无政府主义杂志《自由人》和女权刊物《妇女声》做事的过程中学到一些编辑知识。1923年秋,瞿秋白认识了她们。他的博学多识,他对政治的关心,他对普希金诗歌的吟颂,一下子把她俩征服了。到年底,王剑虹便和瞿秋白同居了,丁玲则搬到他们和瞿秋白的弟弟瞿昀白的住处附近住下,她和昀白已经成了好朋友。四人由瞿秋白的乳母阿董照顾生活。老太太原是从江苏老家来上海照顾瞿秋白的,现在却担起了靠微薄的收入为几个人煮饭洗衣收拾房子的重担。

这一段日子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但到1924年春,他们几个人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了:丁玲同瞿昀白的关系并没有结果;瞿秋白和王剑虹对丁玲的不时出现似乎感到厌烦。暑假将近时,丁玲对她的朋友们说,她打算永远离开上海,先回湖南探望母亲,然后到北京,她想在那里开辟自己的生活。将近60年后,丁玲回忆说,他们听到她的话后沉默了,无论是瞿秋白还是王剑虹,都没有到长江边为她送行;事实上,他们连自己的房门也没出,倒是那位叫阿董的老太太送了一篓水果给她钱行。

第六章

赞美天堂

1923年中秋,瞿秋白常常漫步到上海市郊,去看望刚刚从英国归来的徐志摩。后来,1925年,丁玲在北京定居,也渐渐认识了徐志摩。他曾帮助她和她的朋友们尝试一些文学创作。徐志摩属于那种坚信“万事皆有其理”的年轻人。他1897年出生于浙江一位殷实的大商人家庭。辛亥革命期间,他家里不仅未受任何损失,还因商业和金融方面的冒险得手而越来越富:徐志摩的父亲除了经营其他生意外,还向占领杭州的革命者提供了许多枪支。徐志摩的学业没有因革命而中断,也没有像瞿秋白那样,在革命后不久就被迫辍学。相反,他一直在浙江省最好的现代化学校里就读(由于成绩优异,还被指定担任班长),随后升入上海的圣约翰教会学院,接着转学到北京一所较小的学院读书,最后进入北京大学法政学院攻读学位(这是瞿秋白、毛泽东都读不起的)。夫人张幼仪,出身于江苏省宝山镇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家庭。1918年,徐志摩21岁,夫人18岁,这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徐志摩能与张家联姻,似乎非常幸运,因为张

家属于书香门第,在当时的中国算处于现代意识的潮头;张幼仪的一位兄长已是上海一位最有影响且富有革新精神的银行家;另一位兄长是梁启超的挚友,曾在柏林大学留学,并与梁启超一起从事立宪运动,编辑改良刊物。通过张家的引见,徐志摩结识了梁启超。在学生时代,他就如醉如痴地读过梁启超的文章,自己最初写文章时也模仿梁的风格。梁启超很欣赏徐志摩在古文方面的才华和旺盛的精力;而徐志摩则把自己看成是梁启超的门生。

1918年夏末,徐志摩漂洋过海,到美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他热切地梦想着——也许是受老师梁启超和银行家内兄的双重影响——成为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尽管离妻别子的孤独和对陌生美国的恐惧感时时袭扰心头,就像当初瞿秋白初到陌生的苏联一样,但徐志摩最初并没有表露出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夹杂的那种诗人彷徨不定的心境。相反,他在轮船上用文言文写了一封长信,通过回忆自己过去和欧洲的历史,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

我国自戊戌政变,渡海求学者,岁积月增,比其返也,与闻国政者有之,置身实业者有之,投闲置散者有之。其上焉者,非无宠才也,或蔽于利。其中焉者,非无绩学也,或絀于用。其下焉者,非鲋涸无援,即枉寻直尺。悲夫!是国之宝也,而颠倒错乱若是。岂无志士,曷不急起直追,取法意大利之三杰,而犹徘徊因循,岂待穷途日暮而后奋搏浪之椎,效韩安之狙,须知世杰秀夫不得回珠崖之颺,哥修士哥不获

续波兰之祀，所谓青年爱国者何如？^①

徐志摩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唯有自我奉献，刻苦工作，忘我奋斗，不要自怨自怜，而应勇敢地面对现实。

徐志摩在美国呆了两年，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作为转学学生，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后来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以坚韧的毅力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他与大学里和他一样的一些年轻的爱国留学生共同制订了严格的计划，每天早早起床，然后学习、锻炼，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祖国的境况，并相互激励。在克拉克大学，他主修历史，同时选修了许多经济学和金融方面的专业课程。在哥伦比亚大学，他选修了更多的经济学课程，同时钻研政治学理论，阅读欧文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历史，并写了一篇论中国妇女状况的论文（在文章中，他认为传教士们的报道夸大了中国妇女的困境）。他这一阶段的学习和研究，看起来显然准备以后从事三种工作：一是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二是做梁启超的忠实信徒；三是承袭父业，从事金融经营。

这一学习计划看起来雄心勃勃，但徐志摩渐渐地被一种排遣不掉的意识所困扰，这就是他极少过问生活。他后来回忆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齧橡皮糖，看电影，赌咒”，但基本的思维水平一直没变。“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促使他离开美国（因而放弃了已申请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的是罗素的著作。他认为，与他以前读过的其他著作

^① 《徐志摩全集》第4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页。

相比,罗素的著述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徐志摩说,每当他想到罗素,总是把这些光与力的图景与纽约的伍尔沃思大厦联系起来。他觉得,这座高达58层的摩天大厦,既象征着令人称奇的成就,也象征着能被愤怒的狂潮摧毁的强权结构。徐志摩说,罗素是两个人的“化身”:一个是伏尔泰,在1789年法国的“58层大厦”被摧毁之前,伏尔泰的“清朝凛冽之光”笼罩法国达半个世纪之久;另一个是威廉·戈德温,尽管他不像伏尔泰那么出名,但在徐志摩看来,他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先驱,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他“扫除了种种虚妄的意念,并击垮了不止一座高楼大厦”。

如果说徐志摩离开美国,部分原因是受这种反传统观念的理想主义驱使,那么,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强烈的感激冲动,后来他对此作过分析: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祿泰尔(即伏尔泰——译注)认真念一点书去。^①

这是一项鲁莽的决定,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1920年10月,当徐志摩抵达英国,准备到剑桥大学师从罗素学习时,他发现,罗素不仅没有从中国归来,而且几年前就被剑桥大学驱逐

^① 《徐志摩全集》第3卷第106页。

了，因为他的同事们不赞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持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反对他最近的离婚行为。

徐志摩只得在伦敦住了下来，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学习政治学，以期获得博士学位。他常随拉斯基夫人一起去伍利奇码头参观选举，还给梁启超在中国创办的刊物寄了几篇文章，谈论的都是政治话题。但徐志摩的心思并没有放在这种政治性工作上。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感到十分压抑，正在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在1920年11月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他说，他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一直有一种感觉，每当他开始学一些新科目时，上一年取得的成绩就都消失了。在这种感觉中，伦敦只是重复了他当初从中国到克拉克大学、又从克拉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过程。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在信中并没有提及他已与国际联盟中国理事林长民16岁的女儿林徽音共坠爱河的事情。

徐志摩之所以能与暂住伦敦的林家相识，是因为他们都是梁启超的朋友。立宪运动时期，林长民曾与梁启超一同出过力；在张勋扶持溥仪复位失败后，1917年，林、梁二人又同人短命的进步党内阁，试图稳定国家政局。林长民交游广，重感情，生性浪漫，他觉得年轻的徐志摩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朋友。而徐志摩当时正处于躁动不安、激情满怀的状态中，他发现年轻漂亮、交游颇广的林小姐正是心仪已久的知音。他的太太张幼仪留在国内带孩子，分别已两年多了，她从未出过门，最近虽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以便再多读点书，但在徐志摩的眼里，她显然无法与林徽音的博学多识相比。在此后所写的家书中，徐志摩虽然对幼子颇为关心，但对妻子的热情却渐渐淡了下来。他是通过照片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的。在一封信中，他要求妻子花一整天时

间陪伴在他们两岁半的儿子左右,记下他的每句话和每一个动作,然后完完整整地给他寄到伦敦。

除林小姐外,徐志摩在伦敦还得到了别的机缘。比如,一天早上,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驱车来到他的住处,为他引见了韦尔斯先生。徐志摩很快与韦尔斯成为好友,韦尔斯邀请他到他的乡间别墅去游玩。他们共进午餐,然后在公园里散步(令他吃惊的是,韦尔斯竟然让他跳篱笆墙。他出于礼貌同意并跳了过去,但韦尔斯自己跳墙时却摔倒并刮破了衣服),接着又一起吃晚餐,喝威士忌直到深夜。另一个对他很有益的机遇是与狄更生的交往。徐志摩第一次见到狄更生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狄更生与林长民一同坐在讲台前。后来,狄更生与徐志摩同在林家饮茶时相遇,并结为朋友。在这个时候结识狄更生,对徐志摩来说是个难逢的良机,因为狄更生给他指了好几条道。狄更生是剑桥皇家学院会员,喜爱中国诗词及美学,在伦敦文化界联系很广,很想帮助一位志趣相投的年轻朋友。他发觉徐志摩对文学越来越感兴趣,就鼓动他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大学。徐志摩也很急切,同时向剑桥大学的几个学院提出申请,但不幸都被退回,因为那一学年的申请时间早就过了。这期间,徐志摩的生活经历了一些波折,先是听说林小姐要被父母送到爱丁堡读书,接着他的妻子张幼仪突然决定,要在冬季里漂洋过海,从地球的另一端来伦敦陪伴夫君。狄更生把徐志摩作为特殊学生安排在他所在的皇家学院,所以1921年初张幼仪一到英国,夫妇二人就迁出伦敦,与另一位朋友一起在沙士顿租房住下。这是一个环境幽美的小村庄,距剑桥和大学大约六英里。

但他们在沙士顿的生活并不愉快。徐志摩仍与林徽音保持着热情的书信往来,但不得不利用沙士顿的杂货店作为转信处,

这使他感到很不快。更重要的是，他感到婚姻生活束缚了他，使他没有机会去认识“真正”的剑桥，也无法把握大学提供给他各种机会。他感到非常压抑，潜藏在内心的情感和审美能量释放不出来。每天早上乘车或骑自行车去上课，晚上再乘车或骑车回家，日子过得没什么乐趣。三年后他回忆说，“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即剑桥。——译注）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我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

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们在沙士顿的生活过得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1921年秋天，他的妻子离开他去了德国，到柏林大学继续读书，她在那儿有许多朋友，而且她的哥哥也就在附近，他正在耶拿大学师从鲁道夫·欧根研究道德哲学。那年10月，林徽音随父亲回国了。徐志摩后来写道，“那年的秋季我独自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地‘发现’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他自己总结说，直到此刻他才尝到了“独身的甜美”；他能享受到他太太所不能给他的三种快乐：独自与朋友们接触，独自思考，独自走进大自然。现在，他可以自由地沐浴狄更生那和煦而高雅的美学之光，成为一种崭新的中国观念的接受者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观念，它超乎所有的逻辑，激荡着人们的心灵。狄更生在他1901年写的一本广为人知的书《一位中国官员的来信》中，指出这些思想来自一位中国学者之笔。徐志摩读过这本书而且非常赞赏书中的思想。狄更生在1913年访问中国之后，也更确信了对中国的这种感受。对徐志摩来说，剑桥是一个避风港，他在这里，既可以免遭国内军阀的迫害，也可以不受他的老师梁启超爱

国言论和责任的牵连。但他也遇到了一件很令他费解的事,正当他沉浸在英国文化的意识中,曾激励过他的狄更生却开始不断地批判本国的文化。狄更生写道,英国文化“已脱离了自然,没什么艺术可言”,这种文化“可传授但不可教育,能被吸收但缺乏思想能力”。

徐志摩那时也读雪莱的诗,当他得知雪莱抛弃妻子哈丽特而与17岁的玛丽·戈德温(威康·戈德温之女)私奔时,便把雪莱作为自己的榜样。雪莱的这一行为和他的诗,肯定使徐志摩坚定了与妻子离婚以获得自由的决心。与此同时,他还涉猎了济慈和拜伦的作品,渐渐地,他开始思考诗人内心的灵魂自由,并向一切习俗提出了挑战。随着他进一步阅读华尔特·佩特的作品(一个偶然的机,徐志摩进一个专营旧书的书店避雨时,发现了佩特的作品),他的审美眼光更加敏锐了。他在1921年11月23日的一首诗中,用中文自由体表现了他作为诗人的自我:

诗人哟! 可不是春至人间
还不放开你
创造的喷泉,

嗷嗷! 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璠瑜,
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
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
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

诗人哟! 可不是春至人间,
还不放开你

创造的喷泉！^①

张幼仪到达柏林后不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徐志摩得知这一消息，离婚的念头多少有些动摇。但他决定试试不予理睬，就答复说，他正在翻译华兹华斯的诗《葛露水》，这首诗的最后一段是：

她跋涉苦辛，前进前进，
不论甘苦，总不回顾。
她唱一支孤独的歌，
在荒野听从风筝。^②

1922年1月31日译完之后，2月，徐志摩前往柏林。张幼仪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他们给次子取名为彼得。3月初，徐志摩到魏玛和耶拿，参观了两位早期浪漫派大师歌德和席勒的故居，其间可能与他的内兄张君勱作过一次坦率的交谈，之后，他写信给妻子，提出离婚。在信中，他的措辞非常正式，提出要追求“高层次的情感”和精神的自由（像雪莱一样），而没有陈述他们夫妻生活的琐事或矛盾。他写道，“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张幼仪同意了，随后，徐志摩回到英国。

^① 《徐志摩全集》第1卷第316页。

^② 《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97—398页。

回到剑桥以后,徐志摩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春天——也是在这几个月里,正在莫斯科疗养院中休养的瞿秋白,也第一次真正看到了美丽的春光,并加入了共产党。徐志摩从上一年秋天起就已经很快乐了,现在是更加快乐,他感到自己与整个宇宙和谐地融为一体了。他写道,“我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①

这一年春天,他写了一首愉快的短诗,后来收在他最早出版的一本诗集中。在诗中,徐志摩显然在尝试用简洁的文字表达浪漫纯真的情感。他描写的是英国的乡村风光:

南风熏熏,
草木青青。
满地和暖的阳光,
满天的白云黄云。
那边麦浪中间
有农夫农妇,笑语殷殷。

这年的春天和夏天是这样度过的:与朋友们闲聊,躺在康河岸上观望皇家牧场,凝视克莱尔学院前面令他如痴如醉的大桥,读书、赌马、写作、做梦,或在夕阳西下时,骑上他的自行车,以发

^① 《徐志摩全集》第3卷第112—113页。

疯般的速度冲向落日的余辉，以求把正在逝去的白昼延长片刻。他的朋友各色各样，极具魅力：在剑桥，他进入了包括迪金森、E. M. 福斯特、I. A. 理查兹在内的社交圈子；在伦敦，他继续与H. G. 威尔斯来往，并结识了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伯特兰·罗素（这时已从中国回到英国）、罗杰·弗赖伊和阿瑟·韦利。夏末，一天傍晚，默里邀请他到汉普斯特德去见他的妻子凯瑟林·曼斯菲尔德，她的短篇小说是徐志摩所倾慕的。尽管她已经病得很重，但徐志摩仍为她的“纯真、优雅和智慧”深深感动，感到她的存在使他没了自主。他们谈文学，当然也谈翻译。当他们分手时，她劝告徐志摩绝对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从事政治活动，而要集中精力于艺术。然而，所有这样的时光都应结束了。1922年秋他终于返回中国，10月15日乘船抵达上海，他带着一颗“狂跳的心”见到了他的父母和朋友们。

徐志摩对待他妻子的方式，以及他妻子对待他的方式，很明显是“新潮的”，是对20年来一直受到攻击的整个旧式婚姻的最后答复。因为这一点，也因为他的同样“新潮”的诗——充满激情、随心所欲、意象上富有戏剧性的诗，他很快变成了广为人知的人物。中国的学生组织热切地希望请他讲演，讲他拿手的题目“艺术与人生”，这些讲演极受欢迎，不过，最初他是用英文向茫然不解的听众发表演讲的，演讲中大谈马蒂斯和毕加索，并大段大段地引用威尔斯和佩特的话。1923年，他和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教了一暑假的课，1924年国立北京大学聘他任教。不过，在他的长辈们看来，徐志摩的行为也提出了一些做人的行为准则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他再次向林徽音求婚之后。这对梁启超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自从林徽音回国以来，梁启超一直在努力安排她与他自己的二儿子梁思成之间的婚事。1923年1月，

梁启超给徐志摩写了一封长信(他提到他写到凌晨3点才写完),在信中,他紧紧抓住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问题,而自从大约25年前的百日维新以来,他一直在政治领域里讨论这两个问题。其中一段的大意是:

两天前君劭才离舍下,临行前他告诉了我一些有关你们的行为,令我十分困惑不解。迄今我一直以为你们夫妇之间有基本上无法共处的差异在(也许你不愿这么说,怕伤害了她,我还是一直这么想),我也不想多问此事。可是自你回国后,我看你还在给她写信,写诗赞美她。那你当时为何会有离婚之举?确实不可思议。我一直以为,君劭也是这么想,或许你一人独处过得十分愉快呢!但现在据君劭告诉我的情况,我看你并不快乐。

接着,梁启超告诉徐志摩,希望他能够理解两个基本观点。其一,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者,在于人对其他人的感情有所反应,“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因此,徐志摩所受到的指责是,因离婚而造成妻子、张家长辈和他所忽视的两个儿子的痛苦。其二,虽然“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梁启超也不想反对这一潮流,但他同时也知道世界上值得做的事情尚多,若以此事为唯一的人生目标,则他不敢苟同。况且,“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你不能说你就要某某,而且必欲得之。梁启超劝徐志摩约束自己的感情,避免像梁启超本人那样愈陷愈深。^①

徐志摩的回答是桀骜不驯的:

^① 见《徐志摩全集》第1卷台北1969年版第125—136页。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至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①

尽管遭到了这样的反驳，梁启超仍很喜欢徐志摩，把他安排到《晨报》文艺副刊工作（瞿秋白就是被这家报纸派到莫斯科的），并让他住在石虎胡同七号一座清朝的老式建筑里，梁启超把他的许多中外文藏书都保存在这里。在这里，徐志摩结识了梁启超的许多朋友和弟子——大学教师、哲学家、作家，还有永不服输的老学者蹇季常，他是贵州省人，多年来一直是梁启超的同伴和指路人，他喜欢酒宴，能喝善饮，但这并未减弱他对国学的博闻强记，梁启超常常要借重他对国学的记忆力。在这里，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实以及摇摇欲坠的北京政府，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就像1923年春天徐志摩在他最美的诗之一《石虎胡同七号》中所吐露的那样：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① 《徐志摩全集》第5卷第142—143页。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他的小友，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瞑，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
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
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奈何在暴雨时，雨捶下捣烂鲜红无数，
奈何在新秋时，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
奈何在深夜里，月儿乘云艇归去，西墙已度，
远巷薤露的乐音，一阵阵被冷风吹过——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
雨后的黄昏，满院只美荫，清香与凉风，
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
连珠的笑声，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①

梁启超还把徐志摩介绍给了他昔日的老师和朋友康有为。他和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歧见，当时不是被遗忘便是淡漠了，此时又重修旧好，恢复交往。梁启超向康有为介绍徐志摩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他又补充说，徐志摩正在把梁启超本人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译成英文（这项计划徐志摩已开始进行，但始终未完成）。这三个人在一起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后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中国古典诗词，也可能是当代政治，但不大可能是欧洲浪漫主义诗歌或现代科学，虽然徐志摩曾是剑桥的一位热情奔放的自行车爱好者，而这两位学者在两个星期前对现代交通工具令人畏惧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康有为前不久第一次乘飞机旅行，在河北省保定市上空翱翔，临空俯瞰，“城墙似方碟，巨厦如覆碗。”^②而梁启超则经历了一次可怕的戏剧性事件：看到他的两个小儿子在北京出车祸受了重伤。前几天他还焦急不安地从家跑到医院，又从医院跑到家，等待医生检查有无内伤并向他们提供最后的报告。梁启超获悉他的二儿子、林徽音的求婚者梁思成至少要在医院里住两个月，他立即为他儿子准备了一份必读书目，这样，他儿子就不会虚度因病被迫休闲的这段时光。

自从巴黎和会结束，梁启超从欧洲归国后，他便集中精力于

① 《徐志摩全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3年版第63—65页。

② 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诗集》卷十五第73—74页。

教书和写作,满足于与妻子儿女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远距离地发挥着政治影响。康有为则绝非真正如此,张勋复辟企图失败后,他在北京美国公使馆躲藏了大约七个月,后于1918年2月返回上海。在上海,康有为不得不供养一个大家庭,当时包括五个不同年龄的妻妾(自从他的爱妾何旃理1914年去世后,他又新添了三房),六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二个小子,十个女佣和奶妈以及30个男佣人。为了这么些人的吃住,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左右的收入不可。为此他只好典卖他自己的墨宝,做绝版书和艺术收藏品交易,典卖城市里的房地产(他在杭州附近以及青岛和上海拥有房地产),并通过代理人经营江西农村的大量私有产田,种植西红柿、洋葱和烟草,还生产茶叶、木材,养猪、养鸡。乡下的田产特别令人头痛,由于佃农不诚实和当地土匪的滋扰,不断使他失去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这进一步证明——如果康有为需要证明这一点的话——中国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好处。

为了给处于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之中的中国带来政治秩序,康有为花去了自己很大一部分收入,有人估计有一半之多,这些收入用在了与主要的军政人物进行交流的电报和其他通讯工具上。康有为与当时的头面人物进行的所有这些旷日持久的商谈交涉,目的不仅是要恢复中国的统一,而且要确保把孙中山排除在建立切实可行的新政权基础之外。康有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1922年和1923年间,他对孙中山的怀疑和不悦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两年孙中山在上海寻求支持,以改组国民党,并希望在广州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然后,广州将成为进一步统一全国的出发点。

作为国民党改组工作的一部分,孙中山试图更加精确地阐

释他关于人民的生计、鲜明的民族主义和代议政府的基本原则。到1924年，这些原则被归纳整理成为“三民主义”，此后仍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但是，孙中山发现很难得到实质性的军事或经济支持。他一再被中国的各类军阀盟友所背叛出卖，又无法从西方列强或日本那里得到实质性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与苏联结盟，与广泛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结盟。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他决定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当然，这一愿望与共产国际做出的并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的与国民党结盟的决定不谋而合。

康有为认为，要阻止显然为苏联所左右的孙中山，主要希望在北方军阀吴佩孚身上。直到1923年2月吴佩孚屠杀罢工的铁路工人时为止，他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教养和最进步的军阀之一：他曾对五四运动时示威游行的学生表示同情，支持1922年一度执政并给人们带来希望的知识分子内阁，提倡包括发挥孙中山潜在领导作用在内的重新和平统一中国的计划，他还是一位颇有功底的书画家。但是，尽管吴佩孚的慈善形象因为1923年2月他下令杀害铁路工人而被彻底摧毁，但康有为仍讨好他，敦促他开展他自己的大规模重新统一运动，这显然表明，康有为虽然知道人们对吴佩孚行为残暴、乖戾议论纷纷，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1924年，康有为向吴佩孚详细阐述了他的请求，劝告他现在还应支持湖南的赵恒惕，结成华中同盟，以防止忠于孙中山的南方军队发动大的战役。康有为当时做的一件事表明他只关心早年的那些反叛青年，他还是坚持早年的那些价值观，而不是1924年的价值观。这件事是，当赵恒惕处死工会组织者，威胁学生并迫使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向湖南省以南逃去的时候，他没有片言只语批评；但是当他发现唐才常以及1900年起义的

其他烈士的墓无人问津,杂草丛生时,他愤怒地提出强烈抗议。他的抗议起了作用,政府出钱使这些墓穴恢复了原样。

如果说这类举动使 20 年代的康有为看上去似乎脱离了现实的话,那么,这并不是说他本人年轻时的作品或他本人在世纪之交做出的英勇行为的榜样,也变成多余的了。实际上,如果人们记住 19 世纪 90 年代的康有为全神贯注于中国的民族特性问题、教育的基本内容、中国历史和文化记录的分析以及西方科学的价值,那么就可以看到,五四运动之后的这个时期,知识分子非常熟悉的仍是同一领域的问题。无论是对于那些刚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一些论断的人,还是对于那些反对这种分析的人来说,中国的过去和将来仍有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

对西方科学方法万能论,正是梁启超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批评意见。他在 1919 年访问欧洲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①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十三。

然而，梁启超和他的朋友张君勱通过他们的讲学社，邀请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等学者到中国访问。这些访问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某种西方“科学”方法的钦佩。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批评家胡适——在回国并成为最重要的西方思想的代言人之一以前，与约翰·杜威一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五四运动期间是国立北京大学受人欢迎的教师——极力主张用实用主义的或“遗传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放弃轻率而浅薄的信念，即以为任何什么“主义”都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毫不奇怪，像李大钊和陈独秀这样新涌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的倡导者对梁启超和胡适都提出了批评，指出在像中国这样经济停滞不前的国家里，没有经济结构上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理论是进行这种分析所必不可少的。陈独秀本人在一个时期里很愿意废弃整个中文书写结构，因为他觉得，即使是所谓的“白话文”，书写方式也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对新社会的到来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中国字无法表达新事物和新观念，更糟糕的是，它是一切陈腐思想的温床与摇篮，丢掉它就像丢掉一双又破又臭的肮脏鞋子一样，毫不足惜。

此外，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学生们可能继续受康有为历史分析中的独创性和他对历史真谛的追求的影响，同时为清朝末年年轻革命志士的牺牲精神深深感动；也可能为胡适的实用主义和他把西方的历史方法运用于中国小说和民间传说的传统所吸引。正如此种情况下一位学生在描述他这一时期的追求时所说：

我们前几年所堆积的喜悦情绪与热切的希望，如今全

成了悲痛的记忆。我的心仍在摇摆不定,我只有在哲学的抚慰之下才能平静。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无法采用消极的人生态度或是从禁欲的佛教中找寻慰藉。我有一种想法,也许可以从学习哲学与社会学中找到解决生命难题的答案。世事真是杂乱无章得很,我急切的想找出一两项简单而基本的原则,做为寻找解答我生命现象的线索。^①

年轻的中国人试图摆脱康梁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的那些含糊不清的二元主义,但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寻找那种“简单而基本的原则”也可能导致出一种更为广泛的看法,即人类的抱负是多种多样的。在 20 年代,这种看法往往把世界历史分为三大模式,即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模式。确定了后者即印度生活中具有佛教或寂静主义的因素,西方则具有科学因素之后,就可以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抱负开拓出富有意义的空间。当诗人郭沫若和他的儿子阿和坐在海滩上,读着印度诗人、193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写的《新月集》时,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然后,从泰戈尔的诗中引出了他自己的感叹:

铅灰色的渔家顶上,
昏昏的一团红火!
鲜红了……嫩红了……
橙黄了……金黄了……
依然还是那轮皓皓的月华!

^① 这位学生就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顾颉刚。见阿瑟·赫格尔编译《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台北 1972 年版第 60 页。

“无穷世界的海边群儿相遇。
无际的青天静临，
不静的海水喧阗。
无穷世界的海边群儿相遇，
叫着，跳着。”
我又坐在这破船板上，
我的阿和
和着一些孩儿们
同在沙中游戏。
我念着泰戈尔的一首诗，
我也去和着他们游戏。
噢！我怎能成就个纯洁的孩儿？^①

进而，郭沫若希望，人们能够找到三种文明的结合点，他漫不经心地提到了这样一个想法，即各个文化的内核所共有的“泛神论”，可以使这种聚合成为可能。

这种泛神论思想的乐观主义态度，对于像梁漱溟（梁济之子，梁济于1918年自杀，曾震惊当时的学术界）这样的学者来说，未免过于浅显了。梁漱溟认为，这三种不同文明发展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各自代表着“意欲”的不同阶段。尽管西方模式以其征服环境的要求和斗争，取得了当前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和谐观念和顺应自然的思想就毫无价值。实际上，这些思想将最终战胜西方文化，并将把物质的力量与对自然和人的伦理的更深切的理解融为一体。摒弃一切欲望而“以意

^① 郭沫若《女神》第143页。

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则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彻底改造。梁漱溟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实际面对的却是一间破屋,这时,西方人会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国人会小心翼翼地修葺旧屋;而印度人则会干脆放弃以屋遮身的欲望。像梁启超一样,梁漱溟也认为不同文化的融合并不能创造出新的文化。实际上,在任何意义上,中国都不应该被看是“落后”的,因为中国发展的道路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而且这条道路业已证明,无论是科学、民主还是工业化都未必是“必不可免”的。当前的危险在于,三种模式被迫相互交融,而最终生存下来的却只有一种。因此,梁漱溟写道,达到目的的道路是相当曲折的,因为中国“错过”了必须经过的西方阶段,但是,只要牢牢地抓住中国长此信守的生存之道,那么就可以在事实上同时改造其旧有的“西方”性质。

梁漱溟的这些论点,见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尽管他的论点复杂且含混,但仍给学术界带来了相当大的震动。两年后,争论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再次发生争论的起因,是张君勱发表了《人生观》。他以在德国学到的唯心主义哲学为依据,向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学者用以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发起了猛烈进攻。张君勱认为,人们的人生观是绝对不能用“科学的”术语加以界定的,因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而且是独特的,而个人的心理现象是没有因果可言的。许多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且夹杂漫骂的论战。捍卫“科学”观的人直言不讳地谴责张君勱,说他把在欧洲游荡了两千余年并最终被唾弃的“形而上学的僵尸”搬到了中国。他们争辩说,显而易见,在20世纪的世界里,科学已无所不在,不能批判地、逻辑地予以研究

的知识是不成其为知识的。

尽管关于这些问题的笔墨官司在整个 20 年代初期进行得相当激烈,但持不同观点的人仍然可以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们大都有相同的社会背景,大都在外国的大学读过书,是成熟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国的弱点有同样深切的感受。徐志摩 1923 年秋季的日记,记述了这些各不相同的朋友(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之间的交往情况,他们常常聚在杭州和常州附近的风景区闲谈、郊游、欢宴、饮酒。他们当中有认识秋瑾的前光复会会员,有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的创建者,有国民党的政治家,有从事大众教育和语言改革的活动家,有科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诗人,还有一些以杜威等外国知名学生的学生自诩的人。瞿秋白也不时放下在上海的工作,来与他们聚会,因为他的叔父瞿菊农早已是徐志摩的好友。

瞿秋白与徐志摩是观念全然不同的两个人,但他们还是会面了,那是 1923 年 10 月的一个下午,中饭刚刚吃罢,当时徐志摩正与一班朋友谈论斐德的《诗论》。徐志摩对瞿秋白明显的病态感到震惊,他在日记里还对瞿秋白“旦夕劳作不能休”表达了怜悯之情。瞿秋白则认为,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沉迷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感伤小说,他们相信爱的非凡的力量,他们崇拜泰戈尔,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这种生活与一个充满阶级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杭州西湖一样美丽。瞿秋白也写到,他受到了西湖的吸引,在那美妙的时刻,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满足。但是对这种吸引力是必须加以克制的,因为西湖不是真正的荒野,它的平静是虚幻的。

就在这次特殊会面的一星期前,离瞿秋白发表《铁花》一诗

不到两个星期,徐志摩在瞿秋白的叔父和张君勱陪伴下参观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寺内的宁静气氛使他倍感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合成一种宁静的合谐,使我感到异样的意境。”^① 此情此景化作了一首诗: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杂乱的丛草里,听初夏第一声的鸪鹑,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云中又回响到天边;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轻的抚摩着一颗颗热伤了的砂砾,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听一个骆驼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在远处响着,近了,近了,又远了……

有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大胆的黄昏星,独自照临着阳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与野树默默的祈祷着,听一个瞎子,手扶着一个幼童,铛的一声算命锣,在这黑沉沉的世界里回响着;

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柔声的,忏悔他的一切罪恶;

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颠,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

① 《徐志摩全集》第9卷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11页。

◆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的呼吁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悲歌声，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乡吗？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 赞美呀,涅槃!^①

写这首诗的时候,徐志摩正与梁启超和张君劢一道筹划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来华演讲事宜。徐志摩深深仰慕泰戈尔的作品,为了安排泰戈尔来华,他宁愿中断自己的旅行和写作构想。几经延误和周折,泰戈尔终于于1924年4月12日抵达上海,并在码头上见到了徐志摩和张君劢。此后不久,张君劢患病无法陪同泰戈尔,徐志摩则很快成为泰戈尔的朋友。他陪泰戈尔去各处旅行,并给他的讲演当翻译。徐志摩显然被这位印度诗人所折服,但他的激动、礼貌恐怕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同他一起当翻译的是当时还没有嫁给梁思成的林徽音。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戈尔做了一系列讲演,其讲演的重要内容,是告诉中国人:抛弃亚洲文化的根本美德,去追求已被证实是物质主义的而且是破坏性的西方文明是错误的。相反,中国人应紧紧抓住这样几个“希望”。一个希望在于诗人,诗人在世上的作用,是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生命的骚动,并以美妙和警世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一个希望在于那些具有牺牲精神的人,他们无私无畏,敢于反抗残暴和贪婪;一个希望在于一个联合在

^① 《徐志摩全集》第1卷第99—120页。

一起的亚洲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性格；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人们渴望摆脱受奴役的非人地位，渴望着寻求自由。

泰戈尔的讲演有很多人来听，他也常常受到小型宴会的款待。显然，许多学生尊敬他。但是，从一开始他的访问也招来了一些嘲笑和抗议。当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侮，内受军阀的欺压，在这样的时刻去听一个印度人的说教，尤其令人感到厌烦，尽管此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就在泰戈尔抵达中国的那一天，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茅盾（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同事）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赞扬泰戈尔对被压迫者的支持和他的爱国主义，赞扬泰戈尔诗人的人格，但他告诉那些涌在码头上欢迎泰戈尔的人，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的价值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所迷惑；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底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亦惟有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正怀疑得很。^①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直截了当地把泰戈尔、梁漱溟和张君勱三人放在一起予以批评，他称这伙人所做的，不过是想“破坏我们的铁路、我们的轮船、我们的印刷所，以使我们回到木

^① 《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424 页。

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瞿秋白的意见更加尖锐，他在泰戈尔抵达中国六个月之前就写道：

印度早已成了英国工业经济的一部分，而过去世界的泰戈尔还在那里梦想“爱与梦想”的呼声可以唤回英国资产阶级的心，——因此竭力否认政治斗争。印度已经成了现代的印度，而泰戈尔似乎还想返于梵天，难怪分道扬镳——泰戈尔已经向后退走了几百年！^①

甚至那位曾在给小儿子阿和的诗中引述过泰戈尔诗句的郭沫若，此时也转而抨击泰戈尔了，因为他此时已经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了。他也像鲁迅一样，借用医学的语言来进行抨击。郭沫若认为，东方衰落的原因在于私有财产制度，而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泰戈尔宣扬的和平思想是虚伪的、危险的，因为和平宣传是保护有产阶级的魔咒，是禁锢无产阶级的枷锁。

激进的中国学生接受了这些思想，或是接受了这些思想的某些变种。当泰戈尔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时，他们散发传单，当泰戈尔讲演时，他们提出一些不友好的问题，并不断呼喊“赶走大象”，以干扰他的讲演（陈独秀曾作一讽刺文章，文章将诗人与大象做了比较，文中把大象看作是最大的、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动物，学生取其义，称泰戈尔为大象）。学生们的抗议最有效也最尖刻。四处散发的印刷品宣称，中国青年拒绝泰戈尔对古代中国的赞扬，因为古代中国贬低妇女、充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31页。

满不义战争、实行荒唐的孝道，培养出的是冷漠麻木之徒；中国的农业养不活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工业还迈不出家庭的藩篱，中国的车和船一日只行区区数里，中国的语言是单音节语言，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中国的印刷仍然是木版印刷，中国的街道有如公共厕所，还有那奇脏无比的厨房，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中国在世界上丢尽了脸面。而如今泰戈尔先生却来责怪中国人在追求物质文明！这怎么能不让学生们不反对他呢？泰戈尔认为，这些指责是蓄意的歪曲，所以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讲演，并加快参观他日程表上的其他几个城市。

徐志摩此时再度坠入爱河。这次他爱上了一位北京年轻军官的妻子，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出奇地美貌，她的名字叫陆小曼。可他听到的却是众口一辞的谴责。他的心中感慨万千。因为他是那么向往泰戈尔宣扬的那种爱和希望，那么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实现泰戈尔理想的社会。所以他认为对泰戈尔的批评是一种令人震惊的错误。他要为这位印度诗人鸣不平：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联？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何干？紧接着，徐志摩以华丽的辞藻赞颂泰戈尔，其词汇之华丽比他两年前赞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有过之而不及：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像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

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侏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像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諧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山顶大神。他是不可侵袭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①

徐志摩文采飞扬，擅于夸张。这连绵不断的铺陈似乎凄惨地勾画出了中国新民族主义者不平衡的心态。他们企盼恢复以往的信心，以中国的资源把中国从列强以枪炮强加的那种黑暗时代中解救出来。但即使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他们还是要问—问：老子能与惠特曼、托尔斯泰、米开朗其罗、苏格拉底、歌德、基督，还有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相提并论吗？

^① 《徐志摩全集》第4卷第186页。

第七章

谁家的小孩儿

1921年,当徐志摩在剑桥,瞿秋白在莫斯科时,鲁迅创作了他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在这篇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中,鲁迅刻画了一个叫阿Q的人物,他胆小怯弱,自私狡诈,总是找理由为自己开脱,最后在辛亥年因为自称革命党人而被杀了头。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爱吹牛皮的小偷而已。鲁迅着意刻画阿Q的外貌而淡化他的背景,他解释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是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①在鲁迅看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倾吐他心中的压抑,与梁漱溟、张君勱,还有英国的罗素相反,他要揭露“中国古老精神文明”骨子里所具有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质。他以为,罗素也太容易上当受骗了,居然“在西湖看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鲁迅写道:“一九一一年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146页。

所发生的一切,只有满人退席,和先前稍有不同。”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结论是什么呢:“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①

一位友人认为,也许事情并不像鲁迅想像的那么坏,那些人之所以沦为乞丐,或卖儿鬻女,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惰性”所致。对此,鲁迅表示恕难苟同。1925年3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才,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大,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②

阿Q是在一群围观者饥饿的目光注视下被砍头的。有人批评这个结局太匆促,太随意了,有些欠妥当。对此,鲁迅回答道:“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先前,我觉得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好中国的

^① 《鲁迅选集》第2卷第47页。

^② 同上。

人们看来，也会觉得 grotesk。”^①但另一方面，正像他在谈到罗素时所说的那样，“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②

“阿 Q 精神”是饱受压迫的中国命运的写照，况且，一个人无论是过唯美主义的生活，还是去组织劳工，拯救他们，1925 年的情况都比 1921 年更糟糕。1921 年，鲁迅还写过“幽默故事”（当时，北京《晨报》的一些编辑想把报纸办得活泼些，于是约鲁迅写一些轻松点儿的东西，但他们看到故事的第二章，就把它从幽默版移到新文学版上了）。到 1925 年，旧共和政权有名无实，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无所不贪的曹锟总统已收买了剩下的国会议员；而且，更糟糕的是，连当时最睿智最训练有素的人之一——罗文干法官——也同意入阁为官了（1922 年，为了恢复财政部的秩序和诚信声誉，他辞去了中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职务）。结果却落得个受诬陷，被撤职查办坐班房的下场。

由于北方军阀对衰弱的中央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中国南方与西部的权力又掌握在一小撮地方军阀手中，战事连年不断，伤亡惨重。中国已濒临于永久分裂的危险之中，它极有可能一分为九：有的是以省为界，有的是在经济和地理环境上具有内聚力的“大区”。这九个区三个在南方，三个在华中长江流域，三个在北方。在南方最东部的是广东省的孙中山政权，它对广西和长江流域的所有政治事态的发展极为敏感。同与之对立的军阀武装相比，他的国民党军队是比较弱的，因此，要实现任何统一

① 《鲁迅选集》第 2 卷第 161 页。grotesk，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译注

② 同上，第 47 页。

国家的长远计划,必须建立一系列同盟,才能经过湖南进入长江,并沿江而下,抵达南京、上海和沿海;只有建立这样的同盟,才能使他们直趋北京,控制山东、满洲和山西。连这样一幅粗略的草图也让人感到比现实更有可靠性,因为北方有大批武装,它们虽无固定地盘,有时却能改变北方的力量平衡,比如像游荡于华北和西北的冯玉祥将军的武装。1924年底,冯将军的军队占领北京,迫使曹锟辞职,将逊帝溥仪从紫禁城赶到天津的日租界寻求庇护,并扶植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四次出任总理的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在这种局势相当不明朗的情况下,段祺瑞还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召开新国会的提案,但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就。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明确的权力中心了。

这种状况怎么才能改观呢?1923年底,鲁迅在对北京学生演讲时,提出了他对未来的悲观看法:“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造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是不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的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①

1925年,这鞭子真的开始打在她背上了,或者确切地说,她只是在那一年再也不能容忍疼痛了。只有把“鞭子”理解成帝国主义的某种特殊行动,鲁迅的隐喻才有意义,而且只有在这些行动有“推动”中国的影响时,它们才被认为是痛苦的,才有非得做出反应的感受。产业工人、商人、充满理想主义的学生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一过程,而共产党人及一些激进的国民党人更显示出突出的政治影响,因为他们有能力使中国人认识

^① 《鲁迅选集》第2卷第19页。

到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悲惨的经济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3年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他分析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已经使中国人民“无产阶级化”了，因此，尽管他们尚未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只有少数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当时中国几乎完全是农业社会），但他们已经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像李大钊一样，到当时为止，瞿秋白、向警予及其他年轻的共产党人对已经存在的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他们发现了有希望的新鲜血液，因为中国的工作生活条件一般都极其恶劣：工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14个小时，几乎没有节假日；使用童工的现象极为普遍；工资少得可怜，每家每天一块钱左右；住房（通常由雇主廉价租给工人）污秽不堪，四五人挤在一间房里，没有卫生设备，常常连厨房炊具也没有。就这么点钱，还得用来向街上的小贩买热水做晚饭。许多工人家庭的收入少得更可怜，平均每人每年还拿不出一块钱用于娱乐消遣，连最便宜的书报也买不起（工人几乎都是文盲）。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工厂的老板人多是中国人，可他们全受西方或日本势力的控制，这就使反帝理论具有了现实的说服力。到1925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已经成为暴力活动的中心，但又各有特点：外国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表现最为明显，但它们在天津最集中，那里有众多外国使馆，东部的山东和北面的满洲有被日本吞食的危险，广州不仅在沙面岛有外国租界，也有西方的商业势力，而且还靠近英国的香港殖民地。

在一系列新的罢工活动中，第一次罢工发生在1925年2月，是中共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动的，矛头指向日本人的棉纱厂。上海罢工得到学生和爱国商人的大力支持，许多商人早就采取了抗议其他厂滥用童工的活动。同年春，罢工开始蔓延，

5月中旬,一名中国罢工工人被日本工头打死;共产党立即呼吁在5月30日举行反帝团结大游行,以“复兴‘五四’精神”。游行示威如期举行,但在公共租界游行队伍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11人死亡,50多人受伤。

在后来几周,像1919年5月4日以后的时期一样,同情罢工和集会蔓延到上海其他行业,但是,这次学生加入到工人队伍中。上海有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包括1922年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组织罢工活动,后来像毛泽东一样因反共军阀的迫害而逃离湖南的李立三和刘少奇。负责与学生联络的是杨之华(她是上海大学的学生,离过婚,1924年王剑虹去世后,又与瞿秋白结婚)。瞿秋白亲自负责宣传工作,编辑《热血日报》,在运动中颇有影响;他还撰写《五卅运动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等文,阐述罢工的意义。不过,暴力活动比六年前的五四运动激烈多了。罢工者设立了纠察队,纠察队员配有各种棍棒,受过简单的军事训练;相应的,西方和日本当局也组织了志愿军,在各自的租界区实施戒严,而且还调来26艘军舰,让海军登陆进入租界。6月初,有60多位学生和游行被杀。当时,显示出“五卅”团结精神的集会、抗议、罢工已经席卷全国,抵制英货日货和破坏它们的工厂的活动也时有发生。暴力活动随处可见,报复行为有时也极其残酷;在青岛,山东军阀枪杀了一名工会领导人和一名同情罢工的报纸编辑;在天津,工人占领了一家缫丝厂,当地军队在驱逐工人时进行了长时间战斗,最后20人被杀,300多人受伤。

五卅惨案的消息深深激怒了北京的学生。6月5日,鲁迅在北京女师的学生许广平十分激动地写信告诉他:“上海风潮之

后,接连的‘以脱’的波动传到北京来了”,^①现在是北京学生采取大规模行动的时候了。她说,各校代表虽然像前辈在1919年5月4日那样汇集天安门,可他们竟然浪费时间,相互争夺谁当拟议的“国民大会”的总指挥,结果没拿出一个协调行动的计划,于是她一气之下退出会议,“废然返校”。途中正好遇到保守的女师校长——她一年前被激进的学生赶下台,此时刚被教育部重新任命回校。许广平告诉鲁迅:“看见杨婆子笑迷迷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到不可收拾了。这可怎么办?”^②

许广平非常清楚,鲁迅一般是赞成她的,因为他曾多次写文章嘲讽杨荫榆,指责她懦弱,不敢为女学生说话,用“走狗与狐狸”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位子,对待学生就像是中国传统中的恶“婆婆”,好像学生全是她家的“童养媳”,是向风籁琴上洒污物的凶恶的反动派之一。^③一周后鲁迅给许广平回信。他抱歉地解释说因为他有几件事要处理,所以未能立即回信。许广平是他的得意门生,她于3月开始与他通信,到现在已经用充满爱意的昵称“小鬼”署名了。正因为有这层关系,鲁迅对这种坦率的激进看法十分关切,也很担忧。他说: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第84页。“以脱”,英文Ether的音译,通译以太,即能媒。——译注

② 同上,第85页。

③ 《鲁迅选集》第2卷第90、91页。

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人一发狂自己或者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以为倒是幸福——但从别人看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所以我倘能力所及,决不肯使自己发狂,实未发狂而有人硬说我有神经病,那自然无法可想。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①

鲁迅还指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是难有什么成就的:试想,国立北京大学的联合力量尚不能把不受欢迎的教育部长赶下台,女子师大的学生尚不能把她们的校长杨荫榆逐出校门,他们去对付英国人或日本人,又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鲁迅没有及时给许广平回信的原因之一,是他正在忙着撰写关于五卅惨案的文章。这篇文章直到6月11日才完成,充满了同情怜悯,但相当晦涩难懂。鲁迅说:“中国青年负担的繁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更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在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炼。”“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②

不到一个月后,鲁迅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他在小说中正像在嘲讽自己犹豫不决,并对像许广平那样敢于大胆讲出自己心声的人大加赞扬。此时,鲁迅已经完全改变了写作风格,不再像

① 《鲁迅全集》第11卷第88、89页。

② 《鲁迅选集》第2卷第101页。

1918—1923 年间那样爱写具有敏锐观察力的长篇小说了，他现在爱写一些短文，或是讽刺小品，或是杂文。他把这类东西称为“杂感”。仅举一例以概全貌：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何唷！哈哈！Hehe！he！hc he he he！’”^①

在这篇短篇小说发表之前，英国人再次证明他们是一块多

^① 《鲁迅选集》第 1 卷第 285 页。

么好的“磨刀石”。1925年6月23日,广州工人、学生和军校学生举行大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上海死难者及香港罢工工人的支持,游行队伍向外国人占领的沙面租界行进时,英国军警深感受到威胁,便向人群开枪(这次法国人也加入了行凶行列),当场打死52人,打伤100多人。

1922—1923年,吴佩孚将军的军队用屠杀与报复手段,将工人运动压制了两年,但是现在,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壮大,像过去那样偶尔动用一下暴力已难以遏制它的势头了。广州也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合作,完善了国民党的结构,使它成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致力于革命原则的政党。可惜的是,这一变化来得太迟了,对孙中山本人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1925年初他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当时,他正在做最后一次努力,企图说服北方军阀联合起来,恢复宪政。但是,改组使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避免了分裂,尽管党内出现了各派领袖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蒋介石就是新一代领袖之一。1922年当孙中山陷于困境时,他曾鼎力相助;1923年,他被国民党派往莫斯科学习军事;回国后,任孙中山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创办的新军校的校长。共产国际为学校提供了资金和顾问。根据国共合作的原则,年轻的中共党员周恩来被任命为蒋的副手——政治部主任。正像黄埔毕业生给南方军队注入了新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一样,劳工组合书记处给当地的工会带来了巨大力量。比如省港大罢工就是史无前例的,它坚持了16个月,得到内地及海外华侨工人的大量捐款,以及食宿和教育方面的帮助。

中国知识分子在重新关注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产业工人的悲惨状况的同时,又开始第一次仔细评诂并分析中国农村的资

源、苦难情况和潜力。1919年，李大钊便因为号召北京的学生下乡调查，了解第一手材料，从而深深影响了一批人；20年代，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在湖南，毛泽东及其好友曾两度横穿全省，了解当地情况；也许最重要的是，1920—1921年，一场大饥荒席卷华北，夺去了数百万农民的生命，国际救济组织和中国新闻界对这场大浩劫作过生动报道。但是，正如彭湃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调查”有肤浅与不切实际的一面。下乡调查的文化人与种田的农民在文化与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对调查动机产生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彭湃出身地主家庭，在日本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他的首次革命尝试是可笑的。那是1912年春天在粤东，他身着西式服装，找一位正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农民以为他是来收戏捐的，于是恭敬地说：“这里没有演过戏！”第二个农民问彭湃在哪个营里当差，听他说要和农民做朋友，便说“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第三个农民问彭湃是不是下乡来收帐的。彭湃的乡亲们也认为他得了精神病。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和说服工作，再加上表演魔术——彭善长玩魔术，彭湃才慢慢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和宿命论思想——一个农民告诉他：“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到1925年，彭湃不仅在家乡一带组织了几个农会，还在广州办了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曾在1926年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政治活动在上海以城市工人为主，在广州则开始包括农村劳动者，而在北京在1925年仍集中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军阀冯玉祥控制北京期间，李大钊从避难的乡下回到北京，继续在北京和天津的大学师生中开展劝人改变信仰的活动。李大钊现在拥

有很高的声望,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在参加了1924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后,增长了经验),还因为在国民党改组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活动基础更加广泛。此外,由于冯将军对劳工组织持同情立场,中共北方各支部得以缓慢恢复,重建了1923年2月大屠杀后被破坏的组织系统。

李大钊等人重建中共的成就,令1925年7月回国的闻一多深感不安。闻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才20岁。随后三年,他在美国求学,先是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接着是科罗拉多大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美期间,他成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这部分是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美国种族歧视的压力。但是,正像康有为不希望他的民族主义包括孙中山的共和言论一样,闻一多也不愿意共产党接受他的民族主义信念,因此,他参加了由留美中国学生组成的“大江学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但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回到北京后,闻一多于1926年1月13日写信给他在科罗拉多的好友说:“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必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①闻一多接着说,他在北京找到了一些非共产主义的朋友,他们多是一些书呆子,没有什么影响;他只能慢慢找几个情趣相投的人,在西城租了间新房,一起讨论中国的未来问题。他在给美国“大江学会”的朋友的信中说,这一伙人已经和其他民族主义社团联络,组成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

^① 《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经查,此信写于1926年1月23日。——译注

联合会”，旨在共同抗议俄国和日本蚕食满洲，向那里派驻军队。许广平曾告诉鲁迅说，她发现这些聚会平淡无味。就是对闻一多来说，当这些聚会充满奚落和漫骂之声，间或伴有摔砸家具声时，简直就是闹剧，令人失望之极。闻把这些过火之处归咎于他仍然竭力反对的“赤魔”。但是，他也被一名女学生的抨击技巧所打动，此人的痛骂之声震惊四座，令人为之瞠目结舌。闻被告之，正是她在反对五卅惨案的游行中高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被敬畏的北京市民称为“中国的圣女贞德”。^①

从某些方面看，闻一多对青年政治积极分子的怀疑看法与鲁迅对他的学生许广平的告诫有些相似，不过，鲁迅没有表现出反共情绪。就反共情绪而言，闻一多和徐志摩是接近的。徐志摩在1925年早春访问过苏联，并为之感动，但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1925年夏天写的文章，说明他没有发现瞿秋白在1921—1922年所体验到的那种魅力。在徐看来，莫斯科只有灰暗的天空，遍地的白雪，对过去不留痕迹的破坏的感怀和对为追求新秩序所抛洒的鲜血的回忆，以及街上愁容满面的行人，商店里空空荡荡的货架和人们身上褴褛的衣衫。1926年1月，徐志摩好像是为了整理自己的访苏心得，发表了两篇东西。第一篇小心谨慎地回应了青年共产党人陈毅对列宁的热情赞扬。徐认为，列宁是个“异想天开的怪人”，他绝不能被中国未来的开拓者当作榜样，因为他之后留下了太多的破坏。^②徐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我们只有职业阶

^① 《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31—232页。

^② 参见《徐志摩全集》第4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09页。

级,士、农、工、商,并且没有固定性;工人的子弟有做官的,农家人有做商的,这中间是不但走得通,并且是从不曾关断。”^① 第二篇的题目叫《我所知道的康桥》,以反证来表达他最想表达的看法:是选择苏联还是选择军阀统治的中国。为了有力地表达上述情绪,徐志摩一改创作手法,既没有用他在描绘北京“石虎胡同七号”时所采用的短句和优雅的句式,也没有用他在捕捉常州天宁寺的宁静时所采用的排比长句,而完全是佩特式的华丽的散文短句:

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听,那晓钟和缓的声音。这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象海里的轻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戴着几处婷婷的尖阁。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浅。村舍与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荫,有佳荫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微霏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迟重的,浓灰的,淡清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朝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翳入了天听。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轻纱式的金粉糝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分润了白天诞生的

^① 参见《徐志摩全集》第4卷第224页。

光荣。“春！”这个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①

闻一多没有这样回忆过芝加哥、科罗拉多或纽约，但他对徐志摩的反共态度极为赞赏，而且两人的特征和经历有些共同之处。与徐志摩一样，闻一多也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在湖北省武汉三镇以东），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闻也聪明早慧，也崇拜梁启超的著作，也在北京上学，而且也是在按父母之命完婚后，远渡重洋赴美求学的（闻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时他尚在芝加哥，待他回国见到她时，她已三岁了）。闻和徐两人都是在海外才发现自己的志趣在诗歌；徐的第一篇白话诗写于剑桥，闻则写于芝加哥；尽管闻从不崇拜泰戈尔，他甚至在泰戈尔访华时还写过批评泰戈尔的文章，但是，在高度唯美主义的领域，他与徐情趣相投：他们都崇拜奥布里·比尔兹利的绘画和沃尔特·帕特的作品。闻一多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过一段书，这种折衷主义在他的画室里也充分表现出来，徐志摩描述说，闻一多“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着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薇纳丝一类的雕像”，“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②

1926年1月，徐志摩邀请闻一多加入诗人团体“新月社”（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表示对泰戈尔一本著名诗集的敬意），他欣然接受，可没有立即回请徐志摩参加他的中国青年国家主义者

^① 《徐志摩全集》第4卷第145—146页。

^② 同上，第50页。

的集会,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徐志摩当时正和有夫之妇的陆小曼打得火热,名声不好。不过,到1926年,闻一多答应为徐志摩编辑的北京《晨报》副刊《诗镌》撰稿。

人们原以为,在徐、闻及其朋友们的唯美主义理论和作品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个刊物的创刊号会像其内容所设计的那样,成为一种纯文学的尝试,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常见的巧合因素,它变成了一种政治文献,这个因素就是在一系列屠杀游行示威者的事件后,3月18日在北京又发生一次屠杀事件。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原因比一年前的上海五卅惨案或6月23日的省港大罢工要复杂得多,虽然游行的矛头都是指向帝国主义的,但这次的目标是日本,而不是英法。危机起因于天津地区敌对军阀对阵中的一件小事:冯玉祥将军的军队在天津附近海域布雷,以防控制满洲的军阀张作霖从海上登陆;日本人认为上述地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布雷会妨碍他们的贸易与交通,因此提出抗议,并命令清除港口的水雷。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在北京联合组织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学生进行示威游行,要求临时执政段祺瑞拒绝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当游行队伍行至执政府驻地铁狮子胡同时,被政府军队驱散。次日,即3月18日,更多的人在天安门附近集合,在听完抗议演讲后,人们再次向执政府所在地进发;警察拦住了去路,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7位游行示威者,其中大多是青年学生。

游行的初衷是如此清楚,而参加的年轻人的下场是如此悲惨。它非但没强化闻一多对激进游行示威的厌恶,反而使他放开了自回国后因种种压抑而锁住的诗喉,立即开始有意识地把《晨报》的《诗镌》作为他表现愤怒心声的论坛;他甚至在《诗镌》送印之前就创作了一首诗,于3月27日在徐志摩编辑的该报文

艺副刊上发表。闻一多用想像的黄包车夫的独白表达他对死难者的哀悼；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用黄包车夫的质朴语言来表现对人的困境的复杂看法（周恩来早期在一首诗中用同样的办法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现象，徐志摩也在一首诗中用这种办法，来描绘我们横跨这个地球的神秘旅行中的寂静^①）为了纪念屠杀事件的发生地，闻一多给他的诗起名叫《天安门》：

好家伙！今日可吓坏了我！
两条腿到这会儿还哆嗦
瞧瞧，瞧瞧，都追上来了，
要不，我为何那么跑？
先生，让我喘口气，那东西，
你没有瞧见那黑漆漆的，
没脑袋的，蹶脚的，多可怕，
还摇晃着白旗儿说着话……
这年头真没办法，你问谁？
真是人都办不了，别说鬼。
还开会啦，还不老实点儿！
你瞧，都是谁家的小孩儿，
不才十来岁儿吗？干吗的？
脑袋瓜上不是使枪轧的？

^① 周恩来的《死人的享福》，见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但徐志摩的《谁知道》一诗描写的是他在漆黑的夜里回家时与车夫的对话。见《徐志摩全集》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69—75页。——译注

先生,听说昨日又死了人,
 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
 这年头儿也真有那些怪事,
 那学生们有的喝,有的吃,——
 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
 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
 谁拿老命白白的送阎王!
 咱一辈子没撒过谎,我想
 刚灌上俩子儿油,一整勺
 怎么走着走着瞧不见道。
 怨不得小秃子一下掉了魂。
 劝人黑夜里别走天安门。
 得!就算咱拉车的活倒霉,
 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①

五天之后,即4月1日,徐志摩编辑的《晨报》副刊《诗镌》第一号发刊,内有闻一多的一篇文章。闻在文中特别强调,《诗镌》的诞生“碰巧”是在死难学生在铁狮子胡同里奔跑流血之时。他赞扬道,这是真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碰巧”,在这种巧合中,艺术和爱国融为一体了;而两者之所以融为一体,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洒在天安门及铁狮子胡同的是爱国主义的鲜血,它们应该通过作家的笔尖流到报上:“诸烈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

① 《闻一多全集》第3卷(丁集)开明书店第27页。

诗。”^①

三一八惨案还有一个痛苦的观察家，那就是鲁迅，不过，他并没有像闻一多那样把那些青年人的死想像成“最伟大的诗”，一则是正像我们从他和许广平的通信中已经看到的那样，鲁迅早就强烈地担心会发生这类事情。1925年初，他在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就警告她要小心暴力；至于他自己，他写道，他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堑战中学到一个经验：如果你暴露在战壕之外，就会被子弹打中；但是，要是呆在战壕里，你不仅会很安全，还可以吸烟，打纸牌，哼歌曲，喝口酒^②。他在另一封信中补充说，人们并不喜欢冷漠的“麻木”态度，但是要避免遭受更大的不可忍受的痛苦，也只有这样。^③许广平在回信中对秋瑾烈士舍身取义的行为大加赞扬，并感叹像她那样的人如今太少了。对此，鲁迅回答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是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④。在20年代中期的其他文章中，鲁迅在提出这些观点时，还注意到：“没有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教员咧，学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个学校，一有事故，教员也不见了，学生也慢慢躲开了；结果只剩下几个傻子给大家做牺牲”，他们“一呻吟就被杀戮了。”^⑤年轻人也许是想用演讲、游

① 《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34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

③ 同上，第25页。

④ 同上，第40页。

⑤ 《鲁迅选集》第2卷第91页。

行和宣传之类“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火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力只能将自身燃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① 毕竟，秋瑾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的。”^②

因为预警变成了现实，所以三一八惨案便格外刺痛鲁迅的心。许广平不在死难者之列，但他的另外两个学生却在，还有一个受了重伤。死者之一，青年女子刘和珍，一向特别喜欢看鲁迅的作品，而且鲁迅还知道一个感人的细节，那就是她不顾自己生活艰难，毅然预订了一年他编辑的刊物《莽原》。起初，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反应也只是一般的愤怒而已。他把政府的屠杀行为同沙皇尼古拉二世用哥萨克人屠杀俄国民众的事相提并论，并警告说血债要用血来偿。^③ 他还讽刺说，有人讲游行是受共产党煽动的，事实上示威领导人中根本没有共产党人。他再次告诫青年人要认识到杀人的人是没有血性良知的，因此，“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生了罢。”^④ 当北京学生请他为3月25日举行的死难者悼念活动写篇文章时，失落感竟使他无法静下来动笔，一直到4月1日，也就是闻一多的文章发表的那一天，鲁迅才表达了他内心的强烈愤怒：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

① 《鲁迅全集》第3卷第112页。

② 《鲁迅选集》第2卷第55页。

③ 同上，第143页。

④ 同上，第146页。

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我在十八日早晨，我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情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也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情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情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

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①

当北京的教师和诗人们正在悲感时，控制北京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两个军阀，一个是1923年镇压北方铁路大罢工的吴佩孚将军，一个是强烈反苏的满洲统治者张作霖，联起手来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激进支持者赶出了北京。连临时执政——3月18日学生就是向他示威的——也被迫到天津的日租界寻求庇护，而曾经一度支持国民党的冯玉祥将军则流亡国外，到苏联避难。鲁迅起初呆着没走，还在用辛辣的讽刺抨击北方军阀的逻辑，比如，他在题为《如此“讨赤”》的通讯中说：“京津间战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一小黄狗，是否即‘赤’，尚无‘明命’，下民不得而知。”^②但是，这种冷嘲热讽使他树敌太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躲躲藏藏；最后在1926年8月，他面临危险，不得不离开北京，跑到省一级的厦门大学教书去了。那里濒临大海，生活看来安全多了。他的“小鬼”许广平也离开北京，到广州继续深造。

但是，南方也不是天堂，因为那里的形势也发展得太快了。3月20日，也就是北京学生遭杀戮两天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他在广州和国民党内的地位，采取行动打击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囚禁了一些人，清除了一些党内异己分子；这些试探性活动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得到认可和加强。尽管这些行动对共产党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也确实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深

① 《鲁迅选集》第2卷第149—150页。

② 同上，第155页。

感不安,但是他们不得不按照听命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同国民党继续合作。因此,当已经亲自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蒋介石在6月9日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他们也只好默认这一切。作为总司令,蒋介石现在成了自封的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当蒋接受这一新的指挥权时,孙中山的儿子也在举着他的肖像站在旁边,这一举动强调了国民党内的连续性。

蒋介石的目标,就是实现曾令孙中山抱憾终生的中国统一大业。当时,他建立了一个包括南方诸省广东、广西、湖南和云南的军事盟友(他们常常是过去的军阀)的复杂的联盟,组成了八个军,其中有受过现代军事教育和政治思想灌输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尽管共产党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但蒋下令在1926年7月中旬开始北伐,从广东出发,经广东和湖南打到长江边上的武汉三镇。北伐初期的进展出人预料的顺利,国民党军队沿湘江北上,沿途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还吸引了新的盟军,8月12日进入长沙,一直占据长沙的一个军阀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将军。9月,北伐军进攻武汉,汉口与汉阳旋即被克;1926年10月,武昌守军向国民军投降,这一天正好是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武昌起义15周年纪念日。

1926年底,北伐军在长江沿岸短期停顿,出现了新的紧张形势和选择。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后,比较激进的一派云集武汉,而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其中许多代表广东比较保守的大商人的利益)则驻扎在江西南昌。而且,蒋介石已明确表示,他要沿江而下,先取上海,而不是挥师北上夺取北京。显然,这要求对西方列强采取谨慎的政策——当时上海驻扎着外国军队两千多人,港口及附近海域泊有40余艘外国战舰。同时,农村打击地主的活动,城市反对军阀和实业家的罢工与抗议活动,也日益

增多。1927年2月,共产党支持的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罢工,表达对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并强行驱逐仍然控制该市的军阀孙传芳。他们还试图在该市组织人民政府,推行一些改善经济的措施。2月20日,数十万工人参加罢工,许多工厂和交通系统瘫痪,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商会或店主组织的一致支持,加上孙将军命令军队出面镇压,总罢工失败了。军阀残酷地恢复了大清帝国惩罚叛逆分子的刑罚,杀了20多位罢工人士,并将他们的头颅挂在十字街头示众。总工会又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但两天后也完全失败了,这部分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离该市25里的地方停止不前,搞什么打扫战场肃清残敌的事去了。

在中国农村,斗争也同样充满了暴力,卷入人数之多难以计算。1926年1月,在为国民党刊物《中国农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注意到,在农村“收管”五百亩地的人是大地主,他们仅占农民人口的千分之一,有32万人。^①1927年2月,也就是仅仅一年后,毛泽东又注意到,在他的家乡湖南,农民的觉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农会——有共产党干部组织的,也有国民党干部组织的,但更多的是自发组织的——现在已经掌权了。毛写道:“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了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乡绅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他继续说,若以十分制来评价各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农民占七分,而城市居民和军人(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和干部)仅占三分。他还谈到了农民领袖的所作所为,包括清查地主帐目,揭露其贪污欺骗行为;拿走他们的钱,设立地方信用机构;把当地的土豪劣绅抓起来,戴上高帽子

^① 《中国农民》1926年1月1日第1期第13—20页。

游街，羞辱他们；打破宗权与神权；枪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①

1926年8月14日，即蒋介石进入长沙两天后，徐志摩在北京举行宴会，庆祝他与此时已离婚的陆小曼订婚。宴会招待丰盛，来宾有一百多人，是一个很适于将徐志摩导演的戏剧性的漫长的求婚活动推向高潮的场合——当时徐在众目睽睽之下向陆求婚，并献上了许多情书，充满火热激情的诗词，还有暴露自我的日记（不久后都发表了）。陆小曼是京城名媛，能唱会画，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仅其名字就够古怪的了，那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名字的音译，前面加了一个表示亲昵的“小”字，所以“小曼”两字，事实上，可以译成“小曼斯菲尔德”。徐志摩确信，他在她身上找到了他所追求的心灵伴侣。他曾对梁启超说，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这种伴侣。这次宴会六周后，两人举行了婚礼。应徐志摩的要求，他的老师，这时已弃政从学并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梁启超，答应做婚礼的证婚人，并致辞贺喜。令徐和宾客感到惊讶的是，梁启超竟借此机会痛斥这对青年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要他们“痛改前非，从做新人”，“希望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②次日，梁启超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写道：“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在告诉女儿随信寄去他在婚礼上的“训词稿子”后，梁启超接着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1991年）第26页。

② 宋炳辉《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202页。

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①

另一方面,徐志摩却觉得自己战胜了黑暗的消极力量。“我毕竟胜利了”,他写信给英国朋友厚恩之说,“我击败了一股强悍无比的恶势力,就是人类社会赖以为基础的无知和偏见。”^②不过,这种胜利即便是胜利的话,那也是短命的。徐的父母不同意他离婚,也不赞成他与陆小曼结婚,而且当他带陆小曼回到上海附近的老家住了两个月后,情况变得更糟了。陆小曼在这期间经常有病,左右不适,她把那儿看成是个乡下小地方;而徐的父母,也由于田产被土匪所占,生意又不好做,所以离开浙江,迁居北京,与徐的前妻张幼仪及孙子住在一起(徐的这个孩子是1918年徐去美国前生的,他还有过一个男孩,叫彼得,怀于剑桥,生于柏林,三岁时不幸夭折了)。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徐志摩的父亲还取消了他从其银行帐号中提款的权利,徐志摩生平第一次缺钱用了;他刚刚创办的一份戏剧杂志停刊了,他感到压抑,精神恍惚,以至于无法再写诗了。1927年元月,浙江乡下的情况越来越危险,于是,徐和陆小曼离开老家,隐居于上海的难民之中。在上海,他忙于筹备“新月书店”开业之事,还做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94—1095页。

^② 《徐志摩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点别的生意挣点小钱——因为他认为他没有机会再回北京教书了。杭州，这个1923年时曾令他感到心旷神怡，无限欢快的地方，现在已是“半个城的人都跑光了”。他用英文给厚恩之写信说，“到处所见的是各种恐怖气氛与事实，”“可怜的西湖呵，只余一片荒破败！”^①“正在迅速陷入一个可怕的恶梦中，……只有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②的世界上，继续表现出潘格洛斯特博上特点的乐观主义。^③他全心投入到他已经干了两年多的一项工作中：翻译伏尔泰的《天真人》。

3月初，当徐志摩完成译著时，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由于担心商业活动再次受到破坏，开始搜捕潜在的罢工领导人。反过来，总工会也秘密加紧筹备另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终于为国民党打开了该市的大门。

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庆贺自己的70大寿。徐志摩和陆小曼似乎没被邀请参加这个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但梁启超及康门弟子纷纷自北京南下，前来为老师祝寿，连1924年被迫逃离紫禁城在天津日租界避难的前清逊帝溥仪，也派人送来玉如意一柄，匾额一幅，康有为已经好久没有给军阀写信讨论中国未来的问题了。他最近的唯一一次公开表态，是致北方军阀的一封信，要他们按照当初在1912年订好的协议，恢复溥仪的俸给和他住在紫禁城的权利。康有为此时一直沉迷于星际漫游的思绪中。他有一次乘飞机飞临保定上空，飞机降落后，正像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位自天而降的圣人，对众

① ② 《徐志摩书信集》第22、23页。

③ 潘格洛斯是伏尔泰的讽刺小说《天真汉》里的人物，讲究实验自然哲学，倡导乐观主义。——译注

生的无限苦难，耿耿不能释怀。尤其是自那以后，康的心灵一直在天堂里漫游。1926年，他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天游学院”，并且到处演讲撰文，大谈他的神游经历和梦幻——有一天，他梦见自己在编一份火星地名索引，就像是中国传统的方志。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些诗中，他已经将西方的天文观测的现实世界与传统宇宙论所说的无数层的天堂结合起来了。他在《银河天歌》中云：

仰灿烂之银河兮，
 一白横亘光气则那。
 其长当天之十六度兮，
 积恒星二万万之多。
 或谓有星三十万万兮，
 吾日与八游星自为一家。
 日虱悬中为一星兮，
 比恒河之为一沙。
 热万度之巨白星兮，
 沉沉为邻尤颀夥。
 助我光明晃昱兮，
 吾乃远游而高歌。
 以周天三百六十度兮，
 银河广仅十度。
 其几何悬在霞云天之中兮，
 仅得十六万之一于大罗蹇。
 吾乘天船而上游兮，
 腾云汉而婆娑。

怜牛女之长相望而不得渡兮，
憾清浅之微波。
无仙鹤以为梁兮，
遇张骞之泛槎。
望克廉水素之极星兮，
吾将出银河而之它。^①

康有为过完 70 大寿后，没有留在上海，而是去了山东南部的海滨城市青岛——这里曾一度为德国人所占领，当时被日本控制，它在晚清和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抗议活动中颇有名气。康有为在青岛又买了房子，开始写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文字——一份感谢逊帝送来生日礼物的长篇谢恩折。他的手虽已发颤了，但谢恩折依然布局优美，文字工整。它追忆了 1895—1917 年末遂复辟期间的纷乱世事，书写方式完全依照前清的宫廷礼制，凡是提到天的，一律比正文高出三字，凡是提到皇帝称谓的，高两字；康有为自称“老臣”、“微臣”^②，而且也按清朝礼制要求，凡是提到自己时，字写得都很小。1927 年 5 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上海第二次总罢工推翻军阀政权，国民党军队进入该市十天后，康有为把他的前清朝服铺在床上，依礼沐浴后，在朝服旁正襟危坐，半小时后死于脑溢血。

① 康有为《诸天讲》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90—91 页。

② 《康有为政论卷集》下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124—1126 页。
《谢恩折》写于 1927 年 2 月 15 日，也就是去山东之前。——译注

第八章

叫醒了春

就在康有为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梁启超写信给他在美国读书的两个儿子思成和思永——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对他们不在这一团混乱之中表示欣慰。尽管让他欣喜的是，国共联盟看来已经破裂，而蒋介石显然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向左转，但他还是忧虑不安，不知道西方列强对南京发生的反帝示威会采取什么反应，他的儿子将来势必还要回来的，这个国家还会发生什么情况：

南京事件真相如何，连我也未十分明白，外人张大其词，虽在所不免，然军中有一部分人有意捣乱，亦绝无可疑。蒋介石辈非共产党，现已十分证明，然而他们压制共产党之能力如何，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现在上海正在两派肉搏乱斗中，形势异常惨淡。若共产党胜利，全国人真不知死

所了。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①

两个星期后，鹿死谁手的问题有了答案：4月11与13日，蒋介石的军队在准军事性的私人武装和秘密帮会的帮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他们所知道的所有共产党人，摧毁了工人纠察队，缴了他们的枪，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及其他所有左翼分子的据点。工人和学生企图支持左翼分子，却遭到机枪的疯狂扫射。国民党虽没有公布死伤人数，但估计该市被害人数多达五千人。

这些死亡的背后，是长达数月的政治斗争，既包括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斗争，也包括国民党与共产党内不同派系及劳工运动的斗争。在陈独秀领导下，共产党一直遵照共产国际的关于反帝任务完成前一直与国民党合作的指示；与此同时，他们自然要在国民党占领的每个城市加强本党在工人中的地位。蒋介石意识到同这些“盟友”及自己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武汉和其他地方寻找更可靠的盟友和新的财源。1927年3月间，他就采取行动对付南昌、南京及其他城市的主要的劳工组织，只要它们威胁到他的统治；与此同时，他还得到对共产党在上海的力量感到惊恐的上海商界的六百万元资助。所以，4月事件是他坚决向右转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上海事态的发展使共产党的士气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虽然已经证明蒋介石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国民党合作的整个策略就该放弃了。第一，蒋介石并没有表明他是资产阶级的真正朋友，因为他不择手段地向

^①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22页。

他们索取钱财,甚至采用绑架和其他恐吓手段为他的军队搞钱。第二,除冯玉祥外,北方军阀对共产党人和罢工工人也同样凶恶残暴,他们也没有像蒋那样宣称他们要统一国家。有些共产党人对1923年吴佩孚将军屠杀铁路工人的事件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满洲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的所作所为也是野蛮残忍的。那也是在1927年4月,张作霖命令他的军队闯进苏联使馆(一年前,有20多名中国左翼分子躲进那里避难),将躲藏在那里的中国人全部抓走,还抢走了证明苏联与中共有牵连的数千份文件。经过草率审讯后,20多人被处以绞刑,其中之一是五四运动领导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前馆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共产党虽有所担忧,但他们继续执行通过共产国际传达来的斯大林的指示,与以武汉为基地的国民党“左派”合作,即使这需要对农民革命运动加以严格限制,以换取资产阶级的支持。正是部分由于这一原因,毛泽东赞扬农民运动的湖南报告^①,才在瞿秋白一再坚持下,在他编辑的党的正式刊物上发表。瞿秋白现在已公开反对当时还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及其助手;他觉得陈独秀等人过分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低估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早在1927年3月,他就用当时苏联流行的辩论语言指责陈独秀是“托派”的主要同盟者。同年夏天,他继续有计划地进行反对陈独秀的活动,最终在8月党的紧急会议上撤消了陈的总书记职务。瞿秋白在那次会上当选为临时政治局领导人,也就是中共事实上的领袖,那年他才28岁。

当瞿秋白千方百计取得党的领导权时,共产党的处境继续恶化。1927年春和初夏,共产党人奉命与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合

^① 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注

作，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是敌视蒋介石的，是同情共产党的长期目标的。但是，这些号称左派的国民党政治家为了生存，也不得不依赖华中地区独立的军阀，由于这些军阀与大地主关系密切，所以中共不得不限制当年年初极为活跃的农会运动。结果是灾难性的。地主们为自己的家人及亲友被杀被辱的事件感到愤怒，决心防止共产党进一步利用农村的不满情绪，并在国民党默许和共产党受挫的情况下，利用地方军阀的力量摧毁农会。1927年5月和7月，仅长沙附近地区就有上万人被杀，武汉也有数千人被杀；死难者中有合法召开的立宪会议的农民代表，农会会员，还有一些激进的青年妇女，她们都留着齐耳短发，那是她们最近获得解放的象征。

到仲夏时节，为了回击这种野蛮的杀戮，当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断绝一切关系，重新效忠蒋介石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一种进攻策略，发动城乡起义和暴动。原希望这种城乡并举的做法能再次形成全国革命的势头。但是，在瞿秋白——他不得不将这些指示译成中文——的全面领导下，结果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毛泽东受命指挥的湖南秋收起义，结果既没有占领长沙，也没有在乡下占据一个能防御的地区，毛被撤消了党内职务，率队伍溃退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中共的其他部队也伤亡惨重，没有实现夺取南昌和汕头的目标；1927年12月，为向世界（和批评斯大林的人）证明革命浪潮仍然高涨，共产党人最后一次一致行动，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公社”，结果导致驻扎该市的国民党盟友军队对更多的工人的屠杀。1927年初，共产党人曾声称，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代表着近两百万农会会员和约三百万城市工会会员；但是，到那年年底，两大组织实际上被打垮了。

闻一多有机会亲眼目睹了上述形势发展中的许多事件，因为1926年下半年和1927年最初的几个月，他或在武汉或在这个城市东边不远的家乡浠水，而且在1927年下半年，他还在上海或上海附近呆了几个月。他所目睹的种种悲剧促使他重新拿起画笔。他还画了一幅画，旨在表现战争的恐怖。此时他在政治混乱中的孤寂感又和他个人的悲痛交织在了一起——因为他四岁的女儿（他在芝加哥读书时出生的）在那年冬天不幸夭折了。1927年5月，他写了一首题为《荒村》的诗，在诗前的简短引言中，闻一多引用了一份报纸对中国广大农村凄凉景象的报道。它说，许多村庄断绝人烟，夜间灯火全无，农家的门窗都被军阀的队伍拆去当柴烧了，农民把他们最宝贵的工具都藏了起来，唯恐被烧或被偷走了，许多人干脆背井离乡，让那些还没有被抢走的家禽在无人耕作的地里拱来拱去：

他们都上那里去了？怎么
 哈蟆蹲在甑上，水瓢里开白莲；
 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漂着；
 蜘蛛的绳桥从东屋往西屋牵？
 门框里嵌棺材，窗棂里嵌石块！
 这景象是多么古怪多么惨！
 镰刀让它锈着快锈成了泥，
 抛着整个的鱼网在灰堆里烂。
 天呀！这样的村庄都留不住他们！
 玫瑰开不完，荷叶长成了伞；
 秋针这样尖，湖水这样绿，
 天这样青，鸟声象露珠样圆。

这秧是怎样绿的，花儿谁叫红的？
这泥里和着谁的血，谁的汗？
去得这样的坚决，这样的脱洒，
可有什么苦衷，许了什么心愿？
如今可有人告诉他们：这里
猪在大路上游，鸭往猪群里钻，
雄鸡踏翻了芍药，牛吃了菜——
告诉他们太阳落了，牛羊不下山，
一个个的黑影在山岗上等着，
四合的峦嶂龙蛇虎豹一般，
它们望一望，打了一个寒噤，
大家低下头来，再也不敢看；
……

快去告诉他们——告诉王家老三，
告诉周大和他们兄弟八个，
告诉临淮关一带的庄稼汉，
还告诉那红脸的铁匠老李，
告诉独眼龙，告诉徐半仙，
告诉黄大娘和满村庄的妇女——
告诉他们这许多的事，一件一件。
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
这景象是多么古怪多么惨！
天呀！这样的村庄留不住他们；

这样一个桃源，瞧不见人烟！^①

这首诗因为一个事实而获得了特别大的感染力，那就是闻一多也成了—一个流浪者。因为北京的形势太危险而离开艺术专科学校的闻一多，发现武汉也不能呆下去了。朋友们为他在靠近上海的吴淞政治学院谋了个教职，可是不久，该院也因为它的左翼倾向而被国民党下令关闭了。于是，闻一多到了杭州（在徐志摩看来，它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美丽），1927年夏天，他还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和朋友们筹划创办一份新刊物，为离开北京后散落各地的新月社的老朋友提供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有一段时间，闻一多还做过金石篆刻，他将自己艺术家的准确性注入到了这种细致的工作中；后来，他又到已被定为国都的南京做过文员工作；并在南京大学教过英文、美国戏剧和诗歌。一直醉心于对美的追求的闻一多深深热爱着中国，现在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在一个看似绝对嘲弄美的世界上，也可能存在着美。1927年期间，他将自己1923年以来创作的诗歌整理成集，于1928年1月发表，由徐志摩一年前在上海创办的新月书店发行。也许是为了纪念早已被遗弃的北京工作室，诗集装帧采用的是黑色和金色。闻一多把诗集定名为《死水》。这是奠定诗集基调的一首同名诗的题目，在这首诗的核心几节中，闻一多以强烈的态度，表明了他的信念：在恐怖可怕的条件，下，美也将永存，即使有些颤颤抖抖：

① 臧克家编《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43—45页。

◆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人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蛇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①

要在黑暗中创造“几分鲜明”，也一直是徐志摩的梦想。1928年3月，在闻一多的帮助下，他终于出版了《新月》诗刊，当时他热情地谈到鼓舞他前进的“创造理想主义”，并以他惯用的恰如其分的比例感，在创刊词上附了两句名言，一句出自《圣经》的《创世纪》（“让这儿有些光吧！”）另一句出自雪莱（“冬天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为了进一步表明心迹，他申言，他的新刊物主张的是“尊严”与“健康”，两者将携手共进，随时准备“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② 他还挖苦地开出了列有13

① 臧克家编《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38—39页。

② 《徐志摩全集》第9卷第359—360页。

种“病菌”的单子，它们是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织巧派、淫秽派、狂热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①

马克思主义作家当时控制了以前折衷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他们以为上述批评是针对他们的，于是立即予以尖刻的反击，说这种“创造理想主义”其实只是一些“想入非非的记忆和幻想”而已，“历史的巨轮将把新月诗人送进坟墓”。

这一冲突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在退隐了一段时间后准备随时再度进入社会战场了。在192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很少说什么；人民——特别是在反左翼行动中被杀头或肢解的那些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子——遭受的暴虐，令他感到震惊，他采取了旁敲侧击或讽刺挖苦的手法。没有什么能提高他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那些争先恐后拥挤着去看被砍下头颅的女革命者的裸尸的百姓，与当初施暴的那些人一样令他厌恶。不过，就个人而言，这时他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愉快，因为他到厦门，他以前的学生许广平到广州后，两人的长期通信活动继续在进行，两人的关系已经经过师生之谊达到开诚布公，最终发展到相爱，1927年中期，鲁迅离开厦门与她会合。在广州一起住了几个月后，他们在灾难性的12月暴动^②前离开该市到上海定居下来。（1929年，她怀上了他的孩子，他唯一的儿子）。可以肯定的是，正是为了对她的爱，1927年9月24日，鲁迅写了一段简洁的名言：“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

① 《徐志摩全集》第9卷第359—360页。

② 即1927年12月11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发动的广州起义。——译注

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多愁善感之中，这一点反映在他同时写的一段与上段话互为补充的关于中国男人的名言中：

一看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①

创造社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新月社的浪漫理想主义诗人之间的斗争，给他留下了特别愚蠢的印象。许多左派诗人自以为是的做法，既令他愤怒，又让他厌恶；他讽刺这些人躲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写“革命”诗，就像是“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只有感官影响；要不就是愚蠢地大叫：

啊，汽笛！

啊，列宁！

他还以为一本书的封面为例，嘲笑他们的乱七八糟的象征主义。这本谈论“革命”的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了一个铁锤，象征着苏联的镰刀与锤子。对此，鲁迅评论说：“然而，这样地结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艺术家的徽章。”^② 鲁迅非常清楚，此时，正是这批作家视他为反动分

^① 《鲁迅选集》第2卷第407、408、409页。

^② 《鲁迅选集》第3卷第58—59页。

子,因为他通过著名小说集《呐喊》中的小说鼓励青年人起来斗争,抛弃他们;他也知道,他们想把他及其好友从复兴的创造社中排挤出去。然而,这并没有缩小他与像徐志摩、闻一多这样的新月派实验家的距离感,因为他们也一样矫揉造作,因此,鲁迅把徐志摩罗列的一大堆“主义”又还给了他,批评道:“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晴天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① 鲁迅并不认为他们的榜样有什么了不得:“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个曼殊斐儿(即曼斯菲尔德——译注),他到她坟上去哭过。”^② 为了想不受干涉地接受胜利的国民党强加给社会的严厉控制,又原谅国民党的暴行,鲁迅说,这些作家便“偷偷地逃进资产阶级文化的微光里,”而看不到他们也会被摧毁的。“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③ 换句话说,“约翰弥尔(今译约翰·密尔,19世纪英国哲学家——译注)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潮,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④

在其他场合,鲁迅还谈到在这个“新中国”中漂浮的青年妇

① 《鲁迅选集》第3卷第40页。

② 同上,第57页。

③ 《鲁迅选集》第2卷第491页。

④ 同上,第167页。

女还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1922年，他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发表了一次富有洞察力的谈话，考虑到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受欢迎的程度，这次谈话采用了一个贴切的题目：“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指出，中国的娜拉只有三个选择：挨饿，做坏女人，或回家，回丈夫身边。鲁迅请听众原谅他的分析是如此凄凉，然后，他说了一段明显让人想到他以前对《新青年》编辑说过的话：“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叫醒他。”^①娜拉既然醒了，她该如何面对她面前的凄凉选择呢？鲁迅问道：“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②

在中国社会中，妇女怎样才能弄到钱呢？只有取得他们自己的充分的经济权，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在社会上。那么，怎样才能取得经济权呢？鲁迅说，只有经过战斗，长期的、缓慢的、有韧性的战斗。因为“在家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③他说，他并不主张戏剧性的自我牺牲行为，那让人想起秋瑾，或许还有新的中共的激进妇女组织者，因为他“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④

丁玲就没有表现出走牺牲道路的倾向（尽管她的几位长沙

^① 《鲁迅选集》第2卷第15页。

^② 同上，第17页。

^{③④} 同上，第18—19页。

朋友已投身到共产党阵营),也没有达到经济自给自足的程度。1928年离开上海大学到北京后,她旁听了鲁迅的几门课,靠家里寄点钱(她母亲是湖南的一位小学校长)度日,间或还要去一下当铺。但她很幸运,有一位通情达理的房东,他常常让丁玲给他讲一些国内外作家的事充抵房租。她还得到了爱情与友谊——1924年末,19岁的丁玲与一位同龄的未来作家同居了,此人叫胡也频。

几年后丁玲说,对她来讲,那是一段等待的日子,是一段体验的日子;1924年前,她在长沙的活跃学生生活和与上海南京的激进分子开会的岁月已经过去,而以后投身于共产党政治活动的时期尚未到来。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丁玲写道,她和胡肯定在北京的那些日子就陷入了爱河,但“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女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在笑里,我们另外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①

胡也频的早年生活也像丁玲一样充满了压抑。他是南方沿海的福建人,13岁时离家出走,有人说是因为他偷了一家金银首饰铺的首饰,他是那铺子的学徒;在上海读了几年书,还在山东烟台的国家海军预备学校学习过。^②最后在《京报》的一个文艺副刊谋了一份差事。他们的朋友描绘说,在这时间里,丁玲和

^① 《丁玲文选》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版第278页。

^② 一说在天津大沽的海军预备学校。见《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译注

胡也频已经被感情的强烈变化所左右,但显然还是一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样子;高兴时,整天在街上闲逛;不如意时,就躺在床上瞎想;有钱了,便进馆子大吃一顿;没钱了,俩人就困在狭小的房间里——先是住在西山的一个庙里,后搬到了北京的一个贫民区。1923年脱离湘西军旅生活,决心以写作谋生的沈从文也漂泊到了北京,并在1924年结识这对青年爱侣,他描绘说,他们的住所“床是硬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发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①他们照例也有点私人藏书,是一些谈论无政府主义与革命的译著,像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大仲马的《茶花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等,其中《包法利夫人》丁玲曾一读再读,爱不释手。

沈从文富有洞察且充满爱慕地刻画了丁玲的个性:

她一方面因为身体与性格,皆宜于静,而情感则如火如荼,无可制止,混合两面的矛盾,表现于文字时,就常常见得亲切而温柔。……她并没有某些女子长于应酬的天才,可说不善交际。她不会同生人谈话,在熟人面前无所拘束时,则谈锋十分朗畅。她的谈话同写信一样,要说什么话时,就说出来,所说的多些时,不使人觉得烦琐,所说的极少时,也使人领会得出那个意思。在做人方面,她却不大象个女人,没有年轻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轻女人的风情。她同人熟时,常常会使那相熟人忘了她是一个女子,她自己仿佛也就愿意这样。^②

^① 《沈从文文集》第9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56页。

^② 沈从文《记丁玲》上海众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60—63页。

不太与社会交际与贫穷有关,而且自20年代中期以来,沈从文自己的早期小说大多谈论的是社会挫折与青年的不适应问题;但是,这时青年作家们能相互帮助,并吸引较有建树的人物的注意:比如,胡也频帮助沈从文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徐志摩把沈从文的一些文章与闻一多的一起刊在《晨报》上,沈从文也给鲁迅撰稿的杂志投过稿。

到1926年,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已经成为分不开的朋友,他们搬到北京的大学附近,但他们似乎没有参加1926年3月的示威游行;他们也没有像鲁迅和闻一多那样出于政治压力而被迫离开北京。但是在经济一度极为窘迫时,丁玲曾跑到上海,希望在电影公司找份工作;工作虽没找到,但这次旅行使她获得了创作第一篇小说《梦珂》所需要的细小素材。小说讲的是梦珂的故事,她是一位乡下姑娘,刚进城住在一个亲戚家,最后在一个大制片厂的一部电影中扮演了个小角色。梦珂看到了种种虚伪,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恶作剧的戏弄:富家姑娘背地里笑她土气,明里还送给她一些时髦的旧衣裳;年轻的激进分子尊敬她,管她叫中国的“索菲亚”,对她一无所知便邀她加入他们的行列,帮助制作传单和小旗;制片公司俗不可耐的大人物终于决定雇用她了,但视她如货物一般。所有这一切通过丁玲这位湖南姑娘的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折射出来,对上海读者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1927年末,小说在颇有名气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

在一个倍受战争和暴力折磨的世界上,在一个到处可见既敏感又现代的青年作家世界上,最吸引读者并使丁玲一夜成名的,也许是她把电影院作为她小说的象征性的中心,

并把这种象征同中国传统的创作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小说中间有一段描写，讲的是梦珂和一位留法一年刚刚回国的饱经世故的青年学生一起去看电影。那电影是按大仲马的《茶花女》改编的（读者被告知，梦珂三年前曾流着泪看过这本小说）。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梦珂紧挨着她的朋友坐下，周围尽是低声细语成双成对的男女，肌肤的亲近使纯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淳朴怡静的生活消失了——当梦珂收到父亲描绘农村平静生活的来信时，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小说的结尾是梦珂离家找到了一份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取薪水的工作（鲁迅也许会说，娜拉终于出走了），受雇于一家电影公司，但也不完全是电影公司。丁玲给这家公司起了个名字叫“圆月剧社”，她是用这种办法对新月派与其对手之间的争吵作了一个有趣的评论：她是在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用来发光的东西。而且正如丁玲在小说结尾时所说的，由于一度孤独谦和的梦珂现在以林琅的艺术名出了名，这实际是在冷眼旁观整个上海文学界，是对《呐喊》——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的嘲讽性的共鸣：

现在，大约在某一类的报纸和杂志上，有不少的自命为上海的文豪，戏剧家，导演，批评家，以及为这些人呐喊的可怜的喽罗们，用“天香国色”和“闭月羞花”的词藻去捧这个始终是隐忍的林琅——被命为空前绝后的初现银幕的女明星，以希望能够从她身上，得到各人所以捧的欲望的满足，或只是想在这种欲望中得到一点浅薄的快意吧。^①

^① 《丁玲文集》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在两个月内,丁玲又写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2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这次,丁玲的名字是刊在杂志封面上的五位作者的名字之一。这篇小说的名字选得很好,因为当1911年前的一代人记忆犹新时,当激进分子忘不了谈论丁玲前一篇小说中的梦珂时,它令人一眼望去便想起体现在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身上的革命精神。当丁玲向新一代读者奉献她的这篇小说时,这些共鸣可能会被它打乱,因为新的读者即便在辛亥革命时出生了,当时也是乳臭未干的孩子,现在他们已经或长大成人,或进入了青春期,而革命正在变为对一个极度失望的事情的婉转说法,所以,正像丁玲所描绘的那样,1928年的莎菲是个让人厌烦的人,一副病态,焦躁不安,自艾自怨,冷酷无情,情绪失控。小说借用了日记形式,背景是某年的12月至次年3月;在以第一人称展开的一连串自我分析中,我们看见了肺病的莎菲孤独地躺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咒骂所有爱她的人。如在《梦珂》中一样,小说用莎菲要去的一家北京有名的电影院(“真光电影院”)作了一个重要的主题。莎菲在快要进场时,一阵厌恶突然袭上心头,于是,她抛下好友(恰好都住在青年胡同)和一群年轻女子,悄然而去。在丁玲的有力措辞中,莎菲看到了如下场面:“到真光时,还很早,在门口遇上一群同乡的小姐们,我真厌恶那些惯做的笑靥,我不去理他们,并且我无缘无故地生气到那许多看电影的人。”当她的朋友们打打闹闹时她溜走了。她请这些人来看电影,可她连剧院的门也没进。她在日记中补充道:“除了我,没有人会原谅我的。”莎菲女士用鲁迅所喜欢的冷嘲热讽的目光来看真光电影院的广告,它和一堆别的广告刊在一起,如卖春药的、卖衣服的、法律学校招生的、治疗性病的万应灵药“六〇六”等。1918年时,鲁迅曾含蓄地指出,“六

“六〇六”可能是挽救中国知识退化的良药。而在丁玲看来,这个药方已堕落成一种登在晨报最后几版上的乱七八糟的玩艺了,中国已病入膏肓,绝非哪一贴药所能医好的。

莎菲的疑心由于对性的渴望而加剧了,可她期盼但又不敢满足它。她在写到一个经常看望她的青年时说:“我把他什么细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①她在写一对分房而睡的热恋情侣时说:“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②不过,莎菲所缺少的,正是别人避免满足的情欲,她满脑子都是些不快的记忆:“破烂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屉,无缘无故扯碎了的新棉袍,保存着的一些旧的小玩具”。^③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莎菲让她认为是最英俊,但最瞧不起的一个男朋友吻了自己,这个结束意义不明确,但却具有惊人的力量:

他走后,我想起适间的事情。我用所有的力量,来痛击我的心!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真的,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

总之,我是给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我的天,这有什么法子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损失?

好在在这个宇宙间,我的生命上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

① 《丁玲文集》第2卷第55页。

② 同上,第57页。

③ 同上,第78页。

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的怜惜自己:

“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①

由于这篇小说在1928年初获得成功,丁玲和胡也频(他们在京时尚未一起生活)便南下上海。在随后几年里,她发表了三本小说集,巩固了她早期的名声。这些小说几乎都关注的是妇女问题,或以女人的口气叙述,或以日记体裁叙述;它们关心的女子,或是面对新社会,企图寻找一种生活的目的,但常常失败了;或是在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写出来。有时,这些小说也插进鲜明的社会评论,比如,因渴望过上所看到的富人在避暑别墅中的生活而堕落的乡下穷女子;通过其应付令人厌烦的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细节,而不是戏剧性的高潮情节,来表现一个年轻娼妓的生活。然而,在这一时期丁玲明显在避免在政治问题上公开表态,只是对一个叫欧外鸥的人发表过嘲讽的看法。欧外鸥是她的小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人物,他和穷苦人有一种休戚相关感,但是这种感觉只是在寒夜与情人去幽会或嫖娼时,看到黄包车夫还在等着接活而受到刺激的结果:

他是在那凄凉的路上,便可以愤恨,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这时,他便很可造就成一个革命的英雄。这也并不是完全只为自己无钱逛窑子,无钱讨太太才感觉出革命之必须

^① 《丁玲文集》第2卷第85—86页。

的,因为同时在路上就有着许多只穿着乱棉袍的洋车夫,是还不敢回转家去见他们的妻儿,而犹在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务要铲除有钱阶级的思想,多半便在这许多洋车上成立。^①

当丁玲的创作处于全盛时期时,胡也频的创作却没有什
么长进。他发表的小说和诗不多,在充满竞争的文艺界没有显出
特色。他曾做编辑《中央日报》文艺版还有其他刊物的工作,他
把它们叫“红黑”。与此同时,他和丁玲还办了小出版社,叫“红
黑出版处”。^②丁玲还同沈从文合办了一份刊物,叫《人间月刊》。
出版社庄重宣布要出一套“红黑创作丛书”,第一本是胡也频的
诗集。它的装帧很漂亮,封面是一道红黑线条,背面是一个红黑
半圆——也许是一轮新月吧?丁玲为它写了一篇解人疑虑的前
言,她写到他们为出版 50 首诗绞尽脑汁也弄不到足够的钱,而
他们现在只能发表其中的 22 首,其余的等条件好时再说。她充
满深情地写道:胡也频因为要谋生而无法专心写诗,她不能让他
有更多的闲暇去创作更多的诗。她补充说,选诗也是件难办的
事,因为她总是被他专门为她写的诗所吸引!虽然丁玲的名字
印在封面上,但是这本怀旧诗集还是卖不动。红黑出版社关门
了,杂志垮台了,胡也频的编辑工作也丢了。随着他转向社会主
义立场,他开始阅读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创作他

① 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1928 年第 19 卷第 10—12 期,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72 页。

② 丁玲本人另一说是“红黑出版社”,见《胡也频文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27 页。——译注

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莫斯科之爱》。在这篇小说中,他描绘了一个年轻妻子,她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丈夫杀害了她的共产党情人而离开了他,跑到苏联重建了新生活。但是,写作并未给他俩带来多少财富,为了生活,胡也频不得不另谋工作——丁玲的头两篇小说虽然名噪一时,但也只卖了140元。1929年底,他终于在山东济南找到一份中学教员的工作。而这时,沈从文也破产了,在武汉找到一份教书的差事。

1930年春,当丁玲在上海受够了孤独寂寞后,到山东去看胡也频时,她大吃一惊,她后来写道:“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的欣喜。”^①

在那样一个时代,公开表示支持共产主义是很难做到的,是要有勇气的行为。经过1927年严重打击后,共产党已遭到严重破坏,到1928年,形势更加危险了,以至于中共六大不得不到莫斯科去开——这是自它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国外召开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会议上曾经猛烈批评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搞“右倾机会主义”的瞿秋白,被撤消了在党内的一切高级职务,罪名是在1927年的城乡暴动起义活动中搞“左倾机会主义”,其实这两项政策起初都受命于斯大林。当瞿秋白留在莫斯科研究分析中国革命时,党继续朝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新当选的总书记试图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工会重新组织起来,并在城市中保留某种实力(新的总书记是党的领导人中少有的几个当过产业工人的人之

^① 《胡也频文集》(上册)第9页。

…)。二是宣传部长李立三竭力推行共产国际的政策,用已被唤起的农民和中国红军支持无产阶级举行反对国民党的起义。这一政策导致共产党在1930年夏大举进攻长沙和南昌,都没有成功。三是毛泽东,他虽然也服从命令带部队打过一下南昌,^①但他巩固了在赣闽交界山区的根据地。

外国和国民党的压制不断加强,中共因此失去了许多优秀成员,如向警予、蔡和森和杨开慧。向警予是丁玲的朋友,1919年留法妇女学生的领导人,1925年五卅运动前曾在上海组织妇女工会,后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她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被移交给国民党,1928年5月1日被枪决。向警予的丈夫蔡和森是毛泽东长沙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在香港被英国警察逮捕后,被移交给当地的国民党当局并被处决。杨开慧是毛泽东年轻的妻子,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的女儿,也是丁玲的同窗之一,1930年,在红军攻打长沙失败后,她与两个孩子一起被捕并被处决。

这些逮捕和处决活动,是国民党控制国家的象征;一度中断的北伐于1928年又重振旗鼓挥师北上,并于当年12月结束,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北京,继承父业继续统治满洲的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宣誓效忠刚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尽管蒋介石的地位还不时受到国民党内竞争对手或与他结盟的军阀的威胁,但是,他的中国要先把共产党人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消灭掉,然后再解决外国帝国主义的问题(尤其是来自日本的日益严重的压力)的主张,却没有遇到过成功的挑战。像共和初期的总统

^① 原文如此。据有关材料证明,当时红军没有攻打南昌。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译注

袁世凯一样,蒋介石试图加强中央的权力,实现经济、工业和军事现代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今天看共产党就像袁世凯当年看国民党一样。

像袁世凯一样,蒋介石在地盘、财政和宪法权力等方面的基础也非常不稳。已经当上北伐军司令的他,1928年3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又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拥有对改组后的中国政府的五个院的监督权;但是,这些头衔实际上全是他自封的。他的力量部分来自军队,特别是视他为领袖的出自黄埔军校的各级军官。另一些支持来自国民党的政治机器——培训学校,它们都由蒋介石在南京的密友主持,不过,还有一些支持来自裙带关系结成的派别联盟;1927年底,他因与宋美龄结婚而与权势显赫的宋家携起手来;宋家受过良好教育,信奉基督教,与中美的商业势力关系密切。蒋夫人毕业于美国的韦尔斯利文理学院,她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孙中山,另一个嫁给了毕业于奥伯林和耶鲁的财经巨子孔祥熙;她的哥哥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孙中山在广州的中央银行行长。此外,蒋由于和上海的秘密帮会有关系,也获得了部分力量。1930年,蒋介石通过发展国民党的准军事组织“蓝衣社”,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

当镇压共产党人的活动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变成家常便饭时,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知识分子汇集到上海,住在外国租界。尽管鲁迅也许会说三道四,尽管也有被捕和砍头的危险,但总比住在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城市安全多了,再说,大工业企业、大学及大出版社和各种报刊杂志也鼓励并支持共产党人。所以,当丁玲和胡也频得到警告说他们在山东的行为要导致他们被捕时,他们也逃回到上海。在上海,胡也频积极投身到与中共有关的

活动中，并终于在1930年11月入党，成为左翼作家联合会的活跃分子。左联是一个新合并的组织，合并的目的，是要把创作社的成员与鲁迅等人在其中起积极作用的其他一些左翼团体的成员拉到一起，结束他们之间的争吵。鲁迅虽不是共产党人士，但却是左联的一个有力的发言人，另一位有力的发言人是瞿秋白，他是在那年冬天从莫斯科回国的。

知识分子云集上海，可是中共的未来希望却主要在偏远的农村，在那里，各路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平分土地，实行新的婚姻法，允许妇女自由选择配偶和要求离婚，从而实现了家庭生活的革命性变化。1930年时已经有八个苏维埃地区，最大的一个是赣闽交界山区的江西苏维埃——它是毛泽东在面对国民党屡屡围剿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胡也频在当选为左联执委会委员后，也被选为左联出席即将在江西苏区召开的苏维埃大会的代表。在听到党在1930年8月颁布的有关婚姻自由的法令，打破传统的婚姻习俗的消息后，胡也频激动万分，于是写了一篇轻松愉快的小说《同居》，讲述了一位农村妇女与她结婚十载的丈夫离婚，并抛弃两个孩子，与另一个住在苏区的男人愉快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这篇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高潮，没有紧张曲折的情节，因为被抛弃的丈夫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好言安抚之下，体面地接受了现实。胡也频在描写新世界时写道：

然而，现在的情景是大不相同了，从前很受苦的人们都变成很快乐很活泼了。妇女们更快乐更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象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

是好象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也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她们生来的儿女也有“公家”来保育。不要自己来担心。^①

在1930年秋或冬天创作的另一篇小说《牺牲》中,胡也频描写了一对年轻夫妇,为了不让小孩妨碍他们的政治工作,决定打胎的事,这篇小说也没有紧张的情节,因为女方也欣然同意了打胎的决定。

“不要难过,”她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相爱的,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很压制了,这一次受妊,我自己是应该负责的。当然,如果我们的环境不是现在的这样,我们是应该把小孩子生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纵然养得活,我们也不能生,因为有了小孩子,就要妨害到工作,尤其是我们目前的工作还在紧张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有一个小孩子的。”^②

小说是一回事,现实生活是另一回事,因为1930年春夏之际,丁玲怀了胡也频的孩子,11月生下一个男孩。那一年期间,丁玲所写的所有短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几乎总是围绕一个主题:一对夫妇既要献身于革命事业,又要照顾到符合现存法律的社会结构内的普通工作和闲暇生活。有时

① 《胡也频选集》(二册)第676页。

② 《胡也频选集》(上册)第636—637页。

男的从事革命工作，有时是女的，可以说，丁玲是在用小说的形式再现她年轻时的好友王剑虹——1924年与瞿秋白同居时去世，当时非常年轻——及她自己的困境。毫无疑问，丁玲本人开始对她目前生活的意义及她现在的写作的重要性表示怀疑了，因为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有一个人物的大段独白充满了力量，可以肯定，那是她内心情感的表现：

对于文字写作，我有时觉得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我们写，有一些人看，时间过去了，一点影响也没有。我们除了换得一笔稿费外，还找得到什么意义吗？纵说有些读者曾被某一段情节或文字感动过，但那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们。他们觉得正合他们的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到而不能体味的苦闷……可是结果呢，我现在明白了，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地掉到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他们纵能将文字训练好，写一点文章和诗词，得几句老作家的赞赏，你说，这于他们有什么益？这个社会有什么益？所以，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①

从1930年夏天起，胡也频对他在上海参加会议的情况守口如瓶，丁玲既不知道会议议程，也不知道会议地点，只有一次例

^① 《丁玲文集》第2卷第233—234页。

外,那次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当时他使用的是化名,而且经常变换住所。共产党人有时在一幢三层楼的寓所开会,不开窗户,楼下巧妙地伪装成富豪之家下午消闲时的样子,放着留声机。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去参加另一次会议,地点是公共租界爱德华七世大道上的东方大饭店,议程是讨论即将于那年年底在江西苏区召开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与会者是共产党作家和各种高级干部。会议极为保密,因为蒋介石的军队此时正在进行大规划围剿,要打垮苏维埃政权,连到江西去都是极其危险的;然而,有人向公共租界的巡捕泄露了上海会议的地点,或暗示了会议议程——至今仍有谣传说,共产党内一个从莫斯科刚回来的争做领袖的派别向巡捕透露了消息,以便抛弃他们讨厌的竞争对手。巡警突袭了东方大饭店,逮捕了36名与会者(其中男性29人,女性7人),并把他们移交给了国民党当局。这些犯人被带上手铐脚镣,押往在龙华的上海吴淞警备司令部。龙华是个著名风景区,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曾前往游玩,观赏盛开的桃花;它也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上海的其他激进分子一时间陷入了混乱,因为没有人知道究竟抓走了多少人,为什么抓人。被捕者之一是鲁迅的好友,因此,鲁迅一听到消息,便立即烧毁了大部分往来信件,然后,没跟任何人说,带着许广平和小儿子住进了旅馆。沈从文那天下午约好与胡也频见面的,迟迟不见胡露面,便转而向丁玲打听。稍后,他们才得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在随后三周里,他们俩人发了疯地到处活动,胡也频也从狱中传出话来请求帮助。他们找遍了朋友以及有权势有路子的熟人——从徐志摩和蔡元培,到蒋介石的助手和好友张群、陈立夫,希望能把胡也频救出来。为了疏通消息,请人说情,他们或小恩小惠,或大把花钱,但却没有得

到明确的支持。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们照人的提示，扮成乡下人前往龙华，希望能获准探视胡也频。可是，他们被告知说，胡也频是特殊犯人，不准探视。正当要离开时，他们忽然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他们，还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向他们致意。看到此情此景，丁玲转身对沈从文说道：“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英雄，还是一头豹子。”^① 他们再也没去看他，几天后，他们听说被捕的 23 名中共人士于 2 月 7 日在龙华被枪毙了。胡也频是其中之一。处决的消息没有公布，上海的报纸对此也只字未提。“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鲁迅写道。^②

就在临死之前，胡也频写了一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以 1925 年五卅运动为背景，刻画了三种人的生活：一种人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一种人由信仰社会主义走向乌托邦或无政府主义；第三种人是躲在象牙里的作家们，他们醉心于为了艺术而艺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小说的结局是，后两种人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党，找到了光明；那位“象一朵玫瑰花的”女诗人，原只会写一些“美梦去了”和“再同我接个吻”之类的诗，最后也开始“吐着赤热的气焰”，说服她那位躲在象牙塔中写小说的丈夫和她一直编辑一份新的激进刊物《血花周刊》。^③

不过，徐志摩没有经历上述思想变化，她的妻子陆小曼也没有。他的最新变化不过是在信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原则时，

^① 见周良沛《丁玲传》第 204 页。

^② 《鲁迅选集》第 3 卷第 179 页。

^③ 《胡也频选集》(下册)第 768—900 页。

提出了一套规范的社会哲学,这些原则在两个示范区上体现出来,一个是他的英国朋友厚恩之在德文郡达廷顿庄园建立的,另一个是在埃尔姆斯特的帮助下,泰戈尔在印度寂乡的苏鲁建立的。徐志摩曾于1928年夏秋前往两地参观,他用英文热情地给厚恩之写道:

拿苏鲁和达廷顿作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两者都是你的杰作,二者都源于同一的理想,其策划与进行又是由于你亲手贯彻,可是我对二者的印象却不大相同。我以前说过,达廷顿是我所认识的通向人间乐园最快的捷径。大自然对达廷顿十分仁厚,而你用爱作事业的推动力。结果就一定有超凡的成就,正如纯然美的诗歌,其中毫无聒耳的噪音。但印度的土壤却完全不同,这里大自然苛刻寡情,绝不是一位丰饶多产的母亲。在这里,人若没有奋斗求生的决心,再加上知识的缺乏,就难以希望苟延残喘。前数天我访问一个原有五百户,而现在只余二十五户人家的穷乡,在那里我面对断壁残垣而沉思默想。心中充满了哀伤怜惜。作为一个农村实验基地的苏鲁,当然在建设上已经立定脚跟,加上有拉尔这类的人才(我十分喜欢拉尔)亲力亲为,将来是有更广阔的前途的。你在此地所发轫的工作做得令人钦佩无已,但现在整个事业还是在创始的阶段。当考虑要把这项伟大的建设工作全面推广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更考虑到那些条件更差的地区,那是需要多少的忍耐,多少英雄的奋斗,多少无我的牺牲,才能盼望有所成就呵!①

① 《徐志摩书信集》第31—32、34页。

1929年初，徐志摩仍希望他能在英国友人的经济支持下在中国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示范区，比如说在浙江，他认为那里的人民“较为淳厚”，“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之污染。”可是，到1929年3月，他一下子跌入了抑郁的深渊，看不到此计划实现的希望了。让他万分悲伤的原因之一，是梁启超的逝世。他是在患肾病多年后因肾衰竭于1929年3月去世的。徐志摩用英文给他的英国朋友厚恩之写道：梁启超不仅是“一个完美的学者”，而且是“唯一无愧于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人。”他的重要性在于，“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了一个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他的死对我和不少的人，都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①徐志摩悲伤地说。他对梁启超的两次批评可能还有些耿耿于怀，一次是1923年他追求林徽音，一次是1926年他与陆小曼结婚。这时还有一段令人感伤的事：因为林徽音此时是梁启超的儿媳，她在梁启超临终前一直照顾着这位老人，而徐陆的婚姻也不美满，一方面是他由于这次婚姻而陷入社交上不受欢迎的窘境，另一方面是陆小曼长年小病不断，且挥霍无度。徐志摩常在海外奔走，从不带她同行；而且早在她与戏界名声不佳的女人打得火热之前，已有谣传说她有了新情人。此外，上海文艺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各种唯美主义的问题上的斗争令人厌烦：尽管徐志摩和朋友闻一多认为风格问题，对艺术的完美形式的必要性问题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的作品也是有造诣的，但他们的争论是无力的；1928年后，闻一多退出诗坛，转而从事古籍研究。1934年，应徐志摩的请求，他写

^① 同上，第37页。

了他最后一首诗,但该诗的基调表现出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怀疑,而且对闻一多来说,这种怀疑是明确的,定型的。诗中道:

我不敢让灵魂缺着供养,谁不知道
一树蝉鸣,一壶浊酒,算得了什么?
纵提到烟峦,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
也只是平凡,最无所谓的平凡,犯得着
惊喜得没主意,喊着最动人的名儿,
恨不得黄金铸字,给按在一只歌里?
我也说但为一阙莺歌便噙不住眼泪
那未免太支离,太玄了,简单不值当。^①

徐志摩的名字已经被有政治倾向的同事从《新月》杂志刊头删掉了,现在,随着闻一多也陷入沉默,徐志摩大概不得不满足于年轻崇拜者的赞美之辞了。正像1929年3月他用英文给厚恩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告;不是朝气蓬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象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难,也把人灵魂中创造源泉闭塞了”。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蔽的人间地狱。我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我的血液会骤然变冷。那些

^① 《闻一多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版1993年版第602—603页。

饿得不成人形的孩子真的会为地藓青苔而打斗争。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这种不顾死活的生之挣扎，无非为要减弱一下饥饿与寒冷带给他的痛苦。唉，为什么老天爷让他们生在这世上呢？^①

然而，他照旧继续写作，有时是对死亡的隐晦而崇高的暗示，有时是关于在天空中飞翔的喜悦的富于幻想的随笔，令人想起他在1925年第一次读到丹浓雪鸟(D'Annunzio)的《死域》所写的东西——“有如大海的波涛，在寂静的天空中呼啸着无穷的奥义；有如云，包卷大地。”^② 当他急切地向往着自己的梦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中滚着”^③——时，这肯定和他对自由心灵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也许是和实现自己的梦想是一致的——在34岁那年，他是除鲁迅外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更不要提一个崇拜他的中国航空公司官员送给他一张免费机票的事了）。他成了一个飞行爱好者，穿梭于上海、南京和北京之间，从事演讲和教书活动。飞机载着他的激情在空中飞翔，而这种激情他现在已学会用更深刻、更强烈的语言来表达了。正如他在一首注明完成于1930年圣诞之夜六时的诗中写道：

我只会企望着更绵延的
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

① 《徐志摩书信集》第35—36页。

② 《徐志摩全集》第3卷(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③ 《徐志摩全集》第3卷(乙)第15页。

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
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
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
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
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
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
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
雷雷我的声音，蓦地里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
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①

但是，在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初创时期，乘飞机还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比如，1931年11月19日，一架自南京飞往北京的小型包机因为雾大，在山东济南附近撞山坠毁，机上唯一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那位乘客就是徐志摩。

^① 《徐志摩选集》第157—158页。

第九章

告别美丽的一切

“中国航空公司在文学界投下了一颗炸弹，”天津的一位高中学生在获悉徐志摩遇难的噩耗后写道，“有谁会想到，诗圣徐志摩会死在天上？也许是上帝失察，他没有保护好世界的天才，我们最珍贵的诗人！他毁灭了我们最完美的艺术。我们的诗圣徐志摩已经死了！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是未来诗人的悲剧！”这位哀痛的年轻人承认还有其他优秀的诗人，但是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未能恪守不渝。他们渐渐离开了诗，走进了哲学或社会学领域，要不然就是丧失了自己的斗志，或者是尚不成熟。只有徐志摩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直至死亡和永恒：“中国今天有徐志摩，就像英国有雪莱。留下来的问题是这盏明灯是否已经照亮了我们周围的诗人们？”^①但是，如果说这些年轻人悲痛欲绝，将徐志摩的死视为纯粹而浪漫的个人主义梦想的破灭

^① 这位学生就是唐尔佑(Tang Eryou)。他的信收录在梁实秋等编《徐志摩全集》第1卷台北1969年版第453—455页。

的话,那么,与徐志摩同属一代的其他人则没有那么感伤。正如闻一多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他与徐志摩共事多年,他的著作也是徐志摩帮助出版的),徐志摩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浪漫的人生。关于他,我能写什么呢?”^①

就当时而言,倒是胡也频的死似乎提出了一些更为深刻的问题。如果说胡也频献身革命既有某种偶然因素又有几分感情用事的话,那么他的死则使他获得了新的尊严和地位。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杂志《北斗》上重刊珂勒惠支的一幅木刻,表示对胡也频和与他一起被处决的其他共产党人的敬意,木刻的题目叫做《牺牲》,表现的是一位悲伤的母亲献出她的儿子。在一篇悼念这些年轻烈士的文章中,鲁迅指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即在中国似乎总是年老的为年轻的写讣闻,而不是反过来。“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②

然而鲁迅并未丧失对笔杆子的力量的信心,尽管他知道做一个作家非常不容易,也知道存在着让人放弃理想主义的政治立场的诱惑。正如1930年春他在左翼作家联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时所说: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① 引自 Garlord Kai-lob Leung《徐志摩:文学传记》(博士学位论文)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1972年)第220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488页。

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①

这种看法导致鲁迅试图更加精确地确定正确的社会现实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知道，夸张只会造成荒谬的结果，小资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不应该追求虚假的效果。鲁迅个人认为，应使无产者讲求实际，正如他们现在这样——他们没有必要动拳头而不肯动脑子。鲁迅也知道：“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压迫，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象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② 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形下所处的位置显然是模棱两可的。鲁迅认为，鉴于目前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意识的发展状况，他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233—234页。

^② 同上，第288页。

们必然会发挥有限的作用。因此，“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①

1931年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后，成为鲁迅的支持者，最后成为鲁迅的一位密友，这一点都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时瞿秋白已被解除在共产党内的高级职务，但是由于他精通俄文、熟悉苏联政治，他对共产党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瞿秋白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问题上花费了多年心血。他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用了很多时间拟定发展中文拼音字的方案，以使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有可能成为现实。他与鲁迅一起抨击了那些试图证明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可以有令人信服的民族文学运动的浅薄无知。他坚持认为，文学是“战斗的武器”。然而，共产国际代理人坚持对中国革命的要素作出“西方的”解释，瞿秋白对这种解释显然感到非常失望，以致他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如何排除西方的因素重新作了系统的阐述。1924年他最初阐述这一思想时是针对徐志摩的。现在，知识分子正在用白话文进行写作，这种白话文虽然受到夸耀，但仍无法为大众所理解，因为它保留了旧文言的因素，并与欧式语法结构，甚至词汇混合在一起。“新文言”文仍由上层人士所掌握（和支配），就像旧文言文一样：

这种万里长城，就是企图完全隔断劳动民众和文化生活的障壁。这座万里长城是什么？就是五四式的新文言（现在的所谓白话文学）。在新文言的基础上，无论怎样通俗化，一切新时代的科学艺术的智识，始终只能够达到一两万的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300页。

智识青年。^①

瞿秋白说，大众不仅读不懂徐志摩的作品，而且也未被现代“革命”作品所触动。瞿秋白是以咄咄逼人的气势提出这种论点的，正像他自己为一部题为《地泉》的“无产阶级”长篇小说写的序言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部小说是一位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写的，它“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能够做到”，因此也不能够帮助读者“解释”这个世界，更谈不上“改变”这个世界了。瞿秋白的结论是，即便如此，这类书仍可以促进革命事业，作家们也没有必要退缩不前。艺术“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他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②

瞿秋白的批评因为特别有说服力而使鲁迅颇为感动，因为鲁迅本人的作品文体晦涩难懂，充满了巧妙的措辞和隐喻，越来越与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背道而驰。实际上，瞿秋白最赞赏的小说家茅盾，曾遗憾地指出鲁迅只写“旧乡村”的事情，他所描绘的景色里没有大城市，没有使“城市青年心跳”的东西。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视觉艺术上。他尤其喜爱简明、直观而又富有说服力的漫画和木刻作品。长期以来他一直倾心于这方面的作品，现在则开始通过 1930 年夏成立的左

^① 见丁易编《大众文艺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84 页。

^② 见瞿秋白《乱弹及其他》山东新华书店 1949 年版第 319—323 页。

翼作家联盟,极力倡导这种漫画和木刻。因此,就在鲁迅与瞿秋白就苏维埃文学理论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问题进行漫长的辩论,并且经常把瞿秋白隐藏在自己家里,以避免国民党警察的危险搜捕的这几年中,鲁迅自己出了很多钱,鼓励年轻的艺术家在创作和展览中发展这种直截了当又很有说服力的视觉交流手段。

丁玲本人对胡也频的被害悲剧作出的反应是,重新确认胡也频作出的承诺。她和沈从文从上海的朋友们那里借钱,穿越了小半个中国来到湖南西部她母亲的家里。正像1898年康有为向母亲隐瞒了他的兄弟被处死的真相,现在丁玲也对她的母亲隐瞒了胡也频死亡的真相。她与沈从文开始了一场复杂的字谜游戏,她准备了几封模仿胡也频笔迹的信,寄到湖南,让老太太确信胡也频很好,不必为女儿在上海的家操心。丁玲借口要与胡也频一起去长途旅行,说服她的母亲在他们不在的时候为他们照顾孩子。丁玲与母亲热烈而充满激情地交谈了三天。她们回忆了五四运动之前在一起的生活,谈到了自那时以来农村社会和她们的大家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三天后,丁玲把孩子留下,只身返回了上海。

1931年夏,就在丁玲返回上海之后,她写了一篇题为《某夜》的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她不仅直接面对了胡也频的死所激起的情感波澜,而且证明她本人从对革命事业所抱的单纯的乐观态度向前迈进了多大一步。小说写的是——一小群男女囚犯,戴着镣铐,迎着刺骨的风雪,一起步履艰难地走向他们的最后目的地——钉在冰冷土地上的木桩子的经过。他们虽然有机会最后交换一下信任和爱的目光,但是却没有能够唱完《国际歌》开头的一节,因为机枪的扫射淹没了他们的声音。她最后写

道：“夜沉默着，肃静，庄严，飘着大块的雪团和细碎的雨点。冬夜的狂风叫着飞去，又叫着飞来。雪块积到那垂着的头上，但风又把它吹走了。每个人都无言的，平静的被缚在那里。在一些地方，一个，二个，三个……地方流出一些血来了，滴在黑暗里的雪上面。天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亮。”^①左翼读者们作出了热烈的反应：左翼作家联盟选举她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她被任命为左联刊物之一《北斗》的编辑和左联负责工农文学的部门负责人。1932年初，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时期丁玲的种种经历，表明了她是如何努力寻找能使自己的生命具有某种意义的表达方式的。1931年春，从湖南回到上海不久，她曾向光华大学的学生作过一次非正式的演讲。在演讲中，她谈到她的过去和她的抱负。她把胡也频的死视为“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她坚决否认这件事会使她退出社会生活，陷入无限的个人悲痛之中，或者会使她停止写作——虽然她觉得她最近的作品大部分都不尽人意。她对学生们说，她觉得一个作家不应当只写个人的经历，但她确实实为她觉得她应当去尝试的事情作出了某些限制：

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现在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以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现在我正打算写一

^① 《丁玲文集》第2卷第447—448页。

个长篇,取材于我的家庭。^①

开始在她脑子里成形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起了个非常简朴的名字,叫《母亲》,写的是从清朝末年到1927年革命这段时期的事情,以她自己的母亲在其所属的湖南省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总共有三千余人,分布于许许多多多个家庭)中的命运为线索。她写信告诉编辑,她相信这本书总字数将达到30万字,她可以一天写一千字,10个月内完成全部书稿。她打算在这部小说中详细描写农村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地工业机械化给小城带来的变化,现代通讯手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现代商业的各个方面。

丁玲觉得可以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处理这些主题的时候,正赶上—股居支配地位的新潮流。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抒情诗歌和短篇小说的试验最为广泛和最为成功的时代,那么,30年代初期则是正在兴起的现代长篇小说的极盛时期。巴金的《家》出版于1931年,写的是他的家乡四川省—家三兄弟适应(或不适应)现代化和婚姻模式的压力的感人故事。茅盾的《子夜》是一部大部头的左拉式小说,写的是上海金融界的事情,出版于1933年。沈从文的《边城》出版于1934年,他恰如其分地把自己的思路放在湘西的水乡生活,他在那里长大,然后又当兵驻守在那里。

这一时期的作家们都热衷于写这类长篇小说,仿佛这个时代的戏剧性事件正在大量发生,作家们只有通过追逐相似的辉煌才能得到满足似的。因为个人的希望日渐暗淡,所以政治领

^① 《丁玲文集》第300—301页。

域里个人行动的意义似乎也在变小。1925年，鲁迅曾很有分寸地责怪许广平，因为她认为学生可能影响外国帝国主义者，但是到了1932年，鲁迅的怀疑态度已被多次证明是正确的。尤其是日本人，正在加紧他们对满洲、山东和上海三个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渗透步伐。在中国的日本军官常常脱离东京采取独立行动，决心迫使中国人作出愤怒的反应，这样就可以反过来证明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是有道理的。同样，中国领土上的日本厂商即使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一直赚取大量利润，也通过垄断原材料资源、剥削中国劳工和要求获得只会损害中国制造业的广泛的经济特权，而把中国人的忍耐逼到了极限。1928年，日本军官指挥暗杀了满洲军阀张作霖。同一年，驻山东的日本军队迫使北伐军绕了一个大圈子。1931年，借口沈阳附近的中国部队攻击了日本军队，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的大片土地。1932年1月，上海发生反日罢工和骚乱之后，日本军队侵入上海，占领了部分市区。由于中国军队出乎意料地拼死抵抗，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日军才撤走。日本人还邀请退位的满清皇帝溥仪离开天津的避难所，出任“满洲国”第一“执政”，这时满洲已经改了名字。1932年3月，溥仪答应了这件事。执政两年后，他被加冕为皇帝（此次已是继1908年和1917年之后他第三次接受这一称号了）。

正在是30年代初这段时期，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指导下做出了一项后患无穷的重大决定，即因为担心学生或工人举行新的示威活动会招致日本或其他外国列强的进一步报复，所以尽可能地抑制国民的愤怒情绪。这样，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人，而且打击了新一代自由派青年，他们往往是受过西方教育或受到西方影响的学生。他还使他的党退向带有道德说教和简单化

烙印的儒家思想专制,他通过不断扩大的警察和特务机构来强化这种专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也因为孙中山的旧属、同盟会时期就追随孙中山的一批人中早就有人反对他,所以蒋介石的权力,无论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在他的军事盟友当中,从来都不是无可怀疑的。蒋介石的军事盟友们一直控制着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1930年,蒋介石与原先的盟友、华北的军阀打起了内战。1931年,蒋介石两面受敌,一方面国民党右派拒绝支持他,另一方面广州可能建立独立政权。1933年间,福建省爆发了持不同政见的国民党人的一次起义。

蒋介石能够幸存下来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本身的力量是分散的,其领导集团也是分裂的。虽然到1933年为止,共产国际一直控制着在上海的党组织,但是它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总方针最终证明是不合适的,党的力量转移到了江西农村根据地,在这里,毛泽东是事实上的领导人。但是,江西苏维埃只是分散在广西、湖南、四川、河北和陕西各省的许多共产党根据地之一,每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领导人和自己的政策。此外,即使在江西根据地,关于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也不断有一些小的变动,如对待地主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暴力,应当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土地重新分配,怎样对农民中的各种附属社团作出阶级区分,使用何种强制手段和游击队组织来对付国民党的经常性的围剿。

面对这种发展态势,人们的一种反应就是要领会此刻的荒唐可悲。这样做的人中有一个才华极为卓越的人,他就是小说家老舍。老舍是满族人,他的父亲是御林军成员,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被杀,当时他正在保卫紫禁城,以防被派去援救被围的外国公使馆的八国联军进犯(沈从文的父亲和奋力保卫大沽

沿海要塞的军队也是被这些八国联军打败的)。那时老舍才一岁。他跟着寡母在几近贫穷的家境中长大。也许是为了求得自己命运的改善,1924年他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在伦敦一住就是五年。他担任语言教师,帮助英国学者翻译中文著作,并且如饥似渴地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在伦敦时,他写了三部喜剧小说,寄回中国发表,很受欢迎。1930年回国后,在山东济南的一所大学任教。他对自己所看到的日本侵犯中国的证据感到十分震惊。他写了一部新小说,是关于一个中国家庭悲剧性地卷入日本的阴谋之中的故事。他利用1931年暑假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把它寄给了上海的出版商。仿佛是要充分证明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似的,小说的唯一一份手稿在1932年1月日本军队袭击上海,炮轰该城时被烧成了灰烬。

《猫城记》是老舍对这一损失的回答。书中充满了对于他自己、他的同胞和外国侵略者的怨恨。在描述自己创作《猫城记》时的心情时,老舍用从打谷场得来的隐喻,嘲讽自己不自量力,做了愚蠢的尝试:“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人,能在粪堆上找到粮食;一个真有思想的人根本不将就这堆粪。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维持这堆粪而去劝告苍蝇:‘这儿不卫生!’”^① 仿佛他在同时与中国目前危机中的所有因素作斗争:“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建立,日本人向无依无靠的中国平民动武,国民党缺乏远见的态度,共产党内部的互相争吵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逃避时代造成的极度痛苦,正在成为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在选择写作手法上,老舍运用了许多幻想和讽刺文学作家惯用的思路,即一位

^① 胡絮清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8页。

旅游者恰好被困于所要讽喻的国度里，孤独无援又无法脱身。但人们怀疑《猫城记》的开头几行因为回应徐志摩的某些东西而产生了灵感，因为徐志摩五年前曾翻译了《天真人》，并且就是在济南外面的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的，当时老舍正在济南教书：

飞机是碎了。

我的朋友——自幼和我同学：这次为我开了半个多月的飞机——连一块整骨也没留下！

我自己呢，也许还活着呢？我怎能没死？神仙大概知道。我顾不及伤心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火星。按着我的亡友的计算，在飞机出险以前，我们确是已进了火星的气圈。那么，我是已落在火星上了？假如真是这样，我的朋友们的灵魂可以自安了：第一个在火星上的中国人，死得值！^①

老舍笔下的叙事人搁浅的火星地区，是既冷酷又懒惰的动物——猫人的故乡。叙事人跟着猫人来到了叫作猫城的地方。猫人有简单的语言，简单的文字，没完没了地嗜食鸦片以使自己处于一时的麻醉状态，身上肮脏不堪，城区组织紊乱，对死亡总是听天由命，夸夸其谈的道德说教中透着虚伪，猫人使这位主人公充满了恐惧，他把他们与刚刚离开中国作了比较——他称赞中国是“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国家。他逐渐熟悉了猫诗，知道猫诗至少还有最低限度的尊严，表现出一些进步的迹象。例如，一位猫诗人让这位叙事人看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史有感》的

^① 《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10页。

诗，诗有这么几行：

宝贝叶
宝贝花
宝贝山
宝贝猫
宝贝肚子……

按照这位猫诗人的说法，这最后一行“宝贝肚子”，是诗艺上的最新突破，两万年来猫诗历史，没有一个诗人用过它。^①另一方面，猫国的政治具有无可救药的特点。据叙事人所了解，很显然猫人热衷于接连不断、无休无止地更换政府，他们把这种制度叫做“哄”。几乎每一个人都加入到这些“哄”中去了，除非他们因为吸食鸦片过多，头晕目眩，动弹不得。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大家夫司基主义”^②，这种主义是经过一系列的“哄”，打倒了猫国皇上之后，才跃升到目前的地位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也没有给国民带来多大安慰，大家夫司基哄的首领最终自己接受了皇帝的衣钵，获得了“万哄之主”的荣誉称号。^③

这本书的高潮是一群“矮人”（显然是指日本人）入侵猫国。由于猫人无法就任何政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团结御侮，所以遭到有计划的围捕和屠杀。只有一小股十几个猫人撤到一座偏僻

① 《老舍文集》第7卷第330—331页。

② 原文为 Sharekyism。为老舍自创的猫人语词汇。含义相当于“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共享”，似含贬义。——译注

③ 《老舍文集》第7卷第426—428页。

的山里,但是,即使在山里,避开了侵略者,暂时安全了,他们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站到一起来。当矮人占领这座山时,只有两个猫人还活着。老舍写道:“敌人到了,他们两个打得正不可开交。矮兵们没有杀他们俩,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相互的咬死”。^①书中的主人公经历了这场大动乱之后,靠着偶然在火星上着陆的一艘法国宇宙飞船逃了出来,回到了中国。

《猫城记》一问世,马上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就小说的中心思想而言,受到批评丝毫也不奇怪。老舍本人在谈到它时也说,作为一本书它“没法不爬在地上,象只折了翅的鸟儿”,因为它缺乏真正的讽刺文学所需要的讽刺力量和幽默;书中充满了否定思想,因为“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②然而,老舍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也正是十年来一直困扰着鲁迅和瞿秋白的问题:如果说直接政治行动给中国带来了如此的苦难,那么,这是不是或多或少给予了言词以重要意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讽刺文学是不是有效的工具?

1933年2月间,鲁迅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想法得到了具体体现。当时萧伯纳在周游远东期间中途在上海停留了一天。鲁迅接到去见一见萧伯纳的邀请,便愉快地答应了。给鲁迅的邀请是蔡元培发来的。蔡元培自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以来,成了国民党教育界有影响的领导人,并与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一起创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是这个组织担当了在上海接待萧伯纳的东道主。根据鲁迅自己的描述他没有什么话想对

^① 《老舍文集》第7卷第468页。

^② 胡絮清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27页。

萧伯纳说,虽然他很高兴与萧伯纳合影。萧伯纳待人态度诚恳和面对成群的中国记者没完没了地问一些小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给鲁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瞿秋白把关于萧伯纳访问中国的种种描述辑在一起编成一本小册子时,鲁迅同意写一篇序言。鲁迅写道,萧伯纳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中国人可以看见自己的真实面目。他的伟大由映出的形象准确无误地得到了证实,也由他一视同仁地冒犯每一个人的事实所证实。萧伯纳不说中国知识分子中各个小集团要他说的话:“跛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瘸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者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①萧伯纳拒绝迎合他们,对此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接受,于是便转而反对他了:“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作为防御手段的最后一招,他们称他“讽刺家”,仿佛这样做就可以减少萧伯纳的分析所具有的力量似的。但是,正像鲁迅所说的,“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②

对于1933年春季仍留在上海的丁玲和少数共产党员来说,这些话听起来一定令人心寒。这时上海原有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或疏散到了其他城市,或被杀害,或被监禁,或南下到江西苏维埃地区寻求庇护。丁玲一直努力地为党工作着——负责《北斗》杂志的编务,担任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兼管共产党青年部的工作,与此同时,她还写了十几篇涉及革命主题和反日抵抗运动的短篇小说。虽然其中的一篇《诗人亚洛夫》,描写一

^① 《鲁迅全集》第4卷1981年版第501页。

^② 同上,第491—492页。

位白俄逃亡贵族凄凉的漂泊生活，一篇是彼得·潘和廷克·贝尔式传奇故事的社会主义投影，但是，她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写革命运动中的农民和工人的，这违背了她本人1931年向光华大学的学生发表的不愿写工农的声明。她还勤奋耕耘以完成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母亲》，1932年秋至1933年春这段时间，她写了将近10万字，完成了计划中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分，4月，她把稿子寄给了出版商。写《母亲》时，她住在上海昆山路一座公寓的四楼，与一个叫冯达的面色苍白、憔悴不堪的年轻作家和翻译家住在一起。沈从文见过冯达，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觉得他看上去像一个为洋行做事的办事员。1933年5月14日，丁玲、冯达和两位共产党员朋友正在谈话时，警察破门而入。其中一位朋友试图爬过阳台到另一间房子里去，结果坠地身亡。丁玲与其余二人被捕，就此销声匿迹，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她在上海的朋友都以为她已经被害了。前不久刚接待过萧伯纳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铨，试图查明丁玲是否还活着，他对这次逮捕公开提出抗议，并要求国民党作出解释。国民党领袖们早就讨厌杨铨了，因为几个月来，他所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直强烈地谴责他们。他提出这些新抗议的时候，正赶上国民党向上海派遣特务。6月18日星期天一大清早，杨铨正准备与他的儿子驱车出去的时候，四个持枪歹徒一齐向车内扫射，杨铨当即被打死。

同年晚些时候，瞿秋白完成了自己去江西苏区的准备工作，毛泽东邀请他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以便他能够把他的群众教育和文艺现实主义的理论付诸实践。他是1934年1月到达江西的（他希望他的妻子女儿安全地留在上海的朋友们那里），但由于时时刻刻处于蒋介石“清剿”的军事压力之下，苏区的条件十

分简陋，生活非常忙乱，瞿秋白发现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培训文盲识字上。虽然瞿秋白努力工作，通过把舞蹈和民谣纳入无产阶级艺术形式而进行了革新，但是也许正是在这里，他自己关于大众化的声明（1932年夏发表）得到了充分证明。当时他指出，在农民当中从事教育工作，比在无产阶级中从事教育工作难度要大，因为“‘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仍然受着“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的支配，而都市化的无产阶级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经历中逐渐抛弃了这些土话的偏僻性质^①。但是在这里，他至少在短期内有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即推广可以深入到大众中去的中国文字，这种中国文字是以大众词语为基础，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词语为基础确定的：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运用最浅近的无产阶级的普遍话开始。这在最初，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模仿旧小说式的白话。但是，这决不应当是投降政策。这是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领导着一般劳动民众去创造新的丰富的现代中国文。有必要的时候，还应当用某些地方的土话来写，将来也许要建立特殊的广东文福建文等等。^②

但是，瞿秋白并没有多少时间来试验他的大众文艺思想。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下，江西的共产党力量开始退却。蒋介石指挥着一支庞大而富有经验的军队，担任顾问的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重大战役的德国高级军官。到1934年为

^① 见瞿秋白《乱弹及其他》第278—282页和第245—254页。

^② 见瞿秋白《乱弹及其他》第251页。

止,他们在江西进行的战争是在模仿佛兰德斯战场上的早期战役,因为国民党军队依靠堡垒和战壕的支援,有计划地从作好准备的阵地向前推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与此同时,他们学会了如何辨别共产党军队发动的佯攻和如何避免围剿游击队的军队遭到相同的厄运:补给线拉得过长,分散成多个小股部队,结果被游击队以大吃小,一个一个地被歼灭。共产党领袖们在什么是正确的军事战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被迫处于以静待动的防御地位,所以他们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1934年春,当他们的食品和弹药快要用完的时候(他们从未有过医药用品的补给或先进的后勤支援),他们制订了放弃江西苏区根据地,到其他共产党苏维埃曾设法生存下来的四川或陕西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应急计划。到这年年底,已是非撤退不可了,于是,大约十万名共产党人离开了江西苏维埃首都(他们最初的撤退非常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军队),踏上了向西北转移的艰苦而危险的旅程,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长征”。一些诱骗敌人的部队与老弱病残者一起留在了江西。毛泽东自从到了江西苏区以后,一直与贺子珍住在一起,虽然贺子珍跟随毛泽东一起长征,但他却不得不把他和贺子珍的两个孩子留下。

瞿秋白因患肺结核病,身体很虚弱,无法参加长征,所以也留了下来。1935年初,他动身回上海,有时走路,有时则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2月,瞿秋白与同行的一批人被国民党巡逻队抓住;起初瞿秋白还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的身份,但被一位告密者指认出来以后,他被押往福建省西部山区长汀县汀州监狱。

1935年5月间,瞿秋白写了长篇自白,他称之为《多余的话》。他死后,这份文献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世上来,后来

又登载出来。虽然有一部分内容是一位获准到狱中采访瞿秋白的记者看过的，但是原稿可能被国民党的审查人员删节了，甚至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否被窜改过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共产党认为，这种自我贬低和带有嘲讽腔调的自白不宜列入纪念他的专集，所以正式的《瞿秋白文集》中没有收录这篇自白。然而，这篇自白从许多方面反映出了这样一个瞿秋白：15年前曾去莫斯科旅行，但现在却病魔缠身、疲惫不堪，不过满36岁，却觉得已经垂垂老矣：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①

瞿秋白所说的“空”，可能是指他继续从事宣传工作。虽然从思想上说，这项工作确实令他感兴趣，但仍无法替代俄国文学的研究，研究俄国文学仍是他自己的“真正爱好”。他写道，正是“历史的误会”使他担任了党的领导职务，因为“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那些对

^① 《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世界没有什么贡献的“高等游民”之一。^①瞿秋白写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对这些学问只知道一点皮毛,只是偶尔掌握了一些使他感兴趣的内容,而忽视了其余的内容。比如说,他根本没有读过《资本论》,因为他对经济学没有兴趣。但是,这种随意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给他提供了寄托自己思想的天地,尽管他把自己早年阅读时得来的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混在了一起: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②

在自白书的另一段,瞿秋白补充道: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

① 《瞿秋白年谱》153页。

② 同上,第147页。

随你们了。”^①

在自白书的结束语里，瞿秋白描述了多年来几乎压倒他的万分的厌倦，这种厌倦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病引起的，一部分则是由于他的政治工作的性质造成的。现在，在进入长眠状态之前，他可以享受一阵儿难得的完全坦白的时光。他的遗憾是多种多样的：他没有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更好地为共产党服务；他对自己的同志不是完全坦白的，对自己的妻子杨之华也是这样，尽管他真挚而深切地爱她，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当作了一出“滑稽剧”，他在剧中扮演了太多肤浅的角色，当过党的领袖、大学教授、翻译家、丈夫、初等教育专家；他再也看不到他的小女儿了：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明白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

^① 《瞿秋白年谱》第158页。

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现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①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行刑队枪杀。

瞿秋白1934年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之前,曾为新版鲁迅杂文选集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瞿秋白死后,鲁迅通过不辞劳累地编辑瞿秋白选集,并亲自负责校对和出版过程,来回报瞿秋白给过他的荣誉。像过去瞿秋白的许多文章都由鲁迅以笔名发表一样,为了逃避对该书的审查,该书也是用笔名出版的。

瞿秋白和鲁迅两人之间形成亲密的友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一定在于他们有着广泛的共同兴趣和经验:

① 《瞿秋白年谱》第160—161页。

他们都喜爱俄国文学，都娶激进的年轻学生为妻，每方都有一个独生子，都一直为孩子的安全提心吊胆，都患有失眠症，都喜欢杂文形式，又都是肺结核病患者（肺病也使鲁迅连续多日身体虚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至于派别斗争，瞿秋白在20年代后期处于全盛时期，30年代又处于最低谷的时期，鲁迅则一直是身临其中的顽强战士，1935年和1936年鲁迅周围的风暴加剧了。在左翼作家联盟内部，个性冲突和思想倾向的差异已司空见惯。由于他的朋友、诗人胡风的缘故，鲁迅被拖进了一场与负责文化事务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周扬的恶战中。正如鲁迅致信胡风所说，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① 或者像他写信给另一位朋友时，更为生动、形象地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的世界。^②

鲁迅与共产党中各种故交旧友或相识之间的这种新的紧张关系，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日本人的势力日益增长，二是共产党本身几乎销声匿迹。到1935年末，日本人已不满足于控制满洲，又接管了察哈尔（位于北京北面），并迫使国民党同意将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的广大地区——这样便在中国本土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与此同时，共产党部队的主力从江西苏区撤退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长途跋涉，穿越了将近四千英里的国土，一路上艰苦作战，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穿过西南部的

① 《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876页。

② 同上，第695页。

贵州省,然后向北,经过西藏边界地区和甘肃省到达陕西,之后,千方百计在保安周围重新集聚力量。保安地区位于长城与西安市(40年前,康有为曾敦促光绪皇帝定西安为国都)之间,是贫困不堪的山区。在这里,毛泽东带着七千名长征幸存者,与1931年以来一直维持该地区苏维埃政权的一小部分共产党力量汇合在一起,还从该地区的回教居民和当地的秘密社团中另外吸收了一批兵员。但是,他们的力量仍然极为脆弱。忠于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开始在西安集结,准备进行另一次——他们希望是最后一次——清剿。因此,鼓动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共产党人的一项生存策略,也正好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总路线的策略相吻合。这项策略有希望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因为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集会,这次集会在当地产生的激情和在国内其他地方引起的反响,都说明它是1919年、1925年和1926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继续,并使新一代的学生领袖为国人所瞩目。

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卷入了与共产党干部们的口号之争。1936年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令解散左翼作家联盟之后,斗争变得更加激烈。鲁迅在左联的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左联的解散只简单地征询了他的意见。他对一位朋友说过,左联“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①左联解散后,取代左联成立了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目的是把文化工作者集合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下。鲁迅和胡风认为这个口号会降低革命热情,因此极力反对这一口号,他们提出了反建议,即作家们应团结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下。作为

^① 《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答复，周扬代表共产党领导层发表意见，坚持主张“国防”必须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最中心的主题。这种令人不快的说法显然指的是鲁迅的态度。^①

鲁迅已经很生气了，他和周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又写道，鲁迅正在“无意地助长着”诸如诗人胡风等人的“恶劣的倾向”。此后，鲁迅的火气更大了，甚至怒不可遏。这位鲁迅和周扬的共同朋友，在用心良苦的彬彬有礼的外表掩饰下，就鲁迅的立场及其与中国不可能置身其外的世界政治的发展态势的关系，向鲁迅详细地提出了警告。鲁迅的回答是，他当然支持合乎理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是，他认为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突然急剧地改变政策，并且“一味的咬住我”，主要是出于宗派主义的动机和心胸狭小。^②

这些争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使鲁迅恢复了活力和机智，因为1935年底，他突然间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而且都是漫不经心地从中国古代历史中提取主题，利用神话或半神话人物，将他们置于不协调的环境之中，他们在这种环境中的对话既滑稽可笑又尖酸刻薄，突出了这些流传千年的信念和行为的悲怆特点。神话中的统治者舜和禹，忠臣伯夷和叔齐（商朝覆灭后，他们不食周粟，绝食而死），哲人孔夫子以及道教圣贤庄子和老子——所有这些人物的都进入了鲁迅头脑中为他们重新构筑的这个新世界中。他们不再像鲁迅在大约20年前所描写的那样，不过是“吃人”文化的代表，现在是带着怀旧的心情论及他们，他们的

① 周扬的观点见他的《关于国防文学》一文，载《文学界》月刊，1936年6月创刊号。

② 《鲁迅全集》第6卷第526—528页。

言论有时既机敏又含有动人的力量。例如，在名为《出关》的故事中，圣贤老子觉察到从今往后“朝廷”将由孔夫子控制，所以他离开朝廷，经过万里长城的关口，到西北的沙漠去。他骑着青牛，牛背上驮着他的很少几样物品，当他接近了目的地，已经望见了苍天之下愈远愈低的黄土高原时，他被一位守关的长官拦住。那位长官很有礼貌，但也很坚决地把他带到关上，以便他能够在继续赶路之前，最后讲一次学。当他开始讲述他的观点时，在听讲者中，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惊愕：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大家彼此面面相觑，没有抄。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老子接着说：“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呵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瞌睡来，哗唧一声，刀、笔、木札，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①

要塞长官对老子讲的内容大感不解，但又渴望尽可能有点收益，于是要求老子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编成讲义。讲义写好后，要塞长官看了大失所望，因为它“还是这些老套”。老子被送上去流沙的路，现在他的青牛背上有了一小口袋补给品，而老子的讲义被放在了关口的架子上，一个架子上已经“堆着充公的盐、胡

^① 《鲁迅全集》第2卷第393页。

麻、布、大豆、饽饽等”物品。^①

写了这些故事以后，鲁迅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他继续编辑瞿秋白的著作，准备出一本珂勒惠支的木刻集，还赶着完成果戈里《死魂灵》的翻译。其余时间被激烈的、累人的争论所占据，争论的问题是，现时代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口号是什么。事实上，鲁迅的医生就是一位日本人。尽管鲁迅喜欢并信任这位医生，但其他朋友仍为他安排一位在上海的美国肺结核病专家给他作了检查。这位医生对鲁迅说，他的死期不远了，并且正如鲁迅所谈到的那样，医生又很客气地补充了一句说，如果鲁迅是欧洲人的话，早在五年前就已经进坟墓了。接着鲁迅灵机一动，带着挖苦、幽默地说道：“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②

鲁迅所写的唯一一篇有些像被处决前瞿秋白所写的公开自白的文章，是1936年9月5日的一篇杂文，题目直截了当，就叫做《死》：

……我倘曾贵为官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了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① 《鲁迅全集》第2卷第396、397页。

② 《鲁迅全集》第6卷第611页。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并未被处决,只是被国民党关了三年。由于她既未受到指控,也未受到审判,大部分时间住在国民党官员的宅子里(无论在南京还是在杭州都是如此),所以她的许多故交旧友都认为她成了某种变节者,也许将她的朋友也出卖给了国民党,或者抛弃了她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例如,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611—612页。

鲁迅就曾冷冷地对朋友们说，“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①事实上国民党抓她的目的似乎是要把她与她的故交旧友隔离开来，而不是要惩罚她，是要迫使她放弃为共产党做的各种宣传工作。她可以和她的情人冯达在一起。她的母亲（当时一定已经知道胡也频的事情）带着胡也频死后交给她照看的孩子，从湖南赶来与她住在一起。1935年的某个时候，丁玲有了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一个女儿，孩子的生父是冯达。

在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发生这样的事确实非同寻常。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就是最初下令逮捕丁玲的人，后来评论丁玲的态度时暗示她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她没有担任过激烈的破坏活动，问题并不严重，同时她有出色的写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后成为本党有力的文化工作者。她一到南京，我立刻与她坦率相谈。她表示要放弃过去的想法，并作了书面陈述。他们夫妇既表示了愿意开始新的生活，我就安排他们住在一家安静的旅馆中。但两个星期以后，因为旅馆的费用太贵，就将他们移送在我的一个同事家中居住……在这所房子里，她除了失去对外行动的自由外，饮食起居都是很舒适的。他们夫妇二人同住在一间大书房，外面有个小院子，种了一些花草，他们可以随便读书、谈天，或做其他他们所愿做的事，没有人干扰。所有床铺被褥，衣服用品，书籍报刊，文具纸张，以及丰盛的三餐茶饭，应有尽有，都是免费供应。她自己说，在上海时

^① 《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60页。

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①

但是事实上,丁玲在这样反常和孤立的环境中,很少写作,这也是可想而知的。如她后来解释的那样:“虽说有绝对的空闲,有更多的材料,但我没有写。我只是思索,简直思索得太多了,变得很烦躁。我只希望再有那么一天。我忙着,我偷闲来写”。^② 她确实完成了几篇小说,其中一篇是关于一个看守的故事,这位看守友善而笨拙,有时递支香烟给她,叙叙往事,缅怀自己过去的英雄业绩。整篇小说明显地流露出对这位看守和他的一些同伴们的同情,这与上海左翼文化界逐渐形成的一种论点相矛盾,这种论点就是阶级立场一定要与人物的塑造相一致,一点也马虎不得。在丁玲看来,人道的国民党看守这种说法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日子好长。我们好像是住一个荒岛上。整天待在大厅里,无事可做。我鼓励他们[看守]告诉我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很感人,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们自出生以来,不断地勇敢面对种种风暴。亲眼目睹许许多多怪异之事,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生。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有几个人经常要我们教他们读书习字。有向我们学英文的,也有学中文、练毛笔字的,还有一位喜欢看小说的,每天要我教他不认识的字。^③

① 常君梅(音)《丁玲:生平与著作》台北1978年版第62页。

② 《丁玲文集》第6卷第591页。

③ 常君梅(音)《丁玲:生平与著作》第71页。

也许就在她被捕之前，也许是在她被捕之后，丁玲又回到了她在《莎菲女士日记》中塑造的人物上来，开始写续篇。这位年龄大了些也更聪明了些的莎菲写道，空闲的时候，她翻阅自己以前的已经发黄的日记本，发觉她与早先那个写这本日记的人不再有任何关系了。过去的自己没有引起她一点情感上的共鸣：“所有的梦幻，所有的情热，所有的感伤，所有的爱情的享受，都过去了”。^① 在这篇作品（只保存下来七页未完稿）中，丁玲完全把自己与小说人物新的莎菲联系起来，她写莎菲找到了一位19岁的爱侣，他们彼此相爱，写他们离开北京后的数年中生活上的缓慢变化，还写了其他一些事态发展情况：

……我在这时做了一个小婴儿的母亲。我们并不愿意有小孩，也不能有小孩，因为小孩太妨害我们了。不过，我们究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没有超过这种爱，小的，乖的婴儿，显着天真的，红的嫩脸睡在摇篮里的时候，是给了做父母的人许多劳苦后的安慰的。……小孩吵得很，我的精神和身体吃了有生以来未有过的苦。我是一个女人，我不缺少丰富的母爱，我假如一定要把小孩留在我身边，我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②

但是，莎菲在新日记中写道，她抵制住了孩子带来的诱惑，把孩子送到了湖南的外婆那里，而且没有流一滴眼泪。因为丁玲的突然失踪提高了她的知名度，所以这样的未完稿（不论其文

^① 《丁玲文集》第3卷第308页。

^② 同上，第309—310页。

学价值如何)在著名刊物上发表,增添了丁玲和莎菲这两个名字引起的神秘莫测和模棱两可的感觉。

1936年间,尽管丁玲在囚禁中表现得非常驯服,但实际上她一直精心策划着逃走。她的丈夫冯达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常常要到医院接受治疗。丁玲对国民党看守人员说,他的病使她感到厌烦和沮丧,没完没了地喂养和照看孩子的需要也使她感到精疲力尽,这样,1936年5月她获准去北京一趟。在北京,她与共产党员接上了头,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她应当先返回南京,到年底再想办法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保安,这时已经有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逃到那里去了。同年夏天,丁玲回到了南京,与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一起进行最后的策划。9月,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她取得了国民党的同意前往上海,理由是她不得不到上海找一位日本医学专家看病。一到上海她就被朋友们接走并藏匿起来。她在上海躲了大约一个月,直到可以安排她去西北为止。到10月中旬,准备工作完成了,丁玲离开上海前往西安。到西安后靠国民党军队中的朋友的帮助,她又一次躲藏起来。1936年10月的最后一天,她乘车悄悄地溜出城去,一路颠簸地朝共产党的根据地奔去。从她以往十多年所写的或所读的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10月的那一天这位年轻女子有着三种不同的面孔:像老舍《猫城记》中叙述自己经历的人,加入到逃往山中的最后十几个游击队员行列;像鲁迅笔下的圣哲,走出关口,前往碧空万里的黄土高坡;或者只不过像长大了一些并且感到疲倦不堪的莎菲,终于决定不能把自己余下的生命浪费在南方。

第十章

难 胞

1933年,老舍为《猫城记》作了一篇自己贬低自己的序言,其中有一段与他的一位读者的对话,这段虚构的对话是这样的:“外甥问我是哪一派的作家?属于哪一阶级?代表哪种人讲话?是否脊椎动物?得了多少稿费?我给他买了十斤苹果,堵上他的嘴。他不再问,我乐得去睡大觉。”老舍接着写道,这一觉睡得非常沉,以至于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记不得是何年何月了,因此无法像作家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自己的序言结尾处写上年月日了。^①

到了1936年初期,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使老舍认识到,这些问题再也不能当作玩笑漠然视之了。在1933年和1934年两个酷热的夏天,在山东济南一所大学里教书的老舍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结婚》和《牛天赐传》。在小说中,老舍继续探索现代中国中间阶级的世界,并对他所看到的一

^① 《老舍文集》第7卷第309页。

切越来越感到沮丧：他们不再以中国社会古老的价值观念为准绳，但又没能形成对自己有帮助的新的道德准则；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但又没有勇气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无论是痛饮啤酒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脚穿缎面拖鞋的伪儒家，或是无依无靠的贫苦人，他们都卷入了他们无法理解的社会冲突和军事冲突之中，这些人都无力自卫。像鲁迅笔下 1911 年男男女女漫无目的地从河滩涌向芜市一样，老舍故事里的人物从来搞不清这些内战究竟是谁打谁，他们也不关心谁胜谁负。他们只求上天保佑所有的军队都离他们生活的地方远远的。他们将信将疑地把日本旗帜插在自家的屋顶上，希望这个标志至少可以让偶尔前来滋扰的随便什么军队敬而远之。

1936 年初，老舍想在上海闯出一条做一位独立的职业作家的路，没有成功，便回到山东又教起书来，这一次是在青岛市。这以后，老舍决定在一年时间里完全放弃教书工作，最后一次尝试写一部出色的严肃小说。

《骆驼祥子》是老舍于 1936 年间写成的，从那年 9 月开始在一份杂志上连载（那时丁玲正从上海逃往保安，鲁迅则正处于生命垂危之中）。小说讲的是一个外号叫“骆驼”的年轻人力车夫祥子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故事。小说也是对 1926 年北伐以后十年间中国命运的讽喻（虽然从来没有非常明确地这样说过）。小说一开始，写祥子——年轻、健壮、没受过教育，但满怀希望——开始在北京工作，拉一辆赁来的人力车。他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在城里跑着，跑起来快步如飞，轻松愉快，渐渐地他熟悉了城里的每一条坡路和窄巷，每一个餐馆和水沟，也熟悉了墙上闪烁的每一处灯光或街角刮起的每一阵旋风，他只梦想着有一天能自己有一辆人力车，把它擦得油光锃亮，让它漂漂亮亮的，

然后找一个温柔可亲的老婆为他生儿育女。然而，尽管他年轻力壮，他的梦想简单明了，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却无法单独生存下去：他终于存够了钱，买了一辆车，可是没几天便被一群游荡的士兵征用了，再也没有还给他；第二次攒钱吃的苦更大，对拉车同伴的困难和需要更加不闻不问，但新攒下来的钱被一个刁滑奸诈的侦探借口搜查政治犯而抢去了；祥子与一位他并不喜欢的女子结了婚，希望过上舒适的日子，结果却看到她被她的父亲剥夺了财产继承权；祥子的妻子在临产时死去以后，另一位可以给他爱和柔情的年轻女子想嫁给他，但被他拒绝了。在小说的结尾，祥子生病、孤独、未老先衰，靠乞讨借贷，靠受雇参加丧葬仪式或示威游行，靠向北京警察当局出卖关于工人鼓动者的情报为生。

《骆驼祥子》对老舍三年前在《猫城记》序言中通过他的假想和对话者之口提出的五个问题作了回答。我们先从最后一个问题说起，写小说是为了钱。为了遵守市场法则，它写成了长篇而不是短篇：“五千字也许比十万字更好。文艺并非肥猪，块儿越大越好。不过呢，十万字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这五千字只得了十九块钱，这恐怕也就是不敢老和艺术亲热的原因吧。”第二，老舍虽然并不是为特定的哪一派而写，但他受到了关于文学的作用和现实主义的要求方面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小说中没有曾使身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充满希望的耀眼光芒，而只有对世界更为平静的认识。在这个世界里，一位老者呢喃道：“到底是哥儿们哪！”或者像祥子的妻子在临死前所看到的，“生命才在东方游荡，太阳却已西沉，远方已是漆黑一片，眼前唯有一线夕阳，你还

是要尽人事听天命的往前走几步。”^① 第三,老舍明确地把自己看作中产阶级的一员,有某种才能和某种社会良知,是一个恋家的人(他经过早年的几度失意后,最终于1934年结婚,当时有一个小孩),但却没有办法去改变世界。《骆驼祥子》中有一个非常和气的角色曹先生,曾短期包租祥子的车子,这个人物看起来显然说的是作者自己:

其实呢,曹先生并不怎么高明。他只是个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作些别的事的一个中等人物。他自居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唯美主义者,很受了威廉·莫利司一点儿影响。在政治上,艺术上,他都并没有高深的见解,不过他有一点好处:他所信仰的那一点点,都能在生活中的小事件上实行出来。他似乎看出来,自己并没有惊人的才力,能够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就按着自己的理想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虽然无补于社会,可是至少也愿言行一致,不落个假冒伪善。^②

第四,老舍是使用北京街头的语言,既代表穷苦人也代表当时的中国人讲话的。穷苦人的个人主义在残酷无情且前途未卜的社会中是不起作用的,而当时的中国人似乎没有能力为了他们自身也为了自己的国家而采取明智的集体行动。小说结束时的那段话把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口语的感染力融为一体,这一点一定会使瞿秋白感到高兴,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① 胡絮清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65—71页。

^② 《老舍文集》第3卷第61页。

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的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①

第五，甚至对这个问题中最具讥讽味道的问题，即作者是否是脊椎动物，老舍现在也有了一种答案。因为如果说直立姿势是人类区别于其他脊椎动物和使他们获得自己可以自诩的些许尊严的东西的话，那么放弃了这种直立姿势，也就否定了这种区别，抹杀了人的尊严。因此，祥子的可悲故事的关键在于他不再保持原来的直立姿势了，一开始他年轻气盛的时候，甚至在他拉车的时候，他的姿势都是挺直的。他的经历使他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正是这种命运不仅挫掉了他的那股锐气，也使他的“肩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并且，好像那样故意垂着肩还不够似的，他还得了性病，不时地因为性病引起的疼痛而弯着身子，这种病是从他的一个雇主的小老婆那里染上的。祥子对治疗该病的特效药肿凡纳明，即“六〇六”一无所知。而鲁迅 20 年前便向国民推荐此药，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闲来无事也在报章的分类广告中

^① 《老舍文集》第 3 卷第 228 页。

注意到了它；即便祥子知道了，他也买不起这种药。他“临时服些药，或硬挺过去，全不拿它当作一回事”。^①

1936年间，正当老舍描绘着这幅个人命运的黑暗图画，共产党军队在保安努力坚守着他们的西北根据地的時候，曾对20年代的中国社会产生过极为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和群众爱国热情慢慢地得以复活。1936年3月，来自16个城市的学生代表在上海开会，再次成立全国学生联盟。4月，北京学生成立了自己的救国联盟，7月，他们向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请愿，要求停止反共，释放政治犯，保证坚决抗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对共产党本身的利益是非常有利的，起初，共产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难以察觉的；到了8月，共产党终于公开表示支持救国运动并邀请他们派代表到西北苏区共商国事。1936年11月，日本军队侵入绥远省（从前内蒙古的一部分）后，共产党开始宣传他们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北京、上海和西安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这种统一战线策略与同一年苏联提出的在西班牙内战中采用的策略大体相同；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在延安的行动与占据马德里的共和军的行动相提并论，以此来强调这一点。）11月底，七名救国联盟领导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之后，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12月4日，由于西北剿共军事行动停止——由于忠于蒋介石的一支部队从甘肃省发起的主攻遭到了惨败，而驻扎在西安的另一支部队又拒绝再战，所以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坐镇指挥这次军事行动。八天后，他被自己的反叛军队逮捕。国民党领袖、共产党人和各派军事领导人经过两个星期富有戏剧性的紧张谈判之后，蒋介石被有条件释放；他同意

① 《老舍文集》第3卷第195页。

放弃反共，团结全国人民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丁玲在这场反蒋政变发生前两个月离开了西安，10月抵达共产党根据地保安，受到共产党领袖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很高兴利用她作为一名作家和一名逃亡的国民党政治犯的双重声望。她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他们是湖南老乡，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是丁玲的同学，1930年被处决。丁玲还与邓颖超作了长谈，邓颖超五四运动期间是天津学生的协调人，现在是周恩来的妻子。以丁玲为核心成立了文艺家协会的一个分会——一年前鲁迅曾非常激烈地反对协会的存在。以后，根据丁玲自己的要求，她前往陕西西部、甘肃边界的军事前线地区参观，在前线度过了12月份。1937年1月，当她返回保安的时候，共产党总部已经转移到了稍大一点儿的城市延安，这里将成为他们以后十年的根据地。在延安，丁玲受命担任负责管理政治教育的一项职务，被派去做编辑长征历史记录的工作，并应邀在延安师范学校教授文艺。

她不能不为延安的这种热忱和简朴的生活而感动，在那里，长征的幸存者正在加强他们的防御，招募大量的新兵，为可能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作准备，这些长征幸存者原来被视为在逃的叛国分子，经过西安事变以后一跃变成了爱国分子。与她自己从前三个时期的生活——在北京时的一个几乎身无分文的离校学生、在上海时的一个受人称颂的年轻作家和一个被追捕继而被囚禁的共产党阴谋家——相比，反差非常鲜明、强烈。现在，有人告诉她扮演什么角色——当管理者、宣传家和教员，甚至给她提供讲演的思路。她体格强健起来，体重也增加了。正像她对来自上海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她渐渐习惯了赤脚长途跋涉；她学会了不靠火车、公路，甚至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也

不靠骑骡子去旅行；她并不觉得连续几天不洗脸、不刷牙有什么不舒服，她身穿简单的军装，头上戴着一顶帽子。

1937年春天，丁玲已经适应了延安的生活节奏。共产党领袖正在拟订与国民党谈判的微妙细节。共产党终于答应做出四项让步，以换取国民党不再进攻他们；他们保证将停止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活动；把红军中大约三万人的部队交给国民党“指导”，并在延安地区和他们所控制的一百万人当中停止使用“苏维埃”名称；确立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程序，符合就职条件的非共产党人也可当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让他们的追随者相信，这些“让步”不是“投降”，而是面对日益升级的日本进攻必须采取的行动，他们采取措施执行了全部四项渐进主义政策。1937年夏，双方达成了最后协议。

这项协议由于下述情况的发生得以加速实施：1937年7月7日驻扎在天津的日本军队决定占领卢沟桥，该桥横跨永定河，位于北京西南15英里，是连接武汉和华中交通的关键环节。出人意料的是，过去20年里每遇战争不是乞和就是投降的中国军队，这次的反应是拚死抵抗。为了援助兵力只有一万人的天津日军，满洲的日本陆军司令部又增派了三万人的援军，而其他日本军队则向上海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到了1937年8月，中国和日本已处于公开交战状态。

在延安，抗日战争的爆发受到欢迎，人们欢欣鼓舞。共产党人把卢沟桥的猛烈抵抗视为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面貌的体现。丁玲称之为开创了英勇纯朴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延安精神将普照全国。她很少尝试做诗，在她所写的为数不多的诗中，有一首注明日期为日本进攻卢沟桥之后的第三天，诗的名字就叫《七月的延安》。在这首诗中，她强调延安和她离开的那个地方相比有

着天壤之别——那个恣意放纵的世界自然是日本人正在进攻的地方，而——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乐园。
我们才到这里半年，
说不上伟大建设，但
街衢清洁，植满槐桑；
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
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
百事乐业，
耕者有田。
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那些趑趄在街头的
年轻的工人，全来自
武汉、西安、沪上。
四面八方来了
学生几千，活泼、聪明，
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①

五年前，沈从文曾与垂头丧气、衣衫褴褛、精疲力尽的丁玲进行过一次令人沮丧的长谈，交谈结束时，沈从文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记忆都还很年轻，你真不该把自己弄成这副未老先衰的憔悴相！”他还记得她当时的反应：她苦笑着说：“我何曾真

^① 《丁玲文集》第3卷第353—354页。

正年轻过？”^①现在，她虽然不得不跋涉差不多半个中国，丢下自己所爱的人和两个孩子，但她身处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妇女中间，与他们一起生活、旅行和教学，她又恢复了自己的青春活力。她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她自己的母亲30年前所追寻的目标：扫除文盲、消灭贫穷和废弃缠足——在西北的农家妇女中缠足做法仍十分普遍。

丁玲从写诗进一步走到演出和剧本创作。1937年末，她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团长以后，她带领30多位艺术家和作家在山西和陕西一带为军队和当地农民演出，有时是即兴表演，有时是根据准备好的剧本原稿。毫无疑问，她这时写的两个剧本表现的都是抗日主题：一个写的是一名中国抵抗组织的成员伪装成与日本人勾结的汉奸，以帮助他的爱人从事地下工作；另一个写的是一名被俘的日本兵，经开导了解了他自己的同胞侵略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中国的抗日事业表示同情。

具有奇特的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中日战争的爆发，给丁玲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和个人安全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仍留在华东的人来说则决非如此，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几个月里大灾难连续不断。同样在1937年夏天，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和天津；11月，上海经过激烈战斗后失陷；12月，南京失陷。到1938年秋，日本人已经巩固了对中国东北各城市的控制，向长江推进，夺取了武汉三镇，并占领了广州。战争的最初16个月是以中国军队的惨败为标志的：蒋介石下决心要努力守住他在华东和华中的主要基地，曾投入了许多精锐部队，常常命令战斗到最后—

^① 沈从文《记丁玲续集》上海1939年版第185页。

兵一卒，来保卫上海和南京。中国军队在这些战斗中损失了 35 万多人。1938 年，在坚守武汉周围的环形防线的战役中又损失了 70 万人。平民百姓的伤亡人数也很多。好几万人由于蒋介石的指挥官们作出的军事决定而丧生，例如，炸开黄河大堤，淹没华北平原，以阻止日本军队前进；又如，烧毁长沙全城，以免可用物资落入敌人手中。但是，由于日本军队的暴行而伤亡的人数更多。仅南京一个地方，在 1937 年 12 月的 10 天时间里，日军大肆掠夺和屠杀，估计有 30 万中国人被杀害，好几万妇女被强暴。

日本军队的节节胜利迫使数百万有选择能力的中国人马上做出到何处去生活的决定。当时存在着四种可能性：日本人占领的华北，北京已经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由中国人控制的傀儡政权；华中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南京为基地的另一个傀儡政权（1940 年以后由前国民党领袖汪精卫领导）统治着包括上海在内的大部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中国西北部，陕西延安的共产党根据地——现在被称为边区政府而不是苏维埃政府——已扩展到相邻的甘肃省和宁夏省并深入到山西和河北两省；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政权中心在蒋介石的战时陪都四川省重庆。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落脚点的选择是由个人的从属关系或思想倾向决定的：鲁迅的弟弟在日本受的教育，又娶了日本女人为妻，他决定呆在北京家里，继续他的写作和学术生涯，直至战争结束：虽然南京几乎被毁了，但上海仍是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天然避风港，也是那些金融方面的利益集中在这里或在该地区拥有地产的人的避风港，甚至在 1942 年国际租界也被占领以后，这个城市仍是活跃的知识分子基地，一批有才华的作家生活在这里，为热心的读者们写作。

对于左翼作家和共产党作家来说,不论他们曾是鲁迅的朋友还是敌人,逃离上海并前往延安是合乎逻辑的,在延安,他们很可能会受到欢迎并得到提升。但是,周扬到延安后获得的殊荣——他甚至被任命为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可能足以使几位一直是鲁迅密友的左翼作家不去延安,而到重庆或国民党控制区的其他地方碰碰运气。冯雪峰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是共产党诗人,曾帮助丁玲逃脱国民党的囚禁。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一直被以前的同志骂为托派分子的陈独秀,说什么也不去延安,甚至在毛泽东派特使催促他到西北来之后,他也不去。相反,他宁愿住在重庆上游一个偏僻的内地城镇,尽管他的两个儿子20年代被国民党处决,他本人也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五年时光。

闻一多和老舍也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选择,尽管他们俩的职业和志趣来了个大调换:闻一多为了好好教书而放弃了写作,老舍则在《骆驼祥子》一书获得成功之后,放弃了教书工作,专心于写作。

闻一多曾激烈地公开谴责过日本帝国主义,也指责过共产党,因此对他来说,除了去中国的中部或西南部的某个地方之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尽管他对国民党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自1928年以来,闻一多感到生活很平静,经济上有保障,因为他一直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先是在武汉大学,然后是在青岛,1932年后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他本人在1922年到美国留学之前,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现在把精力集中在早期的道家著作和唐诗上,还有屈原所作的从公元前三世纪流传下来的组诗上,这些组诗给人印象极深但晦涩难解。闻一多成为受人欢迎但有些古怪的讲师:他总是身穿青色长袍,一头浓密的头发,平易近人,不

拘礼节，上课时不仅自己吸烟，还请学生们吸烟，傍晚时分开始讲课，一直讲到深夜。学生们如果问他为什么不再写诗了，他就叹息地说，他不能再写了。但是他写了许多诠释古诗的文章。他变得对政治很冷淡，对1935年12月9日的游行示威视若无睹。1936年他告诫他的学生要坚持他们的学业，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政治鼓动上。

1937年7月之前，闻一多一直坚持这种态度。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逼近北京的时候，他才匆匆忙忙把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另外三个孩子在内战期间夭折了）送往武汉附近他父母家中，希望那里是个安全的地方，而他则留下来收拾他的书籍和文稿，把他曾在里面过了几年平静生活的房子关了起来。7月16日，就在他妻子离开之后不久，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生动地表达了他此时的悲苦心情：

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人在屋里，静极了，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①

7月晚些时候，闻一多也离开了北京，回到武汉附近父母家中与家人团聚，但是没多久，他又不得不离开家人，继续南下到长沙，因为他的清华学生与北京另外两所大学的逃难学生在长沙会合

^① 《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643页。

在一起,并校开课。

1938年初,当日本军队逼近长沙时,这所大学被迫再次迁移,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合并,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昆明市成立联合大学(简称“联大”)。男学生得到指示要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而女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乘火车完成这段旅程,——乘火车南下到越南海防,从那里可经印度支那一云南铁路再折回云南,这样便到了昆明。然而,闻一多虽然属于教职员工,却愿意与他的学生一起徒步跋涉。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是他的新生命的开端。1937年和1938年间,许多中国人都进行过横跨中国的长途跋涉,这些长途跋涉使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宏伟壮丽和幅员辽阔,虽然没有1934—1935年共产党人长征时那么危险可怕,但其艰难辛苦程度有时几乎与长征时不相上下。闻一多同这些中国人的感受一样。他们的旅行从1938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用了整整68天的时间。本来七百英里的直线距离,他们几乎走了1200英里,因为沿途他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涉水渡河,闻一多通过旅行开始再度了解国家的艰难困苦,1927时,他已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闻一多和他的学生横穿湖南省西部,经过沅陵城(沈从文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碰巧沈从文在那儿,他是为了躲避东部战事而回来的。他接待了闻一多和随他一起旅行的两百多名学生,帮助他们准备几天的食物和住处。闻一多也像沈从文一样学会了赞赏本地的苗族人并努力了解他们的文化。许多年以来,他第一次重提画笔开始写生,并利用休息时间向学生们作即兴讲演,详细介绍他们所经之处的神秘传说和历史。20年代,沈从文曾从他军队中的几位朋友搜集的六百首苗族歌谣中精选了一本集子,把具有某种典雅、睿智和野性特点的苗族民歌介绍

给了北京文坛。现在，闻一多的一位学生从这些地区以及贵州和云南两省更靠西南的地区，收集了两千多首歌谣，准备把它们整理出版。

闻一多和他的学生学会了有控制地限量分发难得的食物，学会了在完全没有额外的食物补给的村庄中支持下来，也学会了控制容易爆发的脾气。他发现了比他 1927 年在湘鄂战乱时目睹的更为严重的贫穷和保守：年轻女子穷得衣不蔽体；男人们弯腰弓背像牲畜一样驮着庞大的货物；山坡上种满罌粟，有土匪巡逻看管着；孩子们没有受过一丁点儿的现代教育，仍在对着孔夫子的木牌磕头，同时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儒家经典。

到达昆明后的头几个月，闻一多需要奋力解决许多问题。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这个城市，房租暴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很匮乏。开水代替了茶水，难得有喝茶的机会。以前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的闻一多，现在发现几乎一支烟也得不到了。由于食品价格上涨，他当教师的薪水眼看着越来越入不敷出了。学校本身没有固定的校舍，不停地搬来搬去，以便腾出他们的设施供需要它们的军队或其他单位使用。有一段时间他们在一片荒凉的坟地里扎营，睡在草棚小屋的泥地上或者蜷缩在地下的洞穴里。一些人兼职做运水或看门的工作，另一些人为了来钱容易，开始干起走私的勾当，令闻一多深感忧虑。1938 年夏闻一多写给他妻子的信，满篇都是这样一些事情的详细叙述：不顾一切地拼命找钱和迫不及待地渴望看报，想知道随着日本人向东和向南进一步挺进，哪些铁路或公路还在通车，哪些机场还有客机起降，哪些城市还可以安全居住。

虽然闻一多和他妻子的婚姻是 20 年代初由父母包办的，但很显然他们互相爱慕、情爱甚笃，这也表明了古老中国的某些因

素在新的社会中仍多么有价值。与此同时,他们的榜样也使我们想起了在这个不受束缚的变革世界中心灵受到伤害的其他受害人:蒋介石的原配夫人被遗弃,因为这样蒋介石便可以与宋美龄结婚;鲁迅的第一位妻子还在北京与她的婆婆一起生活的时候,许广平已在照料鲁迅的婴儿并负责他的著作权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带着他们唯一的儿子生活时,徐志摩的第二个妻子陆小曼正在编辑他的日记。至于闻一多,至少他在昆明市周围寻找着仍有房子可租的村庄,思忖着一次打击会落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他的妻子重新团聚,以便他们能够“一同吃苦”。闻一多在给他父亲的信中万分焦虑地恳求他的父母重新考虑他们安土重迁、不离开祖籍的决定。唯一的难题是决定去哪里,随着战事的扩大,哪里能找到安全的栖身之处。那年9月,闻一多到铁路的终点站贵阳去接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接到后与他们一起返回昆明,同行的还有他的弟弟及其家人,他们11个人搬到昆明西北面的一个村子里,在一个驮马站上面的两间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像学生一样睡在地板上,用的餐具和家具都是借来的。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就像丁玲在延安一样,闻一多工作更积极了,身体也更健壮了。他的身体活力和爱国热情重新焕发出来。这种爱国热情在1926年3月北京示威游行期间激励过他,但自那以后一度泯灭过。现在在战时的昆明,有一段时间文坛上不再有激烈的内争,只有如何搞到足够的东西填饱肚子,如何躲过日本飞机的轰炸活下来——有一次闻一多从学校接孩子们回家,就差一点被炸死——以及如何在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条件下完成自己的基本教学任务的问题。闻一多虽然不再写诗,但他仍可以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表达他对一个新的中国的感

情，他的学生们从长沙到昆明沿途搜集的苗族歌谣的出版，为他提供了一次这样的机会。1939年3月，他在为这本书作的序中写道：“你说这[歌谣]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闻一多接着指出，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非常需要的最后机会，来证实一下自己有没有动物的原始血性。闻一多用1919年梁启超从巴黎写信给他的朋友时所说的话宣布：“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个地面上混下去了。”^①

老舍经历了非常相似的思想变化过程，虽然与闻一多不同的是，他最后使自己的爱国热情社会化了。1937年夏末，老舍逃离他在山东的家，朝西南奔去，到了国民党战时临时首都武汉，与国民党势力为伴。1938年春，他在那里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席并担任协会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的编辑。他之所以能够担任这些职务无疑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了“大家夫司基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也毫不留情地痛斥了对穷人的剥削，这样，无论是拥护共产党还是拥护国民党的人都对他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刚正不阿表示钦佩，对他抨击了对手一方感到满意，而不管他是怎样批评自己一方的。他的职责就是在为中国抗日战争而努力的口号下团结各个年龄的作家。为了这个目的，他勤奋地工作着，先是在武汉，

^① 《闻一多选集》第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353页。

1938年夏,日本军队进逼,他跟随国民党撤离武汉,来到重庆。他一面努力维护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使之团结一致,一面还以身作则地奋笔疾书,写了一系列旨在鼓舞士气和民心共同为中国的抗战而努力的爱国剧本和歌谣。但是在这些明显带有宣传性质的文学作品中,他早期作品中的热情奔放和讽刺幽默受到了抑制。当他试着发挥过去的优势返归小说时,他的情况甚至更糟糕。他于1943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火葬》,显而易见是要贬损与日本人勾结的中国人,并指出,即使他们慷慨陈词,自称是为了挽救自己同胞的生命,他们也只会被更加阴险毒辣的汉奸所取代。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忠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身上,他们会坚持不懈地奋战到底,直到把侵略者从中国土地上赶出去为止。老舍在《火葬》写的序言中表达了他对这部小说感到的不安和不满。他坦率地指出:“象《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他承认,他对所有战争技术方面的问题,例如,战术、武器和运输等均一无所知。他又补充道,他甚至对他现在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也不大明白。那么,“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①

在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漫不经心的议论中,老舍强调了重庆的生活存在的深刻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1938年以后整个国民党占领的“自由中国”地区的生活存在的问题。经过1938年的血战之后,日中双方军队都疲惫不堪。由于各方都企图重整旗鼓,恢复元气,为下一阶段的较量作准备,所以他们慢慢进入了不稳定的相持时期。这时,中国方面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作战飞机和重型军事装备,把基地设在了工厂少得不能再少的贫

^① 胡絮涛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83、84页。

穷的内陆地区，主要靠缅甸公路从西方得到一些可以得到的补给。因此，他们不可能向日本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在这样一段武力对峙的平静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旧仇又开始萌动。宣称效忠不同对象的游击队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共产党人从他们的根据地延安稳步地向外扩展地盘，在敌后建立一系列边区政府，鼓动原先忠于蒋介石的北方军阀的军队反叛，从而扩充自己的军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每个党都试图利用情报人员向对方的组织机构渗透。国民党发言人宣称，共产党人正在肆无忌惮地利用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共产党人则坚持说，他们被剥夺了基本军需品的补给和在政府中的有效发言权。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声称在安徽南部地区作战的共产党军队不服从命令，公然袭击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杀死数千人。几个月之后，延安根据地遭到来自西北的中国回族部队的攻击，这显然是国民党授意的行动。一个由属于许多第三党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极力主张重建某种形式的民族复兴同盟，迫切要求重新召开原来的国民参政会，以恢复一定程度的团结。1941年3月，他们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他们并未实现成功弥合国共两党裂痕的初衷。到了1941年12月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在重庆建立以约瑟夫·史迪威为首的美军作战指挥部时，中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出现了破裂的迹象。

这种局面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对重庆发生的一切，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在看法上截然不同：西方政界领袖和专栏作家们很赞赏“自由中国”，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的真正领袖，可以将他的国家视为抗日战争中的主要同盟国之一，但中国国内的批评者则猛烈抨击战时陪都重庆的混乱不堪、政府办事效能低劣而且

官僚习气浓厚,抨击军队管理不善,抨击伴随着美国给蒋介石政府的巨额贷款的核算和支付而来的明目张胆的贪污腐化,还抨击国民党重设审查制度,进行政治恐吓,矛头直指任何被怀疑为“左派”的人士。闻一多的一位学生在闻一多前往昆明前后搬到了重庆,他与从前的老师经常保持通信联系。他在一首题为《捉》的诗中运用简洁的语言,令人胆寒地生动描绘了当时这方面的情况:

末了,微弱的反抗
象一只雀子
被捏在一只大手中。

杂沓的步子
响过小院落,
火把在我的窗纸上
恐怖地一闪,
一个老太婆凄厉的哀号
象投在黑暗大海里的一块石子,
激起来的波纹,
渐渐远,
渐渐渺茫……^①

其他作家则力求在他们的诗作中表现狂热、冷漠和受到腐蚀的半西方化道德风尚交织在一起的战时重庆。在这方面,袁水拍

^① 《臧克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07页。

的《标题音乐》特别成功。他运用蒙太奇手法把流行的政治口号、广告用语和报纸标题剪辑在一起，以纪念1941年夏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惊慌失措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抢占隐蔽处时被踩死的数百名难民。这首诗没能在重庆发表，最后是在香港发表的，这一点都不令人吃惊。诗中写道：

七天七夜车顶上吃睡拉
隧道口扫下了一百三百
大火，大火，大火
尸体，尸体，尸体
 壁上春光半露
 勇士攘臂直前
 大腿，大腿，大腿
 曲线，曲线，曲线
火光里突出的眼睛
眼睛里冒出的火焰
城市跟着城市，铁路线
乡镇又乡镇，小径和骑兵
 快乐无疆，明月重圆夜
 挤掉帽子者大有人在
 如遇警报，全部五彩
 头奖硬是在此，发财请早
吃紧，吃紧，吃紧
看涨，看涨，看涨
四十万万元在金潮里打滚
变，不变，莫谈国事

支支宏壮悠扬
 场场歌舞美妙
 为慰劳从军同学而歌
 为救济后方难胞而舞
 ……^①

很明显，延安从与重庆的对比中获益匪浅。透过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抓住某种更为清晰、明确的中心环节，这种鼓舞人心的观念在延安的共产党社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观念不仅鼓舞了像丁玲这样奔赴延安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且鼓舞了几乎所有设法来到共产党根据地参观访问的西方记者和军事人员。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可供享受的奢侈品根本没有——丁玲曾经有过一罐咖啡，就是这件事成了很长时间里人们谈论的话题；另一部分原因是，在采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了灵活性并且讲求实际。此外，尽管延安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但是它欢迎几乎所有的中国盟友（不论属于哪个阶级）参加抗日斗争。毛泽东本人在30年代末的著作中强调了需要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需要了解每一个特定环境中固有的矛盾，并颂扬了自清朝末年以来国民党在其领导的30年中所做的创造性工作。毛泽东强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但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应当对可能出现的最为广泛的各种力量进行研究：如果中国人不想成为“一个西班牙的唐·吉珂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Q”

^① 袁水拍《马凡陀的山歌》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5—16页。

的话^①，那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丁玲此时的感受可以从她1939年写的一篇故事中出现的共产党根据地两位女子之间的简短对话中看出来：

[刘素说:]“因为你是那么愉快,使人摸不清,薇底,一切生活的困恼,似乎从没有影响到你似的,你是在什么地方养成这一种心情的?”

“你以为我都是这样的吗?我从前忧愁得很呢,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呢。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存在。我还能不快乐么?……”^②

然而,到1940年的时候,这种乐观的气氛越来越难以保持下去了。1941年新四军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牺牲了很多共产党士兵,这是一次严重挫折,正如1940年间共产党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后,日本进行疯狂反攻,使共产党遭受挫折一样。日本人开展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有一个可怕的名字叫“三光”(即“烧光、抢光、杀光”),他们试图利用恐怖手段,有计划地根除华北的中国抵抗力量。无数的村庄被摧毁,村里的平民百姓要么被枪杀,要么被运到满洲国的日本工厂去做工。虽然对这种恐怖作出的一种反应是源源不断的新成员补充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但各种事态的发展仍迫使共产党的领导层重新考虑他们的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社1944年版第127、128页。

^② 《丁玲文集》第4卷第111—112页。

战略。尤其是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加上断绝了财政援助,导致了大规模通货膨胀和供应短缺。加强党的道德规范和纪律的需要成为当务之急。党的领导人开始重申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强调需要加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团结。

丁玲和其他人一起感受到了这些压力。1940年以后,她不再写那些情绪高涨的抵抗故事了,前两年她一直忙着写这类故事。有一件事堪称奇妙的巧合——这件事也许有助于说明她情绪上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这就是她和她的一些朋友那时得到了瞿秋白愤世嫉俗的遗言《多余的话》的抄本,并对它的寓意争论不休。丁玲非常了解瞿秋白,虽然其他干部否认这份文献的真实性,但她确信,它就是瞿秋白写的。在1940年和1941年间写的一组四篇新小说中,丁玲开始深入探讨她在令人振奋的延安共产主义外表后面看到的苛刻、虚伪和幻灭问题。其中一篇小说《入伍》写的是一位新闻记者渴望共产党根据地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最后终于有了真正吃苦和需要勇气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通过这种他梦寐以求的机会使自己充实起来,相反,只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它绘声绘色地写下来,夸大他自己的作用。另一篇小说题为《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一位姑娘被日本人劫持,一再被强奸,直到她因屈辱而得病并因患性病而身体不支为止,后来她被共产党人说服,继续与日本男人幽会,以便使党的地下工作者能够获得至关重要的情报。由于无法公开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位年轻女子自然免不了受到同村人的中伤和怀疑,但是她对党的医生最后一定会治好她的病从未失去信心。第三篇小说《夜》写一个人一跃而成为乡下的负责干部,他不想担任这个职务;他有一个比他大得多的老婆,没有孩子的婚姻令他十分不快;他担心自己在性问题上遭受挫折,还担心自己政治上不能

胜任新的工作；当他的老婆对他的冷淡愤怒之极，呼呼地捶打着他们的床边时，他满脑子里想的是，她可能会把摆放在那儿的家里用来孵豆芽的缸打破，他是很喜欢吃豆芽的。

如果说有人可以从文章的讽刺性结尾中看出瞿秋白《多余的话》最后一行的回音，并认为这种回音应当受到指责的话，那就是她的第四篇小说《在医院中》。这篇故事写得最为坦率，记录事实最为细腻，最终对党造成的损害也最大。因为在这篇描写一位渴望参加革命工作的年轻女子被派到延安根据地的一家小诊所去工作的故事中，丁玲向人们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共产党人的无情和无能造成了从理性角度讲与外面的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没什么两样的形势。丁玲承认战争时期任何根据地医院都存在设备和服务短缺这一现实，根据地医院里没有煤生火，没有清洁的被褥，整个医院只有一个皮下注射针头，几乎没有麻醉剂或一般药品，但是，她所补充的看法是，由于干部们以及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的特殊态度，使这种状况更加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那些最忠于职守的人慢慢地被弄得心灰意冷、不再作声，要不然就是被迫加入发狂般的抱怨行列，最终是自己拆自己的台。故事的结局的主人公——一位名叫陆萍的年轻护士要求调到另一个单位并得到准许。

陆萍的入党动机非常含糊，她自身党的纪律观念淡薄，这在陆萍到达根据地医院后不久的一段内心独白中表达得非常清楚。当党命令她放弃自己想成为一名高级官员的希望，中断她的大学学业，到远离城镇的地方当一名护士时，她对这种做法的反应是：

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

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动摇那主任的决心,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她要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又重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助产婆,或者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①

丁玲把护士陆萍思想深处的混乱和恐惧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帮助做完一个拖了很长时间的手术之后,她终于晕倒了,因为手术小组工作的窑洞中积满了从煤火盆冒出来的炭气。她躺在床上,哭喊着,发着烧,只希望能再回到她母亲身边,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才好:

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肯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

旧有的神经衰弱症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

① 《丁玲文集》第3卷第249页。

支部里有人在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帽子都往她头上戴，总归就是说党性不强。

院长把她叫去说了一顿。

病员们也对她冷淡了，说她浪漫。

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①

这不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问题，丁玲在此时此地不该提这样的问题，即使是通过虚构的人物提出来也不行。如果她做出肯定的回答，就像她似乎已在暗示的那样，那么她就是在提出某种挑战，党不会对这种挑战置之不理。

① 《丁玲文集》第3卷第262页。

第十一章

整 风

1942年,丁玲的处境很危险,延安其他作家的境况也大致相同。丁玲的一位朋友坚持她的批评态度,写了一组纪念鲁迅的杂文——杂文是鲁迅临终前几年里习惯采用的一种文体,篇幅短小,语言犀利,属于批评性的散文——对党的某些作风进行了嘲讽。延安其他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效仿。早在1941年春,丁玲就被任命为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此时,她积极鼓励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这种倾向:

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

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

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①

一些作家作出回应，说延安与重庆同样存在着黑暗，干部们正在给他们企图压制的对象造成“创伤”；鲁迅的“匕首”已经在泥土里生锈了，必须把它挖出来重新磨出锋刃。另外一些人则撰文说，共产党并未根除腐败和冷漠，党的领袖们享受着各种特权，他们脱离了群众和广大青年。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中已享有盛誉的年轻的满族作家，1940年来到延安，他在延安作家们的论点又迈了一步，声称“同志友爱的醇酒”在延安正被“冲淡”，而某些过分热忱的干部的行为，就像脚穿钉鞋的赛跑者，在参赛对手们的脸上“猛踩”。到了1942年1月，萧军开始重弹“个人英雄主义”（徐志摩曾一度热衷于此）的老调，主张所有的人都应该“强化自身，力争第一”；尽管萧军也把马克思和列宁摆入他本人设定的先哲圣殿之中，但他写道，他觉得马克思和列宁所以值得爱戴，是因为他们“真正称得上是诗人”，他们可与荷马、苏格拉底、拜伦、贝多芬和罗丹相提并论。

更为尖锐和敏感的是丁玲于1942年3月发表的题为《“三八节”有感》的文章，文章在详细介绍国际妇女节的来龙去脉时，向人们显示了延安妇女的状况。国际妇女节首创于1910年，中国于1942年第一次设立此节日。尽管事先党的中央委员会曾作过指示，要求庆祝国际妇女节时重点应放在庆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中国统一和颂扬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但丁玲未予理睬，仍我行我素。她写道，延安妇女的境况可能确

^① 《丁玲文集》第4卷第383—384页。

实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要好一些,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必要过分地嫉妒她们。实际上,由于她们周围的男人们用双重标准看待她们,妇女们依旧过着很艰难的生活。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

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地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诬蔑。)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①

丁玲接着写道,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延安社会上有一种压力,迫使妇女们放弃党务工作,去结婚,生孩子,而被逼着带孩子的妇女即被讥讽为“回到家庭里的娜拉”;如果她们把孩子临时托别人代办照看,自己每星期出去跳一次舞,那么到处都会出现关于她们的绯闻。一些已婚的妇女试图不怀孕或设法堕胎,或者找一个专职保姆,以便她们能重新从事政治工作,但如果她们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指责为“落后”。离婚也不是办法,这对男人很容易,女人若是离婚则常遭非议。一个女人的最终命运,丁

^① 《丁玲文集》第4卷第388—389页。

玲说，不论她“落后”与否，生活的自然法则都是不变的，只有名称的变化表明她们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在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丁玲呼吁党在妇女问题上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①

两个月以后，据传毛泽东取消了与丁玲等人合影的计划，并留下了一句讥讽的话：“我们不要再在三月八日那天让人指责了。”实际上，这时共产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已近尾声，而且正如后来事态发展的那样，此后将近40年里，丁玲再也没有写过如此坦率的文章。

1942年整风运动的预定目标是改善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大量难民涌入延安，党员人数急剧增

^① 《丁玲文集》第4卷第390—391页。

加；同时延安承受着来自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的巨大压力，这些都要求党整风以自强。整风所依据的基本策略是毛泽东在20年代末江西苏维埃时期初次试验的方法，即通过同级组织的压力和强化学习，而不是通过清洗或人身暴力的途径，努力解决党内矛盾；在1939年至1940年间，延安地区有四千名学生和干部经过指导，阅读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论著以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1942年初，毛泽东宣布要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主要针对两类问题：一是官僚主义方面，目标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二是文化方面，目标是克服“写实主义、感情主义和讽刺主义”。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讲演，为这次运动确定了基调：整风运动有两重性，既可以看作是针对萧军和丁玲所批评的那些干部，也可以看作是针对丁玲和萧军自身，甚至也可以看作是针对那些只读过几本书，既没有种过田、打过仗，也不了解革命理论真谛的人。毛泽东指出，“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不漂亮，也不神秘，但它极为有用。”他接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像箭和靶的关系。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样，“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放出去，也毫无意义。然而，在中国革命所经历的这一阶段上，毛泽东宣称，既不能责怪弓箭手射技不精，也不能埋怨他对箭的实际作用缺乏理解：“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①

毛泽东对延安知识分子缺点的批评，激起了这些知识分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8页。

强烈反响。丁玲为三八妇女节写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这种反响之一——共产党的干部们已经宣称妇女问题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整体团结利益，在这种形势下，她仍然坚持男女平等的主张——但也有许多其他反响，这些反应丁玲大多数都在《解放日报》的文艺栏中予以发表了。或许言辞最激烈的要数王实味了。王实味是一位共产党的活动家，20年代曾在莫斯科学习，因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小有名气，当时正在延安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担任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教员。他以《野百合花》为题，分两次写了一组文章，丁玲在1942年3月中旬的《文艺》副刊上先后予以刊出。王实味的文章主要哀悼一位在1928年被国民党处死的年轻女友。他把她的政治热情与活动环境和延安干部的自满情绪作了对比，指出延安的干部们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干部处境好得多，他们根本没有动不动就被杀头的危险。王实味说，他的文章以“野百合花”命名有两下原因：第一，延安周围生长着很多这种花，用它来寄托对友人的纯洁的追忆十分合适；第二，据说野百合的球茎吃起来味道极苦。王实味说，那些尝过野百合球茎的人称这种东西有药用价值，（显然是暗指毛泽东一个月前的讲演），“但我本人对此不太有把握”。如果说延安是茫茫黑暗中一盏罕有的明灯——王实味也承认，总的来说，的确如此——那么，在认识到这种黑暗无法规避之后，就完全有必要“防止它在布尔什维克行动主义的幌子下再度蔓延”。

到了4月，批评的风暴结束了，丁玲被撤销了编辑职务；5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要求延安的知识分子端正态度，面向党和读者，此后，作家和干部们都被召集去参加一连串的会议，有的是小组会，有是则是公众集会。经过三个星期的辩论之后，毛泽东第二次发表讲话，就文艺的作用问题详尽地阐述了他的

观点。毛泽东从自己的直觉出发,认定具有生命力的是“大众”文化模式,这种观点也是受了苏联理论家们和瞿秋白晚期作品的影响。毛泽东提出,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内,作家们今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文艺要面向群众,其阶级立场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基于这一点,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向工人、农民和战士们学习,然后普及工农兵所需要、所容易接受的东西。尽管有的人可能学过古人的或外国的文学,但这些文学绝不能毫无批判地一概照搬过来。人民群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此,超阶级的“人性论”是根本不存在的,某些作家主张超阶级的真正的人性,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毛泽东强调说,如果延安的知识分子不想成为“鲁迅在遗嘱中叮咛他的儿子不要做的那种无用的作家或艺术家”,那么知识分子必须坚决地“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①在谈话的另一段,毛泽东针对丁玲1941年提出的需要坚持写鲁迅式的杂文以及坚持杂文所激发的精神,专门指出: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艺术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页。

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①

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四天之后，5月2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接连不断地召开会议，专门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他的其他作品。到6月初，这些会议已变得更像是群众大会，常常有上千人或数千人参加。王实味受到指控，因为他曾宣称“政治服从艺术”，文学能展示人性的各个方面。他提出要退党，但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甚至当墙上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宣布他是托派分子时他仍不改初衷。党内有一些人很不喜欢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迫于这些人的强大压力，丁玲也参加了对王实味的批判；6月10日，中央研究院宣布王实味为“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并开除了他的党籍。从此，王实味不再公开露面了，据说，他开始“潜心研究政治问题”。（20年后毛泽东透露，王实味已于1947年被处决。）

丁玲虽然批判了王实味，但仍然自身难保。对她的攻击越来越不堪入耳，其中的一些文章还登在了《解放日报》上，这些文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2页。

章说她就像是《在医院中》的人物陆萍；而这篇小说本身也受到指责，说它忽视群众，而且采用的是过时的写实手法。联系到毛泽东5月23日的评论，有人说，丁玲错误地运用批判的工具反对共产党员。就在给王实味定罪宣布的第二天，丁玲让步了：她承认对她的指责都是正确的，她还补充说，她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尽管她的文章是“血与泪的倾诉”，但她的态度代表的是一种延安落后的女权思想，在延安，阶级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必须超越性别之间的差异。

丁玲原来在妇女问题上坚持力争，现在则让步认错，这两种态度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当代“娜拉”作用的讨论。至少有一位作家认为，秋瑾是真正的娜拉，为了前途未卜的革命活动而放弃家庭。其他人则指出，延安的娜拉，至少应认识到，对群众负责是实现她自身真正个性的根本的先决条件。对于丁玲的问题，暂时未作定论：6月底，她奉命离开延安，到乡下去向农民“学习”。途中，朱德总司令鼓励她写一部长篇，描述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朱德把丁玲请到他设在桃林的司令部，给她看了一些战报。丁玲受命写的作品名为《十八个》，发表在1942年7月9日的《延安日报》上。几天以后，她离开桃林到乡下工作，在那里一呆就是两年。

就在丁玲被迫离开政界和文化圈的两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人进入东亚战场作战（按照中国人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7年，即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不是1939年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或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并没有给蒋介石带来他所期望得到的那么多

好处。尽管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派史迪威将军率一个军事顾问团来重庆，还承诺以借贷方式向中国供应大批作战物资，但是，在1942年春，日本攻陷了新加坡，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军队也突然惨败，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日本在东南亚推进速度的估计发生了改变。1942年夏天，蒋介石的军队没能阻止住日军在缅甸的推进——史迪威将军对此大为光火——结果导致滇缅公路的关闭，中国最后一条出海通道也丧失了。从那以后，蒋介石可望得到的物资供应已少得可怜，这些物资只能通过险象环生的被称为“驼峰”的喜马拉雅山空中航线，由印度运到中国的大西南。邱吉尔和斯大林自然优先关注对德国军队的战事，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对付隆美尔将军在北非战场的德军以及斯大林格勒的防御，而不是中国的战局；此外，由于罗斯福总统本人也把重点放在西欧，所以他接受邱吉尔的请求，把原定供应中国的作战物资都转运到欧洲。蒋介石认定史迪威应该对美国的这种“背信弃义”负责，同时对史迪威打算彻底改变国民党军队的战术训练及指挥结构也十分不满，所以他转而接受陈纳德将军的建议，即中国要设法在空中战胜日本，而不是在地面较量。在中国西南新建几个主要机场，中国飞机从这里起飞，可以轰炸日军的供给线，但建造这些机场往往要花费惊人的人力和巨大的代价，而且预计到1944年日本将出动40多万军队进行反攻。日本人已占领了长沙、桂林，最后攻占了战略重镇贵阳，从而对重庆构成了威胁。蒋介石的军队伤亡了20多万人，而且士气低落。

与此相反，在1943年底到1944年，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却取得了长足进展。延安的领导人不断学习其他边区政府的游击战经验，而且逐步摆脱了渐进的统一战线的束缚，他们采取所谓的

群众路线政策,大规模发动农民,在贫困地区实行资源互助共享,利用小工业和手工业不断增加边区的生产,在家庭、学校和青年团体中开展工作,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理论,把抗日游击战扩展到了原来的国统区,此外还鼓动农民加入到反对地主的斗争中,要求减租。这些努力的结果,使得共产党的根据地扩展到遍及整个华北,有共产党存在的地区,总人口已超过一亿。

取得这些成就的那些共产党干部们,尽管曾被丁玲批评为无情或傲慢自大,但是,他们的工作能力、坦诚态度与献身精神,与国统区那些当政者的行为相比要好得多,那些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化与残忍人人皆知、人人皆畏。在经历了1941年的痛楚之后,共产党在边区控制物价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与此相反,国民党却无力控制通货膨胀。共产党充分认识到这种对比的宣传价值,并尽一切力量加强这种宣传。丁玲1944年夏天从乡下返回延安,很可能是由于她对外国记者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采访价值了:他们看到,丁玲在她居住窑洞外面的小片空地上种菜,自己动手纺棉纱,充满热情而且神志愉快轻松,看上去似乎是延安道路正确性的一个活生生的明证。这一时期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勤劳、谦逊、听从党的召唤,并准备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运用到动员农民抗战以及成为党的未来成员上面。她在作品中采用陕北的民间方言,放弃了早期作品中那些较为复杂的文法句式——那些句式大多数取自欧洲语法模式。毛泽东对丁玲的新作表示很满意,认为它们非常适合他一贯倡导的共产党文艺作品形式。

共产党影响的日益扩大与国民党的日益衰落,促使重庆和昆明的中国民主主义者作出了最后尝试,他们试图确立一些令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热点。这种努力的结果是1944年10月中

国民主同盟的诞生。民盟提出了一项公民自由权计划，要求避免内战，实行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主张建立代议制的国民议会。这项计划看起来似乎比 19 世纪 90 年代康有为的主张更顺理成章，但是对于国民党内大多数主战的将领而言还是过于激进了，因而民盟从成立开始，就遇到了种种障碍、监视和警察干预，甚至还时断时续地遭遇一些暴力行为。

虽然民主同盟在昆明很活跃，但可能谁也没想到闻一多会对民盟的工作大感兴趣。1944 年他已经 45 岁，学生时代的激进岁月已是 20 年前的往事，他在学术上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似乎已设法为自己营造了一种远离战争、超脱政治的生活。他一心一意地养育子女，深情地陪伴爱妻（朋友们注意到，他们总是尽可能厮守一处，他还恪守大学教书生活给他的工作的安排，出席日常会议或聚会），只接近他的学生们，此外他就完全沉浸在学术生活中，并已进入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产阶段。他正连续发表有关他所钟爱的《楚辞》——这是公元前 3 世纪诗人屈原的作品——的文章，剖析儒家的经典之作如《诗经》、《易经》等社会背景，评论唐诗，还编纂了一部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诗集。他周围聚集的也都是颇有造诣的文人雅士：他的弟弟正在昆明教法国文学；沈从文（当时正潜心研究公元前 6 世纪的古籍）也从湖南迁来，就住在他附近；另外一位朋友正研究并讲授魏尔兰和马拉梅的作品；还有一位朋友在讲授里尔克和歌德的诗作。至于闻一多本人，虽然他已决定不再写诗，但在歌词配曲方面已有所发现，他打算以此作为屈原诗歌的补充，因为他已经着手一项再现《楚辞》时代的计划，他确信，在二百多年以前，这些诗歌就已被传唱并且为人所爱了：

山坡上黝黝的竹林里，歇着一辆豹车，豹子是火赤色的，旁边睡着一匹狐狸，身上却有金钱斑点。

对面，从稀疏的竹子中间望出去，像一座陡起的屏风，挡住我们的视线的，便是那永远深藏在云雾中的女神峰——巫山十二峰中最秀丽、也最妖羞的一个。

林中单调的虫声像是我们自己的耳鸣。

蓦地一声裂帛，撕破了寂静，“若有人兮山之阿”，回声像数不完的波圈，向四面的山谷扩大——“山之阿，山之阿，山之阿……”^①

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在写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说，他对中国病症所开的唯一药方就是编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只有这样才能抚慰他很久以前在《死水》中祈求保佑的那些魂灵：“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今天外，还有二三十年前的昨天。”^② 闻一多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腐化与冷酷无情，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放弃了学术研究 with 诗歌的重新创作。到1944年，他的三个儿子都长成十几岁的青少年了，随着日军在中国西南的节节胜利，中国的征兵也越来越频繁，闻一多也越来越为孩子们未来的生活担忧。近几年来，他自己的学生们基于不同的信仰一直在分裂，一些投奔延安，另一些赴重庆，他知道，中国的青年人正在被迫走入一种终将自相残杀的处境，而不是协力同心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闻一多开始注意昆明城外的应征新兵，他们被拴成一串，有的倒在路边奄

① 《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328—329页。

② 《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638—639页。

奄一息，人们得不到食物和药品，也拿不到报酬。与此同时，由于物价飞涨，闻一多自己的薪水也捉襟见肘，他每月的工资只够应付全家几天的花销；为了补贴家用，他不得不到一所中学代课，并在晚上替人刻一些玩赏性的图章，常常要忙碌到深夜。

他所在的大学里有一个小诗社，其中一位成员常到闻在昆明郊外的一间乡村小屋里做客，据他说，有一件事可能是闻先生的转折点。那是在1944年4月9日，一个晴朗的日子；闻一多领着他八岁的女儿，带着一群学生，坐在林边的一块草地上谈论诗歌，他们一起谈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回家途中，在大路附近的一座桥头，他们又遇上了一群新招募的上兵。闻一多对学生说：“我们不能不管了，每一次我都跟受刑一样，看见倒在马路边儿的那些饿死的‘壮丁’”。他叹了口气，“你们看那些捆着的，拉着，押着枪的，一个个瘦成什么样子，腿杆儿只有这么细——”闻一多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连成一个圈圈，比画着“壮丁”们的瘦弱程度。“走着走着就倒下——走着走着就倒下……”^①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闻一多发表了一系列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猛烈抨击中国儒家倡导的“中庸”价值观，认为这种观念正诱使人们接受一种“介于饥饿和死亡之间的生活”，他还指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已破坏了真正的爱国责任心。他极力主张采用西方进步的价值观，放弃那种忽视现实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古主义”，要全盘否定儒家的“盗贼”理论和道家的“逃避”思想。在7月份的一次学生大会上，他鼓动学生们复兴1919年五四精神和1935年的一二九精神。8月，他和几位同事一道，应一些军官之邀讨论中国的未来。在会上他

^① 《闻一多全集》第1册第72页。

讲道,他对中国军队的现状非常失望,痛感唯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种种问题。那年秋天,蒋介石终于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将军改组国民党军队的计划,并促使罗斯福总统把史迪威调回了美国,与此同时,闻一多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帮助支部在昆明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并创办了一份政治周刊。在知识分子的激情突然发生转变的过程中,闻一多也开始阅读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鲁迅的批判性文章以及他可以弄到的毛泽东的各种资料。

1945年,闻一多的激进行为与个人挫折感愈益强烈。中日陆战再度陷入僵持阶段:继1944年在中国西南长驱直入之后,日军现在却不得不全力以赴对付太平洋的美国军队。蒋介石利用这段时间,在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但比史迪威要圆通得多——的帮助下,改组军队并强化训练。在北方的共产党军队则通过群众教育运动和游击战术扩大地盘。在这种形势下,闻一多的反应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盟的工作中,并通过写文章促动中国人致力于国家改革。

他的做法很有点1919年五四运动的味道,那时他作为学生参加了那场运动,显然,当时提出的扫除旧文化和旧的社会价值观等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谈到自己长年专注的古籍研究,闻一多很不平静。他说,他研究这些经典的动机,目的就是在今天挤出它们的毒液,暴露它们的邪恶面。朋友们提醒说,他从前那种诗人的境界太高雅,主张也太苛刻,他回答说,“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至于室内乐演奏家,对我们来说是次要的。”闻一多此处特指的是竭力效法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中国青年诗人流派,这位诗人的“鼓吹风格”暗示要拿起武器行动。同事们又劝阻他说,他的行为不合时宜,也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他答

复说，“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你们）。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①

2200多年前，诗人屈原在被放逐西南时自杀身亡，屈原之死，曾引起闻一多的强烈共鸣，而今，似乎又成了“为求光荣而生的象征”。有人可能会猜测，当郭沫若在1945年夏访问昆明时，闻一多与他就此话题作过长谈。在此之前，郭沫若刚刚完成一部以屈原一生为背景的历史剧，也已经把屈原的一些艰涩难懂的诗翻译成白话文。此外，郭沫若是一位曾犯过错误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一度迷恋泰戈尔的诗作，在20年代中期还曾回到徐志摩的圈子中，在重庆也受过重用，曾在宣传部供职，他的来访，肯定加强了闻一多已经形成的想法，即中国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国民党军队的缓步改组，以及他们制订的最终重新统一中国的计划，预示着日本可能会在1946年崩溃。因为中国人当时根本不知道原子弹的研制情况，谁也没想到日本会提前投降。所以，在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后，1945年8月中旬，当裕仁天皇命令在华日军放下武器的时候，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根本没有任何接受日军投降的准备。这样一来，共产党军队就填补了空缺，他们既接受投降，又缴获日军的武器和装备，共产党武装了自己的军队，并命令部队开赴满洲，抢占了日军留在那里的财产。美国从中斡旋，先是赫尔利将军，接着是马歇尔将军，经过努力，终于在1945年底把毛泽东请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双方经过谈判，同意在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与作为“第三势力”的各民主党派

^① 《闻一多全集》第1册第75页。

一道共同商讨中国的前途。闻一多在昆明拼命工作,不停地讲演、写文章,为的是确保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但他的努力很快受到了打击,接着又变得日益危险了,因为蒋介石决定将战时各地区的指挥官——其中一些人一直赞同统一战线的和解政策,对政治上的不同主张持温和的宽容态度——全部换上政治上对蒋本人绝对忠诚的人。蒋介石的决定在昆明立即引起反响: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而成群结伙的歹徒穿上便衣扮作苦力,连吼带叫冲入校园,砸窗户,毁设备,殴打联大的学生,甚至还有扔手榴弹的,有三名学生和一名音乐学校的教师被炸死,另有一名学生被炸掉了一条腿。为了向当局抗议,学生们把这四位“烈士”的棺木摆放到大学的图书馆里,周围挂满了挽联,并焚香祭奠。1946年3月,昆明的学生们在为这四位死难者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宣布罢课,并迅速得到全国各地校园的响应。

1946年春末,美国的进一步调停努力宣告失败,国共之间内战再度爆发。联大的师生们陆陆续续返回到北方的母校。闻一多留在昆明,准备继续为民盟工作,并打算整理一下大学里的一些事务。同情他的朋友们担心在这种紧张的政治形势下,他继续留下来处境会很不利,于是替他在美国的加州大学谋得一席教职,但他谢绝了,甚至当他的爱妻与同事们一同恳求他前往时,他也没有同意。7月11日,在离他家不远的大街上,他在民盟中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李公朴遭枪击身亡。闻一多坚持要为李公朴举行追悼会,尽管有人警告他说这样做是迂腐之举。

他的这种坚定态度,令人想起了1922年他出现过的一次情绪激动,那是在他听说一位好友在美国的科罗拉多遇车祸身亡之后,他写道,“这个消息令我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生与死

的意义！人世间最大的难题。过去的几天里我总是神不守舍。他们说失去了自制。但是，能在如此重大的问题面前不失去自制的人，难道不是真正的麻木不仁吗？”李公朴的追悼仪式在1946年7月15日举行，闻一多亲自到场向与会者发表演讲，他赞扬李公朴的风范，并激愤地说，那些杀害他朋友的密探们，干脆把他也枪杀了罢。当天下午5点钟，他19岁的儿子来到民盟的报社接他回家，当父子两人刚刚走出报社时，一群人突然冲到街上，同时向他们开了火。闻一多头部连中三枪，当场身亡。他的儿子胸部和腿部中弹，受了重伤，但侥幸活了下来。

闻一多死后，尽管他在昆明的朋友们不敢像他在李公朴死后那样提出抗议，但这一事件迅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民盟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梁漱溟牵头。梁在20年代以擅长争论闻名，此刻已是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昆明警备区司令应对此次暗杀事件负责，尽管该案件与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人有直接联系，但苦无证据。从此，闻一多的名字在中国成了一个象征，反抗国民党高压统治，争取知识分子地位和人身自由的象征。

民盟提出的要求之一，也是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结束外国对中国内战的干涉，这明显是指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自1945年底至1946年初，美国派海军在中国北方的几个主要港口游弋巡逻，并把大批蒋介石的军队空运至满洲，目的是防止整个东三省落入共产党手中。民盟还抗议美国向蒋介石大量出售剩余的作战物资（到1946年夏已出售价值约九亿美元的物资装备）。同年12月，两名美国海军士兵强奸了国立北京大学的一名女学生，这件事顿时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他们刚刚从昆明回到北京不久，抗议的余波未

消,此时又达到了新的更剧烈的高潮,而笨拙的政府却对该女生的生活作风提出质疑,企图遮掩此事,这种做法犹如火上浇油。国民党弹压异己,美军援助蒋介石,美国人在中国横行,再加上强奸事件本身,所有这一切都汇聚到一起,深深地印在中国民众的心中。从北京兴起的抗议浪潮和游行示威迅速蔓延到其地城市: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甚至还到了台北。台湾自1895年被割让并最早引发康有为的抗议以来,此时第一次回到中国之手。商会和妇女团体也纷纷加入到抗议运动中来。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一年,国民党就似乎与过去的军阀政权一样,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而美国人则已经取代了日本人,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林彪就统率大约十万军队,从共产党的根据地北上进入东三省。林彪当时只有38岁,但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著名将领了,他不仅参加过江西的苏维埃运动,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林彪率部队抵达满洲后,立即与苏军取得联系(苏联军队是在1945年8月进入该地区的)。林彪的部队不仅接受了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还收编了原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武装。在得到大批武器装备后,中共的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抗击任何前来挑战的国民党军队,占领满洲,尤其是占据松花江以北的地区。这一年的夏末,丁玲离开了延安,她没有去东北,而是到了北京西北大约160公里处的张家口。这座城市曾经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如今是共产党华北根据地的一个要塞。在张家口,丁玲与她的朋友作家陈明和自己的儿一女度过了几个月的平静日子。陈明是她在延安工作时结识的;而她的子女,在她十年前逃离上海时分手的,现在他们终于与母亲团聚了。

1946年7月——闻一多就是这时在昆明遇害的——丁玲来到河北涿鹿附近的桑干河畔，与共产党干部和当地村民一起参加了土改工作。

在抗日战争实行统一战线期间，共产党占领区内推行的是温和的“减租”政策，而此刻的土地改革方式，则有意在极大程度上放弃了这种温和政策。1946年5月4日的一项指示对此作了详细规定，这份党内文件目的是为华北的山东、河北和山西三省确定土改方针，在这几个省份，国民党一直未能恢复影响力。（在南方，国民党的势力一般都十分强大；在东北三省，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美国空运去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苏联的军队还驻留在那里，因而很难实施统一的计划。）五四指示考虑到了不同类型的地主之间、农民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异，也考虑到了现有区域内共产党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差别。对于大地主或曾与日本勾结者，如果是罪大恶极，则予以严厉打击或处决；对于其中剥削程度较轻的，则给他们留下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其余的予以没收。在共产党势力强大的地区，对于小地主和富农，则劝说他们通过“公断和契约”，把他们拥有的剩余的土地卖给或捐赠给村里穷人，但对他们拥有的工商企业则不予触动。对于中农——这些人拥有足够自家生存的土地，但不雇用多余的帮工——将予以最大的照顾，并将他们“吸收到运动中来”，他们的土地也不予占用。所有变卖、没收或“捐赠”的土地，都将由共产党组建的农民协会分配给无地的雇农、贫苦佃农、最穷困的农民以及阵亡将士的家属。对于那些在战时逃离村庄、现在又设法回村并辛勤劳动的知识分子和地主，将采取“抚慰”态度。在共产党尚不能完全控制的地区，土地将停留在减租减息的水平上，就像当初在延安的做法一样，暂时不进行土地的重

新分配。

除了农民协会之外,其他几种群众组织也受命帮助土改。在县一级是民兵,负责保卫后勤供给线,并守护共产党作战部队攻占的地区;在乡村是地方自卫队,负责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并做好村庄的防御,这项任务要求年龄在16岁至55岁的男子全部上阵;妇女协会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帮助急救伤员,做针线活以及在当地进行妇女教育工作。当然,这项指示提出的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每个村庄的情形都不尽相同,从地主的人数、剥削的程度到佃农人数以及主管干部的办事能力,都存在着差别;但总的趋势还是越来越激进,偶尔还出现一些暴力和恐怖行为,到1947年夏天,在所有村民中间——男女村民一视同仁——进行的土地分配得到了普遍拥护,尽管中间也出现了侵占中农土地的现象。

共产党提出的这些计划,承诺给数千万一直过着赤贫日子的农民以土地所有权,即使只是小块土地,但由此而引起的紧张和兴奋情绪还是异常强烈的。丁玲立即被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戏剧性结果所吸引了,她仔细观察着穷人们的种种反应,他们时而谨小慎微,时而偏激无度。虽然没人能保证土地改革能否持久,因为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满洲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交战正酣,但是,投身到土改这一群众运动中的广大农民,却被这种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丁玲在与农民们的交往中被深深地感染了,她把这段经历当作了写作的素材。

丁玲后来回忆说,我发现我已经在深深地关注着他们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什么可爱的品质。我能极力容忍他们的缺点。我感到思绪起伏,难以入睡,我渐渐地觉得以前对土改工作的热情,现在又唤起了我的另一种热忱。许多人物涌入我脑

海里,我与他们交谈,与他们争论。有时,我心中的人物多得难以处理,而另一些时候,又觉得资料太少,没的可写。不论如何,记忆和不断涌现的想像激励着我,驱赶着我,使我紧张,令我精力充沛。我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笼罩在一种多彩的气氛中。我渴望做点事情,于是对自己说,“开始吧,别等了!”

1947年初,丁玲开始着手写一部新小说,对于那些“资料太少,没有可写”的地方,就通过大量查阅共产党干部写的土改报告进行补充。丁玲接触这些已归档的资料是经过特批的。1948年夏天,她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的这部小说以桑干河畔的农村为背景(她1946年曾在那里生活过),故事集中发生在一个她称为“暖水屯”(该村的原型是“温泉屯”)的虚构的小村子里。她不想再犯1942年批评共产党干部那种不必要的错误。在小说中,暖水屯的最大干部叫章品。他是被派去指导最棘手阶段的土改的。章品作为一位超凡脱俗的主人公出现,他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和鹿一般的速度,能只吃玉米或腌萝卜过上几个月,严冬中能睡在地窖里过夜(夜里常常冻醒几次,醒来后就起来蹦跳一阵以免被冻僵)。他作出的判断总是公正、敏锐而且充满善意的。故事中的其他干部都是平凡人物:有些人年轻而精力旺盛,经不住诱惑;许多人出于恐惧和怀疑,容易被收买。还有一位,像丁玲自己一样,放弃了在根据地图书馆里与书本打交道的工作。因为他相信“乡村是一个巨大的活图书馆,在这里能研究更现实的问题”;另一位人物名叫文采(字而含义是“文化较高的”),这个人物无疑包含着某些“自我批评”的成分,这是丁玲在延安整风期间学会的。丁玲对他的描写是,尽管他的初衷很好,但在向群众学习时太书呆子气,太拘泥于理论:

这次他用研究中国土地、农村经济等问题的名义，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来了。组织上觉得让他多下来学习锻炼是好的，便要他正式参加工作。可是到了区上之后，区上并不了解他，只觉得他谈吐风生，学问渊博，对他非常客气，也就相信了他，要他做个小组长，代表区委会，负责这个二百多人家的村子——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了。^①

毫不奇怪，文采犯了很多不得不由有经验的干部予以纠正的错误。

暖水屯的地主和村民也是形形色色的，他们在一种似懂非懂的巨大力量的吸引下，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保存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力争着。小说对暖水屯的妇女们特别做了详细的描写：一是忧郁的村妇联会主任，也是地主李之祥的老婆；一是地主钱文贵年轻漂亮的侄女；还有一位是羊倌老婆，她瘦弱、傲慢又有些泼辣，土改前只能冲她那位只知道拼命干活的穷丈夫撒气，土改给了她说话的机会，也给了她一点权力。丁玲极力避免她在《三八节有感》中表露的那种女权思想，但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仍旧活泼生动，比如她在书中写了一个老妇人，由于长年累月的穷困生活，她已变得半疯了，现在面对难以理解的好事，她兴奋得都有些颤抖了。当干部们为筹备一个斗争大地主的会议，走进一户已被分光财产的地主家里准备商议时，突然发现，这位老妇人正一个人坐在屋里的大炕上：

^①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0月北京第2版第65—66页。

几个人挤在一道了要商量一下，却找不到地方，张裕民把大家带进上边侧屋里。房子里还剩一个老太婆，她的牙缺了，耳聋了；腿不方便，却把一个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外面的群众憨憨的笑，眼泪镶在眼角上。她看见这群闯入者，呆了一会，忽然好象明白了什么，从炕那头爬了过来。头老是不不断的摇着，她举着手，嘴张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忽然像泉涌一样的流出来。胡立功刚站在炕边，便赶忙跑过去扶住她，她一下伏到了他肩上，像个孩子似的哼着哭起来了。胡立功也把她像个孩子似的拍着。她哭了一会，抬起头来，望了望大家，一手去揩没干的眼泪，一手又扶着墙壁，爬回去了。仍旧用着那种憨态把脸贴到玻璃窗上去。^①

根据有关土地改革运动的记载，从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的亲身见闻和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记述，直到20年后1947年的土改，都表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即甄别并惩处那些势力最强的大地主——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让地主们服服帖帖，再也不敢横行霸道，并在所有的乡村采取群众性的暴力行为，使地主们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服从于革命变革的进程。在这部小说中，丁玲详细描写了农民们斗争地主钱文贵的场面：

主席因念保状的时候，人们又紧张起来，大家喊：

^①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252页。

“要他自个念!”

钱文贵跪在台的中央,挂着撕破了的绸夹衫,鞋也没有,不敢向任何人看一眼。他念道:

“咱过去在村上为非作歹,欺压良民……”

“不行,光写上咱不行,要写恶霸钱文贵。”

“对,要写恶霸钱文贵!”

“从头再念!”

钱文贵便重新念道:“恶霸钱文贵过去在村子上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本该万死,蒙诸亲好友恩典……”

“放你娘的屁,谁是你诸亲好友?”有一个老头冲上去唾了他一口。

“念下去呀!就是全村老百姓!”

“不对,咱是他的啥个老百姓!”

“说大爷也成。”

“说穷大爷,咱们不敢做财主大爷啊!大爷是有钱的人才做的。”

钱文贵只好又念道:“蒙全村穷大爷恩典,……”

“不行,不能叫穷大爷,今天是咱们穷人翻身的时候,叫翻身大爷没错。”

“对,叫翻身大爷。”

“哈……咱们今天是翻身大爷,哈……”

“蒙翻身大爷恩典,留咱残生。……”

“什么,咱不懂,咱翻身大爷不准你来这一套文章,干脆些留你狗命!”人丛里又阻住钱文贵。

“对,留你狗命!”大家都附和着。

钱文贵只得念下去道:“留咱狗命,以后当痛改前非,如

再有丝毫不法，反对大家，甘当处死。恶霸钱文贵立此保状，当众画押。八月初三日。”^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只有一条十分简明的叙事线索，即按时间顺序记述。不过，丁玲通过加入一些难以忘怀的内心回忆，设法丰富了小说的美学结构。有些回忆追溯到了丁玲的童年时代，也就是她的母亲刚刚开始在学校里教书的那段日子，例如她描写暖水屯的妇女们刚刚放开包缠已久的双脚，走路摇摇晃晃，有时坐在路边揉搓脚趾，以及描写农民们控诉地主钱文贵时，都运用了回忆手法。其他一些回忆则是艺术化的：乌鸦在老农民顾涌的头上盘旋，呱呱鸣叫，并不是像鲁迅在《药》中暗示的那种愚昧无知，而是表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模糊不清，因为顾涌本来是一个辛勤劳作的中农，却被粗心地错划成富农。还有一处描写，在农民们开始大声控诉时，地主站立的批斗台上突然出现了一弯新月，令人回想起徐志摩时代的文艺争论。其他一些段落，则暗含着对共产党暴力行为的批评，例如，在干部们为暖水屯是否存在罪大恶极的恶棍值得他们去打击时，丁玲加进了一小段文字，描写一个小男孩漫不经心地玩弄一只翅膀已被撕掉的蝉。小说的结尾很巧妙，也很伤感，村民们成群结队地目送着新组建的自卫队兴高采烈地开赴前线，去抵挡傅作义的部队对延庆县城的进攻，他们看着亲人们离去，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到队伍转过一个弯，消失在视线中。读者们可能还记得，同样的描述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已出现过，那是在羊倌的妻子与他吵架继而和好之后，她在一个清凉的早晨送他到村外，直到他和他的羊群消失

^①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268—269页。

在路的尽头。

由于傅作义的部队事实上的确存在,所以小说的结尾特别具有感染力。其实,在1946年10月,傅作义下属的一股部队占领了张家口以及桑干河畔涿鹿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另一支国民党部队在1947年3月占领了延安——共产党在此之前已设法平安地撤离。这些国民党军队自然要颠覆共产党实行的土改模式,而且这种颠覆常常是通过极其残忍的暴力手段实现的。尤其是在江苏省,在国民政府首都附近重新收复的地区(蒋介石政府又把首都迁回南京),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在丁玲工作过的北方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些被批斗致死或当众受辱的地主的家属们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们把那些曾经剥夺他们财产的农民或者送进大牢,或者枪毙,甚至如许多档案资料记载的那样,活埋。

在这些报复行为中,作为丁玲小说人物原型的许多农民可能都丧了命,但这部小说却使丁玲本人重新得到认可,并在共产党内获得了比较显赫的地位。她现在已正式改正了1942年受到批评的那些错误。而且,党似乎为了表示已经完全承认并接受了丁玲思想上的变化,特地挑选她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1948年底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妇女民主联盟大会。丁玲带了许多她新出版的这部小说,先到匈牙利,然后又从那里去了莫斯科。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踏出国门。

第十二章

新秩序

丁玲在内战时期的经历与萧军形成鲜明的对照。萧军是一位年轻的满族作家，1935年曾被鲁迅视为好友，1942年曾与丁玲一道批评延安的共产党干部。1945年底，在丁玲被派往张家口参加土改时，萧军获准随林彪的大军回到他的故乡东北。在满族作家中，除了老舍之外，萧军无疑是最有名的文学骄子，尤其是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年首次发表）更是脍炙人口。这部小说描述了共产党游击队在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共产党肯定是指望萧军能成为一个得力的宣传干将，特别是在他经历“整风”之后。因此党派他担任新创办的杂志《文化报》的编辑。共产党计划使该报成为聚拢东北进步知识分子的一个中心。这项任务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国共两党的军队正为中国的前途在东北展开决战。共产党的势力在松花江以北非常强大，在南部乡村力量相对零散；而国民党军队正努力恢复对南京政权的控制。共产党认为，在这场决战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实际上不亚于东北的广大农民，也不亚于新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

萧军经过将近一年的细致准备之后,于1947年5月4日出版了第一期《文化报》,有意选在这个日子出版,实际上是暗示着要继承1919年五四运动的文化斗争精神。但是不久,那些认为这一日子纯粹是一个象征性选择的人们开始失望了,因为几乎从第一期开始,萧军就把《文化报》当成了各种论点的讲坛,批评刚刚形成的共产党文化。和在延安时一样,他现在又批评共产党干部在东北的无情与专横行为,说他们对待当地老百姓的态度就像马戏团的小丑对待观众一样,其行为既幼稚可笑,又让你昏昏然摸不着头脑。萧军写道,人们对他的表演大声地拍手叫好,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嘲弄和羞辱了。接着,他显然是针对毛泽东1942年的整风讲话,批评党滥用“主义”一词,什么“阿Q主义”、“堂·吉珂德主义”,还有一些滥造的词汇(像五四运动时的知识分子和很久以前徐志摩所做的那样),如“不好不坏主义”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主义”等等。他甚至比1942年走得更远,批评整个上改计划“严酷无情”,是“空前的盗贼行为”。他认为党重新发起的群众运动是要把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听话的机器,是要扼杀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他指责正在升级的内战是一场愚蠢的悲剧,强调要多方努力停止交战,谋求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他还谴责并批评在满洲的苏联人,他们不仅行为粗野,还把东北大批有用的工业物资运回苏联,以弥补他们在对德作战中的损失,而这一行为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的经济重建工作。

当然,萧军在出于义愤而进行指责的背后,也有一些提高自己的声望的因素,因为在此同时,他在《文化报》上发表了他个人的自传(他此时39岁),还撰文详细谈他的“大无畏”性格,并表示“绝不屈服”。他还发表了1935—1936年间鲁迅写给他的许多

信件，并加上了详细的注解。此外他还开始写旧体诗。萧军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愿接受党的严格纪律，他能继续留在编辑职务上，也许只是因为他在当地的声望——或许是党的领导人有意想看看他在这条路上到底能走多远，但是到了1948年底，党决定把他作为一个反面典型。他们发起了一场新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向那些尚未证实其忠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灌输服从思想，因为这些人是在国民党看来败局已定的时候设法加入共产党的。

萧军是一个理想的靶子，他对党所作的公开批评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铁证，说明有必要把那些曾拥护抗日的民族主义者转化到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新水平上来。1948年底开始出现了一些抨击萧军的文章，在这些文章的带动下，哈尔滨各学校、工厂甚至党员的集会，都纷纷召开“批斗会”。这种批斗会还迅速从哈尔滨蔓延到整个东北。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受命对萧军进行新一轮的批判，其中包括刚从布达佩斯回国的丁玲。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丁玲敦促萧军“改正错误，向工农兵学习，跟党走”。其他人则指责萧军企图“与敌为友”，并重新审查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认为作者没有展示农民力量是如何受“党和无产阶级”指导的，也没有讨论敌人的“阶级特征”。还有一些人批评他把17世纪的旧沙俄帝国主义与当今苏联的行为相提并论，他们质问道，他怎么竟然相信，像苏联这样一个以马列主义原理为基础的国家会成为“其他受压迫民族的压迫者”呢？萧军坚定地拒绝任何形式的公开认错，于是，《文化报》被关闭了。萧军被送到南满的抚顺的煤矿与矿工一起劳动——也许是无意中遵从了瞿秋白1923年的训诫：作家要想了解无产阶级，就应该下到煤矿里去。

到 1948 年底,东北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手里,他们还控制了山东省,并占领了河南省的几个城市,国民党在南京的垮台已指日可待了。蒋介石政府陷入窘境:劳工骚动,军队士气低沉,官僚腐化盛行,以及糟糕到极点的通货膨胀,老百姓动用了所有的积蓄,不得不背着大袋大袋的钞票上街购物,就像 1923 年德国的情形一样。

通货膨胀给工人的工资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农民的土地也产生了严峻的影响,土地现在重新由那些在战时逃离乡村或在共产党土改第一阶段被剥夺财产的地主控制了。靠领政府薪金为生的人,尤其是国立中学和大学的教师,忧虑更重。1943 年闻一多就曾抱怨说,在昆明买一斗米要花四千元法币,为弥补家用亏空,他不得不到中学代课并为别人刻图章。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最早一度与美元近乎等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二者的官方汇率也还在 20:1 左右,到了 1946 年初,通货膨胀使得法币大幅度贬值:大学教授月薪为六万元,略高于服装厂的女工,但只相当于上海工厂里的熟练木工或机械师月酬金的三分之一。到 1947 年春天,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纸币越印越多,政府职员月薪升至 20 万元;尽管如此,仍不足以支付房租和食物开销。1948 年春,公务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 310 万元,但是,如果房东不要现金而要求以米代租的话,那么这些钱连付一间小棚屋的租金都不够。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法币信誉荡然无存,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不再觉得共产党的胜利是一种威胁,甚至使中产阶级带着更多的同情心向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因为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已经降到“无产者”的状态了。一个大学教授协会曾评论说,现在他们的工资比苦力或者乡下种地的农民收入还低。

沈从文在 1948 年 12 月的一封信中表露了这种在知识分子

中普遍存在的情绪。这封信是写给一位向他求教的青年学生的。在信中，沈从文的言词也已经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发生了变化。他说，现在的政府十分腐败，各个方面都瘫痪了，而且还在继续恶化。我们这一代作家，从30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始，一直用我们的笔传播民主和科学精神，毫无私利。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尤其是在文化领域。我们的社会正在发展之中，它要求你们这些强健的年轻人作出牺牲。不论政治是否稳定，新型国家的建设都依赖于诚实勤奋的青年。你问我你怎样才能改变时局……我只能提醒你，逃避是没有出息的，既然我们要在这里呆下去，那么我们就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能再躲在旧的屏蔽后寻求保护了，我们绝不能再当书呆子。

沈从文1946年返回北京，讲授中国文学。所以他自然而然有机会估计形势，并推测局势可能对他本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认为逃离北京没什么好处，在共产党政权下可能会很安全，因为他自信他的作品不仅不涉及政治，而且在战争期间的一些著作中，实际上还批评了国民党在湖南乡村搞的所谓“改良计划”。

1949年1月，也就是沈从文写这封信之后的那个月里，国民党的傅作义将军向共产党投降，北京和平解放。共产党立即着手准备把这里作为中国的新首都。他们把党的全部高级领导人都迁到北京，并设立了一些局和部——此前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在这里永久地安家立户。丁玲是新任命的官员之一（她对萧军的批评再一次证明了她对党的忠诚），在2月份被指名作为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负责改组中国的文化界。早在1927年，丁玲和沈从文都已是年轻的作家，那时，丁玲与胡也频生活在一起，写出了《莎菲女士日记》，而沈从文则花若干年与湖南的军人们探索文学的前景，从那以后，他们两人从未在北京见过

面。现在,1949年,在中国动荡的环境下,她帮不了他——或许是有意不去帮他。2月1日,北京大学出现了许多匿名大字报,重新引用郭沫若和共产党的其他一些代言人以往对沈从文的批评,对沈进行攻击。这些大字报指责沈从文反动、道德败坏,是一个“文学娼妓”。恐吓信雪片似地飞往他的家中,有的是人身暴力威胁,有的画上子弹,还有其他一些警告。沈从文的处境与三年前闻一多在昆明所经历的处境没什么两样,他开始神经紧张而且魂不守舍了,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送给了学生和朋友们,并对其中一个人说,看样子我难免一死了,但这些书没有过错,没有理由让它们陪我同去。最后,这种焦虑日甚,他悄悄离开了北京大学的寓所,躲到清华园附近的朋友家里,随后他的家人也跟了过去。

在沈从文设法隐身埋名的同时,丁玲却继续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熠熠生辉,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惊人成功,丁玲也扶摇直上。1月份,在北京失守之后,蒋介石辞去了总统职务(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头衔,可惜尚未保持到一年)。3月,丁玲所在的委员会组建了新的文化机构,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此刻,共产党军队已横扫华中,推进到长江北岸。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了南京,这时,丁玲正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中国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7月,她回国出席文联正式成立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会上讲了话。至此,解放军已攻克了上海和武汉。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丁玲作为全国文联常设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尽职尽责(该常委会由21位艺术家和作家组成),并被任命为《文艺报》的编辑,该报拟作为党新建的文艺机构的喉舌。此时,中共的军队击溃了蒋介石在华南的最后一些支持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

成立。两个星期后，解放军占了广州。丁玲再次出国——这次是去莫斯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32 周年。与此同时，重庆和昆明相继落入共产党手中，至此，内战基本上结束了。

谁也没有料到共产党军队的胜利如此迅猛，也没人料到能够避免内战升级的极度痛苦。虽然中国面临着一大堆难题，如惊人的通货膨胀、数百万难民、土地改革只是局部完成、毫无经验的干部进入国家机关，以及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等等，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对于长期战争的结束感到由衷的欣慰。胡风就是其中最高兴的一个。在 1936 年上海的文学论战中，胡风曾是鲁迅的朋友和伙伴，战争期间一直在重庆，现在回到了北京。他在 1949 年写的《欢乐颂》一诗，概要反映了他当时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我的战友
我的同志
我的兄弟
我看见了你！
你在臭湿的工房里冻饿过
你在黑暗的牢狱里垂死过
你和穷苦的农民一道喂过虱子
你和勇敢的战友一道喝过雪水
你受过了千锤百炼
你征服了痛苦和死亡
这中间
多少年多少年了

但你的希望活到了今天这个日子
但你的意志活到了今天这个日子

今天
在激动着你的此刻
也许你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但过去的一切
使你纯贞得像一个婴儿
仿佛躺在温暖的摇篮里面
洁白的心房充溢着新生的恩惠^①

老舍则没有这份激情。内战时期他在美国呆了三年，那是在1946年初，也就是在闻一多拒绝到加州执教的同时，老舍接受了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计划的邀请前往美国。老舍旅美期间事事不如意。有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他刚到美国不久，想尽量与当地入搞好关系，结果在纽约的塔夫脱旅馆里被一个他信任的男子骗走了50美元现金。有些事情则很大，比如他的声誉问题。1945年，纽约出版了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英译本。该书被“当月好书俱乐部”选为好书，并成为畅销书。但当老舍仔细一看译文时——他从未授权翻译此书——他对译本的成功发行大失所望：小说的整体结构被改得面目全非，也许是为了迎合美国与战时盟友加强团结的需要，也许是为了满足公众求乐的愿望，译本中删除了原书中所有的纠葛，不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在老舍的原作中，黄包车夫祥子精神崩溃，身体饱受淋

① 《胡风的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0—11页。

病折磨，变得弯腰驼背，与他相好的女友小福子上吊自杀，祥子自己沦为替警察做眼线度日。而翻译者绝口不提祥子的性病，还让他的女友死而复生，净化了祥子的行为，甚至把这个变节的异己分子改造成了一位有影响的官员。在原著的结尾，祥子蹒跚在街头，寻找人家扔掉的烟头，他曾天真地希望个人主义能实现他的种种幻想，而今却成了一个牺牲品。但英译本的结尾则说，祥子身强力壮，抱起他的女友在田野里奔跑，去迎接一个新的黎明：“夏日的黄昏微微带些凉意，跑着跑着，怀里女友的重量慢慢地变轻了，并紧紧地依偎着他的身体。她仍然活着。他也活着。他们自由了。”

老舍与他的中国友人谈及这些改动时异常愤怒，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法律手段予以纠正。不过他开始极为上心地（后来更加慎重）为自己的战时小说寻找译者，此后他又有两部小说被译成英文出版，但并没有像《骆驼祥子》那样受到普遍欢迎。在滞留美国的三年中，他越来越多地批评美国和国民党。老舍生气，根源可能在重庆，抗战时期他居住在那里，为国民党写宣传文章，而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北京。说来也怪，他的家人们现在居住在重庆（他们是在抗战结束前才搬去的），而他却到了纽约，他肯定很担忧家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内战又起，一方面通货膨胀惊人。老舍在《猫城记》里曾明显表露过的那种对中国文化的忧虑此刻再度出现，在谈及五四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已公开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时，他非常气愤。与此同时，他对美国试图干预中国内战的不满，已超过对共产党的批评。老舍对1947年魏德迈将军访问中国尤其不满。1945年在重庆时，魏德迈曾积极支持蒋介石，时隔两年他再度造访，显然是打算进一步扩大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帮助他们在满洲和华北与共产党作战。

到1949年,老舍对美国的种种事情越来越恼火,从艾伦·拉德和贝蒂·菲尔德担任主角的影片的剧本,到冰淇淋和可口可乐,他都感到厌烦。然而老舍最终作出回国决定却并非易事,他是在1949年秋天作出这一决定的,当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无可争议了。对于一个曾著书辛辣嘲讽“大家夫司基主义”,并明确认为激进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来说,决定回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临行前几天,一位住在旧金山的好友赶来看他。他们一起坐在金门公园里的一个草坡上,老舍一声不响地思索着。轻风徐徐吹过,从远处动物园方向传来一阵铜管乐声,惊醒了他的沉思。他对这位友人说,他回国以后将恪守“三不原则”——不谈政治、不参加会议、不讲演。但在当时那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想奉行这一信条,绝非易事。1950年2月,老舍与丁玲一样,也成为全国文联常委会成员,并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分析说,美国已“堕落为法西斯主义”,海内外的中国人必须在“两大阵营”中选择其中的一个。

同月,毛泽东自莫斯科回国,他在那里呆了九个星期,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中苏双方签署了一项条约,内容包括双边安全、贸易协定以及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一些技术援助。但条约没有承诺给予中国任何重大帮助,对于这样一个大国加入共产主义阵营,苏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的迹象。

从这时起到年底,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投身到土改计划的实施中。党根据40年代在华北取得的经验,动员数十万名干部下乡工作,组建农会领导贫农和中农斗争地主。下乡的干部往往是先选择一个村作为“示范点”,很快这个村就成为周围各村的样板,干部们教给贫农和雇农如何评估村里不同阶层人拥有的财富价值,鼓励他们“诉苦”,倾吐过去经历的困苦;就像丁玲

曾生动描写的那样，干部们带领农民上街游行，宣布哪些人是地主，然后把他们当众羞辱一番，有时还要予以痛打或者处决。

这个过程十分艰难，充满了暴力色彩，也出现了种种始料不及的问题：地主们把钱财和谷物藏匿起来，分送土地以隐瞒实情，宰杀牲畜、砍伐果树以减少表面财产，或散布谣言，说国民党军队不久就会打回来进行报复，以此威胁恐吓农民。但是到1951年底，原来地主和富农统治中国农村的局面已被彻底摧毁了，土地和财物除了少量留给地主富农以维持生存之外，全部分给一亿多户贫苦家庭。尽管由于贫穷户太多，每户得到的土地都很少；在人口稠密地区约人均五分之一英亩（约合一市亩二分），在人口稀少地区或赤贫地区大约人均一至二英亩。但不管怎么说，这场涉及全国大众、以激进方式对私有财产进行的重新分配，实际上结束了中国旧有的生活秩序，尽管还没有废除土地的私有制。

伴随着土改计划的实施，1950年《婚姻法》颁布了，这项内容广泛的法律，目的是从暴虐的强制婚姻中解放妇女，为她们离婚打开大门，同时，该项法律也有一些保护儿童的条款，规定禁止溺婴和买卖幼儿。尽管遭到许多男人的强烈反对，但这项法律还是实施了。由于内战和1950年底的朝鲜战争，有些地区的男性比例很低，在这些地方，妇女对于土地改革显得十分重要。于是，丁玲1942年提过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妇女无论是否以妇女身份出现，都不能超越经济革命的需要。在《婚姻法》颁布后一年之内，共有近一百万名妇女离了婚，这证明许多妇女原来是深感压抑的。

但是，在经历了28年的漂泊与征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政府，还没有力量使社会生活和

各个方面都发生剧烈变化。对于中国的工业,党的政策是审慎的,他们鼓励那些资本家和主要管理人员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而不管他们从前是否与国民党或外国帝国主义有联系,以便中国的工业生产能继续发展。当务之急是通过稳定工资和物价、控制食物的分配,抑制过去十年来形成的致命的通货膨胀。为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建立必要的官方机构,还要形成一个忠于共产党的工会制度,以便打破黑社会把持运输工人、苦力和码头工人的局面,并消除这些行业中的犯罪因素,此外还必须取缔那些操纵妓院和鸦片生意的团伙。

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在邀请支持这些政策的社会知名人士时,在党的多次会议上以及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都指出,中国目前已进入各阶级联盟的“成熟阶段”,在新的联盟中,工人、农民将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三种人的权利将被剥夺,即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阀,因为他们曾对内实行恐怖,对外勾结美帝国主义。作为农村经济运动的延伸,毛泽东提出了一项“思想改造”计划。这项计划将利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和1948年批判萧军的经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因为这些人从他们根深蒂固的阶级立场出发,显然不愿意为新社会的成员们作出必要的奉献与牺牲。

这场新的整风运动,主要目标是根除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下述几种现象:一是过分推崇西方;二是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革命的紧迫性;三是自甘颓废或无病呻吟。1949年五四运动30周年之际,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前,批评家茅盾发表了一篇演说。茅盾曾尖锐地攻击徐志摩过于推崇泰戈尔。此时,他与丁玲和郭沫若一道在文联工作。在演说中,他把上述

种种文化现象统称为“买办文化”，意思是说，就像在旧的经济体系中中国商人为西方贸易公司效力一样，他们不知不觉中帮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忙：

买办文化可以说是帝国主义文化的干儿子，依大城市为据点而伸长其触角。小资产阶级是买办文化最易蔓生的温床。崇拜洋人、醉心欧美生活，“月亮也是外国的亮些”，——总而言之，在人民中间散播民族自卑心理，就是买办文化的特长。尤其恶劣的，是专拣中国的一些封建性的颓风敝俗，用贩卖假古董的姿态，写成书本子，在博得洋主子一笑之余，赚几个赏钱，以自满足其物质欲。^①

这些论点到 1950 年时成了中共政策的主要偏见。这一年里，茅盾被任命为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和文化部部长。1950 年 10 月出现的紧张局势又加剧了这种偏见。当时朝鲜爆发了战争，在美军和联合国部队逼近鸭绿江后，中国决定出兵。这一决定，使全国再次回到一种抵御外敌的战争状态，也加速和强化了国内的各种运动，相应地也导致中国秘密警察和公安机关规模和实力的上升。首先发起的是“镇反运动”（镇压反革命），使大约一百万人受到审判和处决，这些人在 1949 年以前有的是国民党党员，有的替外国人做过事。此外，党还发动了“三反运动”，目的是加紧清除党内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像肃清国民党残余一样。而“五反运动”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在 1949 年以后继续

^① 茅盾《还须准备长期而坚决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49 年 5 月 4 日第 5 版。

留在国内帮助恢复经济的财务和管理人员,他们此时被指责为行贿、偷税、诈骗、盗窃政府财产和国家经济情报。“思想改造计划”的基本原则是,在党的指导下自我检查与承认错误,同时加紧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这一改造运动实际上是经济变革与内部“清理”交互重迭的结果。

老舍从美国动身回国时虽然顾虑重重,但此时面对这些新的压力却表现得十分镇静。在他早年的一部短篇小说《矿工生活》——这是借一位北京警察之口讲述的一个悲剧性故事,描写了20世纪初中国的种种腐败和灾难——被改编成电影,并且按照党的要求加上了一个欢乐的结尾,老舍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这种做法,与美国人未经允许翻译的《骆驼祥子》如出一辙,但如果老舍还打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位令人称道的作家的话,他就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事实上,他很快就转而适应社会主义现实的新要求,而且颇为成功。1950年他写了一部新剧本《龙须沟》,剧本描述了北京一条污水河沟两岸穷人的悲惨生活。这一作品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对照:1949年以前,臭水沟两岸的居民过着梦魇一般的生活——疾病蔓延,时常有人溺水身亡。居民生活不仅受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操纵,还要受贪婪的国民党政府盘剥,政府非但不治理河道,还向已经身处绝境的居民征收“卫生捐”。与此相反,共产党清理了河道,为穷人找到了工作,还铲除了霸道的恶棍,实实在在地净化了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1951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老舍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通过参加一次“批斗”大会,心里异常兴奋。这样就更坚定地表示了他与共产党政府的一致。这篇文章被正式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地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呢，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①

第二年，在一份正式的“自我批评”声明中，老舍写道，他将永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前进，彻底改正思想上和生活上的错误。

与老舍相反，沈从文感到这些新的压力几乎无法承受。虽然他在1949年保住了在北京大学的工作，但批评的矛头一直对着他，几个由干部和学生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常常奉命“清洗”他的思想，对他进行“劝告”。1950年他被解除教职，并被指派学习“革命课程”。据他的一位后来离开了中国的朋友说，不久，沈从文家庭内部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了，因为他的夫人在政治上

^① 《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1951年10月1日)第20页。

越来越积极,他的两个孩子在老师们的鼓励下,也写文章肯定自己和母亲的正确社会立场,对父亲的“反动”观点表示悔恨。他的小儿子在一篇文章中称父亲是“所谓的”作家,由于他的理解能力模糊不清,因而现在已陷入病态了。文章中还说,他们家里的其他三位成员,下班或放学以后,常常在晚上努力“改造”他。这位朋友还说,在这段经历中有那么一个时期,沈从文多次尝试自杀,他喝下大量煤油,割喉、割腕。在医院中醒来时,他总以为是在监狱里。出院后几个星期依旧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惨相,面颊和双眼浮肿,鼻子不停地出血。当问到他这段经历时,他伤感地倾吐了心中的郁闷。

他说,我怎么能理解这种事呢?那些在舒适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有钱,可以出国留学,一直生活在社会的上层。他们今天祝贺某权贵的生日,明天又参加另一位显要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掌权了,那些人仍然生活在社会的上层。我来自乡下,当了很多年兵;就算我过去受的政治教育很有限,到现在也仍然落后,但为什么不给我一个赶上机会呢?我究竟犯了什么特别的罪过?共产党究竟要让我怎么样?如果他们明白地告诉我他们想干什么,我当然遵命。死吓唬不了我,但为什么这种不明不白的诽谤偏偏指向我?我有许多老朋友都在共产党内,比如丁玲,还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

但是,丁玲却没帮他多少忙。她正在证明自己纯正的党性,极力避免任何有可能削弱她在《文艺报》地位的行为,为证实她的革命资历,她采取了种种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大力颂扬她的前夫胡也频。因为党在寻找1931年遇害的共产党员尸骨时,确认胡也频等人为革命烈士,并把他们的遗骨从龙华的乱坟岗迁移到上海郊外新建的“革命烈士公墓”。党还下令收集编纂胡也频

的遗作，并派丁玲督促指导这项工作。文集定于1950年11月出版，丁玲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批评了自己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抑郁伤感”、“百无聊赖”和“偏执”，接着，毫无理由地把沈从文贬低了一番：

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①

这样一篇评论肯定是很有分量，因为丁玲的声望在1951年达到了顶点。这一年里，她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获得斯大林奖金，这部小说是两年前被译成俄文的。她还奉命在北京组建中央文学院，目的是培训青年作家，这使她有权高居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之上，她同时还兼任了党的宣传部要职。因此，当1951年她请沈从文为她的杂志写篇文章时，沈从文感到摸不清她的动机，于是对她说，“我已与新的文学报刊失去了联系。最好你给我找两篇可读的文章，以便我知道该写些什么。”

同年他写的那篇文章，显然表明他力图缓和与当代文学理

^① 《丁玲文集》第5卷第150—151页。

论的关系,并重新评价自己为何没能成为革命的积极分子。他承认,早年在军阀部队里的经历使他对政治深感绝望,所以在20至30年代,他采取了旧知识分子的自由态度,认为文学不可能也不需要与政治结合,并觉得这种结合甚至是一种错误。没想到,他的作品“帮了国民党封建统治的忙”,“被聚集在蒋介石周围的一小撮人利用了”,尤其是蒋的亲属、臭名昭著的宋氏家族。沈从文对他早年的写作生活作了如下正式总结:

一九二八年以后,我生活转入了学校,和当时的英美系争民主自由的人发生深一层联系,在工作态度上虽还照旧,生活方式却逐渐变质,成了半个知识分子。一面是社会接触面不出同事和同学,一面是读书范围越杂乱。写作精力正旺盛,而新出版业方兴起,读者群展开到了学校以外的现代企业中,工作受刺激和鼓励,我成了一个写短篇的热闹人。二十年来大部分作品多产生于这个时间内。一部分作品,虽比较具进步性,另一部分作品,却充分反映出一个游离知识分子的弱点,文字华丽而思想混乱,有风格而少生命。大部分是无助于人民革命,对年轻人前进意志,更容易形成麻痹和毒害效果的。特别是用佛经故事改造的一些故事,见出是我的杂学的混合物。佛教的虚无主义,幻异情感,和文选诸子学等等的杂糅混合,再发展即成为后来的七色魔等极端病态的、邪僻的、不健康的格式。而促成这个发展的,还显然有弗洛伊德、乔伊斯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①

^① 《大公报》(上海版)1951年11月14日第2版。

这段表白似乎令正在调查他的干部们很满意。经过一段短期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之后，沈从文得到了一个新职位。也许是为了突出他主要思考往事的特长，他没有被派去教书，也不搞创作，而是在原来的皇宫、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整理文物。

在随后的几年里，沈从文逐渐成了中国早期丝绸设计制造和唐宋青铜镜方面的专家。老舍又写了几个剧本，并跟随一个慰问团去了一次朝鲜，还被任命为作协副主席。丁玲则成了批评犯错误知识分子的先锋。从1952年底到195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相对轻松、和平的一个时期：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政府得以放心地关注内政，但台湾问题尚未解决，因为美国的第七舰队仍在台湾海峡巡逻游弋，中共军队无法尝试两栖作战，尽管很想试一试。同一年斯大林的去世，减轻了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斯大林的继任者还同意把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交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1954年越南战争结束，在停战谈判上，周恩来担任了法国与越南之间的调解人；翌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非东盟国家外长会议上，在讨论远东战略过程中，周恩来起了重要的缓和作用。在国内，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看来很成功。没有经过任何流血事件就逐步没收了外国在华资产；国内工业也和平地实现了国有化，并纳入国家的长期发展计划之中。1953年中国进行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总人口数为58260万。在苏联技术援助下，一些大型的水电站尤其是在黄河干流上筹建的水电站已开始动工。军队重新装备，参谋系统也重新改组，以避免再犯朝鲜战争中使中国出现重大伤亡的那些错误。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战后的经济重建，为国内的文学、戏剧和电影

提供了大量素材,也为严格界定当代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创造了机会。

农业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刻。党的领袖们开始推广一套国家信贷机构与农村供销合作社相结合的复杂制度。这一制度连同“互助组”(鼓励贫苦农民联合互助的组织),目的都是使私人耕作越来越无利可图,因此也就为实现农业集体化铺平了道路。但这一进程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中国农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只有拥有土地,才能使自己及子孙过上好日子。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对这种观念作过生动的描述。佃农侯全忠老头过了大半辈子穷困日子,当原来的地主把地契交给他时,起初他不敢接,他已经习惯了苦命,觉得应该把地契退回去。经过村农会会员和他儿子的劝说,他终于意识到土地是自己的了:

也有人赞叹道:“这老头可老实,一辈子就给他糟践,如今算醒过来了!”侯清槐也笑道:“爹,菩萨不是咱们的,咱们年年烧香,他一点也不管咱们。毛主席的口令一来,就有给咱们送地的来了,毛主席就是咱们的菩萨,咱们往后要供就供毛主席,爹,你说是么?”侯全忠谁的话也不答复,只痴痴的笑,最后有人问他:“这地要分给你了,你还退给人家么?”他只一个劲的摇着头,答道:“不啦!不啦!昨天那末大的会,还不能把我叫醒么?哈……”^①

不过,到了1953年,政府开始谨慎地调整经济政策,鼓励向

^①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278—279页。

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在合作社成立初期，土地所有制的原则仍然保留着，其他各种社会经济特征也都保留着，因为每个农民仍然根据他或她交给合作社土地和牲畜的多少，获得一定比例的回报。但到1955年年中，一切都变了。那年夏天，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惊奇地发现，剩余农产品太少，难以维持预定的工业发展步伐（农民们生产的粮食多了，但吃得也多了），他们还发现，在很多农村，富农家庭再次与贫农拉开了距离，于是，他们下令立即着手实行农业的全面集体化。废除地契，意味着个人或家庭只能保留一小块自留地种些蔬菜，也可以养猪养鸡。这一过渡快得惊人。到1956年初夏，中国已有7400万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61.8%）加入到集体化，到同年夏末，这一数字已上升到90%。

这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新阶段，虽然很感人，但事实上比土改初期最剧烈的时期还难于描述（不论是政治性言论还是文学），大多数知名作家对此都保持沉默，其中也包括丁玲。政府当然是掩饰这种巨变所产生的紧张局势，因为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地方性的以及不同年龄下部之间的矛盾冲突：如北方的干部南下到刚刚解放的南方，城市干部下放到农村；再比如，数百万新入党的党员，开始与那些1949年以前或1945年以前或1934年以前入党、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们争夺职位。两位在全党颇有实力的人物遭到了清洗：一位是高岗，被指控企图在东北南部的重工业区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以及“从事阴谋活动”；另一位是饶漱石，罪名是抗战时期在延安、解放以后在上海曾有“无耻的欺骗行为”，此外，他与高岗同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结成了“反党联盟”。1954年，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撤销了所有职务，从那以后没再露过面。

类似的冲突也出现在上层文化官员中,他们之间的摩擦与分裂更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在50年代初,丁玲似乎已与周扬平起平坐了,周扬1936年在上海曾反对过鲁迅,1942年在延安期间也反对过丁玲。但从1953年起,丁玲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她被迫陆续放弃了各种编辑职务和在文联常委会中所担任的职务,她所创建的文学院也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她依旧很起劲地批评其他作家——其中一些人原来曾是她的好友,说他们不注意群众的需要,但她本人仍追求尽善尽美,鼓励作家们创作完美的作品,以鲁迅的小说和曹雪芹在18世纪写的《红楼梦》为典型范例,呼吁党的文艺干部们不要对作家使用“家长式权威”,因为那样可能压制作家的创造性。由于丁玲除一些短小的新闻报道文章外已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她只能表示公开支持作家在社会中应占有重要地位,以此得到一些自我安慰。最后,丁玲被推到政治圈的前沿,她一度控制的《文艺报》也被指控为在上海和东北建立“独立王国”。

在批斗丁玲之前,党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家胡风和冯雪峰身上。这两个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也都是鲁迅的生前好友(冯雪峰也是丁玲的好友),抗战期间他们主要生活在重庆,当时他们批评延安的共产党人企图操纵文化,并创办了一份杂志反对这种倾向。50年代初,两人都因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思想而受过批评。1954年底,党从批判胡风的文艺观念转变为对他进行政治批判,在1955年将他逮捕并关入监狱,指控的罪名是反革命、国民党特务以及反共地下网络的头子。丁玲预料到那些憎恶胡风的人也不喜欢她,所以她在1954年底开始在党的一系列会议上不断地作自我批评。但这些批评既没有得到公众的谅解,也没有被党接受。不久她住进疗养院。1955年,党派一个专门调查

组调查她的情况，她离开了这个临时避难所，打算脱离北京的文艺圈和政界，到北京西郊过平静的生活，那里距30年前她与胡也频一起做穷学生时的住处不远。但丁玲的这一努力没能成功。1956年，大权在握的文化界领袖周扬对丁玲本人开始了攻击，并详细列举了她一生中的“反党”行为。丁玲再次做了长长的自我批评，又一次未被谅解，但是从她那时写的文章的一些片段中（其中一篇是为纪念胡也频而作），人们可以看出她的思想倾向。她写道，由于她在青年时代经受了太多的磨难，所以她的作品中确实“充满了对社会的蔑视，也太执着于描写个人孤寂的灵魂”。五四时期的人物已为她的思想定了型，而且非常深刻，所以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得不到帮助，内心极其孤独，但仍要努力寻找一条前进的道路”。

这些请求同情的表白并未奏效，但到1956年年中，国家政策的发展却使丁玲得到了短暂的喘息之机。那年5月，毛泽东担心，由于干部们的保守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习惯，过快推动农村集体化运动，会产生许多无法收拾的严重问题，所以迫切需要联合知识分子更有力地支持他，于是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让那些自认为怀才而未被国家所用的人恢复自信心，既涉及艺术创作与人文科学领域（“百花”），也包括科学研究与实践（“百家”）。

许多中国人对这场运动的反应出奇的谨慎，但也有一些人相信，这一次党真正打开了批评之门。曾翻译过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黄秋耘在1956年秋写道：

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饥饿，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

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①

对于黄秋耘提到的上述种种现象,老舍已经提出了挑战。1956年初,他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了一个新剧本,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李文明的骗子,在50年代初,他伪装成一位受伤的战斗英雄混入共产党内。由于一些共产党干部把他捧得很高,其中有些人还想沾他的光,他得到了很多荣誉,所以,李文明成了人们讽刺共产党的一个极好的陪衬。到1956年底,老舍和其他中国作家一样,想试试这次给的新自由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西厢房里,年轻的周小姐正在听广播里吐字清晰的一首新诗。这能叫做百花齐放吗?”老舍此处所说的“西厢”一词,一语双关,既指14世纪中国描写浪漫爱情的剧本《西厢记》,该剧一直为中国人所喜爱;也指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亲西方文学的倾向。为了揭示外界变迁对中国的影响,老舍创作了他最著名的剧本《茶馆》。

《茶馆》发展了他在小说《矿工的生活》(八年前被拍成电影)中开始表露的思想。这次老舍抓住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件大事,集中在三个时间段,每件事构成剧中的一幕,场景是北京的

① 《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第58页。

一个茶馆，通过茶客与茶馆主人的生活经历和谈论展开。茶馆虽然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改动，但一看便知是同一个地方。第一幕发生在1898年秋天，百日维新之后，康有为逃亡海外，他的弟弟康广仁、学生谭嗣同被杀头；第二幕发生在191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袁世凯死后，张勋扶植已退位的皇帝溥仪复位也归于失败；第三幕也是在秋季的一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和美军刚刚占领北京，但没有明确说是哪一年。在这一剧本中，老舍塑造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物形象，再次赞美了他似乎情有独钟的北京，也盛赞了中国人民的才智和勇气，就像他在写《骆驼祥子》以来一直尝试的那样。与此同时，剧情中又意味深长地留下一些可作两种解释的内容，剧中的反面角色是政府，政府残酷、无情、无能而又无所不在。从满清政府到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政府，如果这些角色的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着某种逻辑性的话，那么不难想像，共产党干部也有可能成为同样的焦点。

黄秋耘和老舍都属于老一代作家，是五四运动时期受西方文学培养的，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激励了一大批30年代中期出生的年轻人，这些人此时都是20岁左右，即将完成大学学业，或者刚刚开始为共产党政权工作。年轻作家王蒙写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在1956年9月的《人民文学》上，这部小说可看作这批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作家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22岁的共产党员，和现实生活中的王蒙一样，急于为党和国家效力，令他失望的是，在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中，就发现他的上级们大多懒散、不讲效率，待人要么虚伪圆滑，要么盛气凌人。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只有等到“有人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工作单位里弥

漫着令人厌烦、相互猜疑的气氛,只是在极少的情況下——比如,无忧无虑地与一位年轻女同志聊聊天,轻松片刻,一起听听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主人公才能得到一丝情感上的共鸣,使烦躁的心绪得到一点充实。

毛泽东虽然要求大家展开公开批评,但反响并不强烈。1957年1月,毛泽东出版了他个人的诗集,所收的全部是旧体诗,目的显然是让那些担心自己的“旧式体裁”作品会受指责的人打消疑虑。为了平息党内对“百花”方针的批评,毛泽东于1957年2月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6月份公开发表时题目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译注),他颇具说服力地警告说,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大胆的斗争,中国人民才能把革命推向深入,才能达到更高水平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1957年春末,毛泽东承诺要保障更多的言论自由,大多数知识分子终于相信了。五六月间,一大批学生、作家、教师、画家、医疗工作者以及宗教团体的成员,试图恢复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坦率与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他们唤醒了几乎已被人忘却的许多名字和文化模式:许多大学里开设了讲授罗素和凯恩斯学说的课程;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用拉丁文写了一项声明,要求研读拜伦的诗篇,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学习二流的苏联作家的作品。还有人把1955年的胡风案件与1894—1906年的德雷福斯^①事件相提并论,并评论说法国人正准备为这桩他们错判的案件“翻案”。

^① 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1894年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因而激发了一场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经重审于1906年予以平反。——译注

新一代人的呼声日高。林希翎，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曾发表过有关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论文，也曾在人民解放军部队里短期服过役，1957年5月她刚满21岁，但已因精彩而有说服力的校园演说而出名了。她自称“小鬼”（30多年前，作为学生的许广平，在她的老师鲁迅面前也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宣称所有的中国人都应坚持自己对社会表示不满的权利，不论是现在还是在今后五百年里；她提出，要以铁托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中国走出目前的困境。

这些似乎还不够，于是大字报也公开张贴出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棘手问题。毛泽东因为首倡批评运动，此刻被置于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尴尬境地，于是在1957年6月底，他决定终止这场运动，而发动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他在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解时说，“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①

这一转向的出现，对丁玲来说可能是最为不利的，因为在“百花齐放”运动的初期，她似乎得到了一个重返文化领导机关的良机，并可能击败她的对手周扬。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深入，1957年夏天，党内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丁玲极力否认对她的种种指控，声明自己在1933—1936年间，从未向国民党出卖过共产党同志，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也绝无诋毁党的意思。她说她所有反对党内某些干部的主张，都从未违背过党的正确原则。她显然还试图通过退出作协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和声望，但她失败了，反对她的斗争愈演愈烈。整个7月几乎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页。

天天开会,每次参加会议的都有两百多人,会上,丁玲和她原来在《文艺报》的同事陈企霞受到批判,并就是否对党忠心受到质疑。8月3日,陈企霞先屈服了,他承认自己犯有种种反党“罪行”,交出了前几年与丁玲的全部通信,并指责丁玲企图“抢夺文艺界的领导权”。从1957年8月7日北京党的官方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报道中,可以推测这些指控造成的后果: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陆续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以丁玲、陈企霞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斗争,该反党集团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权,极力实现个人权力欲望。

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活动包括: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供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会上还揭露,丁、陈反党集团曾经密谋在今年十月准备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向党大举进攻并公开分裂文艺界。他们还企图利用他们的追随者把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变成他们的喉舌……

陈企霞在会上承认了他的反党罪行,但丁玲仍然拒不认罪。^①

① 《新华社新闻稿》第2613期(1957年8月7日)第3—5页(略有改动)。

丁玲拒不接受这些指控，因而在党内激起愤慨。赫鲁晓夫在苏联谴责斯大林使人们深感痛心，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反对国家的方式（即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又令人警醒，这些事件都使得对党的忠诚变得更加重要。到9月底，为丁玲的案件又召开了27次专门会议，文艺界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也开始对她进行批评：老舍说她有一种“优越感”，因而总是看不起其他作家；《子夜》的作者茅盾，1952年曾被丁玲无情地批判过，他认为丁玲以自我为中心，沉溺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之中；鲁迅的夫人也是学生许广平则指责丁玲是“一本书主义”，意思是说一位作家不顾生活和党的要求，只是自私地去创作一部完美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一指控，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表示赞同。这时还出现了一幅漫画，画的是胖胖的丁玲懒洋洋地躺在一棵摇钱树下，支撑她的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上面写着“一本书主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1948年以来，丁玲确实没写过什么长篇作品，但这种批评并不是只针对这段时间，还追溯到她的过去。此外，也出现了对她的人身攻击，在共产党的批评家们看来，丁玲最终已“变成”了她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这种倾向被党的官员姚文元（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夸大了，他指责丁玲在早期作品中，试图用色情描写娼妓的生活。他还写了一篇题为《莎菲女士的自由王国》的讽刺文章，把丁玲与莎菲和延安的护士陆萍揉在一起。最后，在1956年1月，《文艺报》出了一期专刊，重新登载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并围绕这两部作品展开批判。这一期的一篇编者按指责丁玲在作品中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并说她在南京人狱期间已变成国民党特务。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莎菲女士在延安》，文章说，“丁玲、莎菲、陆萍，其

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她们共同的特点,是把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拼命地加以美化。她仇恨的不是延安的某些事物,仇恨的是延安的一切。她不是同某些人斗争,而是同延安的‘所有人’斗争。她否定的不是某些工农兵,否定的是工农兵的整体。”^①

后来这些攻击性文章,丁玲可能都没有看到,因为1957年9月,她依然拒绝认错,党的领导机关十分恼火,革除了她剩下的所有职务,将她逐出作协,开除党籍,并把她送到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到松花江北岸汤原镇郊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那儿离中苏边界不远。

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大跃进”运动,这是一项骇人听闻的空中楼阁式的计划。此前,中国共有70万个农业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平均大约一千人,经过集中和重新组合后,变为24000个公社,每个公社拥有三万人或者三万人以上。组建人民公社,目的是把农业、地方工业、教育、国防和医疗卫生诸功能集于一体,既分散经营,又能自给自足。与此同时,毛泽东宣布,中国朝共产主义迈了一大步。在城市里也出现了公社化组织,通过摧毁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残余的个人主义,使工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全民性组织中,从而加快生产步伐。城市里所有闲置的小块土地都用来生产食物,农村的自留地和家里的厨房都交给了集体,与此同时,农村每一个生产队都要建造一座小型土高炉,用于冶炼中国工业发展所需的钢铁。

实施“大跃进”的动力来自多种因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成功,加上农村合作化和工业国有化的顺利实现,在某种程度

^① 《文艺报》1958年第2期第11页。

上增强了对中国经济内在实力的信心；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似乎象征着社会主义比西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毛泽东与党内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1955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在1956—1957年加强党内批评的过程中，都已明显地表露出来，这种现象促使毛泽东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以防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但也正是这些因素的消极作用，导致了1959—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自然条件恶劣，劳动者负担过重，以及违背规律因而无望完成的统计数字，所有这些，使许多重大的经济目标未能实现。苏联对这一急躁冒进的计划给予严厉的批评，激起中国人作出了痛苦的反驳。中共党内的责难和清洗使领导层发生了分裂，并导致了政策的反转。1959年春，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仍保留了党的主席之职），由刘少奇继任。同年夏天，国防部长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强烈批评，他坚信苏联的技术手段对中国的军队和政府都同样适用。毛泽东在寻找到足够的支持者之后，把彭德怀排挤出了党的高级领导层，并派他去从事艰苦的工作。

在此期间，丁玲被指派负责汤原的养鸡场。她后来回忆说，她渐渐地喜欢上饲养家禽了，并成了照顾病鸡的专家，她把病鸡抱回她住的小窝棚里，放在热炕上，经过精心照料，许多病鸡都重新变得活蹦乱跳了。50年前她曾看她家的仆人这么做过，那时为了贴补家用，仆人养了一百多只鸡。丁玲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说，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使她对这些病鸡的处境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同情。于是她开始潜心研究养鸡的方法，闲暇时，她还用牙膏盒或其他能找到的材料制作鸡的模型。她还要求帮助当地的教育，承担了大量教学任务，包括在公社里教成年人读书识字。

1960年,丁玲获准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基层干部会议,从那里她可能了解了一些“大跃进”失败后的重大政治反应。连续几年的粮食严重歉收,使中国农村出现了可怕的困苦,公社的数目激增到七万个,但每个公社的人数则大大减少了。集体食堂不得不取消了。由于土法炼出的钢铁都是不合格的次品,所以遍布各地的小高炉也被纷纷拆除。在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受到挫折后,刘少奇的地位逐渐加强,而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有些动摇。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之后,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了。但是丁玲只能通过一些令人痛心疾首却又十分重要的细节回顾那段岁月。1961—1962年,汤原地区的食品极度短缺,以至于她无法实施她的教学计划。农民们太累太饿,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她只好凭记忆给他们讲一些她在延安和其他地方的故事,在吃过少得可怜的午饭后吸引一些热心的听众,以排遣他们的忧愁。虽然这段日子贫困交加,但丁玲晚年回忆起来却带着一丝留恋。陈明作为她未举行过正式仪式的丈夫,从在延安时就与她生活在一起,此时也获准来陪伴她。虽然栖居在遥远的北大荒,但他们在生活中总能找到些许浪漫的色彩。她后来写道,那些年里,生活中也有令人愉快的时刻,比如到河边去洗衣服,或者在下雪的冬夜里,看完电影后与陈明一起步行回家,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被大雪映白的夜色。她说,她在延安的日子比这苦得多,常常上抗日前线写报道。而汤原的农民对她很友善,尽管她背着“右派”的黑锅,头上顶着在莫须有的时间被判定的莫须有的罪名。

第十三章

叛教者之声

在“百花齐放”运动和“大跃进”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党努力寻求适度的妥协让步。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限制有所放松：以往作家和艺术家们只能严格遵循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路线，只能利用与革命和阶级斗争有关的可接受的资料，所创作的人物形象必须有清楚的阶级背景，“好”、“坏”分明，现在，他们则可以开始揭示“大跃进”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了，中国农民在经历了两年集体化的狂热之后，现在又被允许种自留地了。政府对私有农产品买卖的严格控制也放松了，公社领导也有了较大的自决权，随着共产党鼓励城乡各阶级劳动者退回到切合实际的生产目标，一种实用主义气氛开始遍及全国，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对这种实用主义作了简洁精辟的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伴随经济紧缩而来的是行政机构的改组更新。毛泽东曾满心指望依靠集体中的英雄主义行为，改造中国人自身和中国社会，但是现在这些方面却迫切需要审慎的计划。共产党员人数

到1961年已增加到大约1700万,他们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地方干部大多来自社会的贫困阶层,他们赞同毛泽东的激进变革主张;但位居地区决策机关要职的则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纪律性较强的干部。毛泽东对新形成的保守与因循守旧的局面感到非常吃惊,于是在1962年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重申阶级斗争在中国的重要意义,鼓励贫农再次认清隐藏在从前的地主、富农中间的阶级敌人,同时要求农村干部每年必须有一段时间亲自下田劳动。

这场新运动的中坚是大批工作组,这些工作组由富有经验的共产党干部组成,他们被派往农村,在农民中间“扎根”,取得农民的信任,然后揭露出地方干部中违法乱纪或堕落的典型。但几乎从一开始,这一做法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工作组有时滥用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忠心耿耿的干部错划为异端分子;同时,他们凭借权势,越来越多地干涉农村工作,至少毛泽东相信这些现象是存在的,特别是在邓小平和刘少奇为下乡调查的干部重新制订了基本的指导思想之后。新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似乎还常常压制农民中的激进分子,同时保护已放不开手脚的上层干部。河北省一个县的情况使毛泽东的担心加重了。当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亲自率领一个工作组在那里开展工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地85%的干部不是腐化,就是实行“自发的资本主义”。王光美在汇报中写道,整个地方组织“基本上已不属于党了”,而是“一个两面派的反革命政权”,她建议彻底改变地方的领导权。

毛泽东觉得这种判断可能会损伤真正的农民革命者的信念,而且表明他苦心经营的关于区分两类的不同性质矛盾的论点彻底失败(他说过,“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温和的方式处理,而

“敌我矛盾”才需采用暴力手段解决),所以,他指示通过各种报纸和宣传媒介,广泛宣传那些他认为已取得重大成就的农村生产大队,比如位于山西省一个贫困山区的大寨。大寨先是在40年代末迅速成立了互助组,紧接着在50年代初成立了合作社。虽然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但一个被派往大寨的“清查”小组考察后发现,大寨的成就远不如宣传的那么大,因为当地的干部们自吹自擂,他们上报的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数字都是虚假的。

1964年底,毛泽东亲自与大寨大队的负责人谈话,此后,他似乎认定,目前党内有人企图公开推翻他所树立的一切,但他已经指示新闻界树立一些出身于农村贫困家庭并英勇献身的感人典型,以此来增加他倡导学大寨的分量。他在1963年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就可以看作是这一战术的一个例子。雷锋是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1939年出生于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曾当过拖拉机手、炼钢工人,之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牺牲。雷锋平凡而普通的一生正好代表了毛泽东一贯尊重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的军人身份暗示着毛泽东决定利用军队,作为反击党内“右派”的基地;而雷锋对毛泽东著作的崇敬,又为了一场全国性的更严重的毛泽东个人崇拜埋下了伏笔。

1966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林彪带头向军队传达毛主席语录并大加颂扬,还收集成册,称为“红宝书”,称毛泽东为“伟大的舵手”,“最最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老舍等知识分子只能重新克制,静待事态的发展。一些高级官员,例如邵荃麟,早在1962年就曾十分明确地提出,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扩大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允许

他们写一些“中间人物”——就是说，作家们塑造的人物形象，一头是作为最完美典型的纯粹的解放军战士和英勇的贫农，另一头是罪恶的地主和国民党匪帮，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可称为“中间人物”。邵荃麟在大连的一次会议上曾提出过这一观点：

“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创造人物主要依靠人物的行动，言行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行动表现出矛盾的具体化的东西。写人物，应该注意写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心理就是灵魂——这是灵魂工程师的任务。^①

但是，他的主张并未被接受，丁玲是“右派”之一，此时她以往的著作也被挖出来并加以引用，说明邵荃麟的路子是错误的，尽管邵本人曾是丁玲的强硬反对者。

像老舍这样的人，尽管在写《龙须沟》时表现得“很好”，但也不是邵荃麟所说的那种忽视人物的内在需求、片面分析“反映人物矛盾的自身行为和心理”的作家。早在1957年老舍写完《茶馆》时，读者大概就看到其中又出现了某些辛辣的讽刺，类似《猫城记》和《骆驼祥子》的笔调。在《茶馆》第一幕即将结束时，一个茶客听说谭嗣同因追随康有为进行戊戌维新而被处斩的消息时，问道：“谭嗣同是谁？”另一个茶客回答说：“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通过类似的描写，老舍暗示：

① 《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3页。

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滥用权力，而普通老百姓则一直默默地忍受着。对于一些真正的活动家，老舍则大加赞赏。他钦佩秋瑾，因为她写出了许多反映内心极度痛苦的诗篇；他推崇鲁迅，因为他用辛辣犀利的文章警醒世人，不要面对不平沉默不语；甚至对萧军和丁玲，老舍也深表钦佩，尽管他们目前的政治处境不佳。在其他一些评论中，老舍以文艺批评为掩护，采取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严肃态度，而表面看起来却是兴高采烈——至少那些看过《猫城记》并记得其中的主人公的读者会这样认为。老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也用了快板的形式，可还是极好的诗！诗要简练，这一句极简练。诗人并不多说什么：

“天明了半天，
东方已经发了红，
太阳就要出来了；
啊，毛泽东就好比是
中国的太阳啊！”

他只简练经济地写出那么一句，可是气魄有多么大，句子有多大分量，感情有多么深厚，声音有多么响亮，念出好听，唱也好听！^①

^① 老舍《福星集》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玩笑如果开得过头就可能变成麻烦,但老舍把这段评论夹在整个长篇文章中间,许多读者都不会太注意;他没有像60年代的其他学者那样,以报刊文章和历史剧等形式,通过历史讽喻对党的领导层进行批评。而吴晗此时却写了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共产党的干部们,后来是毛泽东本人都把这一剧本理解为是对“大跃进”的批评,同时也暗含着对刚刚被毛泽东罢黜的彭德怀元帅的同情。毛泽东以此为导线,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最后阶段。这场在1966年新发起的政治运动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热血青年纷纷涌入北京,聚集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

这些十六七岁甚至更小的年轻人,都出生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次他们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体验一下1935年那次著名长征的某些经历。尽管毛泽东的初衷是利用这些年轻的“红卫兵”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官僚施加压力,但这些青年人却几乎代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立场,有着各不相同的目的:一些人来自农村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他们认为自己受教育或晋升的机会被掌权的保守势力剥夺了;有些人是“右派”的子女,他们认为由于父母的过错而同样被剥夺了上述机会;有些是从城镇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的青年,他们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机会回家;另外一些是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人,他们受党内某些有个人野心、试图巩固自己手中权力的干部的鼓动,长途跋涉到北京。农村公社里、大学内、工厂中,自称“根红苗正”的人越来越多,难以分辨,也难以证实;一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另一些人则通过加快革命步伐,报复性地攻击原来的对手。红卫兵焚烧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殴打“从前的资本家”,要求提高工资,捣毁艺术品,改换“反动的”街名,绑架围攻中央委员,冲击一个

又一个校园，建立新的工人管理的人民公社，高呼紧跟“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总之，这些红卫兵们以疾风暴雨的速度，迅速成为受人操纵的一群，也似乎成了左右国家局势的主人。

1966年与1967年的那种过度的激昂与愤怒情绪，现在已经很难重现，敌人被彻底地消灭了，而中国的所有国家机构——文化、政治与经济——也都几乎陷于瘫痪。世界各国的一些青年得知中国的年轻人可以肆意攻击他们的长者，竟欣喜若狂，比如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也着实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在中国国内，后果更为严重得多，因为有毛泽东亲自支持，又有正规军队的观战和助阵。邓小平、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以及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受到公开羞辱，并被赶下台。周恩来的处境一度也很危险，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因想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势头而受到批评。原来的知名人物，要么被打翻在地，要么被改头换面；有些学生组织了一个“鲁迅兵团”，专门对付当权人物和走红的高干子女；另外一些人把矛头指向已故多年的瞿秋白，因为他曾写过一篇有失败主义言论的《多余的话》，其中似乎有轻视党的意味，他们还砸毁了位于北京革命烈士公墓里的瞿秋白墓碑，甚至掘了他的坟。与此同时，红卫兵各派之间也互相攻讦：出身工农家庭并想在党内往上爬的年轻人，高喊要打倒那些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青年，因为这些人 在高考中成绩比别人好，等于控制了上大学的机会，因而较好的职业也都归了他们。工农出身的红卫兵造谣说，那些“后门儿硬”的年轻党员们“一心只想着小轿车、小洋房、白大褂和实验室”。他们大喊要打倒人民共和国的“老爷、少爷”，其语气听起来酷似1903年年轻的邹容抨击满清贵族：“从前，你们享

受特权,骑在我们头上拉屎,炫耀你们高人一等。今天你们得接受专政,也得受受罪。”那些“后门儿硬”的学生们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的名誉,也开始反击。他们与那些被严禁与党沾边儿的地上和国民党后代联手,常常闯进政府机关,把那些记载着他们家庭的旧事因而将危及他们前途的可恶档案统统毁掉。

至于老舍是如何或者为什么成为攻击对象的,目前仍不太清楚。他的几部新剧本当然为人熟知,但大多数红卫兵都太年轻,可能没有看过电影《矿工的生活》。那么,他们知道他喜爱狄更斯的小说吗?他们中间有人读过《猫城记》,有人领会他所说的“大家夫司基主义”的含义吗?他对新诗的评价年轻人接受吗?也许,正如当时许多遭批斗的人一样,仅仅因为他年老、出名并吸收了足够的被认为是西化的外国文化,这些就足以打倒他了。许多人可能认为老舍挨批与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关系。1966年5月他对几位西方记者说,“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摧毁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但我不能写有关这场斗争的情况,因为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无法像北京的学生那样去感受和思考……”

1966年夏天,老舍又退回到他过去的生活中,潜心创作一部自传体小说,描写清末旗人家族的生活。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最时髦的是每样东西都用西方的——小说初稿的最后一段写道,一些人聚在一栋清代阁楼里,窗户上安的是玻璃,屋里的陈设也全是西式的——桌子上摆西式茶具,地面上铺西式地毯,屋顶上装西式吊灯……

1966年8月间,老舍奉命与北京市委的领导们一起参加了一系列“学习班”。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他已经67岁了,腿疾困扰着他,此外还有支气管出血——因面中间给他放了

几天假，让他呆在家里，与夫人和四个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四个孩子中，有一个女儿是物理学家，一个儿子是木工），以利身体的康复。这期间，他曾给好友诗人臧克家打电话谈了自己的处境，臧克家自1935年就与老舍结识了，是闻一多的生前挚友，抗战期间在重庆写过一本书《逮捕》。他能够理解老舍正在经历的事情。老舍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激动，他告诉臧克家：“我正在接受教育！”8月23日，老舍又被叫去参加了另一个会，这一次完全是“批斗会”，是一群加入了红卫兵的中学生组织的。老舍被迫在台上举着标牌站了好几个小时，牌子上写着他是反革命，是罪犯。据说他还被迫戴上一顶纸糊的大尖帽，红卫兵们还用剧院里做道具用的木棒子打他。就在他挨斗的同时，他的家被抄了，很多书籍和收藏品被毁。第二天他又被叫去开会，又一次挨打。当天夜里，老舍死在清代旧京城西南角附近的太平湖中，也许是投湖自杀，也许是被审讯他的人打昏之后扔进湖里的。出事地点的主管部门下令立即将尸体火化，因而根本不可能全面验尸。

丁玲在遥远的北方省份黑龙江也许是因祸得福，躲过了老舍等人在大城市里遭受的厄运。但丁玲也经历了一段凄惨岁月。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1964年，当她和陈明被从汤原转到更靠北的萝北县时，她在集体农场的那种好日子就结束了。在萝北，她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得不到任何写作文具，还被勒令与陈明分居，来自汤原和萝北的几个造反派小分队，彼此明争暗斗，他们轮番让丁玲参加“批斗会”，使她不仅精神紧张，也受了很多皮肉之苦。丁玲后来对记者说，她坚信，来自汤原的一些朋友看起来对她很严厉，实际上保护她免遭萝北激进分子的虐待。但1966年夏天之后，丁玲完全被萝北的激进

派接管了。在批斗大会上,她受尽了屈辱,不仅遭拳打脚踢,还要长时间地“坐飞机”(双腿直立,上身前弯成90度,两臂向后平举)。她在汤原时一直在创作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也被造反派抢走并毁掉了。这部手稿拟作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描写1946年傅作义的部队攻占张家口地区以后那些农民革命者的命运。她还被强行搬出宿舍,独自一人住在牛棚里。尽管如此,丁玲后来却说,对她的这些虐待在事实上保护了她,使她避开了一些非人的折磨。

在那一段漫长而黑暗的日子里,她唯一的安慰就是收到陈明写给他的小纸条。这些便条有时写在废纸碎片上,有时写在火柴盒或香烟盒,甚至晒干的玉米皮上。陈明和大伙儿一块路过了丁玲住的牛棚时就顺便把小条扔在地上,有时也采用其他方式偷偷地夹带给她。尽管红卫兵后来发现并烧掉了这些纸条,丁玲也没有泄气,因为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所以她早就强迫自己记住了纸条上的话。陈明在一张纸条上写道:“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们啊!人们也同我们一起祈求。”他还写道:“黑夜过去,曙光来临。严寒将化为春风,狂风暴雨打不倒柔嫩的小草,何况是挺拔的大树!”还有,“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①

尽管“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几千起像老舍或丁玲这样的个人悲剧,但这场“革命”在彻底推翻旧的政治秩序方面并不成功。

^① 《丁玲文集》第5卷第350—351页。

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混乱，毛泽东被迫动用军队平息学生的情绪，解决红卫兵各派之间的争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但知识界的局势又在摇摆动荡中持续了十年，因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掌握了文化大权，她提出要建设一种纯粹的中国社会主义艺术，既不受西方的影响，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残余。各种民间艺术、民间舞蹈、民间故事、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以及共产党的英雄业绩，都被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形式，作为向中国人强行灌输的精神食粮。1966年下半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曾一连几个星期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这些人陆续返回田间和工厂很久以后，在他们心目中，天安门仍然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象征。

尽管“文化大革命”似乎已渐入低潮，但江青对一大批知识分子自延安时代就已经形成的积怨却越来越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逐渐变成了中国文化的旗手，她对知识分子的怨恨经姚文元的煽动，愈演愈烈。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的反右派期间，姚文元曾全面而恶毒地批判过丁玲的作品，现在成了“四人帮”之一，紧跟江青之后，而江青似乎从“文化大革命”中攫取了最大的权力。1970年4月，丁玲被中央文革小组从萝北召回到北京时，本以为自己“得救了”。但这种乐观想法很快就消逝了。她被送进了京郊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关在一间小牢房中，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指定让她看的书，第一年是《毛泽东选集》共四卷；第二年是经过党认可的马克思、列宁著作选编，共六卷；此后阅读的范围较广泛，包括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著作，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她每个月可以到户外锻炼一次，但与陈明和其他朋友的所有联系都中断了。她后来叙述这段经历时说：

如果我碰巧想写点东西,我没有笔,没有纸。如果我有什么事,想与某人说,囚室里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这是隔离,完全且绝对的隔离。自我出生以来,从来没有这种被隔离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之中,我白天被打被羞辱,或是被迫受到一些“坐飞机”之类的体罚,但是到了晚上,我还能有份属于自己的恬静时刻。如果陈明也在这儿,我们可以彼此交换心中的感受,相互安慰鼓舞。苦涩的泪水还可以哭出来,可以不必承受整个的怨恨。但是被单独关在这里,由白天到夜晚,又由夜晚到天明,日日夜夜、夜夜日日。我所能选择的只有面壁而坐,或是在两壁之间走来走去。孤寂像一条毒蛇,啃噬着我的心灵。

在五四运动以前的军阀统治时期,鲁迅曾同样用毒蛇缠绕心灵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孤独。那时,他遇不到任何人,也找不到任何人,看不到丝毫希望。他只有—种忽隐忽现的机会,即帮助某位新的勇士“在孤独中前行”,而丁玲连这一权利也被剥夺了。30年代中期,丁玲在南京被囚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记得,当时的看守们在执行公务时还多少带有些人情味。但对于70年代的第二次坐牢,她的印象却不太一样:

也许很可笑,但是这一次坐牢,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十足自信的念头,一个十分“浪漫”的幻想:我幻想着终有一天,有一位好心的狱卒——就像在旧戏剧中常见的好心狱卒——大发慈悲心肠,看我寂寞得可怜,为我捎来我丈夫的信。在信

中陈明会写几句话来安慰我，鼓励我。我寂寞无奈地日盼夜盼，我又悲伤地把昨日的希望一个个地埋藏在心里。我一连等了一千八百个日日夜夜，但一直没有期盼到我所渴望的信。

丁玲说，她在监狱的五年中，没有一位朋友去看过她，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在哪儿，而不是出于无情或害怕。“像她那样的人是不会有问题的，你用不着为她担心”，沈从文的一位学生 1973 年 5 月来北京时，沈从文这样告诉他。尽管沈当时已有九年没有见过丁玲了，但他相信她还在黑龙江，“身心却很健康”。沈从文的这一误解显然是根据自己当时相对舒适的处境作出的判断。采访他的人发现，他一直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安心研究古代服饰收藏品，心情愉快，精力充沛。1962 年，党派他去参观毛泽东在 1928 年创立的井冈山游击根据地（现在，那里已辟为全国性的纪念圣地，供人们了解当年的革命斗争和生存情况），他写了几首小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创作过任何作品，但他似乎对出版历史资料感到很高兴。此外，他说，他的两个儿子工作很安稳，都是机床车工。同时，他的家庭也颇受优待，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能获准在湖北乡下的一间小屋度假。

采访沈从文的人曾是闻一多的学生。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后，中美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旅美的中国学者也第一次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这位采访者就是这第一批客人中的一个。尽管中美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但中国国内在林彪于 1971 年摔死之后（据说是阴谋杀害毛泽东未遂），政局一直不稳定；此外，中国还面临着来自苏联的战

争威胁和美国在越南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整个大学教研机构在中断几年之后依然十分混乱；大批城市青年仍被不断地送往乡下，以免在城市里失业。全国人口总数已超过了警戒线——九亿。在“文革”的动荡中爬上来的四位新领导人，虽然在毛泽东的荫佑下权势越来越大，但也没能稳定住政治局势，因为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患了癌症，但全力支持邓小平（1966年被赶下台）复出掌握了大权。

1974年，党发动了一场令人难以理解的群众运动，即“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肃清林彪的余毒。党内有人认为，林彪的反动思想与孔子如出一辙。孔子在公元前5世纪封建国家兴起时，反对中央集权，反对经济进步，林彪反对毛泽东与此类似。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方面功不可没，从历史前进的步伐来看，毛泽东可与秦始皇媲美。在这种紧张的表象背后，掩盖着毛泽东已病重的事实。几年前狂热不羁的数百万革命青年，此刻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仍茫然无知。不过，有一点他们非常清楚，那就是在干部的选拔方式上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政策已明显地转向不利于那些受过任何西方教育的人或父母在1949年以前是社会名流的人——他们还知道，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凄惨的失败。

这种紧张局势被三位原来的广州红卫兵利用并加剧了。广州市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是闹得最欢的中心之一。这三个年轻人在1966年的境况都很不错：其中一位刚刚从广东艺术学院毕业，另两位都是干部子弟，正在上中学。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满意的职业，也没有任何能替代“文革”激情的事可做。1973—1974年间，他们三人联合拟订了一份宣言，并于1974年11月7日张贴在广州街头，署名“李-哲”，这是他们三人名字各取一字的组

合。宣言长达 67 张,连接在一起约 100 码(约 90 多米)。宣言声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反对“林彪体系”。李一哲写道,党现在已取缔了原来的革命大字报,“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化公为私”,从而建立“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方式”,换句话说,少数干部垄断了稀有物资和资源,而要求其他中国老百姓跳着“荒唐的忠字舞”,起早贪晚地工作,只领取微薄的工资,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林彪的“半法西斯式的封建独裁统治”,仅在广东省就残杀了四万人,并把成千上万的人关进“渣滓洞式的牛棚”。请问,人们应如何区分这种行为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军阀或国民党的行径? 这些事件与 1925 年的“五卅惨案”、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1927 年的“四一二政变”有什么不同?

三位作者继续写道,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法制体系荡然无存,中国人民又“获得了新的锁链”(这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最后一行的反语)。人们只知道要求中国的青年们英勇无畏、“反潮流”,但青年人甚至都无法具备鲁迅那样的勇气,因为鲁迅在绝望时,还有日本友人帮助他出书,而在 70 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党禁止青年人发表文章,那么青年人就求告无门了。中国人民“就像一位来自南方河流众多地带的游客,只有在他进入沙漠地区时才知道水的珍贵”。李一哲呼吁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是在 1964 年召开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主义民主权利。

但李一哲从人民代表大会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安慰。1975 年 1 月,四届人大终于召开了。会上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取代 1954 年宪法。尽管新宪法庄严地宣布,中国已从“人民民主国家”(1954 年宪法的提法)转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国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民

公社是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但是,这届代表大会将原来宪法中赋予的一些自由权利都删除了,包括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等等。新宪法增加了第13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但党对李一哲大字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三个人投入监狱(这三个人在1978年全部获释)。

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个月后,丁玲获释,就像五年前她被捕时一样令人感到突然。她和陈明一起被发配到山西省长治市去帮助照顾老年人。他们两人依然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长治,丁玲可以写作了,她开始重新构思那部被毁的小说初稿,题目是《在严寒的日子里》。她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这里的人们对她非常友好,气氛与萝北大不一样。但好景不长,1976年1月,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丁玲的梦破碎了,因为她一直把周总理当成保护她免遭江青迫害的人。随着他的离去,丁玲感到自己能否活下去比过去更成问题了。她后来写道,当时,她在自己家里为周总理设了一个小小的祭坛,并抄了一份邓小平对已故总理的颂词贴在墙上。做完这一切之后,她就战战兢兢地在家里等待着。

周恩来的去世,引起了中国人悲愤的大爆发,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政府的预料,当局本打算低调处理人们的反应。但到了4月,清明节扫墓期间,成千上万人涌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诗篇和花圈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与怀念。悲哀在不知不觉中化为愤怒,游行演变成骚乱,就像二三十年代的几次游行一样。警察和部队都出动了,当局逮捕了很多参加者。许多人遭殴打,许多财物被焚毁。人民受到了重创。邓小平遭到当局的责难,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国内政治这种令人痛苦的扭曲，逐渐遍及全国，由于这种动荡在中国历代王朝都预示着分裂，因而也同样预示着毛泽东晚年已接受的帝王思想（至少他认可了将他与秦始皇相提并论）即将终结。几周之后，在朱德（7月6日）与毛泽东本人（9月9日）相继逝世之间，一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地震，将中国北方城市唐山夷为平地，大约75万人在地震中丧生（原文如此，与我国统计公布的数字有较大出入——译注）。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这是国家将有重大政治变动前兆。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四人帮”就被清除了。在涉及毛泽东追悼会的图片中，经过现代技术处理，凡是有这几个人对毛表示敬意的地方，都被抹得干干净净。

“四人帮”垮台后，受诬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平反昭雪，不论是否健在；活着的官复原职；已死的开追悼会并恢复名誉。现在，党把中国所有的倒退统统归罪于“四人帮”。复出后的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走“四个现代化”之路——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寄希望于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带进一个崭新的时代。1977年8月，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开创一个大团结的新时代。如果说这一阶段使人重新回忆起康有为年轻时代梦想的话，那么还应指出，这其中也包括了他的学习西方科技以自强的思想：大会提出了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十年规划，确定了将要完成的120个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厂、九个有色金属加工厂、八个煤矿、十个石油和天然气田、六条铁路干线、五个港口、三十个发电站。该计划的前八年里，农业产量要年均增长4%—5%，工业产量年增长率要过10%。在这一发展阶段结束时，中国将拥有四个独立的工业区。每个工业区都自成体系且强大有力。1978年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了一部新宪法,其中有三项修改条款,对科学家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第12款宣布,国家将“大力发展科学,扩大科学研究,推动技术进步与技术革命”;第13条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第14条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下文紧接着又说:“一切文化活动”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明确保证将不再采用旧的“体力”与“脑力”界限来区分技术熟练人员(毛泽东过去常常这样做)。他说:

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邓小平的这席话，加上党在新宪法的前言中承诺要努力创造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反响。实际上，新散文、新诗歌、新型研究团体和新杂志的纷纷出现，不同于21年前的“百花齐放”运动，倒更接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或者晚清读书人在上海和日本所发起的运动。

1978年11月下旬，在原来的紫禁城附近，即后来被称为“西单民主墙”的地方，出现了多次集会，这些集会引起了极其热情与坦诚的讨论。

在这些争论中，对毛泽东的批评越来越普通了。一位“原来的知识分子”、现在的工人说，毛泽东后来“变得耽于内省了，由于他读了太多的古书，他无法看到国外科学的迅速发展，也无法听到人民的迫切呼声”。另外一些青年作家则借用鲁迅惯用的语言和隐喻。“四人帮”曾把鲁迅变成一个人们狂热崇拜的对象，在70年代初，书店里除了毛泽东的书以外，一度几乎全是鲁迅的著作。邓小平复出后，也把鲁迅的文章当作批判“四人帮”阴谋诡计的锐利武器。1979年，青年们避开对鲁迅作品的过分赞扬和过细解释，而是抓住鲁迅关于“医药”的比喻。声称“引进技术”这剂药，对中国来说还很不够，只有通过改造整个“上层建筑”的自觉意识（一位作家补充说，就像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努力做到的那样），中国才能摆脱麻痹意识，才能不再沦为“东亚病夫”。

类似的言辞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1979年12月8日，政府下

令取消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的权利。1980年1月17日，邓小平宣布，在适当的时候，将从宪法中取消允许张贴大字报的条款，因为这种权利被某些极端个人主义者滥用了。

大约在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当时仍在山西劳动的丁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1979年2月，丁玲被召回北京；同年7月，她在1957年和1958年受到的所有指控都被取消。尽管她当时身体有病，但还是同意参加全国作家与艺术家大会并发表讲话。大会是在1979年10月底至11月初举行的。在会上丁玲对过去的一切没有责怪任何人，她说，没有哪个人是坏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与整个社会都有关系。这种看法贯穿了她的整个发言，而她慎重选用的一些代名词更使发言显得十分精彩：

我一九二七年开始写小说，前前后后写了五十二年，当然，五八年以后中断了二十年。三十年代，国民党禁止我的书，五八年以后，我们自己也禁止我的书……

“文化大革命”里打倒的大都是好人，不是坏人，现在可证实嘛！……被“四人帮”打过的，这些人是好人，大家心里清楚，有的人虽说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但五八年被打倒的人呢？是臭的！是被我们自己人划的……但这些人真的应该被批倒批臭吗？我反复地问自己，是不是应该讲讲这些事情。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坐过国民党的牢，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坐过“四人帮”的牢，所以，一些好心的朋友们劝我不要再过问这些事了，不要再提他们了。难道我是一个昏昏噩噩，没有思想，吃了饭就睡觉的人吗？我就一点感触都没有吗？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吗？所以我想一想，不管怎样，我也要来讲两句真话。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

最自私的人。^①

丁玲似乎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即中国社会里仍然存在着“封建”因素。她说从她还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时，就已经开始抨击中国的种种弊端了。她对中国的青年人充满信心。她特别提到，她这20年来真正感到的遗憾是，她的书一直遭禁，有整整一代中国人，就是现在大约30岁左右的人，根本没读过她的作品。

丁玲对中国文化界和政界领导人的委婉批评，被登载在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这样，全国各地都能看到并引用她的评论。虽然她表现出了足够的政治勇气（也正好可以为即将进行的审判“四人帮”提供证据），但丁玲对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却只字未提，而37年前，1942年在延安的三八妇女节时，她专门论述过这一话题。此时她避而不谈也不足为奇，因为此刻的中国，大多数妇女并不要求党普遍关注妇女问题，她们仍受传统的就业和家庭方式限制，对在工厂、部队和政界工作的丈夫也很体谅。

不可否认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对青年人来说，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难以阐释的困惑。他们在党的声音不断改变的世界里为生存而挣扎着，邓小平第三次上台之后，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及其同伙提交公审，与此同时，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丁玲在内）纷纷撰写歌颂文章，试图恢复瞿秋白死后的英名。在经过多年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历代封建主义的严厉批判之后，人们应如何理解与美国和日本重新开展大规模的贸易？对

^① 参见《丁玲文集》第4卷第343—359页。

于大批中国杰出的学者被指定去研究康有为的著作、研究光绪皇帝、研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戊戌变法的教训,人们又当如何看待呢?

无论如何,丁玲获得了自由;作家王蒙,这位“百花”运动时党内的批评家,在被流放新疆 20 年之后,也自由了。沈从文的状况也不错,他得到了出国签证,前往美国探望在耶鲁大学教中国书法的妻妹。老舍的《茶馆》重新公演并受到热烈欢迎。一位署名“北岛”的中国诗人写了一首诗,对所见所闻给予了最贴切的回答。诗的总题目叫作《太阳城札记》:

生命
太阳也上升了

爱情
恬静,雁群飞过
荒芜的处女地
老树倒下了,嘎然一声
空中飘落着咸涩的雨

自由
飘
撕碎的纸屑

孩子
容纳整个海洋的图画
叠成了一只白鹤

姑娘

颤动的虹
采集飞鸟的花翎

青春

红波浪
浸透孤独的桨

艺术

亿万个辉煌的太阳
显现在打碎的镜子上

人民

月亮被撕成闪光的麦粒
插在诚实的天空和土地

劳动

手，围拢地球

命运

孩子随意敲打着栏杆
栏杆随意敲打着夜晚

信仰

羊群溢出绿色的洼地

牧童吹起单调的短笛

和平

在帝王死去的地方
那支老枪抽枝、发芽
成了残废者的拐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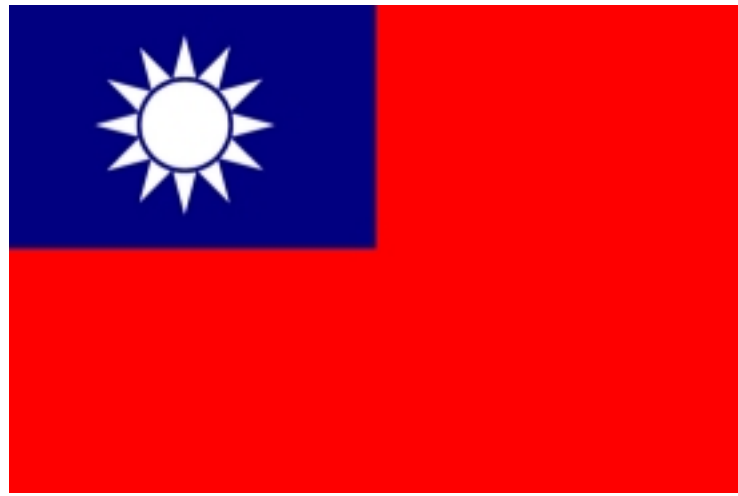
祖国

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
靠着博物馆发黑的板墙

生活

网^①

① 《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25 页。



更多好書:

<http://mybooks.googlepages.com>